

三联
耳关

生活

2017.6.26
2017年第26期
www.lifeweek.com.cn

周刊



三十岁的恐慌

如何度过1/4人生危机

942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5元



《纽约时报杂志》(美国) 2017.6.18

切尔西·曼宁的孤独之路

因泄露美国构架丑闻机密而被判处 35 年监禁的切尔西·曼宁，在奥巴马在任的最后时刻被提前写入特赦令名单，仅服刑 7 年，于今年 5 月释放出狱。服刑期间，他接受了变性手术，成为一名女性，这让她在狱中变得更孤立无援。出狱后的曼宁通过《纽约时报》首次公开讲述了自己参军后泄露美军丑闻的过程以及对自己的性别认知和坚定态度。



1 / 《新科学家》(英国) 2017.6.17 站起来! 别被压力打败

工作、孩子、贷款、肥胖这些身体和心理的负担都是让现代都市人疲惫不堪的压力，可能会引发持续性炎症，最终导致心脏病、抑郁症、慢性疼痛、神经退行性疾病等各种疾病。我们往往忽视了炎症的严重性，我们并不真正了解身体的保护性免疫过程，寻找新的治疗炎症的方法并非要彻底阻止其发生，而是要更加了解身体与心理的连接，从而防止现代生活心理病对身体健康的侵蚀。

3 / 《展望》(英国) 2017.6 永不止息的保守党

提前进行的英国大选结果出炉，尽管英国最古老而成功的政党——保守党，仍然是下议院第一大党，但由于未达到超过半数席位，因此自动失去获得单独组阁的机会，英国将再次出现“悬浮议会”。这个国家在脱欧的重要问题上，没有任何改变意见的迹象。伴随着脱欧，下一届政府将面临行政和外交政策的艰巨挑战。

2 / 《经济人》(英国) 2017.6.10 “恐袭”与互联网

英国接连发生恐怖袭击，巨头互联网公司再次成为舆论指责的对象，Facebook、谷歌等网站对暴力视频视而不见，成为恐怖分子的“帮凶”。制定新的相关法律变得迫在眉睫，“纵深防御”可将风险降至最低。另一方面，互联网公司也必须看清现实，无拘无束的自由时代已然结束，获取巨大利益的同时，对社会的责任也必须成为互联网行业巨头应该付出的代价。

4 / 《时代》(美国) 2017.6.27 Uber 的失败

美国时间 6 月 13 日，Uber 公司 CEO 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宣布他将暂离目前的岗位，在此期间只参与重大的战略性决策，这无疑给长期笼罩在负面新闻下的 Uber 公司更增添了一丝危机。Uber 在短短几年中迅速发展成一家估值近 700 亿美元的巨头，颠覆了全球范围内的出租车行业。但它自始至终都不曾摆脱丑闻的困扰，如被指控性骚扰、窃取商业机密等。





P30 封面故事

如何度过 1/4 人生危机

三十岁的恐慌

- 32 三十不立：推迟的成年
- 44 “最强大脑”王昱珩：洞悉世事地活在自己的世界
- 48 俞飞鸿的“无所谓”
- 52 缪钦：在对抗中保持年轻
- 56 立与不立皆辛苦
- 58 盛年当前
- 60 年轻潮和无龄感，被同步消费的时尚

P66

科尔：巨人谢幕



P124

于佩尔：行走在电影国



社会

- 时事：科尔：巨人谢幕 66
- 热点：“隐形人”倒下的路口 74
- 热点：NBA 总决赛：勇士王朝奠基礼 78
- 调查：三里屯“脏街”的命运 82
- 人物：从徐扬到赵永勇：18 年回家路 92
- 访古寻城：奈良若只如初见 102

经济

- 市场分析：养老金回报下降 64

文化

- 话题：“深夜食堂”这味药 110
- 文化：24 年后，终南山再寻隐士 114
- 专访：除了兵马俑，中国如何向世界展示自己？ 120
- 电影：于佩尔：行走在电影国 124
- 戏剧：《彼得·潘的冒险岛》和戏剧“游乐场” 130
- 艺术：舞蹈是对人性本身的庆祝 132
- 设计：超越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界限 138

- 时尚：文化挪用是一项“罪名”吗？ 144
- 书与人：王德威：召唤虚构的力量 152

专栏

- 邢海洋：审美疲劳后的 SUV 16
- 苗千：一本流行科学杂志的生存之道 148
- 张斌：22 块奥运金牌下的“恐惧文化” 150
- 宋晓军：特朗普在中东玩的是“红白脸”？ 151
- 朱伟：苏童：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 (7) 156
-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 158

环球要刊速览	2	声音	21
读者来信	8	生活圆桌	22
天下	10	好东西	26
理财与消费	18	个人问题	160
好消息·坏消息	20		

2017年第26期，总第942期，2017年6月26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主编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谢先凯 Xie Xiankai 袁越 Yuan Yue

陈晓 Chen Xiao 蒲实 Pu Shi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a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曹玲 Cao Ling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丘谦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张雷 Zhang Lei 苗千 Miao Qian

记者 Reporter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杨丹 Yang Dan

刘敏 Liu Mi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宋诗婷 Song Shiting 王海燕 Wang Haiyan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鲁伊 Lu Yi 赵潇 Zhao Xiao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执行图片总监 Executive Photo Direc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菲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潘海艳 Pan Haiyan 张富伟 ZhangFuWei

发行服务 Circulation Service

李卫红 Li Weih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乔龙宁 Qiao Longning

王霄 Wang Xiao 王荻 Wang di 金宇迪 Jin Yudi 姚贺梅 Yao Hemei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市场发展中心 Marketing Development Center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傅东方 Fu Dongfang

电子阅读 Electronic Reading

刘国强 Liu Guoqiang 辛军 Xin Jun 连子君 Lian Zijun 张莉 Zhang Li

微博微信 Micro-blog WeChat

执行主编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薛芃 Xue Peng

内容编辑 Editor

刘彭媛 Liu Pengyuan 刘凌 Liu Ling

视频 Video

吴冰川 Wu Bingchuan 李倩 Li Qian 孙明楷 Sun Mingkai

活动 Event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傅东方 Fu Dongf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连华伟 Lian Huawei

运营 Operational Manager

罗启宏 Luo Qihong 周宇飞 Zhou Yufei 邢宇 Xing Yu

节气刊 Solar Term Department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王晶 Wang Jing

设计 Design

袁媛 Yuan Yuan

衍生品创意 Derivatives Creativity

总监 Director

王小峰 Wang Xiaofeng

熊猫茶园事业部 Panda tea garden Department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程磊 Cheng Lei

运营部 Operational Manager

殷佳婷 Yin Jiating 常晓红 Chang Xiaohong 白玥 Bai Yue

孙名梓 Sun Mingzi 王瑶 Wang Yao 李晓光 Li Xiaoguang

设计 Design

杨雨然 Yang Yuran

松果生活事业部 Songguo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魏一平 Wei Yiping

运营部 Operational Manager

宋洋 Song Yang 孙正之 Sun Zhengzhi 尤帆 You Fan

奚牧凉 Xi Muliang 陈璐 Chen Lu 牛家欢 Niu Jiahuan

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蔡华 Cai Hua 夏青 Xia Qing 李璐 Li Lu 李加贝 Li Jiabei

潘鸿 Hannah Pan 陈陌陌 Chen Moyang 陆汉夫 Lu HanFu 王岂庸 Wang Qiyong

技术部 Department

黄勇 Huang Yong 卢威彭 Lu Weipeng 石亚刚 Shi Yagang 于欣然 Yu Xinran

田盼 Tian Pan 王星宇 Wang Xingyu 洪靖慧 Hong Jinghui

深圳城市频道 Shenzhen city channel

吕薇 Lü Wei 邓雅菁 Deng Yajing 钟婉仪 Zhong Wanyi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金桥律师事务所 马眉 Ma Mei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商务推广合作电话：(010) 84681038

联系人：连华伟

E-mail: lianhuawei@lifeweek.com.cn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 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 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51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0063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上海：上海汇敦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21) 63769858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 (025) 83327129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2100585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阳：大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934765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 (0791) 88820509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993043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 (0551) 64252409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封二~扉1 · 海坨山谷

3 · WWF

17 · 三联全媒体

63 · 承德·避暑山庄

113 · 生活周刊

119 · 松果生活

129 · 三联中读

159 · 三联书店

封三 · 熊猫茶园

封底 · 卡萨帝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果 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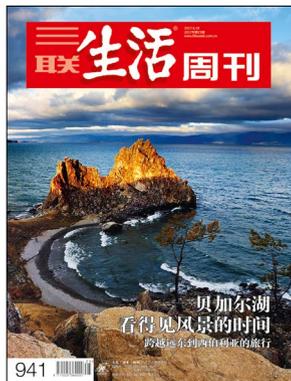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五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贝加尔湖：看得见风景的时间

非常喜欢三联的“行走体”封面故事。从以前的滇藏线、三江源，到近两年的尼泊尔、不丹和这期贝加尔湖及远东之旅，都给人心灵的安宁与力量。这种文字不仅呈现出异域的独特风光，更是将当地的历史背景、人文风情写得深刻，途中的小插曲、小玩笑也能成为万字长文的点缀，让我读得如痴如醉。在李健的歌声中，贝加尔湖有几分阴柔之美，但通过这期封面的讲述，更能看到其中的历史纷争和远东的壮阔之美，让我心向往之。

(@鲁宁)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平台(lifeweek)，回复您对封面故事的评论，精彩留言将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中。

烦人的在线教育平台

前几天，学校突然通知班主任们到电教室参加“在线教育平台”APP的使用培训，大家实在都没兴趣。

这些年教师网上培训名堂太多，培训之后极少有教师能学以致用，教学实际工作中，新技术根本就用不上，只有参加优质课或者观摩课比赛的才会临时抱佛脚，找人帮助玩一下学就就忘掉的新技术。而且大家都困惑，“在线教育平台”APP的使用上学期不是已经培训过了吗？上次开会教导主任还催促班主任们，继续督促家长注册登录“M学网”，本校家长注册率太低，才百分之十几，必须超过30%，教育局量化考核才给学校计分。教育局、中心校也一再要求各学校要把这件事当作“任务”，这套“在线教育平台”属于教育电子化管理系统，是由市教育局公开招标建立的。教导主任说，不行的话，也按注册率给班主任“量化计分”。但班主任们也都颇有怨言，很多家长就是不愿意登录，难道为此拿学生出气逼家长下载注册？这回培训莫非会告诉我们有什么新招数可以快速提高家长注册率？

其实这个“M学网”要注册登录也很简单，当初培训员讲解时对电脑版只说了一句话，重点推荐了如

何使用手机下载登录APP，还给学生人手一份“说明书”——类似广告。除了在电脑上登录一次，看到本班有几个家长登录，我再也没碰过“M学网”，那款手机APP我根本就没下载。我把广告发给学生，只说是学校要求家长下载安装该软件，过后也没再理会。有几个家长可能嫌麻烦，发微信或者打电话问我下载行不行，有几个学生也很不安地问了，我直言相告，随便，反正我也不用。

如果按照培训员以及“红头文件”说的“认真用好M学网”，那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它的功能据说很多，可以在线给学生布置作业、辅导作业，还可以向家长们发布公告，可以给每个学生建立动态“成长档案”，随时发布学生在校表现，当然也能够把考试成绩单直接上传，家长随时可以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随时反馈。好像还有其他什么玩法，但我们学校没有一个班主任玩，即使一个标准班只有三四十个学生，班主任恐怕也忙得够呛，能有多少时间去玩这些“先进技术”？更不要说我们这里每个班都有七八十甚至八九十个学生，作业批改都叫人感到“疲于奔命”了，难道下班回家还得“在线教育平台”在线加班？这纯粹是给老师们增加不必要的工作负担。再说了，家长真的需要这些吗？我曾经问过几

个家长,注册后看过几次“M学网”,都说没再打开过,有的家长注册后就直接把APP卸载了。

之前学校曾配合移动通信运营商,让家长们开通过每月收费3元的“校讯通”,到现在也没有取消,有的班主任还在督促家长们开通——只要给家长们每月发送6条信息,班主任就可以得到返还话费。家长极少利用“校讯通”跟老师沟通,它哪里有微信方便?我干脆就让家长们取消了它。上学期我接班主任时,我们班还有40多个家长开通校讯通,现在只剩下几个了。所以就目前的情况说,家长和学校联系有微信就足够了。“M学网”也许不算超前,但有点不接地气。

然而,这次来的并不是“M学网”培训师,而是一个叫“L学网”的“在线教育平台”培训师,同样属于市教育局公开招标建立的。培训师还播放了公司领导跟市教育局签合同的视频以及“红头文件”的照片。看看手里的广告,听着培训员的介绍,这“L学网”跟那“M学网”好像没多大区别。市教育局招标弄两套同样的“在线教育平台”,让两家竞争吗?对本地教育,对老师、学生和家又有何益处?花了多少钱建这些“平台”?这钱花得不冤枉吗?

培训师走了,教导主

任又强调了这APP的“重要性”,又要求班主任督促家长下载安装、注册登录。我回到办公室,直接把广告全扔废纸箱了。这回我不打算给学生们布置任务了——我不想再看到他们困惑的眼神。

河南 温凉河

走走形式的体检

妻学完月嫂后,得需健康证,否则不能上岗。经过打听得知西青医院能做体检办证,于是妻骑电动车赶往西青医院。

医院里做体检的人很多,排队挂号时,窗口里面的工作人员问妻,是个人消费还是单位报销,妻说个人消费。工作人员告诉妻:“个人消费是80块钱,单位报销是86块钱。”听工作人员这么一说,妻交齐了80块钱挂上了号,两个多小时后轮到了妻。

体检第一项是化验血,其次为化验大便,接下来是胸部拍X光片,最后一项是内科检查。妻说前三项体检操作流程比较认真,最后内科检查时,她把体检表交给值班大夫,那位大夫接过去也没细看直接在上面画了一个“√”,随即说:“好了,你通过了,下一个。”妻不无疑惑地问那位大夫:“什么也没查就通过了,我这80块钱不就白花了,怎么也得给我简单查一下吧。”那位大夫

白了她一眼说:“办个健康证无非就是走个过程,谁会细查这件事。”妻仍心有不甘地说:“最好给我检查一下,心里比较踏实一些。”旁边另一位大夫也帮腔道:“叫你合格不就行了,干吗这么较真儿。”妻一再坚持查一下,那位大夫极不情愿地取出听诊器。妻见她一脸的不高兴,心想就她这工作态度也查不出什么结果来,无非就是走走形式而已,于是干脆说算了不查了,拿着那张完全“合格”的体检表交给了医院里的其他部门,等候健康证审批下来。

说实话,有些工种需要从业人员必须有健康证才能上岗,如餐饮小吃经营者、食品加工者、服务行业等,这样做才能保证食品安全卫生,杜绝传染病的传播发生。没有健康证,有关部门就会隔三差五让从业人员抓紧去办,并且每月这些行政工作人员都会亲自登门检查敦促健康证的落实情况。这种做法是卫生监督部门依据食品卫生法的要求实施的,也符合民意。但是有些负责体检办健康证的机构(指定的医院、体检中心、防疫站),却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违背了职业道德良心,

走走形式简单应付了事,其目的就在于收费。

体检是体格检查的简称,就是指人为了身体的健康情况而专门对一些常见性的疾病进行检查。体检的常规内容主要有三大块:一般的体格检查包括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等专科检查;功能检查包括心电图、X光、B超(包括肝、胆、脾、肾和生殖系统)等影像学检查;化验检查包括血、尿、便三大常规,及血糖、血脂、肝肾功能、乙肝五项。体检前应注意禁食、禁水,空腹,早上8:00~10:00前到体检中心。但大多数体检机构从早到晚地工作,也不告诉体检者应该注意的事项。采血化验要求是从早上7:30~8:30采空腹血,最迟不宜超过9:00,太晚会因为体内生理性内分泌激素的影响,使血糖失真。体检表内设定的检查项目不能随意舍弃,可见体检对于我们自身的健康是多么重要,可有些正规的体检机构却拿此事轻描淡写、潦草应付,只要交了钱,不管体检者身体是否真的有病,一律下发健康证。试问,这样的体检有意义吗?

天津 农夫



威尼斯的时间机器

想知道在过去 1000 年中，古城威尼斯曾经发生了怎样沧海桑田的变化吗？运用最新的电子扫描、智能识别和机器学习技术，一个名为“威尼斯时间机器”（The Venice Time Machine）的档案数字化项目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能让全世界的历史爱好者随手一搜，便知道在某个特定时刻，谁在圣马可广场旁起高楼，谁又在黄金宫里宴宾客。这一项目将使收藏于威尼斯国家档案馆中的数百万份历史地图和文献重新发挥作用。由于主要以拉丁文或威尼斯方言写成，而且数量庞大——光是陈列架的长度就超过 80 公里——这些档案中的绝大部分自现代以来就不曾被打开翻阅过。

好消息



涂鸦以解忧

心情低落？随手找支笔拿张纸写写画画吧。美国德雷赛尔大学护理与卫生学院的研究小组对 26 名志愿者的脑功能进行监控后发现，在填色涂鸦——尤其是画圆或在圆圈内涂写——时，大脑前额叶的血流量会显著增加，而这一脑区与人的情绪调节和获得愉悦满足感有重要关系。



养狗之益

难以养成坚持锻炼的好习惯？何不养只汪星人来帮忙。发表于《BMC 公共卫生》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显示，养狗的人平均每天要比不养狗的人多走 22 分钟，而且多数时间是可以被归为中强度运动范畴的快步行走。这对降低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风险都有很大助益。

坏消息



熊孩子与低头党

为什么这年头熊孩子好像特别多？发表于《儿童发展》杂志上的最新研究调查了 170 个美国家庭后发现，父母花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其他电子设备上的时间越多，孩子变身没头脑、不高兴、动辄哇哇大哭、到处讨人嫌的熊孩子的频率就越高，持续时间也越长。



回收与浪费

废物回收利用毫无疑问是件好事，但美国波士顿市场的市场学小组日前发现，由此而带来的良好感觉却会诱使人们浪费更多。当设有专门的回收垃圾桶时，志愿者倾向于使用更多的一次性水杯和包装纸，但当仅有一个大垃圾桶存在时，内疚感却会令他们更主动地减少浪费。

作家应该为他那一代的年轻人、为下一代的评论家以及其后每一代的教师而写作。

——菲茨杰拉德

西蒙娜·韦伊、汉娜·阿伦特、苏珊·桑塔格，作家玛丽·麦卡锡、琼·迪迪翁各自都术业有专攻，却可以归到一个类别里——在看待世事尤其是苦难时，她们似乎都养成了一种很酷的、无情的态度。这些女性知识分子都是“冷峻派”。冷峻是她们在深思熟虑后采取的伦理、美学和政治策略，是女性知识分子们有意为之。

——美国学者戴博拉·尼尔森，《硬气十足》

人们宣扬大城市的末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现在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每当一个32岁的人抱怨伦敦已经不适合生活而选择离开时，相应地，总有大约1.1个新来的人在争抢空出来的房间。但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正在离开大城市，“搬到人口在50万到100万之间的小城市”。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西蒙·库柏

讽刺也许是一个盾牌，但它不是一个武器。

——美国作家多萝西·帕克



(插图 山草胡)

不吃你的曾祖母不认识的食物；不吃含五种以上成分的食品；不吃把糖列在成分表前几位的食品；只吃会“腐败”的食物；一条腿（蘑菇和植物）好于两条腿（禽类），两条腿好于四条腿（牛、猪等哺乳动物）。

——美国饮食作家迈克尔·波伦，《吃的法则》



+/-
数字

120

万美元

在日本，黄金走私这种旧式的犯罪活动急剧增多。本月，日本警察逮捕了5名五六十岁的女性，她们涉嫌在来自韩国的航班上把将近70磅黄金藏在衣服里，总价值约为120万美元。

137

亿美元

6月16日，亚马逊宣布，将以总计约13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全食超市。这是亚马逊史上最大规模的收购。收购完成后亚马逊可以获得全美450多家全食超市的店面。

452

万元人民币

在许多地方，66.4万美元（约合452万元人民币）可以买到一套漂亮的房子。但这个价钱在香港只能买到一块约5米长、3.3米宽的水泥地，用来停放豪车。这个价格买下的停车位在港岛的一座公寓楼里，是香港停车位的新纪录，打破了去年一块略小车位的61.5万美元的买价。

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

文 / 贝小戎

图 / 谢驭飞



如今经济学充满高深莫测的术语，让普通人望而却步，而经济活动本来是非常日常的活动——我们每天都在挣钱、花钱。英国经济学家、《耶鲁经济学小历史》一书作者尼尔·基什塔尼想来一番拨乱反正，他说许多经济学概念只是常识的简略表达，比如“均衡”：假如香蕉的单价是20便士，消费者的需求是100万只，供货商愿意卖100万只，市场就是均衡的。如果下个月运输成本上涨，供货商只想卖50万只，需求超过了供给。为恢复均衡，香蕉的价格就会上涨，导致消费者需求减少、公司的供应增加。但偶尔比如在经济危机期间，市场不但无法恢复均衡，还会陷入深渊。

再比如“劳动分工”，智能手机的屏幕可能是美国制造的，其电池是中国制造的，其他零部件可能是欧洲制造的。“大师级的工匠在他们的工作台上独立完成全部产品早已成为过去，今天，精细的劳动力分工是现代经济的奇迹。然而，一名工人上班时花几个小时把零件装到电路板上，他会发现，他很难像一个制陶工人那样对他日常的工作感到骄傲——制陶工人雕刻、绘制完成之后，把一只碗交到忠实的顾客手中。”

看到“X无效率”你会感到一头雾水。它的来历是这样的：标准的经济学假定，公司会高效地运作，不会有工人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有用的机器不会放着任其生锈。而实际上公司运行中经常会存在大量的懈怠。经济学家称之为“X无效率”。原因之一是缺乏竞争：当一家公司垄断了

一个行业，或者面对国外竞争受到保护时，它就缺乏有效地使用其投入的压力。

“边际成本法则”听上去很专业，边际其实就是额外、富余的意思。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托德·布赫霍尔茨说，它在经济学领域内外有诸多应用。比如有些学生为了备考而通宵学习。但是，如果在半夜额外熬1小时的成本（以第二天的疲劳为计量单位）超过了这个小时死记硬背收获的一点收益，最好还是上床睡觉，而不是继续扎在书堆里。

美国经济学家罗杰·阿诺德在他写的《经济学》教材中写了一段接吻经济学：比尔和辛西娅刚刚开始恋爱。某段时间，辛西娅也许要准备考试。对她而言，跟比尔接吻的有效时间是90分钟。在90分钟的时候，辛西娅对比尔说她要走了。比尔跟辛西娅接吻的有效时间是120分钟，因此他觉得辛西娅停止接吻的要求来得太早了。他希望能再吻30分钟。假设比尔不懂得效率的概念，他会误解辛西娅要求暂停的意思。他会问：“怎么了？你不喜欢吻我吗？”比尔忽略了辛西娅接吻的成本比他高。为了改变辛西娅接吻的有效时间，比尔必须提高辛西娅接吻的边际收益，或者降低她的边际成本。比尔如果知道辛西娅是要去图书馆准备考试，他可以说：“我们再吻一小会儿，然后我开车送你去图书馆。而且到了那里，我还能帮你复习。”阿诺德老师仿佛在说，要想多吻女友30分钟不仅要懂经济学，还得是“富二代”加学霸才能办得到。☑

奇葩们的蜜月之旅

文 / 肖遥

图 / 谢驭飞



所有的风俗习惯都倾向于美化“蜜月”这个词，好像蜜月就应该是人生最蜜的一个阶段，俩人好得蜜里调油，再加上旅行。旅行嘛，一般都比平庸的生活要色彩斑斓一些，人们在美丽风光和奇幻旅途中也会亢奋起来，心胸会张开，平时的龌龊可以忽略不计，而两个人在封闭的环境里，有了这些催情剂，那个叫“爱”的事物，怎能不得到充分的滋养和生长？

苏小姐前一段时间和她老公去美国度蜜月。这次不知是她的第几次蜜月了。婚后，苏小姐把旅游作为缓和夫妻矛盾、增强两人凝聚力的一个方式。有时候，这个举措对增进感情还是起作用的，比如这次，一开始也幸福得如胶似漆，可惜在旅途进行到中段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插曲，苏小姐半夜倒时差睡不着，偷瞄了她老公的微信聊天记录，是他跟一个女人的聊天，大意是，女的问他：“结婚怎样？”他说：“嗯，这就是件小事而已。”女的说：“说说嘛，感觉如何呢？”他说：“一言难尽呢，需要面谈……”结局是苏小姐大闹一场。最后，苏小姐不甘心地说：“好玩吗？好玩吗？！如果我没有和你结婚，那么现在和你这么玩游戏的人就是我！”

苏小姐的话虽口不择言，但也是真心。苏小姐有这个自信，不论比拼颜值魅力，还是撩骚暧昧、花式勾搭，她都是曾经沧海，只是如今做了人妻，在对方眼里就端了装了。话说端庄娴熟啥的，难道不是人妻标配吗？难道不是丈夫需要的

吗？苏小姐不免越想越委屈。最后几天吵得很凶，平时吵成这样还可以不欢而散各找各妈，可在旅途中想散也没法散，还得把相看两厌坚持到底。可见旅游真是检验感情的试金石，也是两个人漫长生活的一个微缩模型。两人24小时黏在一起共同度过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会不会有心猿意马，三观和审美是否相合，或者即便没有多少共同话题，但能不能愿不愿互相容忍？这些在一个月的朝夕相处里足够暴露出来，也足以考验彼此的应对能力了。

倘若苏小姐见识了休的蜜月之后，会发现世界上不止只有她的蜜月奇葩：在纳博科夫的小说《透明》里，休和新婚妻子阿尔曼度蜜月。最后一个晚上，这位新婚妻子坚持要演练一次“火灾逃生”（他穿着短睡裤，她穿着 Chudo-Yudo 牌睡衣），从他们住的四楼顺着旅馆墙壁像壁虎一样往下爬到二楼，然后再从那里爬到长廊的屋顶上……休劝老婆不要瞎折腾，但无济于事。勇敢的姑娘命令休跟在她后面，可是，休是那种特别笨拙的类人猿，他刚爬出去就被他们阳台底下的一个突出物挂住了。他从自己的歇脚处往下喊话，恳求她返回。脚下一扇百叶窗忽然打开，休设法爬回自己的阳台上，以为他老婆一定挂了，但他还是挨家挨户地去打听寻找，最终休在三楼的一个房间里找到了他的新婚妻子。她裹着一条毛毯，仰卧在一个陌生人的床上，若无其事地抽着烟，陌生人则坐在床边的靠背椅里看一本杂志。■

31岁再起跑又怎样？

文 / 中读用户 @ 静时

图 / 谢驭飞



31岁，我又开始每天跑步。

那时，风雨无阻每天坚持跑上4公里，已经是整10年前的事——21岁的大学光景，除了上课、恋爱、打球、跑步，偶尔应景减减肥，闲来无事装装文青，校园生活也就这般的井底打转，虽然局限得随手可触到井壁，可也没心没肺不亦乐乎，至于坚持跑步的原因，早已无迹可寻（硬要说些理由对付过去，就当是年少精力过剩，无处发泄）。

21岁到31岁之间，跑步肯定是没再跑了，各种球也离手已久，恋爱什么的，连手指都懒得伸出来数，“文青”这玩意儿更是从纯纯的装模作样沦为换取柴米油盐的谋生工具。此话怎讲？不知从何时起，深感说话的速度远赶不上思考的速度，于是乎连让唇舌追赶大脑的努力都懒得去做，就这么日渐变得寡言，深知很多人事，都已无关痛痒。但说来可笑，沉默的其实只是口舌，而非内心，所以满腔翻涌的是非扯淡、喜怒哀怨或天马行空，就只能通过指尖发泄。久而久之，其他谋生伎俩的达标指数直线下降，最后就仅剩利用“之乎者也”填满一张张白纸的能力。

指尖偶尔也会变得迟钝，故而想要准确拿捏杂乱无章且转瞬即逝的心思，就只能依靠大汗淋漓的方式——在苦苦挣扎只为喘口气的刹那，才能看清纷繁头绪中最清晰的那条线，然后迅速将

其记下。所以，31岁的我，又开始了跑步。慢跑，中速跑，慢跑。每天4公里，这不长不短的距离，对于所谓的达人来说，自然是微不足道，但对于现世一众游离于文明边缘的颓废文字工作者而言，我这厢已经是阳光有余。

每天4公里例行公事，只在跑步机上做机械运动，不是因为喜欢，仅仅是为了某种抽离。纵使不理解这种重复动作所给予身体的快感，也还是能清楚体味到内心以一分钟一个节奏的转向速度，从膨胀的紊乱向收敛的素静过渡。中途不停息，不喝水，不发声，嘴唇只随歌词一张一合。

遇到中意的音乐，会在整个4公里中单曲不断重播：汤姆·威兹、坂本龙一、波莉吉恩·哈佛、包豪斯乐队、奇想乐队（The Kinks）、比尔·卡拉汉……从来无论属性，不追究是否是所谓“适合跑步时听的音乐”。最近循环得近乎疯狂的一首，是王菲的《白痴》：“什么海角，什么天涯，明天我要攀越喜马拉雅；什么高楼，什么大厦，钢铁能炼成最幸福的家……”一边斟酌着歌词听曲儿，一边享受步调受耳边的旋律左右。

记得村上春树说：“喜欢的事自然可以坚持，不喜欢怎么也长久不了。”不过就跑步一事来看，喜欢与不喜欢，似乎并不成为权衡坚持与放弃的唯一理由——31岁，我从跑步中又得到了一个可以在跑步中思考的问题。☑

吃书

文 孙欣

图 谢驭飞



读书如吃书，不少人都这样比方。读与吃的确有相似之处，都是将外界事物的内容同化为自己的一部分。有人细嚼慢咽，有人蚕食鲸吞。有人只求营养到了就好，因此只读非虚构类，或者干脆除参考书不读别的；有人不讲究营养但滋味挂帅，所以沉迷吟风弄月的文艺作品。前一类人难逃枯燥乏味，后一类人伤于味精摄入过多。

在一般人看来，吃这个动作总比读要容易些。只要咀嚼吞咽，不管多难吃的东西都能最终吃完。读则不同，默然瞪书一天，可能一行字都没能消化吸收。学生在考试以前挑灯夜读，记住了多少，全看各人本领。因此“哆啦A梦”的一个法宝就是“背书面包”，把面包片印在书页上吃掉，书里的内容就一字不漏印入脑海。结果大雄吃得太多撑坏肠胃，连续跑厕所，记住的书本知识又排泄掉了，只好重新吃过。

一本书万人读过，还是同一本书。一碟食物最多只能让几个人分享。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一船的人，那是神迹。所以物理性地吃书其实是为了毁灭书被写出来的意义。在《玫瑰的名字》里，杀人凶手、盲眼的老图书馆长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卷二》上涂了毒药，因为他认为这本书的思想会毒害人间，读过的人都必须死。当他自己的末日到来之时，他摸索着把这本书吞下肚里，放火烧了庞大的修道院图书馆。

最实在的物理性吃书在近日的英国大选后发

生。肯特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马修·古德温在大选前不看好工党，在推特上预测工党得票率不可能超过38%，否则他就把自己的著作《脱欧：英国为何投票离开欧盟》吃掉。虽然工党并非有意独与他为难，但还是在6月8日的大选中赢得了40.2%的选票。古德温教授为表示自己绝不是食言而肥的人，决定直播吃书，在镜头前撕下厚厚的光面书页，大团塞进嘴里。《每日电讯报》《镜报》《太阳报》都有报道，认为古德温教授履行了诺言，一条花边新闻就此圆满。

但此事自推特而起，推特的传播方式与传统媒体很不一样，围观群众比电视和报纸都踊跃得多，互动评论此起彼伏。评论者纷纷质疑几秒钟塞满一嘴纸的镜头根本就不是真的吃，可能连咽都没有咽下去，应该全程直播才有可信度；单吃几页根本不能算，应该把整本书吃下去；应该把全部发行的书吃下去；应该从书脊开始吃，因为那里的营养最好；应该把Kindle版也吃掉；作者喜欢精装版还是平装版？热闹了半天以后，推特读者又转去注意其他新焦点了。其实如果把这本书用高压锅煮成纤维素糊糊，加点盐和胡椒，全吃光也不是难事，只是习惯冷餐的英国人可能一时想不起合适的料理方式。■

本栏目投稿邮箱更改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巴西 | 圣安东尼日

6月13日，里约热内卢举行圣安东尼日庆祝活动。圣安东尼生前热心帮助有困难的人，常为教徒寻找失物，后来人们寻找失散亲人时也会向他祈愿。慢慢地，人们开始在圣安东尼日前夕祈愿美满婚姻或爱情。因此圣安东尼日也是巴西情人节。除了情侣，人们也会在当天送礼物给亲朋好友。



德国 | 空客引擎

(右图) 6月14日, 劳斯莱斯的员工在检测为空中客车 A350 XWB 生产的 Trent XWB 飞机引擎。劳斯莱斯从 2015 年 1 月开始为空中客车 A350 XWB 提供新的特仑特 (Trent) 引擎。



意大利 | 佛罗伦萨历史足球赛

(左页上图) 6月11日, 意大利佛罗伦萨历史足球赛半决赛在当地圣十字广场上演。图为参加比赛的一支队伍在赛场内候场。佛罗伦萨历史足球融合了足球、橄榄球、摔跤等活动, 起源于 16 世纪。

印度尼西亚 | 露兜树战争

(左页下图) 6月12日,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卡朗阿森镇当地居民参加“露兜树战争”祭祀活动。“露兜树战争”是当地传统的宗教祭祀活动, 参加活动的人用露兜树树叶互相抽打对方, 直到见血。他们以这种方式祈求上帝使人的身体与宇宙间保持平衡。

巴勒斯坦 | 电力短缺

(右图) 6月13日, 在停电的加沙城内, 在烛光下看书的孩子们。据巴勒斯坦当地媒体报道, 加沙地带唯一发电厂于当地时间2017年4月16日由于燃料短缺而无法正常工作, 约180万加沙民众受到影响, 每天停电大约20小时。

英国 | 火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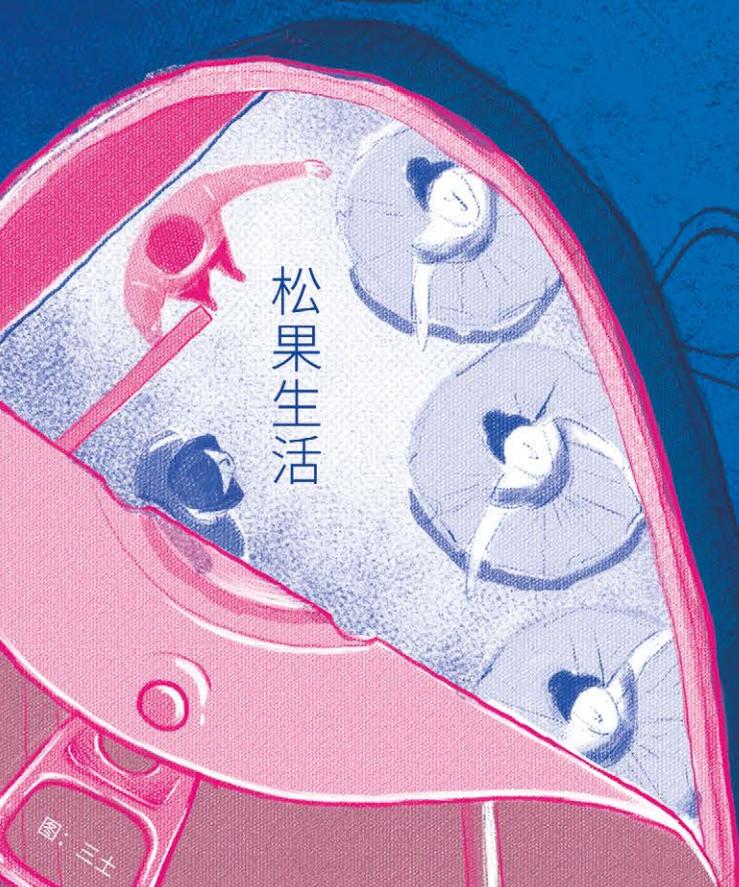
(下图) 6月14日, 英国伦敦西部、靠近诺丁山地区的“格伦费尔塔”居民楼发生了巨大火灾。图为附近的孩子戴着口罩以防吸入烟雾。警方此前曾预计, 火灾发生时, 居民楼内有400至600名住户。据BBC快讯, 英国警方宣布, 伦敦西部格伦费尔公寓楼大火中的58名失踪者“预计已全部罹难”, 伦敦大火死亡人数超80人。







生产知识 也生产知识产品





栏目插图 | 范薇

竞争力飙升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布的《2017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中,中国从2016年的第25位跃升至第18位。原因在于,中国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化贸易,促使其“经济表现”“政府效率”和“营商效率”等均有明显提升。中国在“经济表现”中高居全球第二位,在该竞争力因素下的“国内经济”和“就业”两项分指数中更是排名全球首位。在“营商效率”因素下的“劳动力市场”分指数也排名全球首位。

安邦系

6月14日凌晨,安邦保险集团声明其董事长吴小晖暂不能履职,当天安邦概念股全线暴跌,其持有的26家上市公司市值蒸发了49亿元,这些股票总市值则缩水620亿元。按当日收盘价,安邦所持A股市值合计为2194亿元。安邦持股以蓝筹为主,不少个股同时被基金重仓,吴小晖的消息对上市公司基本面并不构成严重影响。安邦持股比例最多的是金地集团,一季报显示,所持股占总股本的20.44%。

“保本”绝迹

保本基金越来越“鸡肋”:今年以来,在可统计的170只保本基金中,收益高于3%的仅4只,绝大多数不足2%,另有十余只负收益。A股疲软,保本基金风格不得不保守,其投资收益根本无法匹敌货币基金。按证监会对保本基金的规范,“保本”只能是“力求避免基金份额持有人投资本金出现亏损”,保本基金也需改名为“避险策略基金”。没了刚性兑付的承诺,这一基金品种面临绝迹。



个位数 M2

5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9.6%，增速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低0.9和2.2个百分点，个位数的M2也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新低。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的M2设定目标是12%，随着去杠杆的推进，金融数据的变化超出了年初的预期。不过，M2走跌并不意味着信贷过度收紧，5月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18万亿元，同比多增2406亿元。监管政策从严抑制了表外融资增长，引导需求转回表内信贷。

人气？口碑？

争食中国票房，好莱坞多片两地同映。在北美，汤姆·克鲁斯主演的《新木乃伊》首周3220万美元的票房，排名第二。在中国，这个北美口碑只有17%的《新木乃伊》首周却获得5220万美元的票房，远远高于强势口碑的《神奇女侠》首映票房。《加勒比海盗》与《木乃伊》两个北美暑期“炮灰”在中国找回面子全靠德普与阿汤哥的人气。在美国，大部分观众买票前都要搜一下影片的评价，中国观众却是情怀第一，看电影首先是去看IP。



雅虎谢幕

6月13日，Verizon宣布完成对雅虎48亿美元的收购，互联网世界闪耀了22年的雅虎正式退出舞台。雅虎在发展中错过了三次重要机会：购买Google算法、与Facebook合作和被微软收购；做对了一件事：10亿美元入股阿里巴巴。雅虎市值曾高达千亿美元，并且一直希望靠收购保持市场领先，可对目标公司经常提出过高的溢价，让这些公司的创始人和投资者享受着巨大的收益而退出，而雅虎却后知后觉。

“缩表”

没有意外，6月14日美联储再加息，联邦基金利率从0.75%~1%调升到1%~1.25%。此次议息会议重点不在加息，在“缩表”，耶伦表示，“可能会相对迅速地实施资产负债表计划”。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直接开动印钞机。“缩表”意味着反其道而行之，美联储卖出手中的证券，回收当年投放的货币。据猜测，美联储最终的目标是将资产负债表缩减到2万亿~2.5万亿美元的水平，而目前其规模为4.5万亿美元。

月亮的笑脸

宝珀 Villeret 经典系列女士日期指示月相腕表的蛋白色表盘上，设有蓝宝石水晶材质的月相显示盘，一张月亮的笑脸对应着月相变换。其左嘴角上的美人痣设计概念来自 18 世纪的法国宫廷，代表着挑逗玩味的态度。当时的女性用其来默默回应爱慕者，点在左脸表示同意。



帆船赛计时腕表

专为帆船比赛而设计的劳力士蚝式恒动游艇名仕型 II，集机械记忆设定倒计时计时及实时同步功能于一身，来满足帆船赛开始程序的三个由声音及旗帜表示的倒数时间。新款表盘的 12 点位置配置三角形钟点标记，时针末端有夜光圈，可与分针清晰区分。



智能积木

索尼近日开发了一款有趣的机器人玩具套件 Toio。它的主体是两个带轮子的立方体小机器人，彼此可以检测到对方的位置，并根据对方的姿势做出反应。它能够由儿童单手操作，内部的加速度传感器能够识别手势，精确地操控两个立方体的活动。内置的 AI 程序让它们犹如一款智能版的积木。



无线筒式吸尘器

设计师 Sumin Shin 结合当前的智能跟踪技术研发了一款家用筒式吸尘器，在保障吸尘效果的同时，也摆脱了有线的束缚。它在使用时会随着吸尘拖把的方向转弯并移动。吸尘把手使用完后可以通过磁性吸附在筒身上，体现了人机关系的考量。



轻量化材质

这款 Piuma 座椅由意大利品牌 Kartell 设计，并获得了红点最佳设计奖。这款座椅的精致之处不光体现在其简约大方的设计风格，还有它的热塑性胶和炭相结合的制作手法——迎合了产品打造轻量化也不失稳定性的特性，演绎出设计与材料唇齿相依的关系。

环保概念艺术品

来自台湾艺术大学的青年艺术创作者制作了 100 款冰棍黑暗料理。用树脂混合从污水中搜集的样品制出让人乍一看是垂涎欲滴的糖水冰棍。这些污水样品从台湾 100 个地区搜集而来，旨在提醒大家关注环保、保护水源，能够真正放心享受 100% 无污染的糖水冰棍。



多功能闹钟

La Metric 是一个桌面闹钟，功能相当于桌面版的 iWatch。它可以通过手机 APP 定制更多的内容通知，例如接收天气预报，微博、微信、QQ 等通讯软件的推送更新，它甚至还可以帮忙呼叫出租车，甚至帮用户在线订购比萨。



丝绸编织

Harry Winston Premier 系列 36 毫米玫瑰金自动腕表结合丝绸编织和金丝压花技术，在表盘上构建出精致的浮雕星形图案，12 颗钻石分别充当小时的标记。

无线音箱

瑞典 Nocs 公司设计的 NS2 无线音箱结合了 AirPlay、蓝牙和数码音乐服务 Spotify Connect 功能，因此可以通过 Mac、PC、iOS、Android 或 WP8 等多种设备无线播放你喜爱的曲目。



穿孔壁灯

Maison Sarah Lavoine 品牌的 Diva 壁灯外形纤细，连接电线的黑色织物便于将它固定在墙壁上，柔和的灯光透过穿孔金属灯罩，在四周投下光影图案。



甜甜圈烛台

施华洛世奇家居系列中的“甜甜圈”烛台，刻面水晶围绕着不锈钢底座拼接出水晶的光环，在色彩交融中形成丰富的视觉效果。





黑玛瑙钢笔

Graf von Faber-Castell 镀铂金钢笔的灵感来自维也纳美泉宫漆画厅的中国漆画嵌板，笔身上镌刻松针图案的黑色玛瑙被镶嵌在铂金外框中，与枫木的天然木纹形成对比。



猫头鹰戒指

纽约珠宝品牌 Temple St. Clair 的 18K 金雅典娜猫头鹰戒指，顶部的橙色石榴石圆润而通透，蓝宝石、翡翠和钻石等以对称排列镶嵌出猫头鹰的双眼。



折线图案

Ferragamo 2017 秋冬系列的彩虹色调手袋用锯齿形的皮革拼接，丰富的折线图案以及由深到浅的渐变色彩，构成手袋自身的装饰。





三十岁的恐慌

如何度过 1/4 人生危机

主笔 / 陈赛

我清晰地记得我在30岁的时候，感到一阵巨大的恐慌——周围的朋友都结婚、买房、生孩子。时代的车轮呼啸而过，北京的房价节节攀升，一个个新的生命来到世间，而我却在南方多雨的小镇，茫然无措地守候着病中的母亲。

第二年，我的母亲去世。她在我的年龄已经有两个孩子，独立支撑一个家庭，照顾弟妹，侍奉父母。她是一位小学老师，17岁开始教书，教了30多年书，退休那年发现自己得了癌症。两年后去世，死时才57岁。

如今回想起来，30岁那一年过得波澜不惊，却也是我有生以来，与现实碰撞得最为剧烈的一次。头破血流之后，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

在做这篇报告时，我才发现，原来当时我的恐慌有一个名字——“1/4人生危机”。无安全感、失望、孤独、抑郁，这些心理症状本是中年危机的典型特征，但它们袭击的却是25~35岁、刚刚进入“现实”的年轻人，尤其在30岁的时候到达高峰。

不久前，《国际行为发展期刊》上的一项调查显示，39%的男性和49%的女性在20多岁的时候感觉到“危机”，普遍症状是一种不真实感，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

18岁到28岁之间的10年，经常被称为“人生最好的年华”。从生理上来说，这个年龄段的男人的肌肉和女人的皮肤都处在最佳状态，生殖能力也处在高峰。但事实上，没有多少人会真的愿意去重复这个阶段。因为这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充满了困惑与恐惧——你第一次要独立面对人生中的许多重大决定（有数据称，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决定中，有85%是在40岁之前做出的）而因为缺乏经验，你会觉得你的每一个决定，这份工作、这份感情，可能都会影响你今后的命运。

也就是说，他们大部分还是未完成的成年人。

三十而立，按孔子的原意，“立”是一个很高的标准。“立”，谓身能立道也，是道德人格层面的意思。己欲立而立人，卓然自立。立是很难的。即使按平均寿命做一下粗略的换算，那时候的30岁大概相当于现在的50岁吧。又有多少50岁的现代人敢自称达到了孔子所说的“立”呢？

今天，当我们讨论“三十而立”这个问题的時候，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时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比起古人面对的那个小而稳固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更大，更快，更浮躁，更容易让人恐惧和迷失，在这样的世界里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并不容易。

我们也意识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立”已经从一种儒家的人格理想变成了日常意义上的“成家立业”。事实上，西方人对于“成年”最客观的评判建立在五个里程碑上：毕业、离家、经济独立、结婚、生子。与我们的“成家立业”差不多。有趣的是，根据美国统计局的数据，上世纪60年代有77%的女性和65%的男性在30岁之前已经实现了这五项标准；到了2000年，30岁的人中只有少于1/2的女性和1/3的男性实现了这些目标。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也应该放开“三十而立”这个魔咒？

但是，我们更愿意探讨的，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上的“成年”。当一个人的人生到达一个阶段，你开始以一个独立的姿态面对真实的世界，为自己人生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决定，并承担责任。这不仅是一种生理上的，也是心理的、情感的、社会的、文化的成熟度。

在我们的采访中，一个贯穿始终的问题是：你觉得自己成年了吗？怎么样才算是一个成年人？作为一个成年人意味着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20岁出头的年轻人回答得最爽快：“当然，我都20多岁了，自己一个人住，靠自己赚钱，再也不想用父母的钱了。”

年纪稍微大一点，30岁的门槛开始临近但尚未到达的人，对这个问题就开始有点犹豫：“没有钱，没有事业，没有家，算不上吧……”

对于那些真正处在30岁关卡上的人，对于自己的人生，他们感受更多的不是“立”的自信，而是困惑：怎么就三十了呢？即使结了婚，生了孩子，遇到这样的问题，反应常常是一怔，“算是吧，也许不，还是在挣扎吧！”

心理学家怎么说呢？

有人说责任，为自己，为别人承担责任，就是成年人。

有人说，要自己为自己思考，而不是让别人为你思考，这才算是“成年人”。

还有人说，要获得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将对自我的爱转化为世界的爱，才算是一个“成年人”。

但我最喜欢的一个答案是：“所谓儿童、青春期、成年，都是概念，而生存是自己的事情。”

这是漫画家 Tango 说的。他说，其实成年并不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从此固化在那个成熟的状态里了。事实上，生而为人，最好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时常回到孩子的状态。当你很有安全感的时候，比如老友相聚，你就可以回到孩子的状态，欢乐、天真，充满了创造力和想象力。

去年我参加一次去皮克斯的媒体团，同行的都是自媒体的年轻人，一路叽叽喳喳，只有我和一位大叔是中年人，临行前才知道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漫画家 Tango。我以前看过他的漫画，以为是 20 多岁的年轻人。那次相识才知道，他自己有一家广告公司，女儿在美国读书。画漫画只是他的业余爱好。

Tango 生于 1966 年，如果按传统的算法，已经是知天命的年纪。但是，如果已经知天命，他的这些漫画大概就不会诞生了。这些漫画是他消解压力，也是还原自己的方式——商业上必须虚伪，但年纪越大，越不想违背心意，任人评判。而且，这个时代太喧嚣，很多时间都是给别人的，安静下来就害怕，所以，画画是他给自己的时间——只要你还有想象的自由，你就仍然是自由的。

他原来是学数学的，而数学最好玩的就是，只要有一个反例，就可以打破一个概念。这个世界为我们制造了各种各样的概念，迫使你进入某种逻辑关系、社会秩序里，而他在漫画里最热衷做的事情，就是打破概念。比如他有一幅漫画叫《城市的中指》，城市里一幢幢高楼变成了一根根伸出的“中指”。大城市漂泊的每一个异乡人，快递小哥、各种服务员、各种问路的人……看了都觉得一阵好笑，一阵酸楚。

是的，一切都是概念，而生存，是个人的事情。▣



三十不立：推迟的成年

主笔 / 陈赛

真正的成年，是艰难的美，是得之不易的荣耀，是商业力量和乏味文化不应剥夺的理想。——托尼·莫里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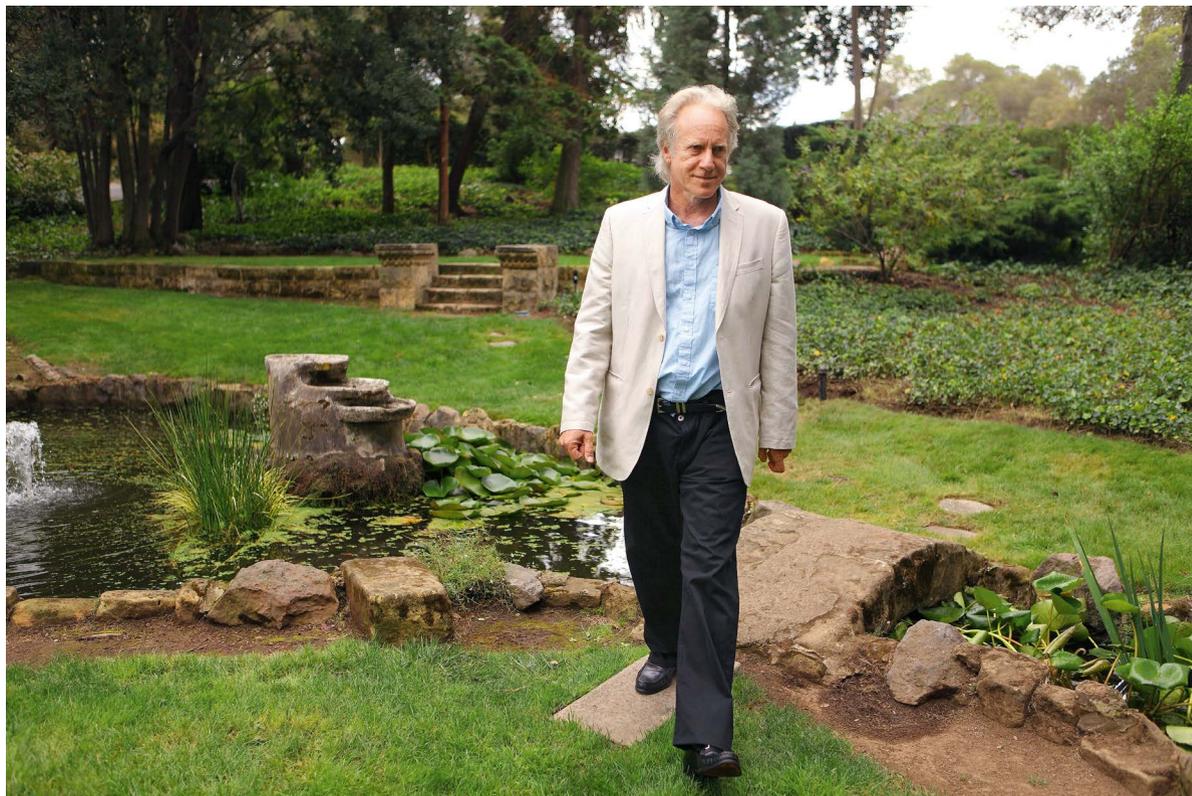
成年的延迟，既是现代社会的奢侈，也有危险存在

未完成的成年人

就像童年一样，成年是一种社会构建。中世纪早期的欧洲人根本没有童年的概念。直到12世纪，儿童的受关注度提升，才有资格进入画作。即便如此，他们也只是被画作小大人，他们的表情和特征完全

是大人的样子。从希腊到中国，几乎没有一位古典作家表达过对童年的怀念或渴望。

100多年前，“青春期”还不存在。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第一次提出，在童年与成年之间有一个特殊的转换阶段，一个“风雷激荡”的人生时期，充满了强烈的情感起伏、哀愁和反叛。他们需要一段额外的时间，解决这个阶



左图：美国斯坦福大学文学教授罗伯特·哈里森

右图：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

段特殊的心理任务，才能顺利过渡到成年人的角色。在美国，为了适应这个新的概念，很多社会机构，包括教育、医疗、社会服务和法律都要适应12~18岁人群的特殊需求，比如劳动法规定16岁以后才能就业、初中从小学教育中分离出来、建立了专门关押青少年的劳改营等。



在美国心理学家艾瑞克森（Erik Erison）的人生八阶段理论中，青春期（从十一二岁到十七八岁）属于人格发展的第五个阶段。

这一阶段的核心问题是自我意识的确定和自我角色的形成。在这个人生阶段，他们对于自我的认知还没有建立起来，还需要进行多层面的探索和实验，但社会（尤其是父母）对于他所要扮演的角色已经有所规定和期待，于是二者之间经常构成巨大的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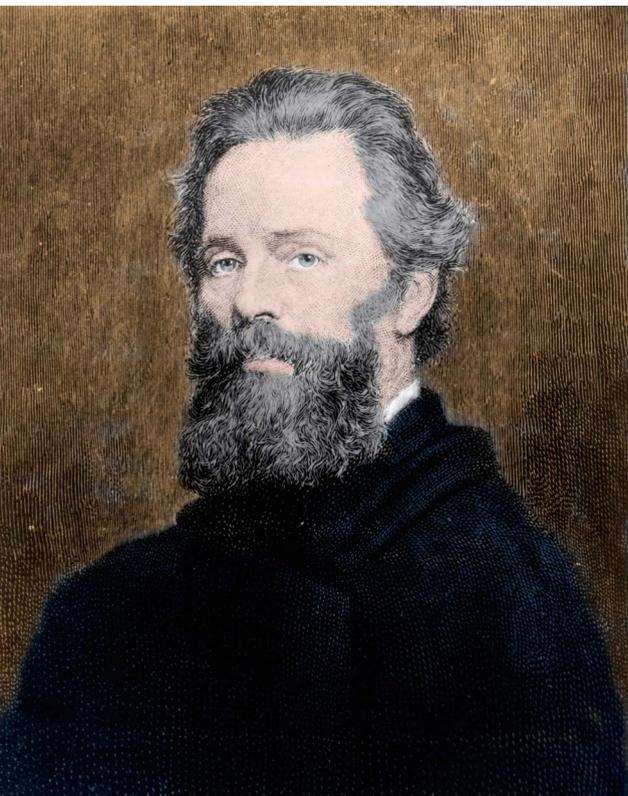
100年后，另一位美国心理学家杰弗瑞·简森·阿内特（Jeffery Jenson Arnett）又将18~29岁单独拎出来，作为一个独特的生命阶段，称为“正在形成的成年期”（Emerging adulthood）。

阿内特的调查显示，这个年龄阶段的年轻人离开了童年与青春期对父母的依赖，但还没有进入一个正常的成年生活的持久责任里：婚姻、事业、孩子。他们频繁地更换工作、伴侣，试图知道自己是谁，以及如何融入这个世界。

对于事业、婚姻、孩子，他们并非没有期待，只是并不着急而已。他们对稳定保持警惕，因为稳定也意味着停滞。25岁之前，他们不愿意受束缚，因为一旦进入成年人的角色就无法回头了。

所以，他们有时候觉得自己是成年人，有时候又觉得不是。大脑科学为这种心理状态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他们的大脑就处于成人与未成年人之间。

科学家曾经以为大脑的发育在青春期结束之前就完成了。事实上，在16岁之前，一个人大部分大脑功能都已经发育得很好了，包括大脑的执行功



能——逻辑推理、计划、高级思考能力等。平均而言，一个 16 岁的年轻人在逻辑测试上已经可以达到普通成年人的水平。

但新的研究发现，从 20 ~ 30 岁的整个阶段，大脑一直都还处在继续发育的状态，尤其是边缘系统（情感产生的区域）与前额叶皮层（控制情感的区域）之间的连接。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跟踪 5000 名 3 ~ 16 岁的孩子，发现边缘系统的发育与前额叶皮层的发育之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差。边缘系统在青春期就爆发式发育，而前额叶皮层还要持续 10 年的缓慢发育，直到 25 岁才能完全成熟。前额叶皮层负责你控制自己的冲动、长期策略、回答类似于“这辈子我到底要做什么”之类的问题。

这是否意味着，允许，甚至鼓励这些年轻人在安定之前游荡是一件好事，这样他们可以有更充裕的时间来选择自己的事业与伴侣，探索自己的身份，而不是在 20 多岁就必须做出那些可能影响后半生的决定？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就曾经提出，现代青少年被庇护的生活剥夺了他们即兴发挥式的身份探索阶段。以前的年轻人虽然很早就要靠自己谋生，人生的不确定性更大，但也给了他们更多的机会试验自己最终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 19 世纪的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虽然出生名门望族，但 12 岁辍学在叔叔的银行打工，在帽子店当过店员，在农场干过活，还在捕鲸船上当过服务员——这些都发生在他 20 岁之前。

阿内特的研究，是从他自己的困惑开始的。他自己的成年之路也远比他自己想象的要漫长。1980 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拿着一个心理学本科的文凭，但并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他在酒吧和餐厅里唱歌赚钱，收入足以维持生计，但那是因为他跟父母住在一起，不必付房租。

几年后，他读了心理学的研究生，再过了几年拿到博士学位，但仍然不知道要做什么。他有很多女朋友，但没有一个能谈婚论嫁的。直到很多年以后，他才真正找到爱与工作——35 岁得到第一份长期工作（教授），36 岁结婚，42 岁生了孩子。

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对这些年轻人有着很深的同情。他本来是研究青春期的，但发现很难深入进去。因为处在青春期的年轻人太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以至于很难退一步往回看，思考自己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但 18 ~ 29 岁的人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大都受过大学教育，尤其是那些经历过伤害的——坐过牢、幼年受过虐待，或者单亲家庭的人，他们对自己的经历和命运有着相当清醒的自觉和洞见，正是这种洞见，让他愿意将整个职业生涯都用来研究这些人。

但是，美国的经济衰退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复杂。这些 20 多岁的年轻人，即使愿意跳过“正在形成的成年期”的阶段，也未必找得到工作。所以，《纽约时报》杂志的一篇长文感慨，这是一个诡异的历史阶段，我们到底应该鼓励年轻人利用这些不断被延长的未成年岁月，更加从容地追寻自己的真爱与梦想，还是应该告诉他们，人生苦短，别纵容自己，有什么先抓住什么，否则就再也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对于这个问题，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文学教授罗伯特·哈里森（Robert Harrison）告诉我，成年的延迟，一方面来说是现代社会的奢侈或者福利，我们可以延长青春，推迟成年，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探索、学习，但危险在于，有这样一种诱惑，你可能永远

无法到达一个点，对人生的一个重大问题做出决定、做出承诺，以及认识到人的限制性。

“认识到身而为人的限制性，是一个人成熟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的生命有限，才华有限，可以选择的职业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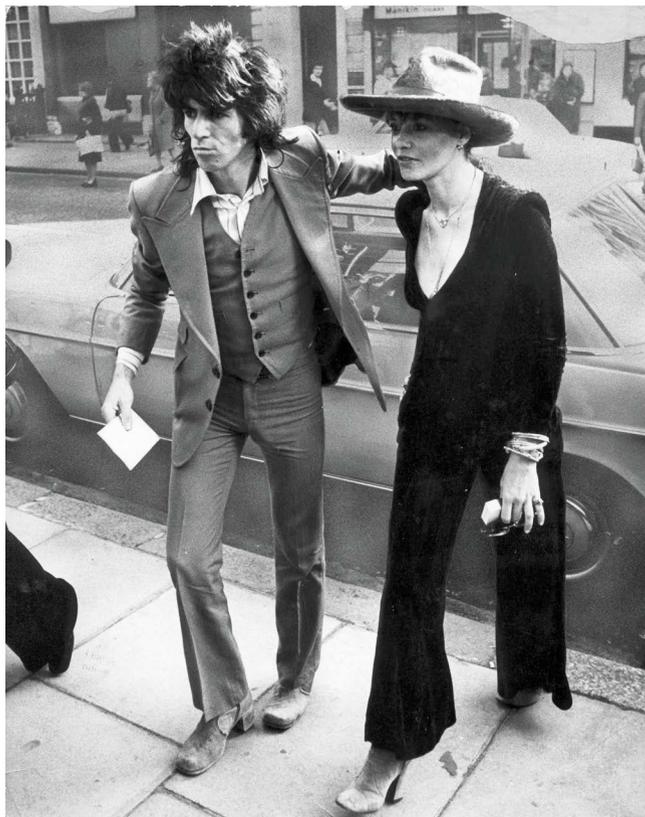
但你仍然需要做出决定。“什么是决定？决定就是消除所有的可能性，只剩下一个。关于人生的一些重大决定，比如与谁结婚、追随什么样的事业，什么样的信仰、世界观，这些决定不宜推迟太久。”

在他的书《我们为什么膜拜“青春”》中引用了李白的《长干行》：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千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左图：意大利女演员安妮塔·帕里博格和与她维持伴侣关系的滚石乐队成员凯斯·理查德兹（摄于1973年）

右图：美国影星凯瑟琳·赫本（右）出演的电影《育婴奇谭》剧照



诗中的女子，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经历了从小女孩到成熟女性的转变，而在我们的时代，可能需要20年。

到底是什么让你成为一个成年人？

在一个人的成年之路上，年龄是最不可抗拒，却也最不可靠的评判标准。

我的一个朋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他觉得自己6岁就成年了，只是社会，尤其是父母不同意而已。这话没错，所谓事业、婚姻、孩子，都是社会为我们定义的“成年”，没有这些指标，社会就不承认你是成年人，而被社会所承认恰恰是成年最重要的另一大标识。

从生理上来说，每个人都会长大、变老。但从心理而言，事情就变得复杂得多——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为自己负责、为别人负责，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都是内在的、主观的，你需要自己做出判断。

什么是孩子？孩子是有人保护着的。他们无须担心生存问题。或者说，他们与现实之间是隔开的。但一旦这份保护被打破，那个孩子就长大了。

意大利女演员安妮塔·帕里博格（她曾先后与滚石乐队的成员布莱恩·琼斯和凯斯·理查德兹维持伴侣关系，并与后者育有子女）回忆自己的青年岁月，她在二三十岁的年纪大部分时间浸泡在毒品里。她说，当你在吸毒的时候，你停留在一种孩子的状态里。不管你有多大，你都觉得自己只有17岁，因为毒品允许你回避现实，而现实会逼迫你发展出责任感，以及与现实谈判斡旋的能力。

在我的采访对象里，有一位38岁的女企业家。13岁父亲另结新欢，将家中财产一卷而空，不肯为子女留下一点赡养费用。母亲不肯离婚，最终被父亲打到离婚为止。家庭的变故，以及这种变故在她的情感上引发的伤害，无安全感、困惑、悲伤、痛苦……将她迅速推入了通往成年的快车道。真实生活的帷幕揭开了，没有人来拯救她，而她必须独自面对其中的一切残酷和毫无道理，自己拯救自己。

她16岁辍学，与母亲和两个哥哥一起在镇上做纽扣批发生意，短短几年里已经熟悉生意圈的一切事物，如何谈生意，如何管理工人、计算财务。19岁结婚，28岁生完第三个孩子，到30岁已经将生意做到全世界，从欧美、意大利、巴西到中东国家，凡是有手工业、



有设计业的，都会用到她的产品——一种树脂水钻，经常用在美甲或者头饰上。“全世界的头饰上那些闪闪发亮的东西，都与我们有关系。”她说。

“我常常想，我之所以是今天的我，要感谢童年的那段经历，虽然那时候真的很惨。很惨的。”

几年前，她的父亲身患癌症，他们一家人将父亲接回家，倾尽所能，照顾他终老。我问她，放下容易吗？她淡淡地说：“没什么啊，毕竟是父亲。”

反之，只要父母的那一层保护网还在，一个人成长的速度就会自然放缓，他们可以悠闲地从一份工作到另一份工作，从一段感情到另一段感情，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

我的采访对象中还有一位26岁的女孩，在国内最好的大学里读了7年书，专业是父母选的，房子是父母早早买好的，23岁就被安排了各种相亲。按照父母的安排，她应该在世界500强的企业里当一名白领，然后结婚、生子，度过富足而平淡的一生。但有一天，她突然意识到：在我最富创造性的年华里，每天花8个小时做毫无意义的事情——活着到

底是为了什么呢？于是，她第一次反抗父母的安排，为自己找了一份薪水不高但有很多自由时间的工作。她决定试着写作，也许将来能当一名作家。

很显然，这个女孩仍然处在父母的羽翼保护之下。也许她还无法承担起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责任。但当她做出那个决定的时候，至少往成年的路上跨出了很大的一步。因为她决定了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是由别人来为她决定。

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永远长不大的人。这个时代患有“彼得·潘症候群”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希望能永远享受年少的自由与随性，而避免扛起工作或人际关系中的责任。他们也许结了婚，有了稳定的事业，但这只是表象，在内心深处，他们仍然是一个孩子，怀抱着不切实际的梦想，希望写出最伟大的小说，或者找到最完美的情人，但却不真正为此付出行动，或者负起责任。

在《大人心理童话》一书中有一则童话，给出了彼得·潘症患者的归宿。

这个故事叫《渔夫与美人鱼》，一个贫穷的渔



《绝命毒师》、《广告狂人》(右)的主角是各种自恋、长不大的孩子

夫爱上了美人鱼，并且与她结了婚，生了五对双胞胎——五个儿子、五个女儿。美人鱼从海里带来很多财宝，他们过着很富足的生活。他们经常结伴去海底玩，把孩子留给用人。

终于有一天，大儿子偷偷尾随即将去旅行的父母，发现母亲是美人鱼，十分震惊，就死了。他的丧礼举行的那一天，一条男性人鱼从海里游出来，把棺材带到了海里。一年后，渔夫一个人回来，不久就死了。美人鱼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心理学家艾伦·知念。他在人到中年时，突发奇想，写了一些以中年人和老年人为主角的童话，后来又展开了漫长的成人童话的搜集工作。这本书是他搜集的世界各地的中年童话的合集。

我问他：“你对成年人是怎么定义的？”

他的回答出乎意料的简单：“责任。”

“当你为自己，为别人负起责任时，你就是一个成年人了。”

比如他自己，20多岁的时候在医院实习，到了夜里，病房里只有你一个医生，一下子就长大了。

青少年童话，常常以年轻男女离家为故事起点，到一个广大的世界里开创自己的命运。这是因为年

轻人必须从父母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而中年童话却很不一样。一个人年轻时百般努力奋斗才达成的目标，到了中年时会被一一彻底摧毁和重建。到了这个年纪的人，因为被迫要赚钱自立，养家糊口，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年轻时的天真必须转为脚踏实地的工作，而理想主义也转为实用主义。

但知念教授认为，这种责任自有它的意义所在，就像大力神亚特拉斯举起全世界。“成年男女是整个社会的支撑点，负责教养下一代，照顾上一辈，完成这些责任本身也能带给它们很大的满足感。”

事实上，不止一个做了父母的朋友告诉我——“有了孩子之后，不轻言生死。遇到再难的问题，也能冷静下来想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我该如何应对和处理。敢于面对生活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是‘立’的，是一个真正的成年人。”

成年是一种颠覆性的理想

杰弗瑞·简森·阿内特在分析所谓“正在形成的成年期”时，分析了很多可能的原因：从制造经济转到信息经济以后，年轻人需要更多的教育和培训才能适应新的工作，更长的教育时间推迟了他们



结婚生子的时间。此外，性革命、女性运动也是重要原因，随着婚前性行为的普遍被接受和生殖技术的进步，进一步推迟了婚育的年龄。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在这个时代，成年并不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图景。至少在美国，长大成人，不再是一件值得向往、令人激动的事情。

如果说，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好莱坞电影里还有凯瑟琳·赫本、加里·格兰特这种成功、优雅、有担当的成年人形象，到了今天的电视屏幕，就只剩下《广告狂人》《绝命毒师》里各种自恋、长不大的孩子。

“总是有人告诉你，成年人过着一种绝望沉默的生活。19世纪流行成长小说，会描述一个年轻人追寻灵魂，发现自我的过程，成年意味着一个独立的自我的成长，在社会留下自己的印记，而到了20世纪，尤其在‘二战’后，几乎所有的小小说家，索尔·贝娄、玛丽·麦卡锡、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他们笔下的成人生活，无一例外都是破碎的梦、破碎的婚姻、无法实现的野心、职场的疏离、家庭的隔阂。”

美国历史学家史蒂夫·明茨（Steven Mintz）在《最好的年华：当代成人史》一书中分析了美国

在过去400年里“成年人”的变迁，认为“成年图景”的贬值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不要相信任何30岁以上的人”。

成人小说，也叫启蒙小说，起源于德国，是西方近代文学中颇重要也常见的一个类型。简单说来，这类小说处理的是主角自幼年至成年、自天真无知至成熟世故的历练过程：或许进入社会吃亏吃苦而逐渐明白世途艰难人心险恶，或许经历某个或某些重大事件而使人生有所领悟有所改变；而在这番“长大成人”的领悟和改变完成之际，故事也由此到达（圆满的，或虽不圆满但尚称释然的）尾声。



在美国哲学家苏珊·奈曼（Susan Neiman）看来，成年的贬值来得更早，形式也更加的隐秘。在她看来，彼得·潘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这本小说写于1911年，与其说是在“浪漫化”“理想化”童年，倒不如说是在描述成人世界有多糟糕。而到斯皮尔伯格改编这部电影时，成年人（彼得·潘宁）变得更加悲哀可笑。

“真正的自由意味着控制你的生活，学会做计划、承诺和决定，为你的行为结果负责。一个孩子，比如彼得·潘，如果他受着欲望的摆布，怎么可能学会这些，怎么可能发展出有能力支配自由的自我？”

苏珊·奈曼今年60多岁，定居柏林。她说，自己在50岁的时候，经常听到别人恭维她说，“你看着真年轻”。作为哲学家的她立刻捕捉到这种恭维背后的问题——不仅是对青春的拜物，也是在暗示，你只有在你并非所是的状态（年轻）里才看起来很好。

“我们生活在一个庆祝不成熟的文化里。”她说，“成年则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图景。成年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希望和梦想，接受既定现实的限制，屈从于生活，尽管它远不如起初想象的那样刺激、有价值或者有意义。”

“成长的艰难，不在互联网，不在社交媒体，甚至是当下的经济状况，当然，这些问题都让成长变得更艰难，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文化不再



2015年1月17日，日本约2000名刚刚年满20岁的新成年女子身穿华丽和服在京都的三十三间堂参加比试传统射箭技术的全国打靶大赛

提供任何有吸引力的成年人的模型。”

她甚至认为，当下西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也与西方文明中“成年的危机”有关。缺乏道德目的，无法在现代经验中找到意义，导致年轻人投向那些可怕的宗教教条。“听命于那些宗教权威的行为毫无成年而言，但我们又能提供什么另外的选项呢？”

在《为什么长大》一书中，她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从哲学中找到一个成熟的模型，不是屈从于无可避免的失去，而是关于成为一个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我总是不断地回到各种被诟病的启蒙时期，因为那是我们的根基所在。在启蒙之前，你很难想象成长是一个问题，因为根本没有选择——你的命运取决于你的父亲。难怪对卢梭和康德来说，成长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卢梭的父亲是钟表匠，而康德的父亲是造马鞍的，他们未曾想象过自己儿子会成为大哲学家。”

卢梭和康德是《为什么长大》一书中的主角。卢梭一生狂放不羁，而康德过着刻板枯燥的生活。但康德却说，卢梭改变了他的一生，他的房间里唯

——张照片就是卢梭的肖像。卢梭写了世界上第一本育儿书——我们关于育儿的很多现代观念都来自这本书，比如孩子应该由母亲抚养，孩子应该有机会玩耍，教育不应该基于机械学习，而是尊重孩子的兴趣与好奇心。也是卢梭第一次提出，童年有其自身的重要性——它是人类最接近“自然状态”的人生阶段，也是天性保存得最完全的时期。它并非工具，而是目的本身。但他的目标并不是浪漫化童年，而是为一个自由、自觉的成年人打下基础。但与此同时，他也认识到，在一个不想要自由公民的社会里想要抚养这样一个孩子有多难。而正是这个问题，引导康德写出了《何为启蒙》。

在《何为启蒙》里，康德把“成熟”定义为——理性将自己从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

按照成长的逻辑，一个人刚出生时只是一个无助的婴儿，但随着身心的发展，我们将逐渐掌控人生以及与之相伴的世界。我们会逐渐融入世界并稳固我们在其中的位置，然后变得越来越独立，越来越有经验，直到我们可以成为自作主宰的成年人。但另一方面，我们最坏的本能却无时无刻不在阻止

破坏这个过程——处于被动状态是一件舒适的事情。我们选择了不成熟——让别人替你做决定，远比你自己做决定要舒服得多。

“如果有一本书照顾我的理解力，一位牧师照顾我的良心，一位医生规定我的饮食，我丝毫不用自己费劲。只要我能付钱，我就不需要思考，别人自会帮我打理一切事物。”（康德）

但奈曼认为，康德更深刻的洞见在于，不长大，并不只是我们的错，而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结构在保持我们的“孩子气”。因为我们不长大，永远保留在青少年的心智状态，符合社会的利益——即便是最好的政府也会发现幼稚、消极的臣民比独立、理性的公民更容易统治。国家控制的欲望与我们贪图舒适的欲望，创造了一个更少冲突的社会，但这不是成年人的社会。

在康德的时代，这固然意味着审查和惩罚，但消费社会发明了更好更隐秘的方法。以消费而不是生产来定义一个人——长大成人意味着有能力购买昂贵的玩具、更贵的车、更新的手机、更时髦的鞋子……而建立一个公正人性的社会反而被斥之为孩子气的梦想。所以，我们周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信息，有一半的信息迫使我们变得务实，不再做梦，接受世界实际的样子，并把成人的世界描绘成对现状的妥协。另一半信息则是关于如何保持年轻的产品和建议。这种“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比审查更有效——“如果你阻止人们得到信息，总会有一些勇敢的人起来反抗，但如果你用大量无意义的选项淹没他们，他们只想让噪音停止。”

“正因为如此，真正的成长不是一种顺从，而是一种颠覆的理想。和所有的理想一样，它永远无法真正实现，但不代表它不能引导我们的行动。”奈曼说。

“在康德看来，哲学在帮助我们成长方面所起的作用恰恰是相反的。它不会安慰你，也不会减轻你的疼痛；实际上它一定会使你的生活更加艰难。因为现实是不合理的，理性的任务是确保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点。通过独断论和怀疑论之间的辩证法，哲学引导我们尊重两者都包含的好奇与愤怒。它要求我们直面永远得不到想要的世界的事实，同时却拒绝放弃心中想要的世界。”

所以，在康德的成人模型里，“成长，更多的关乎勇气而非知识：世界上所有的知识都无法代替你运用你的判断力的勇气”。判断力至关重要，因为真

正触动我们的问题不可能通过遵循某一个规则找到答案。我们需要勇气去学会相信自己的判断力，而不是依赖国家、邻居或者喜爱的电影明星的判断力。

也就是说，独立思考，是成人的关键。其次，要有勇气去接纳贯穿我们生命始终的裂缝。理性的理想告诉我们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经验却告诉我们现实往往不是理想的样子。长大需要我们面对两者之间的鸿沟——两者都不放弃。

是的，成年必然遭遇失去。我们失去年轻，失去外表，失去健康。父母死亡，朋友离去，婚姻终结，孩子长大，终究离去。对于大部分成年人来讲，即使最亲密最重要的情感依恋，也会证明是短暂的，一半的婚姻以离婚收场。

但是，正如李剑，一位中国的哲学家告诉我：“成年，意味着成为一个有人的尊严的人，过一种有人类尊严的生活。这包括，能够去爱，去悲伤，去体验到渴望、感激和正义的愤怒；能够形成关于善的观念，能够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批判性反思；能够得到平等的、尊重的对待等等。”

在历史中“成年”

比起苏珊·奈曼，罗伯特·哈里森教授对于这个时代的“青春迷恋症”有着更复杂的心态和思考。

几年前，我在斯坦福大学采访他的时候，他就曾经表达过对硅谷青年文化的某种深切忧虑。我记得他说，这个时代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现代人正在放任自己的文化由一群“硅谷的孩子”（介于男人与男孩之间）来领导，任由他们重写社会的规则，决定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与苏珊·奈曼的《为什么长大》所谈的恰恰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奈曼批判的是成年人放弃了对一个应然的、更好的世界的希望；而他担心的，恰恰是年轻人对这个世界过于鲁莽的改造。

2014年，他写了《返老还童：我们为什么膜拜“青春”》（*Juvenescence*），一本关于“年纪”的哲学思考，从一个更宏大的文化史的角度切入成长的问题——“人类有许多不同的老化方式：生物上、心理上、社会上的，此外还有一个文化年纪（Culture Age）。如果这样考虑年龄，我们或许比想象中老很多。”

他从美国生物学家史蒂芬·古尔德（Stephen J. Gould）那里借来“幼态持续”（Neoteny）的概念，认为我们当下的青春迷恋症，恰恰是“幼态持续”在文化或者精神层面的一个体现。



当代进化生物学的研究认为，某些重大的进化改变是通过发展的延迟（或阻滞），而非积累来实现的。当有机体通过进化获得改变以便其成体保持幼年的某些特征，这种过程就叫作“幼态持续”。

人类是“幼态持续”的动物。我们演化的方式之一就是直到成年都还保留了我们祖先原本的幼态特征，比如我们的脑生长得更慢，骨骼骨化得很晚，新生儿的未成熟状态更为彻底，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父母的照料。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幼态持续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好处，我们巨大的脑至少部分是因为出生前的快速生长率延续到了后来的阶段。

哈里森教授认为，如果将“幼态持续”的概念用到精神层面，我们可以用它来指代一种童年心理在经过保存与修改之后，被延续到成年期。“如果人类的心理中没有保持了某种‘内在的孩子’，世界上大概就不会有各种父神、母神、各路神明。世界上就不会有宗教，不会有俄狄浦斯情结，也不会有艺术、诗歌、科学、哲学，因为所有这些人类的创造都源于在某种现象面前某种孩子气的惊奇感。而人类对生活的许多期待——我们的存在很重要，某人某物应该关心我们——本质上都是孩子气的。这些孩子气的欲望、梦想、失望，并没有随着成年而终结，而是延续我们的一生。”

这样的“幼态持续”并非坏事——青春（youth）对文化的创新和天才的光芒闪现至关重要。一方面，人类史无前例地被延长的青春依赖于成年人提供的智慧与稳定，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了这样被延长的、受保护的青春，我们才得以成长、成熟，创造了社会和文化，积累了足以与天才抗衡的智慧。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文明的发展依赖于“青春”与“老年”，“天才”与“智慧”之间的平衡与转换——“天才”专注于创造属于未来的新事物，“智慧”专注于继承过去的遗产，并在传递的过程中予以更新。（“智慧”这个概念是从汉娜·阿伦特那里借来的，指对世界延续性的一种关切。）但他认为，我们今天的文明呈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特征——过去的文明，一次次警告，青春的天才是如何被老年的智慧所压迫毁灭的。但我们的时代恰恰相反，青春的天才被庆祝，而老年的智慧则遭到了抛弃。

“我不知道我们的文明是否可以只靠青春的天才而存活。”他说，“当创新、变化来得过快过于鲁莽，文明更新的源头是否会遭到破坏？”

在他看来，这个时代最大的诡计就在于，一边迷恋着青春，一边却又正在对其自以为崇拜的青春发起战争——“一方面，它给年轻人对文化的主导权，但另一方面，这个时代又在剥夺这些年轻人养成真正的创造力所需的闲散、庇护所以及孤独，而这些是一个人形成自己的身份、创造力的根源。它剥夺年轻人的即兴发挥、惊奇以及失败的自由，剥夺他们闭上眼睛，在屏幕的巫术之外形成自己的图像的能力。剥夺他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没有这种与自然、与宇宙的关联感，生命将失去意义。剥夺他们与过去的关系，因此也无法形成自己的未来。”

“硅谷的年轻人喜欢说，我们连接世界。是的，我们可以越来越快地链接全世界，但它们是否真的有助于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呢？”

他最担心的是，无所不在的连接，来自所谓“云端”、整天在你脑中嗡嗡作响的集体意识的声音，正在使得孤独和独处变得不可能，但只有在孤独和独处中，一个人才能进入与自己的对话，进入与历史的对话。

人如何获得历史？

“一个人要进入那样一个地方，超越自我的爱在一种‘鲜活的记忆’中弥合了过去、现在与未来。正是在这里，一个人才能获得历史性的存在，从而将对自己的爱转化为对世界的爱，正是这种爱将孩子变成大人，不仅在心理层面，也在文化与历史的层面。比如，我作为一个西方人，随着我对19世纪、文艺复兴、中世纪、古典罗马希腊了解越多，我对这些时代了解越多，我的历史感越成熟，我的文化感越成熟。”

“但是，这样的地方需要日常的内省、沉默、孤独。一个人日后人生的智慧，是在他年轻时独自度过的时光——阅读、学习、好奇、观察、做梦、想象、沉思里滋养出来的。正是这种孤独，催生了心理、情感与文化的成熟。”

“我理想中的成年，不是在外表、行为、心智或者生活方式上无限靠近年轻人，而是经过了这样历史性的转换之后，你是一个年轻人，但担当着自己、对他人，对世界的责任；同时，你是一个成年人，却带着对世界无限的好奇与惊讶、一个年轻版本的成年人。”

如何应对“1/4 人生危机”？

肯尼思·希尔 (Kenneth Hill) 是美国一位心理学家,他在与另两位学者合著的《人的迷失行为》(*Lost Person Behavior*)中,有一章节从心理学角度讨论了“迷失”的概念——“迷失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Lost)。他描述了对于迷失者行为的研究,包括他们在“找到”自我的努力过程中的情绪反应以及所采用的各种各样的办法。在文中,希尔提出了五个步骤,指引迷茫的年轻人找到生命的轨迹,不再挣扎。

美国自由撰稿人卡罗琳·比顿 (Caroline Beaton) 对此进行了总结,指出人们在面对“1/4 人生危机”的时候,实际上是迷失了自己。如同杰弗里·阿内特所说的那样,我们“有很多方向,换了不少工作,也换了爱人”。研究表明,39%的男性 and 49%的女性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会有一种危机感。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实际上跟在荒野中迷失的解决方式差不多。

第一步：远离歧途。

在荒野中迷失的人常常不顾一切地坚持某一条路线,很难改变自己的想法,而事实上那条路可能是错的。我们在 20 多岁时候的选择,也符合同样的道理。我们不会去走那条难住了我们的路,而是盲目地遵循眼前已经设置好的路线:也许是父母规划的路,也许是我们刚毕业时就选择的那条路,或者我们觉得“应该”走的路。即使我们会低落、焦虑甚至愤怒,即使这些情绪都告诉我们,那条路是错的。

事实上,极少有人能够本能地知道他们想用一生来做什么,所以不要害怕做出改变,永远不要担心换一条路走是不是太迟了。神经科学揭示,我们的大脑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生的知识和阅历在不断地进行着调整。如果身体中这个最强大的部分都能够跟上你选择的新的路线,那么还有什么好担心呢。

第二步：留在原地。

大部分人一旦意识到自己迷路了,都会感到崩溃。但是焦虑于事无补,只会火上浇油。当情感(比如悲痛、恐惧、担心)很强烈的时候,希尔写道,“我们的思想中会迸发出很多干扰路线,让当事人的注意力涣散,即使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都无法集中精力去解决”,最后选择了一条“没有明显目的性的阻力最小的路线”。这无异于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

重新定位自己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平静下来,留在原地。跑得太快太急很可能会南辕北辙。就像作家杰

夫·戈因斯所写的那样:“在我搞清楚要用我的一生来做什么之前,我需要先弄明白自己到底是谁。”

第三步：找到属于你的“标记”。

一个内行的徒步者,无论去哪儿都会使用一个明显的“标记”,如果没有它,很容易在荒野中迷失。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在 20 多岁的时候不搞清楚什么是对自己真正重要的事情,就会被其他人在做的事情以及我们“应该”走向何处所干扰,在混乱中迷失自己。

所以,一旦停下脚步开始重新定位的时候,我们需要找到那个能指导我们实现个人抱负的标记或者里程碑。静下心来思考几个问题:1. 我喜欢什么? 2. 我擅长什么? 3. 这个世界需要什么?

这些是你抵达目的的小基石。如果你认为你的回答自相矛盾,请跳到第五步。在便利贴上或者你容易看到的地方写下你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在困惑的时候,用它们来引导你走回正轨。

第四步：创造一个行动计划。

并不会出现一个搜索救援队,来营救迷路的 20 多岁青年。第一次面对独立,我们必须成为自己的救援队。留在原地,找到自己的“标记”后,再创造一张地图,记下你想要做的每一件事,思考何时该用何种方式。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很可能又会退回到阻力最小的那条路上。行动计划和系统的步骤,能够让自己尽量免于消极怠工,从而对自己负责。

第五步：别找借口。

只有当我们对自己负责时,才会感到未来掌控在自己手里。一般来说,20 多岁的人会有以下借口:“我不够聪明”“时机不太合适”“我运气太差”“是我老板的错”,以及“经济形势太不好了”。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史密斯认为,你对自己的这些暗示会决定你事业的轨迹。很多人会寻找借口,例如:“我的确要追求一项伟大的事业,但是我认为人际关系比成就更重要。”但这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事实上我们完全能够掌控自己,换个方式思考:“我想要成为一个贴心的朋友、一个出色的恋人、一位称职的家长,并且我不会为了伟大的成就感而放弃这些东西。”调查显示,寻找借口的行为本身,可能比真正的借口更会阻挡你。

刚刚脱离青春期、离开大学,第一次决定未来之路时,我们常常会感到困惑。希尔将其称为“伍德斯休克”。但是调查数据的结论是相对积极的:那些有四分之一人生危机的人,再经历“中年危机”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文字整理/傅婷婷)



“最强大脑”选手王昱珩

“最强大脑”王昱珩： 洞悉世事地活在自己的世界

主笔 / 杨璐 摄影 / 于楚众

“微观辨水”其实特别能说明王昱珩的人生态度，他的视力比谁都差，可他能做到大部分人觉得超出人类极限的观察，这不是特异功能，而是他看透了套路，也就有了应对策略。这个能力伴随着王昱珩的成长。他可不是住在桃花源，而是洞悉世事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他没有中年危机，连随时有可能失明都坦然面对。看明白了，也就那么回事儿，不能被命运、思维定式、标配人生给吓住。这也是他参加“最强大脑”的初衷，告诉大家，世界上没有最强大脑，或者人人都是最强大脑。

天定胜人之后

王昱珩本来可以参加第一季的“最强大脑”，但他把眼睛给伤了。

他记得那天是3月7日，去打羽毛球，没热身就上了场，球飞过来的时候，分了心。“我突然间在想，是不是可以用意识把这个球停下来，多看它一秒，这样就能看清球头长什么样子。”王昱珩说。他睁着眼睛仔细看球头呢，没有躲，结果羽毛球像钉子一样打到眼珠上了。“我当时坐在地上蒙了一下，但我在清华的时候一直是运动员，什么伤也都见过，觉得应该不是什么事，以为歇歇就好了，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我发现视野变窄了，有一只眼睛完全看不到了。我就有点慌了，到洗手间镜子前看了看，发现瞳孔放大了。”王昱珩说。

同仁医院的专家没告诉他结果，只让他记住一点，必须坐着睡觉，不能做任何低头的东西。“我当时还心想说，坐着睡觉挺舒服的一件事。结果发现特别累，我总想往下躺，那一刻其实很痛苦。以前对我来讲那么简单的事情，现在都无比艰难。”王昱珩说。他必须以极大的毅力保持坐姿，这样才能保证眼压在安全范围内，一旦低头，可能就会彻底失明。王昱珩在门后面贴了一张视力表，希望某一天睁开眼，就能看见了。“我每天睁眼都是失望的，

什么都看不见，人就越来越消沉。只是大概过了几个月，我的眼睛才慢慢有了光感，但还是雾蒙蒙看不见。没受伤的那只视力也掉得厉害，因为两只眼睛的视力是有个平衡的。”王昱珩说。

王昱珩本来是一个爱玩的人，现在却坐得腿上的肌肉萎缩，腰也受了损伤。他回忆起上大学时候跟老师的争论。王昱珩告诉我说，他高考的时候没怎么复习就考了第一名，甩了第二名40多分。那时候觉得自己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很轻狂。“有一天在楼道里遇到老师在抽烟，具体聊什么我忘了，但就聊到人定胜天这个话题。我当时坚持认为人定胜天，没有自己干不成的事儿，但老师说，这句话还有后半句，叫天定胜人。当时，我就愣住了，我印象中的画面一直停在那里。”王昱珩说。

34岁，王昱珩遇到了人定胜天还是天定胜人的坎儿。同仁医院的医生告诉他，他受伤的眼睛会发展成一种类型的青光眼，可能头一天视力还正常，但第二天一睁眼就失明了。即便这种情况没有发生，视力可能也就坚持10年。王昱珩信奉人定胜天，对这个诊断并不服气。他去私立医院看过，去中医医院看过，清华大学校友会的校友也从各个国家发来资料，结论都跟同仁是一样的。

王昱珩只能面对现实，想好以后的人生怎么办。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既然眼睛随时有失明的可能，那么休养看起来就不是一件划算的事情。“其实那会儿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对我来讲真正最可贵的不是眼睛，而是不可再生的时间。它没有了，就真的没有了。与其坐以待毙，我为什么不花更多的精力去做想做的事情？”王昱珩说。

王昱珩开始恢复正常生活。他首先得适应受伤后看到的世界不是立体的，而是平面。“我出门很不方便，别人眼中的台阶在我眼里就是斑马线，我不敢迈腿，不知道下一步会不会踩空。倒水也不行，经常倒着倒着身上就湿了。眼睛对不上焦。”王昱珩说。他赖以生存的专业似乎也无以为继了。他是毕业于清华美院的设计师，一直特别相信自己的双手，觉得自己的手像上帝一样，可以创造出任何想创造的东西，但现在，当他想完成“天定胜人”那位老

师去世前没有完成的作品时，画了一宿什么都没有。“我之前一直不以为我受伤有什么事儿，但那突然之间，我的心态终于有了变化，特别受打击，因为手不行了。”王昱珩说。

王昱珩逐渐训练自己，脑、眼、手三个点，在缺了眼睛之后，如何画得准确。“我先画一只眼睛，然后画它的外面。我开玩笑说，别人都是画龙点睛，我是画眼睛装框。因为我只有前10分钟是能看清楚，应该把最打动我的东西先画出来。”王昱珩说。他受伤之后的作品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立体感非常强，这也是他视觉与常人不同的结果：“我眼睛的视角是扁平化的，那么我就希望画的东西首先自己能看清楚。这就会导致很多人看到感觉像立体画，因为当我自己看着是立体的时候，别人看着就更立体了。”王昱珩说。

总在套路之外

王昱珩在江苏卫视的“最强大脑”节目里出名，拥有220多万“粉丝”，是公认的聪明人，可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也不勤奋。“不学无术、玩物丧志”是父母从小到大对他的评价。

他第一次在节目中亮相时肩膀上落着一只大鸚鵡，十分贴合他日常的状态，爱自然、爱动物、爱做手工。他养鱼、养水草、养蜗牛、养刺猬、养乌龟，还要把爱好融入生活。他家的Loft面积很大，却只在楼上装了一个小空调，因为他坚持模仿西伯利亚冷空气形成的原理给家里降温。他在楼下布置了一个低温、阳光少、潮湿的环境，用大塑料箱高低错落落地养着龟背竹、尼古拉鹤望兰等雨林植物。“楼上的位置装的是空调，冷空气给过来，形成一个下沉，楼下西北角的高湿环境就会形成一个循环对流。”王昱珩说。

这些自然知识来自于从小到大的积累。王昱珩告诉我说，他走画画这条路，完全是因为画画比学习好玩，而他初中时候跟着“高三”临考的大孩子一起画，就能画得比他们好了。他不爱规规矩矩学习给大学老师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便是毕业多年以后，老师跟他以嘉宾身份在活动上相遇，还是能清楚回忆起这个顽皮怪异的学生，因为王昱珩在课桌上放了一个大鱼缸，旁边还放着小鱼缸、小花盆，不听课，交作业就是画一条鱼，而且别的同学画很多内容了，他还是在画一条鱼。

王昱珩说，他的记忆力从小就好，去一次动物园就能把平面图画出来。他的注意力也非常集中，所以高考时把复习分成15分钟一个单元，闹钟一响就换一个科目。“我觉得我是能随意控制自己的人。看起来经常走神，一旦专注地做事，我的效率非常高。”王昱珩说。更重要的是，他总是能研究出规律来。他做过智商测验，分数在150分以上，但他觉得这不能证明就是聪明，因为他做几次就猜到了出题的套路。“很多人需要固定编码，然后用固定的东西去记，这样的话其实等于记一个套路，不灵活。比如我教你怎么撬门，木头门你也这样撬、石头门你也这样撬，来了纸门还是一样，已经完全僵化了。这种固化思维，我认为是有弊端的。”王昱珩说。

学生时代的思维模式一直伴随王昱珩到成年之后。一旦洞悉套路，他总能完成普通人觉得很难完成的事情。他发现很多人印书，一次性购买的纸用不掉，于是剩下的纸就被他收购来。“这些纸肯定不整齐，那我就通过设计让人家觉得是专门为了做成这样的，很特别，还觉得成本很高，其实用的纸张品种越多越便宜。”王昱珩说。

女儿能读现在的学校，也是他动脑筋的结果。入学考试要考特长，家里人一开始报的是舞蹈，但他女儿其实没学过，被淘汰了。王昱珩拿着招生简章研究了一番，“特长考试里画画、书法、唱歌、跳舞都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里面有一个击剑。我觉得击剑学的人比前面那些少，因为它需要固定装备，这么大孩子正在长个，很费钱。而且中国家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显摆孩子的才艺，击剑平时没法显摆。我就让女儿报这个专业。”他在网上看视频，自己先学基本动作，然后教给女儿，告诉天生左撇子的女儿无论什么情况下，左手拿剑，先出左腿。王昱珩告诉我说，他揣摩教练的心理是选苗子。左手拿剑跟对手打一顺边，对手肯定别扭。所以，左手、女孩占了两项优势。教练又偏好看遗传，考试那天，他特意穿上运动服陪着女儿去，教练看到爸爸的情况，就留下了女儿。



“我觉得我是能随意控制自己的人。看起来经常走神，一旦专注地做事，我的效率非常高。”

“只做我认为正确的事”

上电视之前，王昱珩并没有被看成天才，他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只不过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告诉我说，他从来不做别人认为对的事情，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所以，他觉得为了一个世人认为

的“成功”奋斗,而放弃自我是件不正确的事情。“像郎朗、丁俊晖,他们的成功我并不认可,我觉得那都是被逼出来的,这样的人生不完整。”王昱珩说。他从小玩到大,对女儿的教育也复制了自己的成长经验。7岁之前,他只教给女儿两件事,一个是阅读,因为阅读可以满足好奇心、长见识,另一个是用改锥,因为动手能力是一个人基本的东西。他给女儿挑选学校的主要依据,是学校配套了动物园。

秉持着这样的价值观,他并不喜欢“最强大脑”里的一些选手。“第一季有个初中的男孩子,还没公布答案就开始哭。他以为自己答错了。其实公布答案之后,他答对了。我当时就觉得这孩子的心理素质太差了。看采访,他赢了比赛之后的愿望是有一天假期,因为他有一个非常严厉的父亲。我看男孩那么小就戴着眼镜,大腹便便,觉得这孩子每天都干什么呢。”王昱珩说。王昱珩给节目组留言吐槽自己的想法,还告诉节目组,这些题目太简单了,他也能做。节目组真的给他打了电话,带着题目到北京测试他。王昱珩通过了测试,可不久就伤了眼睛,错过了第一季的比赛。

第二季的“微观辨水”让他一战成名。这种题目其实王昱珩有优势,因为从小就盯着花花草草看,动物、植物有些微变化他都能用眼睛看到。他的注意力又非常集中,即便是在比赛里,现场有800多名观众、100多名工作人员,灯光烤灼着,几台摄像机在运转,都没干扰他。“你首先要静,然后就是找到目标,到最后一步就是视微如著。”王昱珩说。另一个成功的关键是他想好了策略。“水杯一排4个,是因为我一眼能扫4个。其实就算当时放了一两千杯水,我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分母做到多少都不是问题,因为我的方法是把盯住的那一杯找出来。那么如果用记忆水杯的方法,就是其他题目里很多选手去记忆分母的方法,就很难过,那么多雷同的,到底能记住多少呢。”王昱珩说。

同样的思路,王昱珩又用在了“辨别唇印”的比赛当中。他并没有像对手一样去记忆31个女团成员的唇印,而是只看4个被选出来的女孩,再去寻找。王昱珩告诉我说,一场节目要录很长时间,特别累,他那天又拉肚子,就觉得不一定要记住那么多,上场之后再见机行事。王昱珩总在套路之外,他也并不相信准备。“场上随机都会有变化,没办法按照什么既定方针,既然这样不如以不变应万变。根据实际情况和对手的状态再想策略。”王昱珩说。

王昱珩的观察力和记忆力都超出常人,可他视力很差,比赛策略也不以记忆取胜,这是他参加综艺节目的原因,告诉大家人生许多有意思的事情,把那都搁置着却去应付记忆术,根本没必要。他在互联网上被称为“脑王”“鬼才”,但他觉得周围比他聪明的人太多了,只不过他想清楚了自己是谁,不去做不擅长的事情。他经过了眼睛受伤的大挫折,依旧不相信宗教,觉得那是人在没有出路或者没有自我的时候,需要一个心理慰藉。他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不跟别人比较。因为他用最熟悉的自然界去看人生,“标配”是违反规律的。他告诉我说,每个人就像植物的花期,是不一样的。有人是草本,天天开花,有的是木本,还有一些是一棵参天大树,甚至有人就是被子植物,但如果他们在合适的环境里,都会过得很好。

王昱珩推崇的是忠于自己的内心和兴趣,去探索无穷尽的世界。“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能够沉迷在自己喜欢的工作里,一直做这个事情,就是特别好的状态。人不应该去想那么多无意义的比较,就专心地做好自己,自然而然会有人发现你。夏天兰花开了,我很开心,但也许一颗花迟迟不开,有一天长成了参天大树,那也很开心。根本不用着焦虑。”王昱珩说。

他从“最强大脑”的光环中回到家里,继续着生活的主题,专业地玩儿着。当年为了纪念女儿出生,他在当天就开了一个海缸,觉得地球3.5亿年的生命演化就是从一块石头和一瓢水开始的,完全模仿自然环境,日夜更迭地,用了7年时间在空缸里养出了珊瑚礁。“等我再回到论坛,发现天地都变了,认识的所有老人都上了岸。他们说,因为有了孩子觉得压力大,没时间就不玩儿了。我是有了孩子才下海的,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借口,其实是不爱了。”王昱珩说。他在兴趣上一直在做加法,养鱼养花养龟都没有放弃。现在他连一直以来的梦想都快实现了,在农村弄了一块地,把30多年玩过的一切都搬进去,完全用自然能源形成一个生态循环,让孩子在这里看到自己养的生物如何繁衍生息,完成一生。

王昱珩没有中年危机,其实他面临的是更严重的问题,视力的期限大约只有10年。一旦完全失明,他的设计工作就不能继续了。如何谋生呢?他还是一副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态度,告诉我说,到时候再说,一定能想出办法,相信自己是能赚到钱的。✍

(感谢桑洁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俞飞鸿的“无所谓”

记者 / 宋诗婷

演员、导演、制片人俞飞鸿

“成长就是给自己找个最舒服的姿势，躺着、半坐着、斜倚着……找到最舒服的姿势，然后一直保持，这就是我现在的的生活。”

对俞飞鸿的采访约在她的工作室。那天，我早到了几分钟，一推门，她就站在门口，身旁围着3个人，摆弄着她身上那件红棕色礼服。4个人一起左右端详，讨论侧过身拍照，这宽松的腰部剪裁会不会有些显胖。

工作室不算大，墙上的海报大多来自两部影视作品——《我爱你，再见》和《爱有来生》，前一部俞飞鸿是制片人和出品人，后一部她是导演，当然，两部作品的女主角都是她自己。

俞飞鸿很守时。她试完服装，换上轻便的白色背心和宽松长裤，采访准时开始了。

“他们说是一个专题采访，说实话，我兴趣不大，不太喜欢聊话题性的东西。我不太喜欢自诩成一个什么代表，我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我自己。更不愿意去引导别人，号召些什么，群体活动我不太喜欢参与。没关系，既然今天咱们在这儿了，就随便聊吧。”俞飞鸿给出一个坦率的开场。

美与自由

采访前，我看了她前阵子接受的一个视频访谈，与她对谈的是曾经的记者许知远。两人面对面坐在茶室里，俞飞鸿讲得神采飞扬，对方突然冒出一句“你真是挺好看的”。这话把俞飞鸿逗笑了，大概也把很多观众逗笑了。

没想到的是，当我，一个女人，坐在俞飞鸿对面时，冒出的第一句话也是“你好美啊”。这赞美来得很突然，完全地情不自禁。

她又笑了笑，没接茬。在过去的40多年里，她应该早已习惯了这种赞美，对她来说，就像见面打招呼一样稀疏平常。

一个家境殷实又美丽的女孩在这世上会经历什么？

“美？到底能有多美？大家都是一张嘴，两只眼睛，一个鼻子，能美到哪去啊？”俞飞鸿在自己脸旁比比画画，“小时候，家里没人说这个，我一直把这夸奖当成善意的传递。”

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俞飞鸿对自己的美是不自知的，但美这东西是个客观存在，它在一定程度上

让俞飞鸿的世界被她口中的善意环绕。

小时候，她是街坊邻居的洋娃娃，大家抢着给她织毛衣、做衣服，放了学总有人轮着班在幼儿园门口接她。大姐姐、小阿姨们把她按在椅子上，再把火钳烫热，掀起一绺绺头发，在火钳上绕几圈，给她烫出一头羊毛卷，看起来更像个娃娃了。

上高中时，班里最野、最凶的男同学会和假小子打架，但对她就温顺很多，还会偷偷塞给她好吃的。高考报了北京电影学院，她跟六七个男生结伴去北京艺考。回来的火车上人贴人，大家受不了了，怂恿她去和列车员说说，给大伙儿找个能立脚的地方。交涉的结果是，列车员把她和一起的几个小伙子带到了邮车车厢，和成堆的信件靠在一起，宽敞、凉快，自在极了。

美丽带来的特权没让俞飞鸿骄纵，被照顾得太好，反而束手束脚。这和她的家庭教育有关。父亲是清华毕业的高才生，母亲也是读书人，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大人好好工作，孩子好好学习，什么都不缺，独缺一点点离经叛道。

“我很小的时候就特别希望能长到30岁，因为30岁的女人看起来是一副可以自己做主的样子。”俞飞鸿回过头来想，从18岁进入大学到30岁之前的那十几年，她一直在努力拓展自己自由的维度，不是物质上的自由，更多是精神上的，很私密，有点暗流涌动的意思，看起来无关紧要，也不会让生活起太大波澜，但对她来说，没有不行。

追求自由是从逃离开始的。她原本考上了一所杭州的大学，但总觉得还在家人、亲戚和朋友们身边，还是有依靠，于是，决定重考，去北京，读电影学院。

逃离故乡并没让俞飞鸿活成另一个模样，她依然是好学生，成绩好，守规矩，老师、同学都喜欢。毕业后她还顺利留校，用掉了系里唯一的留校名额，这在父母和外人看来，实在是个安稳的好差事。

工作一年，她又觉得哪里不对，还是想逃。这一次要逃去美国，一来学英语，二来再次逃离熟悉的朋友圈和时不时提供帮助和照顾的叔叔阿姨，看看能不能真正地一个人生活。对于一个家境良好的美女来说，很多便利与生俱来，接受便是，俞飞鸿却很难对此心安理得，她似乎没有办法从外部提供的任何赞美和帮助下找到安全感和自由，她要全权接管自己的生活。

“一本护照，一门外语，一张信用卡，那是我二十出头时最想拥有的东西。”到美国学习语言，俞飞鸿一次性得到了这三样东西。她在美国学会了很多自己之前不会做、未来可能也不需要亲手去做的事，比如换灯泡、开车、办各种身份证明和信用卡、帮朋

友在4S店里讨价还价……“我可能不需要一个人去面对很多事情，有些事我可以选择不做，但我需要知道自己能做，这样内心才觉得是真的自由了，不然总有疑虑。”俞飞鸿说。

这种思维方式非常西方。我可以不选择，但我需要有选择的权利和能力，对于自由边界的探索，贯穿了俞飞鸿的18到26岁。

26岁，俞飞鸿在美国街头险些被一辆飞驰而来的私家车撞出斑马线，她跑过去，踢着对方的汽车轮胎大吼大叫，用学会的所有英语脏话、俚语问候对方。“说来很好笑，那是我第一次直接表达愤怒。”俞飞鸿在视频访谈里聊起这段经历，她把那次愤怒视作自己在美国所修的最后一门课。尽管在之后的近20年里，她几乎没再有过如此声势浩大的愤怒，但那次怒吼让她知道，愤怒这项缺失多年的能力她终于习得了。

《爱有来生》

1997年，俞飞鸿从美国回来，接拍的第一部戏是《牵手》。片方和导演本来想让她演女一号夏晓雪，她看了剧本，挑了女二号王纯。王纯，一个刚大学毕业的漂亮姑娘，男女主角婚姻的第三者，不太讨好的角色。“但我觉得，自己当时刚回国，和她的状况很像，事业刚起步，表演上能找到支点。”俞飞鸿的想法简单直接。

王纯这个角色让俞飞鸿火了。福利和代价是，片约不断。90年代末，中国的电影、电视剧刚刚市场化，大家拼命赚钱，演员的工作规范还不完善，经常连轴转。“完全没有在创作的感觉了，只是在机械重复劳动，我必须停下来，找回创作的快感。”在红了的过程中，俞飞鸿被名气和高强度工作束缚，又不自由了，于是，紧急叫停。

接下来的近10年，她把自己献给了一部电影和一部电视剧——《爱有来生》和《我爱你，再见》。

“我1996年看到须兰的这篇小说《银杏，银杏》（电影《爱有来生》原著），2001年买的版权，2007年开拍，一个女人的黄金年龄，是这本小说和这部电影陪我过来的。”俞飞鸿感慨。

她是在往返美国的某班飞机上读完这篇小说的，原著不长，9000多字，一气呵成。故事很中国，很执念。阿九一家被土匪杀害，为报仇，她潜到土匪头子的弟弟身边做情人。一边是弄假成真的爱，一边是不共戴天的家仇，阿九选择结束生命，与爱人相约来世。爱人化作孤魂，在树下等她50年，再轮回，阿九已成别人的妻子，两人的前世和今生，都是错过。

“看完之后，一直想着，偶尔和朋友聊起来，就会讲到这个故事。买了版权，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拍，朋友劝我自己拍。”据说，劝俞飞鸿自己做导演的人是王朔。2000年初，转行当导演的演员还不多，女演员更是凤毛麟角，徐静蕾是最成功的一个，她的转型也有王朔的功劳。

从和俞飞鸿的聊天中就很容易感觉到，她是个温柔的人，但也是个糊弄不了的、较真儿的人。你的观点，她但凡有半点不赞同，就一定会指出来。她大概是我见过的最喜欢向记者提问的演员之一。

这点提问的劲头和筹备《爱有来生》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拍这片子之前，我挺顺利的，没受过什么罪。这片子对我影响挺大的。”俞飞鸿说。

她怕见生人，沉默寡言的性格不得不改变那么一点。每天和各个部门据理力争，与美术组半米半米地争执搭建场景的内部结构，和道具师一件一件勾对屋子里要摆的锅碗瓢盆。她说自己从来都不是领袖，但做导演就得以身作则，看景时，自己噌噌走在前面，一口气爬上上千米的山，后面跟着的人不敢有半句怨言。“我不偷懒，我把自己全交待出去，那就什么遗憾都没有，不然的话我心虚，我从来都不喜欢心虚的感觉。”

但和这些落在实处的执行力相比，《爱有来生》对于30多岁，不曾经历沧桑的俞飞鸿来说，最大的意义在于，让她体会到了绝望。在接受许知远“十三邀”的采访时，她描述过当年云南的那场雨。云南是《爱有来生》的取景地，拍摄期间，当地的雨季提前到来。一开始，雨下得断断续续，每天还能拍几个镜头。到了后来，雨不停了，七乘二十四小时地下，每天剧组要白白损耗几十万元，面临不得不撤离的困境。

“我留在脑海中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是，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雨，不知道站了多久，内心没有起伏，没有悲伤，一片空白，出奇的镇定。原来，当你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发生了的时候，不是愤怒，也不是悲伤，是空白。”

2009年，《爱有来生》上映，口碑不错，票房却不好。“具体数字就不要纠结它了，外面的数字都是不正确的，都无所谓，它确实没赚钱，这是真的。”

在拍摄《爱有来生》之前，俞飞鸿还折腾过一部没怎么赚到钱的电视剧——《我爱你，再见》，也是一个关于错过的故事。高中校园里的姐弟恋情侣，因为误会和成长而分开，纠缠了十几年，不断错过彼此。

这符合俞飞鸿的审美：错过就错过了，错过不一定不美，没错过也不一定美，顺其自然，万事都不强求。这也是她当下的人生态度。在剪辑《爱有来生》时，



“我很小的时候就特别希望能长到30岁，因为30岁的女人看起来是一幅可以自己做主的样子。”

她还被另一部电影打动过——西恩·潘的《荒野生存》。那种对自由的极致向往，让30多岁，在剪辑房和家之间两点一线的俞飞鸿流泪了。

积极的悲观主义者

采访中，我总试图和俞飞鸿聊聊年龄，聊聊向往自由、顿悟和生活转变的节点。但她好像不是个有时间概念的人，也从不喜欢用时间来归纳和标注生活。就像她的长相一样，似乎没年轻过，也好像没有老过。

“不要总问我什么时候，没有明确的某年某月，就是一种感受，很难说清是哪一年，哪一个时刻，肯定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发生的。”俞飞鸿说。

26岁，从美国回来，知道自己靠一本护照、一门外语、一张信用卡就可以生活，学会了愤怒，学会了尽量不求助于人，俞飞鸿就觉得自己内心越来越自由了。当下，她46岁，与内心自由相对应的是，行事作风越来越规规矩矩，越来越遵从眼前的社会规则，越来越对自己无所求。

她对演戏无所求了。“没有太多规范，不给自己下套，不给自己压力，遇到好的是意外惊喜。毕竟，演员是被动的。”《爱有来生》之后，她也不以导演自居。“不会为了做导演而去找故事，阅读是个习惯，有事没事都会读一些东西，没那么目的性。”

她对外来的目光也无所谓了，我反复确认，她都一口咬定。“证明给谁看？要给谁看呢？谁对我来说那么重要？观众吗？你觉得再好，拍出来，人家觉得是狗屎，也没辙。你最多是茶余饭后的五分钟谈资。父母吗？你永远是他们挚爱的孩子，永远那么重要，没什么可证明的。朋友吗？他们更无所谓了。”

她对婚姻无所求了。不拒绝，也不排斥。她说，男人从来不是她拓展生命维度的方式。

她对很多政治正确的立场也不感冒。比如，女权。在和许知远的对话中，她常常提到男人和女人，并不是倡导女性权益，只是想了解在这个既成事实且短期内也无法改变的男权社会里，男人与女人的观念差别。对此，她不抗争，甚至有点庆幸：男人受男权、责任、面子和欲望所累，女人轻巧很多，可以不出头，不争名逐利，也可以偶尔偷个懒。

这种“无所谓”的态度来源于她对自我的认知。“年龄越大你越知道自己的局限在哪里，一开始还找不准，但越来越清楚，优势、劣势、长处、短处，你开始知道自己的范围在哪里，哪些是自己可以掌控的，哪些不能。在自己发挥很好的范畴里尽量发挥就好了。”



电影《悟空传》剧照

“无所谓”也来源于她从小所受的教育。逃离了一大圈，她又回到了少年时期被圈定的规范里，并且心甘情愿。“生活中我不太喜欢失衡，很多规范，我不想去打破，打破了你要负责任，要承担后果，能不能承受要考虑。安稳一点更好。”

俞飞鸿喜欢看人物传记。看凡·高，她庆幸，庆幸自己没有天赋太多才华，“保持平庸就好”。她也看武则天的人生，前半段的“宫心计”她不在意，反而对武则天40岁之后的经历有兴趣，觉得中年之后的武则天所作所为已经超越了性别，在政治远见上可以和男人相抗衡。她有兴趣扮演中老年武则天，却没兴趣经历类似的波澜起伏的人生。

曾经一度，我们的话题莫名转到抑郁症。“身边几个朋友都跳楼自杀。”俞飞鸿有很多文化圈、演艺圈的朋友，人到中年，自觉或不自觉地思考起生与死的话题，有些人病了，迈不过这个坎儿。而她最接近死亡的一刻是尝试蹦极，“站在那儿的那一刻你才知道，生活中有多迈不过去的坎儿你才会选择跳楼啊！”思考死亡势必要探讨哲学层面，但她不愿意给自己找麻烦，假装对此毫无好奇心。

听起来，她是以一种“傻白甜”的方式在生活，但似乎是绕了一大圈，经历过思考后，主动选择了这一方式。就像很多年前，她接受“凤凰非常道”采访时所说的：“我喜欢苍白，您要知道，我喜欢它平淡无奇，这是我想要的，我根本就没有想要不苍白的人生。”

对苍白的向往大概来源于她本质的悲观。采访的两个小时里，我最终也没搞清楚，一个美丽又被宠大的女人是怎样开始笃信“生活本身是无意义的”。但目前来看，这种存在主义的价值观似乎真的让她自由了，踏实了，找到了“自己最舒服的姿势”。



茶饮项目创业者缪钦

缪钦：在对抗中保持年轻

主笔 / 杨璐 摄影 / 于楚众

缪钦从麦当劳炸薯条、扫厕所的员工一直做到中国区的 COO，是中国区晋升最快的员工，也是最高职位的本土员工。他本来有机会更上一层楼，完成整个传奇的励志故事，可他辞了职、卖了房，创业了。他对 40 岁没有恐惧，也没有去感悟的时间。如果说对这个年龄段有什么想法，他觉得自己的创业就是为了对抗人到中年的索然无味。

做带劲的事

缪钦给人的深刻印象，是有与实际年龄和职场经历不符的“少年感”。他穿了一件 T 恤，外面套一件帽衫，衣服上都印着他公司的 Logo，背着一个双肩包，风风火火走来，像一个刚打完篮球的小伙子。他也不像中年人那样持重，仿佛坐不住一样，采访期间需要什么东西，根本不等员工走过来，自己就麻利地搞定了，动作清爽，语速快，效率高。这种

打满鸡血的状态，在创业者身上很常见，但跟他从前的经历完全是两回事。

38岁辞职前，缪钦是麦当劳中国区的C00，管理着2000多家门店，下面有6个副总裁，其中5个都是老外。他只负责思考战略上的事情，其他具体工作细节通过庞大的公司机构，自然有人承担。这是个位高权重的位置，但也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压力巨大，跟创业公司相比，麦当劳早就完成了从0到1的积累，它的品牌和产品已经被雕刻完成，业务模型也经过市场验证，作为一个地区的C00，是庞大跨国公司的一个关节，只要能够执行好总部的部署，衔接好中国市场，工作就能做得很好。

按照现在市面上流行的“标配人生”，那个时候的缪钦达到了“人生赢家”的硬件和软件标准：事业上身居高位、年薪丰厚，朋友圈都是政商要人，生活中出门坐头等舱、住五星级酒店，每年阖家去国外度假三次，小孩读很好的私立学校，为将来去美国读书做准备。他甚至还有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到美国工作一年半，同总部高层磨合，回到中国接任更重要的职务。

缪钦却没有为了更高的年薪、更安稳的前途，以及全家住在美国、小孩可以顺理成章在美国接受教育而选择在这条道路上前行。他辞了职，从麦当劳这个庞然大物的顶端下山，创业去了。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不但没有把全家带入有钱人流行的移民潮之中、让小孩念上美国的名牌学校，还把中国老家的房子卖了，连带多年的积蓄一起投入了创业的公司。缪钦告诉我，他唯一没有降低的花销是孩子的教育，留下了未来的学费，因为这是做家长的责任。但如果小孩不想出国读书，甚至只想做个工匠，他都接受，因为那是孩子自己的选择。至于生活上其他支出，工资只要够租房子就可以了。

放弃“人生赢家”的硬件和软件，缪钦不纠结。“我要是在麦当劳，每天日程表的80%都是有规律的，现在我80%是没有规律的，一会儿这里出问题了，一会儿那里出大事了，多好玩。我们活的时间越来越长，为什么40岁就要过有规律的生活？很多东西都是盖上棺材那一刻带不走的，创业这件事是我心里一直想做的，管他多少钱。”缪钦像着了魔一样，要做一个茶饮项目，就是开一间咖啡厅似的茶饮店，让年轻人也像喝咖啡一样喜欢喝茶。在今年，这种创业项目成了风口，但在他2009年写商业计划书的时候，未来并不明朗。

缪钦谙熟餐饮行业的生意。他告诉我，最容易的方法是把街头的奶茶店做个品质升级，把8块钱的东西卖到12、13块钱。“这件事不用投资太多钱，给我几千万元就能快速地转起来，这就是个赚钱的逻辑。”缪钦说。另一种离成功比较近的方法是去英国买一家大概有200年历史的品牌，本土有一两家店，可能跟皇家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的品牌只需要100万英镑，把它买回来依靠我的连锁复制能力快速扩张，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很快能做成一个有调性的品牌。西方下午茶做标准化的东西已经很成功了，这是绝对可行的生意。”

缪钦却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自己研发产品。他告诉我，如果是为了创出一个短期快速赚钱的工具，他完全不会从麦当劳出来，做这种事没意思。他觉得自己的内心一直有一团火，必须要做足够有挑战的事情，才带劲。

不安分的晋升

缪钦1993年从中专毕业，专业是财务。他告诉我，父母有银行的背景，于是给他安排了读这所毕业后可以保证到银行工作的学校。在那个年代，不用承担高考落榜的风险，是个相当不错的选择。“我中专的同学现在很多做到地区行长，但我不喜欢银行那种日子，我没办法对着一个桌子按部就班地坐一辈子。”缪钦说。

缪钦自己选的工作是麦当劳。他仰慕外企的管理经验和生意模式，希望可以学到东西，所以即便从最底层的服务员做起，每月挣的钱还不到在银行工作时的一半，他也不在意。“我相信自己不会一直做炸薯条的。其实我离开麦当劳的时候，曾经跟我共事的伙伴还有在炸薯条的，他享受炸薯条的工作，也很开心。每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缪钦说。怀揣远大理想炸薯条、煎牛肉饼，他工作得特别卖力。“每天早班是6点开始，下午1点钟下班，我就留下来免费学，一直学到晚上打烊，有时候就睡在库房里。”虽然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晋升却不顺利，6个月里升职两批新员工，他都落选了。

缪钦现在觉得那是自己职场生涯的转折。他递交了辞职信，认为公司不公平，经理却让他说出每个升职同事身上一个他没有的优点。“我想了十几分钟，一下子就开窍了，我应该在意的是他们身上比我好的地方，我才有机会去学到东西进步。从那时

候开始一直到我离开麦当劳，从来没有任何人超越我，原来跟我平级的，我做到他们的上司。大部分人是我的上司，最后被我管理。” 缪钦说。

麦当劳在中国的迅猛发展给缪钦的晋升提供了空间，最快的时候，他曾经一年连升8级，还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手下就掌管着福州的4家店。缪钦却放弃了在福建等待晋升的机会，接受挑战去开辟湖南市场。“那个时候，省级市场都是老外在管。想要开湖南市场，问了一圈没人想去。那时候，武汉市场才刚刚开，是个大市场，湖南比起来就太小了，而且经济不发达。大家考虑去了业绩会差，死在那里。我觉得去做拓展无所谓，做不出业绩，但是有经历、有体验，就算开的店都死掉了，也值得。”

缪钦拎着行李去了长沙，成了麦当劳在湖南省的第一个员工。“那个时候很恐怖的，我要做地产代表去跟物业谈判，合同都看不懂，就远程向公司求支持。好处是自己快速学习了地产知识和合同条款。谈下来之后，施工，我自己做项目经理，天天蹲在工地上看图纸。那时候工作没日没夜的，有时候会觉得没有希望，但我又得对这件事负责。”

熬过了最初开拓市场的阶段，湖南市场成了缪钦的成名之作，他在这个不算富裕的省份做到了全国利润最高，还拿到总部奖励全球优秀员工的总裁奖。接受开拓湖南市场的挑战对缪钦的职业生涯也有质的飞跃，缪钦说，如果他不出福建，永远没机会成为一个全面的人。也许工作到现在，会说运营是自己的强项，但在湖南单打独斗之后，他成了一个全面的人，地产、工程、法律、人力资源、市场没有能难倒的。

缪钦没有止步于湖南。随着职位的升迁，他被派到各种重要的或者棘手的市场。他一路北上，担任东北区域总监。在东北，他推动了24小时营业和早餐的项目。“当时公司觉得很现实，南方都不愿意做24小时营业，东北晚上9点路上就没人了，推出24小时店太猛了。”

缪钦敢于尝试是因为他在工作中确实观察到不少人晚上开车到处找不到吃的，从经济角度算，租金已经付了24个小时，只需要花很少的成本，就有可能提高单店的销售额，销售越高越容易赚钱，开新店的机会就大。“我在东北选了几家主干道上的店做试点，请总部给我6个月的时间。前4个月真的没人进啊，但坚持开，到了第6个月就有人来吃饭了。他们天天开车在门口过，周围一片漆黑，只有麦当

劳亮着灯，就都记住了麦当劳晚上是有吃的。其实所有人都认为晚上不能开业时，跟你竞争生意的人就少了，不怕蛋糕小，就怕吃的人太多了。” 缪钦说。

35岁时，他当上了麦当劳中国的副总裁。在他决定辞职的时候，他是麦当劳历史上第一个中国籍副总裁，也是麦当劳中国最年轻的高管。

40岁可怕吗？

我第一次见缪钦的时候，他正在跟一个创业团队谈下半年的合作，那个团队的创始人是1996年出生的，比他小了22岁。

在崇尚年轻有为的创业潮里，缪钦绝对算是老同志了。缪钦告诉我，他交往的高管圈，年龄一般都比他大，有些人对他的创业决定不是很看好，觉得他太不成熟、太草率。缪钦的太太也跟他深谈了两个多月，倒不是担心他赚不到钱，而是创业九死一生，他从20岁加入麦当劳就一路顺风顺水，如果遇到挫折崩溃掉怎么办。

缪钦很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从麦当劳出来，他并没有马上创业，而是去一家民营企业工作了两年接地气。他告诉我，从0到1这个阶段他没有经历过，从1到10可能大家能做得差不多，只有到了从10到100到1000，他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中国没有几个团队有他的经验。可因味茶能完成从0到1吗？缪钦并没有十足的把握。缪钦给自己的心理建设是，失败了就失败了，应该可以很快地爬起来再找一份工作，很快能调整心态。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想赢怕输和看重外在衡量标准的人。“我坐地铁碰到以前的司机，一点也不尴尬。我说，现在很好啊，你看不是我不要你了，是我不用司机了。因为我曾经到过那个地方，大家也知道我是可以到达那个地方的，所以我无所谓这些东西。对我来讲，重要的是把我想做的事情做成，才是有意义的。” 缪钦说。

他一直埋头在做事里，对岁月的流逝并不怎么关注，每次问到事业重要转折的年纪，他都要停下来计算一下。他不是那种年过四十就认了命，维持现状，并为退休和人生的尘埃落定做准备的人。他觉得也许是因为40岁以后新陈代谢慢了，精力不如从前，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也变差，心态容易变得保守。周围的朋友圈也都是同龄人，大家更多地追求品质而不是变化。“这个时候如果心理不够坚强，暗示自己的学习能力弱了，不能接受新事物了，世



“如果心理不够坚强，暗示自己的学习能力弱了，不能接受新事物了，世界是年轻人的了，很容易就消沉下去。”

界是年轻人的了，很容易就消沉下去。” 缪钦说。

对于 40 岁以后考虑功成名就，移民澳大利亚、新西兰那种生活方式，缪钦一点兴趣都没有。“从前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是因为人的寿命就到六七十岁，现在生命线拉长了，过了 40 岁就去养老，待不住啊，那太无聊了。” 缪钦说，他上个星期刚跟儿子一起下载了《王者荣耀》，他的同龄人里没有人在玩这个，但他觉得这个游戏很有意思。他说，玩这个游戏如果觉得累，觉得是为了迎合年轻人受委屈去做的，那这就不是你的东西。但他是非常享受的，觉得自己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还很强。

缪钦敢于人到中年还折腾也是因为在职场上不走寻常路积累的经验。大企业里每个人都是巨轮的一部分，按部就班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能够过得非常舒服，可一旦外界迅速变化，巨轮停止，失去惯性，摔下来会非常惨。缪钦说，有些高管是惶惶不可终日的，因为觉得自己所在的行业不行了。行业衰落了很正常，但他们在这样的公司工作了十几二十多年，又坐到很高的职位，最恐怖的是自己已经不会做事了，因为下面的人太多了，他们早就不是用智慧和创新精神去做事，而是靠经验就能混得很好，可中国发展太快了，经验靠不住的时候，事业就垮了。

缪钦是摩拳擦掌地投入到巨变的商业市场中的。他告诉我，他那一代人是仰视外企，看外企什么都是好的，他工作两年之后到美国去培训，也觉得只有在外企才能有这样的机会看外面。可现在国外的资讯太容易拿到了，外企因为是全球化的一个环节，很僵化，并不如民企蓬勃发展。其实不少在外企工作十几年的人都会产生前方的路怎么走的疑问，只不过他果断地选择离开从前的轨道。

与很多人梦想财务自由、然后到处旅行钓鱼不同，缪钦现在的乐趣是创立自己的企业，并且让它具有活力。他的团队由一群“85 后”“90 后”组成，很多人都是白纸一张，没有做零售连锁的经验。缪钦亲自带，就像 20 年前他在福建做店长时一样。有时候年轻人闯祸把他气得暴跳如雷，有时候神来一笔又给他很大的惊喜。他的性格是不喜欢做事瞻前顾后、纠结犹豫，所以，他愿意给年轻人很多犯错的机会，只要用心做，他就舍得试错的成本。他告诉我，创业公司最怕的就是平稳成一条线，创业是可以有波峰波谷的，只要是向上走就好。

“如果非要说我为什么选择创业，我觉得是我还没到 40 岁的时候，就认识到这一点，对抗自己进入那个巨轮。” 缪钦说。☑

最想念的 年货

年货、年味就是乡愁，就是亲情，而亲情永远不过时。

在新的一年里，新的一个春节即将来临的时候，《三联生活周刊》推出一个充满乡情、亲情，充满年味的文化产品

——《最想念的年货》





生活
LIFEWEEKLY

生活周刊

1558 1005-3403

生活周刊编辑部

生活周刊

立与不立皆辛苦

文 / 李健



歌手李健

多年以前，40岁对我来讲是个遥不可及的年龄，如今，我已不敢再怠慢时间了，因为它就像个刺客，不知何时会突然来到你的面前。

是的，我已经被推进了40岁的门槛，而且，已经进来几年了。我在此并非要强调时间的速度，而是想说时间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常常展现出苛刻甚至是吝啬的一面。我越来越感到做成一件事情所需的时间往往太多了，很多人在与时间的讨价还价中丧失了信心。

一直以来，人们喜欢给人生标识刻度，以此来衡量每个人生的进程和质量，就像“三十而立”“四十

不惑”之类，尽管是曲解了孔子的原意，但人们依然将错就错地沿用。有人说，既然在当下的社会三十难立，那么就宽泛到四十吧。一个毫无背景的年轻人靠自己的努力想在30多岁找到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有所成绩，谈何容易。我大学毕业后工作了三年，所从事的工作和专业没太大关系，跟后来的音乐工作更无关联，这似乎已经浪费了三年，当然它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浪费，依然是我的一段宝贵的生活经验。等到所谓的事业有所起色时我已经36岁了。回想在我30岁的时候，似乎刚刚找到音乐的方向，勉强能靠音乐为生，所谓成就无从谈起，面对谜一样的未来偶尔也会担心，尽管当时我已经写出了那首《传奇》，可是听过的人寥寥无几。那时候，我也想过如果10年以后还是这样该怎么办，或者要不再给自己5年时间，否则就去干点儿别的？好在我不是那种给自己严格计划并且严格执行的人，否则我就会在35岁那年改行了。

通常，人们愿意用10年作为一个阶段，这看似不短的时间里，其实真正能用到做事的有效时间是很短的，不仅要花时间去找到一个方向，还要面临许多生活琐事。一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在寻找自己未来的方向时，更多的是要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这还不包括那些不可预知的精神烦恼。“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可是，这泛泛的天高地远实际上更是窘境，就好像在一个已然茂密的丛林里给许多未来的参天大树找到一个栖身之地一样困难。通常，在一个单位或是企业里，新来的年轻人要从最底层做起，这似乎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但问题往往是，由于长时间在底层工作而丧失了向上流动的可能，其中原因可能非常复杂，主观、客观都有。比如，我刚刚工作那几年，很多时候在做些杂事，接人，打水，打印材料，还有打发时间，这些工作和我的专业毫无关系，而我的专业水平也越来越不专业了，这些毫无成就感的工作常常会给我带来沮丧感，时间久了，我又开始习惯了这种沮丧感。我可能看到的未来就是成为某个部门的主管，但问题是你成为主管的条件也并非完全靠你努力就能具备的，况且成为他又怎能怎样呢？有人可能会说，这些都是在锻炼一个年轻人，可是，锻炼的期限有人控制吗？锻炼的结果有人负责吗？大多数人都适合这种

锻炼吗？我想起自己毕业那年，我请一位诗人朋友说一句话送给这些即将走向社会的毕业生们，他说：“千棵针万棵针投向了大海。”

常听说，人要有梦想，那我们说说关于梦想的“梦话”。梦想可以有，但大部分梦想是实现不了的。即使实现不了那也没关系，我们依然可以活得很好，或者说，有些梦想实现不了更好，这意味着没有付出有可能是很沉重的代价。生活中，大多数人是平凡的，平凡没有什么不好，平凡自有它的幸运和乐趣。在我们拥有梦想的时候，通常都是一厢情愿的，对生活和社会还不了解，随着时间的流逝，与生活的朝夕相处，逐渐会感到那些梦想越来越远，有人会因此郁郁寡欢，有人会开始淡忘梦想，而很不幸的是其间有可能会看到某个电影或者某篇心灵鸡汤，里面大力地描述和鼓吹一个人是如何历经千辛万苦而最终实现了梦想的，而你的心再一次被唤醒，开始反思或是抱怨目前的处境。我并不是否定去实现所谓的梦想，而是想说，实现不了梦想是很正常的，它不可以成为你郁郁寡欢的理由，梦想的存在，是可以让你能够隐隐感觉存在于生活远处的某种美好，而它的意义绝非是一定要有一天它真的降临到你面前，这就像是祈祷，心愿成真更好，不能成真也很正常，而你也并非是要完全依赖于它。

在别人眼中，我可能算是一个四十而立的代表，可这个“立”需要立多久以及能立多久呢？我不知道，没人知道。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美国硅谷做工程师，而立之年算是做得不错，在面对金融热潮时跃跃欲试，于是投入到了金融行业，不巧很快就遇上了金融危机，以往的成绩几乎归零，又要面临重“立”。但此时的他与当时的他所处境遇是完全不同的，此时的他需要养家，房子和孩子都是他要面对的，要知道美国人的生活大都是要贷款的，而贷款是需要工作担保的。我举这样一个例子是想说，人的一生很不确定，很难在某一个阶段用某一个标准去评判。如果一定要去评判一个人的话，有时像评价爱情一样，只有到生命结束时才知道到底如何。

作为一个歌手，作品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只能交付给时间。当然，人们大都会用商业标准来衡量一个歌手。通常来讲，偶像艺人成名较早，但容易很快就走下坡路，有实力的艺人往往需要经过很长的积蓄期才得以被认可，整个的演艺生涯也更长一些。这些都很正常，成名早和成名晚都是不同的体验，就看你如何看待它。做成一件事不容易，而维持它更难。



成名早和成名晚都是不同的体验，就看你如何看待它。做成一件事不容易，而维持它更难。

当我们感慨昙花一现时，有没有想过，又有多少花连一现的瞬间都没有，但即使这样，也不能否定它存在的意义。

最近，我在担任“快乐男声”的评审，那些怀揣音乐或是明星梦想的年轻人面对略显残酷的淘汰规则所展现的脆弱和勇敢、纠结和释然是颇有感染力的，你能看到他们眼中巨大的希望升起又瞬间跌落，也能感受到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孤注一掷的决绝。事实上，这中间只有几个人可能成为职业歌手，但作为选手，很多人都立志成为明星，甚至认定自己的一生就是做这个的，而且深信不疑。有时我看着这些年轻选手，会隐隐地担忧甚至心疼，因为再过10年，他们人到中年，还在追逐着这个梦想，梦想距离他们可能比今天还要遥远，而此时来自家人朋友的鼓励到那时可能会基本消失，也许已变为压力和阻力。我很想告诉他们，可以找一个其他的工作让自己生活得开心些、舒适些，别让梦想压得喘不过气，业余时间依然可以唱歌写歌。如果一定要自己无路可退，那就要做好无怨无悔的准备，也要做好会有人说你一事无成的准备，就像一个苦行僧，一生都在修行，直到戒掉所有的迷惑、失望、悲伤、患得患失等等。这看似有些悲观的话语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我的身边就有同我一路走来的朋友，他们如今也40多岁了，还在为音乐梦想奔波，放弃了另外一种通常意义上的安稳生活。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只有来自音乐本身的美妙还在时常安慰着他们。其中有人抱怨没有遇到好机会或者好的音乐环境，其实这种抱怨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你所面临的环境和时代是无法选择的，或者说你所面临的时代就是属于你的时代。当然也有个别人很乐观，这种乐观来自一种心态，来自多年来的自我磨练得以实现的释然，它的宗旨就是心甘情愿，为音乐一切都值得，即使无法靠音乐为生。

最后，我想说的是，四十而立就不错了，三十能立更好，不“立”也没关系，因为这些“立”与“不立”都是别人眼里的，而你的世界理论上真的与他人无关。生命，就是时间之旅的体验，你可能没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这并不妨碍你去寻找和积累生活的乐趣。其实，懂得生活了，过一种自得其乐、有滋有味的生活，就是所谓的“立”了。这个“立”字，按照我个人理解，如果从字源学上来讲，就是人活在天地之间而已，只不过最上面的“丶”告诉我们，活着要有一些光亮，一些智慧而已。恰恰，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理解常常也就差这么一点儿。☑

盛年当前

主笔 / 薛巍

不要害怕成长，长大有许多好处。“中年时，绝大多数人都已经挣得比年轻时多了，可以去买他们6岁时喜欢的玩具加大版。”

那些长不大的男子

《每日电讯报》2013年的一篇报道说，英国男子43岁才能长大，比女性晚11年。英国女性每个月都要提醒她们的伴侣要表现得像个大人。男人不成熟的表现包括：在凌晨2点吃快餐、打游戏、开车太快、玩游戏和比赛时努力打败孩子、反复讲一些愚蠢的笑话，还要妈妈给他们洗衣服做饭、不吃蔬菜、经常换工作、炫耀他们多么招女孩喜欢、炫耀他们能举起很重的东西等。

男人不成熟的表现还包括不喜欢看书，觉得书很无聊。所以2015年企鹅出版公司出的一套“可怕的中年”，每一册都只有50页，其中一半是插图，开本只有小相框那么大。这套书一共10册，包括《如何假装年轻》《如何假装好爸爸》《如何假装没喝醉》等。书的内容并不是什么实用的指南，而是描摹了一些人物，如在《如何假装年轻》中：“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梦想着今生要做出伟大而激动人心的事业。我们会成为什么人？宇航员，潜水员，冲锋手，外科医生？一切皆有可能。然后，突然有一天，一切都不可能了。”“尼克离婚后，卖掉了他那辆中规中矩的车，买了辆双门跑车。10年后，尼克回头再看他和‘情人’的合影时，会觉得就像个碍眼的门把手。”这些描写刻画了中年人的各种困境。

《如何假装好爸爸》中说：“本以前迫不及待地想当爸爸，这样他就可以少花点时间在工作上了。现在他却很期待星期一回办公室上班，至少那些表格不会互相大喊大叫。”配图是两个在抢东西的孩子。“在蜂箱里，雄蜂不用采集花粉和养育后代，而是一大群一大群地飞出去，找蜂后交配。约翰尼喜欢趁15分钟的午休时间到蜂箱跟前。他刚刚收到警告，叫他不要利用午休时间上网泡论坛，那个论坛里的

男人都想过雄蜂的生活。”“彼得教会了坦迪爬楼梯。接下来的几年里，他还会教她走路、游泳、骑车，还有开车。直到35岁时女儿才终于读懂他的暗示，主动离开。”

英国作家尼克·霍恩比2008年出版了一部小说，中译本叫《非关男孩》，书中描写了一个不想长大的男人，36岁的单身男子威尔。他继承了许多钱，所以不需要很努力地工作。他痛恨孩子、家庭、家庭生活、一夫一妻制。至于他擅长干什么，他说他擅长小孩子们的事，擅长胡闹。

偶尔他也会找工作，应征报纸上的招聘广告。“他觉得他能胜任上面几乎所有的工作空缺。编辑一份建筑业的内部杂志，或者开一家艺术工坊，或是写假日指南。他坚持不懈地给这些雇主写信，解释为什么他是最佳人选。他甚至附上一份简历，虽然撑死了只有两页。不过他非常聪明，他在这两页上标的页码是1和3，表示包含他光辉事业的详细内容的那一页给弄丢了。最近18年来的每一天，他一早起来都带着要一劳永逸地解决他的事业问题的决心，不过等这一天过完了，他要在外面的世界为自己寻找一片天地的熊熊渴望也就彻底熄灭了。”

威尔还擅长消磨时间。“他或许不会因为一辈子一事无成而骄傲，却会为自己有本事一直浮在他拥有的无边的时间大海上从没溺水而感到自豪。”晚上好办，白天他所有的朋友都在上班。他应付白天的办法是把时间分成数段，每段大约30分钟，然后为每段时间想出该干的事。他发现一天内可以做的大部分事情花的时间差不多都是半小时。看报，洗澡，收拾房间，看杂志，在厕所快速做一套填字游戏，吃早点 and 午饭，去附近的商店……这就占去一天20个时间段中的9个了。实际上，他还反过来怀疑他的朋友们是如何兼顾生活和工作的。生活的琐事已经占了这么多时间，一个人在同一天里怎么还能工作，又比如，洗个澡？

中年危机不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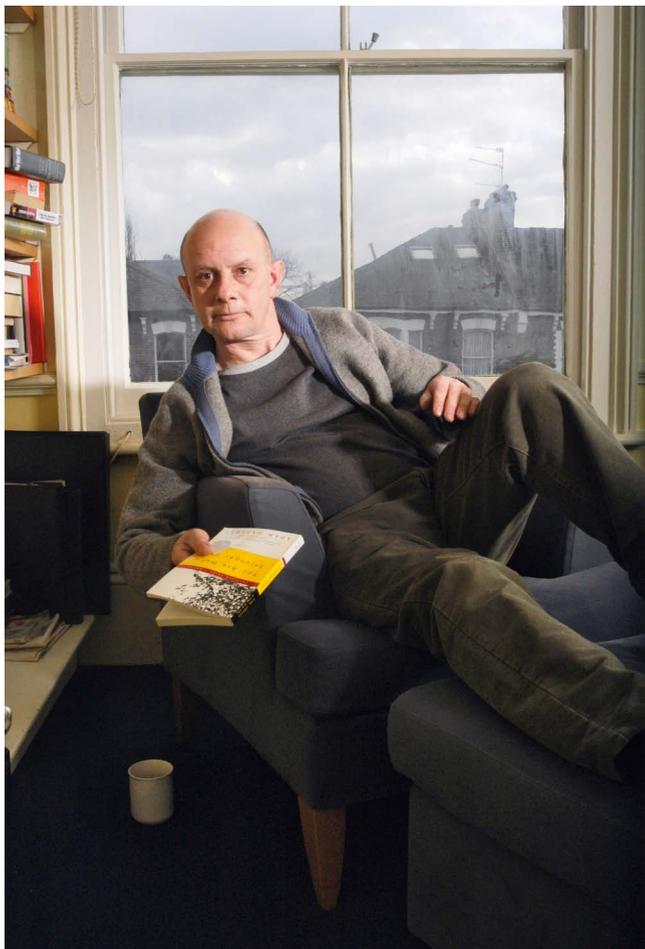
波伏瓦出生于1908年，1949年，40岁出头的

她出版了名作《第二性》，1960年出版了自传的第二部《盛年》，4年后又出版了自传的第三部《时势的力量》。她在该书末尾写到她感受到中年危机的那一刻：“曾记得有一天，我对自己说，我40岁了。还没等我从这一发现的震动中定过神来，我已经50岁了。当时攫住我的那种恍惚还留在我身上……40岁时，有一天我想到，在那镜子的深处，老龄正打量着我，也正等待着我，这是无法回避的，总有一天，她会赶上我。”

叔本华出生于1788年，1850年，他耗时6年完成了《附录和补遗》一书，其中包括他日后闻名遐迩的《人生智慧箴言》。叔本华的哲学体系是悲观主义的，然而在他的随笔中，悲观主义被打了对折，他要教人们如何尽可能地获得幸福。

50余岁时的叔本华认为，人到40岁时生命刚得到充实，到50岁时正处于鼎盛时期。他在《人生的旅途》一文中写道：“人生的一般过程就其不同阶段而言，可以被比作行星的交替；可以说我们是在这些行星的影响下度过各个人生阶段的。10岁时，水星正向天顶上升，此时的少年就像这颗星，其特征是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那里的每件小事都能对他产生重大影响——极为活跃，但是，如在一位经验丰富的人的引导下，他将很容易取得巨大进步。在人20岁的时候，维纳斯女神开始支配他，此时的他已完全屈服于女人的爱。30岁，火星开始出现，于是他精神振奋，争强好胜，妄自尊大。当一个人到40岁时，他就置于四小行星的影响下，这就是说，他的生命已得到充实。他节省俭朴，换言之，他受惠于谷神星而喜爱那些实用的东西；并且，在灶神星的影响下体魄强健；小智神星使他懂得何物对他必需的；他的妻子是他家的女主人。到了50岁，木星的影响便居于统治地位。那时，一个人已经比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长寿，并且他感到自己超越了周围的人。他仍然充分地享受着充沛的精力、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学识。假如此时他自身有力量和地位的话，他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现在，最适宜他的工作就是指导自己、支配自己。这是一个转折点，在这里，木星的影响到达了高潮，而50岁也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鼎盛时期。大约在60岁时，土星才带着铅一般的重负蹒跚而至。最后，天王星终于出现了，俗话说，一个人升天了。”

2012年，《纽约时报》记者帕特丽夏·科恩在《盛



英国作家尼克·霍恩

年：中年的发明》一书中说：“中年人首次成为美国人数最多、最有影响、最有钱的人群。他们在40到64岁之间，构成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控制了近70%的财富。经济满足着他们的需求和欲望。他们比前人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健康、更快乐、更高效、更充实……中年可以是一个更宏大的概念，像惠特曼在中年时写的《自我之歌》中说的：‘我现在37岁，一开始身体就十分健康，希望永不终止，直到死去。’这种中年概念认识到青春的一去不复返，以及远处的未来，但它也赞美更深的经历和洞见之井，利用扩大的愿景的优势。中年有许多种形式。到了一定年龄的男男女女推着童车，把孩子送往学校，开启环球之旅，上起钢管舞课。他们放弃篮球，转向高尔夫球，扔掉小了的衣服，反复尝试放弃油腻的食物……”



时隔 25 年，摄影师皮特·林德伯格请回当年《Vogue》那批模特，进行了一次名为“重逢”的拍摄

年轻潮和无龄感，被同步消费的时尚

记者 / 杨聃

“我看着那些家喻户晓的面孔从 20 多岁变成四五十岁，而她们每一个人现在都比 25 年前更有趣。20 多岁并不是她们最好的年纪”。

消费与被消费的年轻化

还记得《欲望都市》里女主角凯莉对助理露易丝说过：“玩得开心点，二十几岁就应该这样子；三十几岁的时候学些教训；四十几岁就该为酒水买单了。”如果现在重拍这部爱情和时尚圣经，那台词很可能要往前递推个 10 年了。

时尚一直建立在青春的面庞和鲜活的肉体之上，至少，设计师们比较倾向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一个 14 岁的以色列女孩去巴黎寻求模特的工作，只因在迪奥的门店偶遇拉夫·西蒙斯，便成了迪奥 2015 秋冬高级定制大秀的开场模特。香奈儿同年宣

布邀请约翰尼·德普和凡妮莎·帕拉迪斯 16 岁的女儿莉莉-罗丝·德普担任其眼镜广告的形象代言人。在《CR Fashion Book》杂志的 9 月刊大片里，辛迪·克劳馥的女儿凯雅·杰柏踩着范思哲的高帮水台靴，另一张里她身着普拉达裙装，化着猫眼妆，噘着嘴，那年杰柏也只有 13 岁。

想想 CK 广告片里 15 岁的波姬·小丝、青少年时期瘦骨嶙峋的凯特·摩丝，几十年了时尚似乎没什么长进。私底下，时尚编辑们会八卦这些现象背后真正的原因，模特 Sofia Mechetner 是“小镇姑娘成名记”，凯雅·杰柏是“好莱坞星二代的传承”，而莉莉-罗丝·德普则是“被卡尔叔叔（卡尔·拉格斐）介绍进入时尚圈”。尽管 2013 年后逐步完善的立法保障了一部分懵懂弱势的未成年人在模特行业免遭“迫害”，却并不会阻止野心勃勃的另一部分。

就像时尚评论家瓦妮莎·弗里德曼所说的：“时尚的本质基于欺骗，它承诺如果穿上这件衣服，就能显得比实际更美、更酷、更瘦、更高，或者更有气场。这是好的一面，我们都能从中受益。”年轻的天然更容易打造出这类效果。高盛发布的报告显示“80 后”“90 后”人群正在迅速崛起，以美国为例，9200 万人口的数字说明，他们已超越婴儿潮一代，成为购买力最强的消费群体。这让时尚又多了一个年轻崇拜的理由。

最早尝到甜头的是快销时尚品牌，在 Zara 和 H&M 快速扩张的时候，Gap 和 A&F 却面临着迥然不同的命运。因为在年轻人眼中，中规中矩的设计和卖弄性感人设早就不潮了，他们喜欢让运动和时尚产生点联系。H&M 和王大仁合作推出的系列在健身房里都可以用到。优衣库很早以前就推出过网球运动系列，还曾聘请过诺瓦克·德约科维奇作为品牌大使。同时，耐克、阿迪达斯等运动品牌也开始被时尚同化，其中最成功的要属凭借蕾哈娜“咸鱼翻身”的 Puma。

随后，略显保守的奢侈品逐渐也意识到了改变的重要性，他们中的一部分开始借助和街头品牌联名款来吸引年轻消费者。纽约潮牌 Supreme 标志性的红色商标 Logo 出现在了路易威登的毯子、双肩包和手袋上，该系列中的一款旅行箱售价高达 5.4 万美元。而以古驰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似乎更容易洞察到年轻一代的好恶，一方面反潮流地坚持极繁主义，另一方面跟江宥仪这样的年轻艺术家展开

年轻化与无龄感因穿的人不同被瞬间转化了。同样深谙此道的还有锐步，他们新签的大中华地区代言人不仅有 17 岁的演员吴磊，还有 81 岁的王德顺。

了合作。她那张将古驰经典元素印在脸上的图片在 Instagram 上已吸引超过 21 万人点赞。

正是受这种多元文化剪切的影响，正在上演的男装周“光怪陆离”之风愈演愈烈。在《时装商业评论》的观察下，Matthew Miller 的基调是：“我这代人，开始呐喊”。模特们有男有女，嘴巴用深色阴影涂花了，仿佛还没开始呐喊就被恶狠狠地禁言。军装风粗暴的组合试图体现年轻人向往不参杂质的自由。Bobby Abley 继上一季致敬《恐龙战队》之后，这一次庆祝的是天线宝宝诞生 20 周年，想想一下拥有八块腹肌的男模穿着粉红色蓬蓬裙，混搭而愉悦的设计把秀场变成了游乐园。

相比这些太过刻意的讨好，杜嘉班纳的方式高明多了。他们刚刚发布的绣球花系列太阳镜微电影描述了一个有爱的午后。三位花枝招展的老太太围坐在花园里，聊天、打牌，享受着下午茶。这时一位青春洋溢的女孩子端着甜点款款走来，加入游戏。随着牌局进入胶着状态，每个人都伺机而动，当完全沉迷于游戏的年轻姑娘刚要出手，却发现四面空空。一不留神，三位可爱的老太太已被经过的有型老爷爷们吸引过去，纷纷玩得不亦乐乎了。

只有把画面定格下来才发现这不只是个宣扬享受恋爱、不受年龄限制的故事，同样是个无论什么年纪都可以很有型的样本。三位老太太从太阳镜、耳坠、项链等配饰，到服装、鞋子都和年轻姑娘的一样来自绣球花系列。年轻化与无龄感（agelessness）因穿的人不同被瞬间转化了。同样深谙此道的还有锐步，他们新签的大中华地区代言人不仅有 17 岁的演员吴磊，还有 81 岁的王德顺。

年龄的两面

克莉丝蒂·杜灵顿可不是华伦天奴的“新灵感缪斯”，早在 90 年代她就好几次出现在华伦天奴的

视觉里。当然那时候需要她展现的特质和现在完全不同。2017 春夏时装周广告中，杜灵顿脸庞上的皱纹刻意没有添加任何滤镜与处理，就是要这样不经意地传递出“时间”的概念并引发观者对其的理解。对于这样的要求任何一张干净单薄的脸都满足不了。

事实上，就在上一轮鲜肉模特崛起之前，一度出现过“银发模特”的高峰。摄影师阿里·塞斯·科恩在他的博客中最早启用了银发模特的实践。2013 年，英国纪录片《传说中的时尚达人》，专门讲了讲 6 位平均年龄 80 岁的女性时装偶像，其中艾瑞斯·阿普菲尔年龄最长，也最被人熟识。她同意可可·香奈儿的说法：“没有什么比一个女人拼了命地想方设法让自己看起来年轻而更显老的事了。”

一家英国的模特公司打破了模特只能吃青春饭

的规矩，他们只招 35 岁以上的模特。“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已经知晓了社会对什么是老的看法。我认为 40 岁和 30 岁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但在我这个年纪，哪怕我觉得我还是，大家已经不把我当年轻人来看了。我的胡子会经常被拿来造型，但这并非我刻意为了模特的工作而留。这是我的生活方式，而也是这种生活方式让我看起来是年轻的。”老模特尼克曾对《卫报》这样说。

对于审美和女人，摄影师彼得·林德伯格（Peter Lindbergh）有绝对的发言权。在那个设计师、模特和摄影师将世界囊入怀中的时尚黄金时代，是他记录下了后来成为“超模”的那些女人的青涩样子。27 岁的林德伯格以广告摄影师汉斯·卢克斯的助手身份第一次拿起照相机。5 年后的一组叙述性摄影不但成为德国《Stern》杂志刊的经典，还把余波振到了时尚界。

“在我看来每一张时尚大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人物摄影。不管其中的时尚元素有多重要，我总觉得，我在那儿就是去拍摄女性的。任何时尚摄影师，他的照片应该有助于定义一个时代的女性风貌。而这个定义应该比拍摄一群女孩穿着漂亮裙子深远得多。”林德伯格对《Nowness》说。

时隔 25 年，他重新请回了当时《Vogue》那批模特，进行了一次名为“重逢”的拍摄。无论是在沙漠中拍摄海莲娜·克莉丝汀森，还是用吊车将琳达·伊万格丽斯塔吊悬在曼哈顿街道上空，林德伯格总是希望用镜头捕捉那些他曾拍摄过无数次面孔的自然和真实。克劳馥非常了解林德伯格想要什么：“人生阅历，恋爱，轻伤，生儿育女……在彼得看来，这些都组成了女人成熟的美。”

最后，林德伯格在凝视着这组照片时感慨道：“我看着那些家喻户晓的面孔从 20 多岁变成四五十岁，而她们每一个人现在都比 25 年前更有趣。20 多岁并不是她们最好的年纪。”

这让我想起英国音乐人玛芮安妮·菲丝弗，相比于 50 年前，她的声音从清甜变成了渗出丝丝倦怠的沙哑，菲丝弗承认，这是一口口威士忌和一根根香烟累加的结果。但她这样评价自己，“我的嗓音里充满了时间的痕迹，像布里奶酪一样醇厚”。当听到 16 岁的小孩在青年版“天桥骄子”（Project Runway Junior，美国设计师真人秀）上“失言”要给 30 多岁的老女人设计衣服时，只能说年轻的他们还不懂鉴别奶酪的好。☑

上图：名模辛迪·克劳馥的女儿凯雅·杰帕

下图：年龄最大的时尚偶像艾瑞斯·阿普菲尔





承德避暑山庄



盛景说天下

0314-2029771



养老金回报下降

主笔 / 谢九

6月13日，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发布2016年的社保基金报告，去年投资收益率仅为1.73%，创下近5年来的新低。

全国社保基金自2000年成立以来，年均回报率大概为8.37%，累计投资收益额8227亿元，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投资回报，尤其是2014和2015年，年投资回报率更是超过了10%，但是去年投资回报率却意外地大降至1.73%，甚至跑输了去年2%的通胀指数。作为老百姓的养老钱，养老金投资的首要诉求是安全第一，其次才是合理的回报，在这样的平衡下，过高或者过低的收益都不符合养老金的回报要求。过低的收益率不利于保值增值，过高的收益率意味着投资风格可能过于激进，潜在的风险过高。而最近几年从两位数的增长跌至不足2%，在一定程度上就呈现出了大起大落的特点。

我国的养老保险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是基本养老保险，目前结余大约为4万亿元，主要由各地方政府控制，按照规定只能存入财政专户，存在银行或购买部分国债，所以收益率极低；二是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由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资本划转、基金投资收益和以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构成，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和调剂，属于战略储备基金，按规定比例投资于有固定收益的各类债券和存款、股票、实业等，目前总体规模大约1.6万亿元；三是企业年金，也就是职工单位自办的补充保险，截至去年底，企业年金的总体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元。

长期以来，我国养老保险一直面临最严峻的两大问题，一是缺口问题，二是保值增值问题。缺口问题主要通过延迟退休、取消双轨制等改革来解决，但是保值增值问题却难有实质性突破。由于基本养老保险只能存在银行或者购买国债，因此收益率极低，过去10年的年均收益率不到2%，明显跑输通货膨胀，这也就意味着大量的养老金持续处于缩水状态，进一步加大了养老金的缺口；反之，如果养老金能够获得不错的投资回报，还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缓解养老金的缺口压力。

在我国的三大养老构成中，基本养老保险一直是养老体系的支柱，社保基金和企业年金扮演的是补充角色。但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看，作为补充角色的全国社保基金和企业年金的回报率远远超过基本养老金。全国社保基金的年均回报率超过8%，企业年金的年均回报率超过7%，而基本养老金的回报率不足2%。

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下，提高养老金进入资本市场比例的呼声在近年来一直相当强烈。2015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养老基金结余余额，可按照本办法规定，预留一定支付费用后，确定具体投资额度，委托给国务院授权的机构进行投资运营”，同时将此前基本养老保险只能购买存款和保险的投资范围大大拓宽，购买股票、股票型基金等权益类产品的比重提升至30%以内，还可以参与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股指期货和国债期货交易。

养老金入市虽然在政策层面已经扫清了障碍，但具体执行力度如何，主要还是看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如何。我国的基本养老金主要掌握在各级地方政府手中，全国共有多达2000多个基金统筹单位，按照《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只有通过省级政府进行基金归集，才可以委托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进行投资。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可能并没有足够的积极性将大笔养老金让出，养老金在地方政府手中收益虽低，但是可以有很多其他用途，按照以往的社保资金审计报告，地方政府挪用养老金的事件屡屡发生，或是在地方财政吃紧时用养老金暂时垫付，甚至挪用为政府部门经费。如果将养老金交给中央统一管理，意味着地方政府少了一大块可以实际支配的资金。

目前对养老金入市态度比较积极的主要是养老金结余相对富余的地方政府，比如广东和山东分别委托了1000亿元给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其中广东的养老金从2012年就开始入市。按照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最新披露的数据，广东委托资金1000亿元，累计投资收益331.57亿元；山东省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入市，委托资金1000亿元，截至去年底投资收益累计50.19亿元。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出台之后，一些相对富裕的地方政府也开始试水。按照人社部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

上海、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 7 个省（区、市）政府与社保基金理事会签署了委托投资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3600 亿元，其中 1370 亿元资金已经到账并开始投资，其他资金将按合同约定分年、分批到位。

如果想要让更多的地方政府将养老金委托给全国社保基金，最有说服力的无疑是社保基金的投资回报率，如果社保基金的投资回报率持续稳定在较高的水平线上，才可能真正打动地方政府，否则，如果出现投资业绩大幅下滑，地方政府就会有合理的托辞来延缓养老金入市的节奏，这将不利于我国养老金保值增值的整体战略。去年社保基金的投资收益率从两位数下降至只有 1.73%，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地方政府委托投资的顾虑，相比之下，收益率一直不如社保基金的企业年金，去年的收益率虽然也出现下滑，但仍然实现了 3.03% 的回报，略强于社保基金。

对于 2016 年投资业绩大幅下滑的原因，社保基金的年度报告并未做出详细说明，不过，年度报告还是披露了去年的投资策略，从中可以窥见社保基金投资回报下降的原因所在：“把握市场利率高点时机，主动适度扩大固定收益产品投资规模，优化债券产品结构，择时投资存款类产品。主动适应境内股票市场风格转换，抓住股市大幅度下跌后的低估值优势，择优追加委托投资，优化存量管理。加强实业投资调研

论证，优选金融企业改制项目，参与出资设立中国政企合作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加大投资市场化股权投资基金。科学把握汇率市场走势，积极应对汇率市场新情况，优化调整境外委托投资结构。加强短期资金分级流动性管理。”

2016 年的整体投资环境并不乐观，债券违约事件在 2016 年频繁爆发，导致债券市场下跌，而存款类产品也在去年面临低利率的制约，从货币基金到银行存款利率都处在较低水平上，股市 2016 年初以熔断悲剧开局，上证指数全年跌幅超过 10%，无论是股票、债券还是存款类产品，2016 年的投资环境都不乐观。不过这种局面在 2017 年可能会有所改观，在去杠杆的主旋律之下，今年市场利率全面提升，对于存款类产品占比较高的养老金，可能会收获不错的回报。今年股市虽然刚刚经历了一场小股灾，但是社保基金重仓的白马股在今年逆势上涨，预计也能带来不错的回报。

不过对于社保基金而言，更值得追求的应该是长期合理稳定的回报，而不是某几个年份的大起大落。尤其是我国目前正处于养老金大规模入市的关键时期，投资回报的不稳定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养老金向全国社保基金转移，进而不利于养老金保值增值的战略规划。☑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 (传真)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7 年第六期要目

封面人物

阿格里奇，永远的浪漫天才

热点·观察 贝多芬丁酉年落英
斑狐说乐 尼采 - 瓦格纳公案
专访 “新复杂主义”作曲家布莱恩·费尼霍夫访谈
话题 朗朗的未来有没有头儿？
爱乐笔记 贝多芬访谈录

乐史空间 哈蒂的音诗《与雁同归》
布鲁诺·瓦尔特自传《主题与变奏》38
另一种“民族乐派”

译文选萃 路易吉·博凯里尼
浮生碎乐 看不见的声音
藏鞋爱乐 齐格弗里德牧歌、音乐戏剧与瓦格纳的希腊(上)
音乐之旅 我看汉堡易北爱乐音乐厅

作曲家与作品 俄罗斯“强力五人团”的音乐历程，以及对《伊斯拉美》《荒山之夜》《在中亚西亚草原上》和《天方夜谭》的解读
人物 男中音歌唱家迪特里希·菲舍尔 - 迪斯考访谈(下)
资料库 舒伯特与施莱格兄弟：浪漫主义的黎明(五)
听购收 2016 年个人收藏的十款推荐(后篇)
爱乐往事 北大爱乐故事(四)
爱乐使我重生(上)

《爱乐》2017 年订阅须知

2017 年《爱乐》月刊，每期 160 页，全年 12 期，零售单价：20 元，全年定价：240 元。

2017 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欢迎咨询、订阅与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或在卓越网订购：
www.Amazon.cn

银行汇款：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莎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账号：0200012709201646336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爱乐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科尔：巨人谢幕

主笔 / 徐菁菁



左图：1985年11月，时任德国总理科尔在柏林根参加联邦国防军建军30周年庆祝活动

右图：2017年6月17日，人们在路德维希港的科尔家门外献花，对他的去世表示哀悼



当地时间2017年6月16日上午，87岁的赫尔穆特·科尔病逝于故乡莱茵河畔路德维希港。他在1982～1998年担任联邦德国总理，在任内促成两德统一和欧盟的成形，被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盛赞为“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欧洲领导人”。

晚生一代

1985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赴德国参加世界经济峰会，遇到了一个难题。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邀请他在5月8日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这天一同拜访彼特堡（Bitburg）的“二战”阵亡士兵公墓，以此彰显战后的彼此谅解。问题在于：除了普通德国士兵，公墓里还同时埋葬着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纳粹党卫军成员。时任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回忆，美国官员极力想使科尔放弃这个想法，但没有成功。相反，里根总统被科尔的坚决说服了。折中的办法是：5月4日这天，仪式进行了4分钟便草草结束。

科尔的这次冒险坚持源自于他重新定义德国的雄心。这种定义并不是为纳粹翻盘，而在于卸下战

后德国的负罪包袱，为国家的未来找到新的出路。1984年1月25日，他在耶路撒冷对以色列国会发表讲话时提道：“首先要说明一点，我是希特勒之后的这代人中的第一位联邦总理。”他强调，这是“晚生的福分”——出生在纳粹时期，却“没有陷入罪孽”。这为科尔在德国历史中担当承上启下的角色奠定了基础。

1930年，科尔出生在路德维希港一个税务秘书之家。父亲约翰·卡斯帕尔·科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个时代国家公职人员的典型代表。尽管这个中产之家的经济较为宽裕，但他给家人做出了为人的表率：量入为出，忘我地工作，忠于职守。孩子们只有在圣诞节和生日时才会有礼物。它们大都是些“实用的东西”，如袜子、衬衫和毛衣。父亲在1935年曾给科尔买来一辆自行车，但那是辆旧车，“仅花费了8马克”。这让科尔很早就学会“节制、理智地估计现实情形，接受限制，生活上不追求享受”。科尔很小就会在上学前一大早在莱因河里捞河虾，然后将其出售。他还把自己辛辛苦苦养的蚕茧按每公斤20马克的价格交给“国家”。比这些教育更幸运的是，虽然路德维希港的纳粹势力很盛，但科尔的父母虔诚地信仰天主教，父亲在政府工作，看透了政府政策的表里不一，这些都将成为纳粹世界观阻挡在了这个小家庭之外。

科尔9岁那年，1939年8月31日晚上，也就是希特勒命令进攻波兰的当天，父亲被迫奔赴波兰战场，瞬间击碎了科尔平静的童年生活。14岁，战争结束的前一年，科尔迎回了因为心脏病发作而退出了国防军的父亲，但失去了18岁的哥哥伞兵瓦尔特·科尔。1945年，因为男农工的极度缺乏，15岁的中学生科尔不得不在饥荒中到农场谋生，挤牛奶、耙地、喂猪，为每月26个马克的工资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干活。

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男孩目睹家国如同同时局中的一叶扁舟，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5年11月，

科尔说：“我是希特勒之后的这代人中的第一位联邦总理。”出生在纳粹时期，却“没有陷入罪孽”，这为科尔在德国历史中担当承上启下的角色奠定了基础。

科尔从农场重返校园。一天，在数学课上，老师奥托·施塔姆福特讲解着几何定理，发现科尔埋头在桌子上画画：一张数学稿纸上画着几个拿枪的人像，依次标着：希特勒、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旁边写有一行字：到底是谁把德国人从德国的土地上赶了出来？施塔姆福特并没有惩罚这个开小差的学生，却把他引到了自己家里，在那儿，施塔姆福特夫妇每周都要举行一次小型的政治哲学研讨会。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团体的引导下，1946年，16岁的科尔作为第00246号成员加入了基督教民主联盟。17岁那年，他已经向同侪们宣布，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莱茵兰—法尔茨州州长。

这个年轻人并不只是说说而已，从此，他人生的每一步都在为权力的登顶做准备。科尔到海德堡大学学习历史和社会科学，有的放矢地选修那些对从政有益的课目，并开始关心裁军、缓和政策和德国史。1958年，他提交的博士论文题目是《1945年后法尔茨的政治发展和政党重建》。为完成论文，科尔翻阅了大量年鉴，并深入诺伊施塔特社民党区总部、基民盟区办事处、区政府查阅卷宗、记录和口头报告，这使他对当地政治生态有了细致而深入的了解。他的博士生导师瓦尔特·彼得·富克斯后来回忆说：“根据科尔的经历，我知道他读完博士学位后会进入政界，对此，他也毫不隐瞒。”

事实上，1955年，科尔已经被任命为基民盟莱茵兰—法尔茨州执委会委员。博士毕业后不久，他就成了州议会议员。议员的薪水微薄，不足以养家，为此，他先是在路德维希港一家铸铁厂任厂长助理，后来又“莱法州化工联合会”任经济、税务政策专员，负责环保工作。科尔的吃苦耐劳有目共睹：为了同时完成联合会的工作和党务、议会工作，他每天工作12到14个小时。

明确的目标和勤勉的工作让科尔的每一步都走得又快又稳。1949年，73岁的阿登纳当选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时，19岁的科尔曾在海德堡宫作为选民发言人发言。阿登纳给科尔留下的唯一印象是：“很老”，“太老了”。那以后，年轻的科尔在政治阶梯上青云直上，在他任过的每一个职务上几乎都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代名词。1964年，《法兰克福汇报》敏锐地写道，“整个年轻的一代”都站在科尔一边，“将他视为是一种政治舞台上的年轻英雄，在这个舞台上，老一代人简直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统治了15年之久”。

秘诀

1982年10月，作为史上最年轻的联邦总理，52岁的科尔走马上任时，很少有人能够想到，他将是总理办公室未来16年的主人。反对者嘲笑他浓重的法尔茨地方口音，认为他很快就会被证明不堪大用。

科尔上台时，联邦德国正在面临第三次经济危机。1982年7月，工业衰退到197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零，预计有1.5万家甚至更多的企业不得不宣布破产。1982年底，联邦政府的债务将突破3000亿马克的赤字。

科尔有一个习惯：他不喜欢清晨开始工作时发现桌上放有前一天本来能够了结的工作。他从来都会及时处理文件，尽可能使他的写字台保持空旷。反对者没有料到的是，新总理把他效率惊人的作风带到了波恩。他首先宣布今后126个月内所有部长和国务秘书的薪金将削减5%，以此作为民众表率，而后决定把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服务员的工资增长率控制在2%以内。在上任11个星期之内，他不仅完成了令前任政府屡屡为难的预算制定，还提出了一系列法律措施，并发出了振兴经济的信号，为逐渐提高经常性项目收支盈余创造了条件，并通过向阿尔贝德—萨尔钢铁公司提供财政支持保住了1万个工作岗位。在削减社会福利事业的支出经费时，科尔遭遇了工会的大规模示威抵抗，但他熬了过去，因为情势的发展很快证明他是正确的。1983年3月《华盛顿邮报》前记者吉姆·霍格兰就在采访科尔后的文章中得出一个结论：“交谈的过程中得到的印象是，科尔随和、不拘礼仪的举止掩盖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对在政治上怎样生存下去的直觉，十几年来，他在联邦德国政界中的竞争对手灾难性地低估了科尔的这种能力。”

科尔政府的效率得益于他的意志和直觉，而这种意志和直觉又来自于他深厚的政治根基。在成为联邦总理之后，科尔回到故乡同6000名同乡欢聚，在艾伯特公园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家庭庆典”。他说：“在我走过的漫长道路中，极为重要的一点是感到朋友们的亲近。”但这并不只是一种“乡情”。科尔曾经深有感触地说：“周末回到路德维希港同那里的人们交谈，我经常会发现他们不一定对波恩上层讨论的问题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一些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例如瓦尔德霍夫体育协会队踢得如

何，或者凯泽斯劳滕俱乐部一队用了哪位教练。”事实上，自决定从政开始，科尔就从未停止过对德国基层的观察。

对基层的了解决定了科尔的务实风格，也使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如何与人打交道，这与他的前任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形成了鲜明对比。施密特讲究表演艺术，颇具演讲天赋，不但能够吸引听众，并且可以把随口而出的言辞当作名言兜售给他的人民，然而他却很难使他身边人喜爱信任他。有一次，施密特在一次紧张的竞选旅行之后，在火车上同记者们进行一次谈话。没过多久，记者们马上意识到，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施密特看来是多么愚蠢，他们中一半以上对施密特产生了敌对情绪。

科尔则完全不同。他不会咬文嚼字，也不习惯如其他政治家一样斟酌酝酿，他总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那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表达方式，使他常常被打上“土包子”或“表达方式过于简单生硬”的标记。但他身边的人却觉得他温和有礼、魅力非凡。知情人士说，施密特始终用特有的、冷冰冰的态度对待内阁成员，而在科尔主持的会议上，内阁成员的“情绪很好”，气氛“热烈”。他还具有一种极为惊人的能力：“凡是怒气冲冲来找科尔的人，十有八九都可以作为伙伴而离去。”事实上，从50年代初期开始，科尔就有意识地把志同道合的人聚集起来，这些人被称作“科尔分子”，为总理未来的执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基民盟内没有能够与之匹敌的竞争者。1981年3月，基民盟的党代会上，715位代表里有689名代表认可他为联邦执委会主席。

1989年，当真正的历史机遇出现在科尔面前时，执政7年的总理已经在国内政治上取得了全面的成功。在他治下，联邦德国的经常性项目收支从124亿马克，增加到1988年的825亿马克；出口额从4277亿马克增长到5678亿马克，从1986年以来，联邦德国在世界出口名单上一直名列前茅；国家每人每年的福利开支也从8524马克增加到1.074万马克。

“对的人”

1947年，17岁的科尔搞到了一本假护照，从法占区路德维希港进入美占区曼海姆，去听社会民主党原主席库特·舒马赫的演讲。科尔后来回忆，



左图：1984年9月22日，科尔（右）与法国总统密特朗手牵手站在凡尔登“一战”战场遗址上悼念死难者，以示两国的和解

右图：科尔与妻子汉内洛尔、7岁的长子瓦尔特、5岁的次子皮特在一起

尽管两人的政治见解千差万别，但他被舒马赫折服了。舒马赫主张德国“应当走原德意志帝国的路子，建立在州也就是联邦的基础上”。在那个时候，提出德国国家统一的要求实在是不识时务。德国前总理勃兰特1982年还在《左派与自由》一书中批评舒马赫“对国家重新统一抱有幻想”。

现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科尔逝世后评价说，科尔是一个“对的人”，出现在了“对的时间”和“对的地点”。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德国统一有赖于整个国际“冷战”大环境的变化，但没有科尔的审时度势，左右回旋，一切不会那么迅速顺利地发生。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和东德的民主化令世界始料不及。赫尔穆特·科尔第一时间决心把实现两德统一作为联邦德国的头等大事来抓。1989年11月28日，科尔向联邦议院提出了如何逐步实现统

一问题的十点计划。但在那个波谲云诡的时刻，并没有多少人支持他。华盛顿一方面感到这是西方势力进取东欧的绝好时机；另一方面，又担心处置不当会因此危及自身利益。国务卿贝克说，两个德国“从自由履行的权力一下子跨到统一问题，为时尚早”。

在欧洲，法国担忧德国主宰欧洲事务，也不希望看到德国统一。1989年12月6日，法国总统密特朗飞赴基辅与戈尔巴乔夫会晤，双方同样得出结论：德国统一还为时尚早。而在科尔十点计划提出的当天，东德政府发言人就表示，该计划不符合现实，德国统一问题尚未提到议事日程。

但科尔并不接受这些论断，他敏锐地看到了各方反对之词背后的游移和可能性。在执政的7年里，科尔一直在调校联邦德国与各方的关系。1982年，



美苏导弹之争愈演愈烈。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科尔积极支持美国在联邦德国部署中程导弹。与此同时，他还与里根总统就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以及天然气管道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了一致。这些举措使两国关系迅速摆脱了施密特时代的阴影。德美关系的改善，一方面加强了联邦德国的国家安全防务能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增进美国对联邦德国的信任度，这为日后获取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支持和认可打下了基础。

科尔明确地知晓，保障欧洲的和平是德国统一的基本前提和必经道路，于是他将德国统一置于整个欧洲统一的大框架下。科尔当上总理后，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两幅肖像画。一幅是19世纪政论家和学者约瑟夫·冯·格罗斯的画像，另一幅是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素描。1984年，密特朗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双双站在凡尔登“一战”战场遗址上，手拉手悼念两次世界大战的死难者，曾深深震撼了欧洲人的心，被视为战后欧洲法德轴心形成的标志性画面。同一年，欧共体关于预算摊款问题达成了一项重要的妥协方案，从而扫清了欧洲一体化前进道路上的

障碍。次年，欧共体又通过了《欧洲一体化文件》，决定在1992年建成共同体内部“统一的大市场”。这些都是在德法协调与合作的基础上实现的。

与此同时，科尔从未放弃他的“新东方政策”。1985年戈尔巴乔夫的上台，使德苏关系迎来了转机。戈尔巴乔夫当时正在为振兴苏联经济而努力，急需与联邦德国这样一个技术发达、资金充裕的国家建立密切的联系。双方一拍即合。1988和1989年，双方不仅在环保、文化、食品、贷款等方面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而且还使德苏两国间的交往从政治、经济领域发展到军事领域。

与美国、欧洲、苏联的关系构成了德国统一的大气候，在东西德之间，科尔也极力创造出了充满主动性的小气候。80年代初，民主德国解决自身外债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1982年秋，巴伐利亚州州长施特劳斯通过朋友获悉了民主德国的贷款愿望，就此事致函联邦总理科尔。科尔立刻意识到，可能通过金融援助来打开探亲访问的这扇大门，并防止民主德国向苏东阵营进一步靠拢。经过几轮秘密谈判，两国签订了一笔由联邦政府担保的10亿马



2009年10月31日，科尔在晚年伴侣迈科·里希特（左）的陪同下出席在柏林弗里德里希剧院举行的“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活动

克贷款协议。科尔不拘泥于社民党执政时期两德之间“以付出换回报”相处模式，开始“以信任换信任”——他并没有在协议中附带书面的政治要求。双方默契低调行事，1983年来自民主德国的紧急家庭团聚人数就比1982年增长了40%。1984年，科尔又利用参加苏联领导人葬礼的机会，与民主德国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进行了会晤，达成了“我们的国家是分裂的，但德意志民族继续存在”，有责任“竭尽全力不再在德意志领土上发生战争”的重要共识。在处理东西德问题上，科尔付诸了足够的耐心。1984年9月，在苏联的反对下，昂纳克取消了科尔期盼已久的联邦德国访问。3天之后，在挪威进行访问的科尔在当地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虽然昂纳克的西德之行取消了，但是西德将不遗余力地在人道主义方面继续改善、发

展同民主德国的关系。

当时间走到1989年，如果有一个人能够说服各方放下他们对统一德国的犹豫，那么这个人非科尔莫属。初次见到科尔的人都会惊讶于他营造老朋友般坦率气氛的非凡能力。科尔最擅长的是亲密性私人外交。

“为了说服密特朗，我频繁地和他约会，”科尔后来回忆说，“我们两个，一个爱吃鹅肝喝红酒，一个喜欢猪肚和啤酒。”他们在法国波尔多的沙滩漫步后回到密特朗的别墅里，在温暖的壁炉前进行了一次长谈。在朋友般坦率的氛围里，密特朗向科尔提出了同意德国统一的先决条件——“以马克换东德”：德国同意放弃马克、实行欧洲单一货币，从而把德国经济完全融入欧洲经济。科尔同意了密特朗的条件，法国接受德国统一。

1989年12月，科尔飞抵东德的德累斯顿。他带去了10亿马克的投资计划和信贷建议，并宣布联邦政府还打算在今后10年内，为西德经济界向民德提供1000亿马克投资计划提供担保。1990年1月，民主德国莫德罗政府提出《德国，统一的祖国》方案，科尔敏锐地指出他绝不能接受方案中的一点——“德国中立”。这个提法和欧洲一体化的思路相悖。当时距离民主德国大选还有两个月时间。科尔从共计33个竞选党派和组织资料中挑选出了主张尽快实现统一，并全面引进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德国联盟”。从2月初到3月中，他6次亲赴民德的埃尔福特、马德堡、罗斯托克、德累斯顿、科特布斯和莱比锡发表讲话，支持德国联盟。在卡尔·马克思城组织的一次竞选集会上，他明确表示，如果3月18日德国联盟获胜，那么联邦德国将向民主德国提供数十亿马克的援助。在科特布斯的竞选集会上，科尔又允诺，如果德国联盟执政，那么在联邦德国实现货币统一时，民主德国公民的存款可以1:1兑换马克。如果德国联盟不能掌权，那么联邦德国将不向民主德国提供援助。1990年3月19日凌晨，大选结果初步揭晓，德国联盟以48.15%的选票获胜，在400个议席中获得192席。

最后的障碍在莫斯科。5月在加拿大，戈尔巴乔夫面带愠怒地明确表示，西方坚持统一后的德国必须是北约成员国，而不提出别的解决办法，就像一张老唱片反复唱同一个调子。对僵局科尔有两条判断：德国不可能中立或脱离北约；苏联从经济、

政治上的需要考虑，不可能同西方国家搞持久战，戈尔巴乔夫一定有他想要的东西。于是，科尔加紧与民主德国新政府的合作，使苏联在外交上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同时，他敦促北约“重新确定未来的作用、战略和军事结构”，减少苏联对北约的担心。最后他解决了戈尔巴乔夫的燃眉之急，宣布决定由德意志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牵头向苏联提供50亿马克（合29.8亿美元）的优惠贷款；致函欧共体12国和美、加、日等国首脑，希望西方国家对苏联提供经济援助。1990年7月，科尔飞抵苏联疗养胜地阿尔黑兹，在那里和戈尔巴乔夫达成了八点协议，后者终于同意，统一后的德国可以自由决定归属那个联盟。

巨人的倒下

1998年，科尔开始向他的第五个总理任期发起冲击，这将让他打破俾斯麦19年的执政纪录。那个时候，曾经与科尔一块儿改变世界的巨人们都已经离场。密特朗在完成他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后死于前列腺癌，戈尔巴乔夫带着他的“新思维”走下了政治舞台。科尔是唯一一个还屹立在西方政治舞台的巨人。

科尔所创造的统一欧洲从辉煌梦想变成了一个切实的问题。大选之前的几年，在达到加入经货联盟所必要的经济趋同标准的重压之下，德国面临巨大财政困难，政府为此采取了削减社会福利和增税等措施。执政联盟曾试图推行减轻企业负担、创造就业机会的税收改革，并计划于1999年推行养老改革，以解决德国长期遗留的结构性问题，但改革的提案在由社会民主党占多数的联邦参议院遭到了抵制，这一失败严重影响了科尔政府的声誉。科尔上届选举时所做出的到2000年以前将失业人口减半的承诺已经无法兑现。1994年大选之时，科尔也曾面临过类似的颓势，东部选民的支持起到了决定性因素，但这一次，东部的失业率达到了19.7%，人们抛弃了他。

1998年的败选成为科尔整个人生的转折点。很快，基民盟收受不法献金案丑闻曝光，调查显示：1986年，科尔从不知名的账户中汇出来路不明的275万马克分派地方政党；1989至1996年，基民盟从列支敦士登陆续汇入将近1300万马克给黑森邦党部，有强烈逃税、洗钱嫌疑；1991年，坦克军火商

交给基民盟会计100万马克，这笔钱立即存入法兰克福银行的秘密账户；1998年，汉堡一对夫妻捐赠将近600万马克给基民盟，不久这对夫妇所属的公司国际竞标中得标。于是他的同僚也抛弃了他。在基民盟内部，率先向科尔公开发难的就是科尔一手提拔，并称之为“我的小女孩”的默克尔。1999年，默克尔迅速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署名文章，公开批评科尔的行为损害了基民盟的利益，呼吁科尔辞职，只担任党的名誉领袖。

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科尔渐渐变回了一位脆弱衰颓的普通老人。多年来，科尔的好胃口一直是德国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他爱吃甜食，好喝白葡萄酒，每顿要吃大量肉食和土豆。从前他身高1.95米、体重136公斤的庞大体形被人们形容为“不怒自威”，而现在人们更愿意用臃肿和迟钝来形容他。2008年一次严重的摔伤之后，科尔的余生就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颅内瘀血造成的脑功能受损破坏了他的语言功能，在许多公众场合，人们看到他疲惫而茫然地坐在醒目位置上，艰难地用普法尔茨口音念出几个不连贯的单词。

他的家庭生活也支离破碎。2001年，结发妻子因不堪忍受严重光过敏症自杀，曾经的女下属迈科·里希特成为科尔的晚年伴侣。2014年，长子瓦尔特·科尔发表了一篇公开信。他指责父亲在他童年时经常对他拳脚相向，使他从小生活在恐惧之中，并认为如果科尔没有卷入政治献金丑闻，母亲当年就不会自杀。他还表示，继母迈科·里希特不仅不与科尔的两个儿子有任何往来，限制了科尔的人身自由，甚至不允许他查阅撰写回忆录所需的档案文件。在那以后，84岁的科尔称，他不想再知道这两个儿子的任何情况。

科尔越来越像是一个倔强易怒的老人。他总是在批评自己的接班人默克尔。2011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决议时，德国投了弃权票。科尔批评说：“在现政府手中，德国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领域，已经不是有分量的大国。”他也看不上默克尔经济路线为导向的欧洲政策，认为这不符合当初欧洲一体化设计的宏愿。科尔的最后一次试图发声是在2016年，他罕见地在其住所会见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后者是默克尔难民政策在欧盟内最猛烈的批评者之一，科尔此举被外界解读为公开“敲打”默克尔。而在这次沉默的抗议中，衰老的科尔甚至没能留下只言片语。■



“隐形人”倒下的路口

记者 / 王海燕 插图 / 老牛

烩面店老板娘马萍倒在了距店门不足 100 米的马路上，因为车辆逃逸和无人施救导致二次碾压致死。人们指责路过的人让马萍变成了倒在斑马线上的“隐形人”。但让马萍变成“隐形人”的不止当时的路人，还有事后现实世界的所有反馈。除了视频里那个被撞倒的无助的白衣女子形象外，在真实生活中，关于她的信息仍是少得可怜。而对当地人来说，马萍之死只是这个路口无数日常事故中稍微大一点的而已。她倒掉的那个路口，繁忙依旧，混乱依旧。

致命路口

2017 年 4 月 21 日这天，河南驻马店的日落时间是 18 点 33 分，到 19 点 40 分时，天已经黑透了。烩面店老板娘马萍走出店门，来到 50 米外的路口——想起来多少有点可悲的是，虽然马萍之死在网上世界引起巨大震荡，但除了视频里那个被撞倒的无助的白衣女子形象外，在真实生活中，关于她的信息仍是少得可怜。事故之后，她似乎被某种神秘的力量屏蔽了。除了知道她在驻马店市解放大道学院路口对面小巷子里开了一家特色羊肉汤烩面店外，其他信息都是模糊的。没有人说得清她的准确年龄，只描绘她“三四十岁”；有人说她来自驻马店下面某个县，但也没有人说得出那个县名。

这一天的马萍不到晚上 8 点就关了店门，这和她以往的作息有些不同——当天是周五，这时

候本应该是店里生意最好的时候。她的烩面店所在的小巷子处在一大片城中村里，紧邻解放大道，也就是驻马店建市以来最老的主干道之一，连接着火车站、市中医院、市内最大的市民广场和老市政府（现已搬迁）等重要机构，也顺便把这片城中村变成了市区最老最繁华的城中村。这里的住房和门面租金每月从300元到700元不等，是马路对面的2/3左右，堪称一片福地，吸引了大量驻马店下辖县城来到市区的打工者和小生意人。

巷子里有很多烩面、卷饼、麻辣烫一类的快餐店，晚上还会出现流动的小吃摊，店主们的交情限于暗中观察对方的生意好坏和极其偶尔的闲聊。周围多位邻居都说，和这条巷子里的大多数店家一样，马萍做的是中午和晚上的生意，每天早上10点左右开门，下午2点多会午休一会儿，晚上临近午夜才关门，关门后直接住在店里，而不是像部分媒体写的那样要过马路回家。和大多数店主一样，她每天早上会穿过5个路口去3公里外的一个大华菜市场买菜。除此之外，马萍的一天当中没有必须出门的理由。

那一天，马萍店里的帮工请假回家了，没人知道这是不是她早早关门的原因。毕竟这里的生意不好做，以前很多人都在解放大道边的非机动车道里露天摆摊，驻马店市2016年开始创建文明城市，城市管得严了，很多摊主都到巷子里来开店，开着开着，倒闭又周转的不少，周围一个人经营的小店比比皆是。马萍在这个地方开店一年多了，生意算不上突出，根据她的帮工向媒体提供的信息，店面甚至还处在亏损期。

没人知道她为什么早早关门了，更没人知道她去马路对面干什么。马路对面有驻马店市第二实验小学和幼儿园，一家占据两层楼的生活超市、商场、菜市场 and 市民广场，学校和幼儿园5点就放学了，马萍也没有孩子在幼儿园和小学，菜市场里的商铺也基本都关门了。早上出门买菜的时候她会骑三轮车，但这时候她两手空空地步行，她也许是准备到商场或超市买点小东西。

关店以后，马萍来到了路口。根据后来公开的视频看，过马路时，她走上斑马线，在自西向东一侧的两车道中间停了下来，还低下了头，似乎在看衣服上的什么东西。如果在交通规则良好的城市，停留在斑马线上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反常行为，但一般情况下，也称不上有何危害。然而，在当地，

这一行为显得比较“反常”——和大多数的中国小城市居民一样，这里的人过马路习惯站在路口左顾右盼，小心谨慎地确认好两边的车距后，如临大敌般，直接从任何可以过路的地方匆忙奔向对面，这里的年轻人不会在过路时看手机，不会看斑马线，更不会无缘无故在马路中间停留下来。

兜了一圈的出租车

事实上，在6月份采访时，记者看到，这个路口的斑马线已经剥落到需要非常仔细才能辨认的程度。比对视频和现场可以发现，这条斑驳的斑马线并不是马萍站过的那条：两条斑马线发生了明显的位移。这个路口南边是一条小路，早年叫学院路，现在改名张西街，小学和幼儿园就在这条路上，北边则是马萍的店所在的无名小巷。原先的斑马线和大多数的斑马线一样，垂直于两边的非机动车道，连接着张西街和无名小巷，位移后的斑马线则是一条南北之间的斜线，从一边的绿化带切口连接到另一边的绿化带切口，大大偏离了大多数人每天过路的区域。不过没关系，这里没人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改，也没人注意到了斑马线发生了位移这件事，连交警和协警站在马路中间指挥交通时，也没有把斑马线当回事。

没人知道马萍当天站上斑马线，是因为无意，还是在其他城市留下的经验——在回到驻马店开烩面店之前，马萍曾在广州惠州待过。从视频上只能看到，车祸事故之前两边等待过路的人不少，但只有马萍一人孤零零地站在斑马线上，当时洒水车刚刚走过。用洒水车保持路面清洁，这也是驻马店去年以来创建文明城市的重要举措之一。解放大道上，洒水车从早上5点工作到晚上11点，播放着《兰花草》或《天路》的洒水车不到1小时就会在路上呼啸而过一次，洒水量非常大，以至于路面会出现大大小小的水洼，反射出路灯的黄光和白光。一般的出租车司机会在这样的灯光里格外小心。

但当马萍站在斑马线上时，那辆自东向西的出租车显然没有保持这份小心，而是车速不变地径直冲过了路口。站在路口的马萍被撞得从地面弹起，又被车辆带着往前了数米后，才从引擎盖右侧滑落在地，直直地躺在了马路正中间。肇事后的出租车经过轻微的路线摇摆后，绝尘而去。那个时候，正是这个繁忙路口晚高峰过去的尾声，还有三三两两

的下班人群、接送孩子的家长提着大包小包过路。马萍当时还活着，甚至有力地欠起上半身朝前方望了一眼。

根据驻马店警方通报，马萍被撞倒后，有十几个人报警和拨打120，从微博公开的视频里，则能听到接警人员断断续续和人沟通的声音，称“有人报警……被撞了，躺在路边上，还在过车，特别危险”。但马萍躺的并不是路边上，而是车来车往的马路中间，以至于好几辆车发现马萍后，不得不轻微拐弯，绕路而行。路过的起码17个路人当中，一对本来准备过路的孩子和家长倒退了回去，其余人或者朝马萍看了几眼，或者没有，都步履如常地过了路，没有任何人上前查看或围观。

1分钟后，另一辆在路口丝毫没有减速的私家车从马萍身上碾压而过。这一次，马萍被前后车轮分别卷起两次，像一截柔软的布条，被揉搓成扭曲的姿势，躺在了大街上。私家车迅速停车，马路另外一侧也有车辆停下，人群终于渐渐聚拢。

当马萍无助地死在车流中的视频被公布后，舆论强烈地谴责撞倒她的第一辆出租车——毫无疑问，该车司机应该为马萍的死负主要责任。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在遍布监控摄像头的城市交通体系中，逃逸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也有另外一种声音提出：出租车因为对面的远光灯或地面上的水的光反射，造成短暂的视觉失明，而没有看到车前的马萍？

为了还原当时的场景，记者特地在日落一个半小时后乘坐出租车在解放大道上来回了一圈，当天温度高，水迹已经快要干涸，路口靠近马萍出事一侧的一盏路灯已经损坏，但路上的行人依然可以清晰可见。出租车师傅告诉我，损坏的路灯是在近一个月损坏的，马萍出事时还亮着，无论是否有水洼，只要稍微注意一点，无论行人穿着什么衣服，都不会看不到。

而根据知情人士提供的信息，那辆肇事出租车在撞倒马萍之后，从前面的路口再次兜回车祸地点——这个细节可以证实，第一辆出租车是确认知道自己撞人的。记者在当地采访时，遇到的出租车司机也对自己同行的举动表示不解。据他们说，当地正规出租车保险额度强制50万元起，即便撞到人，“如果只是受伤，赔偿金也在保险公司可支付范围”。逃掉，也许是出租车司机本能的反应。等他再兜回现场时，第二次碾压已经发生，被抬上救护车的马萍最终抢救无效死亡。出租车司机驾着车辆再次离

开，并在次日清晨到案，自首。

“肯出事”的路口

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马萍在第二次碾压中直接被碾中了心脏位置。如果不是两个月后车祸视频在网上再次掀起一波讨论热潮，这件事的余音会像滴落在马路上的一滴水，很快从当地生活中消失得干干净净。在当地，这起车祸掀起的波澜远不如在网络上大，那本就是一个“肯出事”（河南方言：容易出事）的路口。

解放大道长4.4公里，有大大小小28个路口，马萍出事的学院路口是人流量最大的路口之一，每天早上7点左右、中午12点左右、晚上5点至6点，路口南侧的小学和幼儿园的大多数学生和家都要从这个路口往返，住在城中村的居民则在早晚高峰去对面的超市、卖场和菜场采购。小学和幼儿园前面的张西街，有用黄色油漆画出的菱形安全地带，但是没有任何缓冲措施。

而从张西街往前不足百米，来到马萍出事的路口，可以看到，和任何一个人流巨大的中国小城市路口一样，高峰时段，这里可以完成一场中国城乡居民出行工具现场博览会：除了一小部分步行或骑自行车的，这里的人大部分开着电动车出行，这些电动车有两轮的、三轮的、四轮的，载人数量从1人到3人不等，形态各异，用途各异，品牌各异，装饰得五花八门，有简单罩上彩色遮阳布像一艘道口小船的，也有形状像太空舱一样科技感十足的，走机动车道或非机动车道则视现场条件动态调整。

因为没有信号灯，这里无论大车小车、行人还是自行车，争取路权全靠眼观八面，脚下生风。而当地在路边拉客的三轮车师傅们则普遍认为，更高级别的交通工具拥有更高级别的路权。没有设置交通灯的原因是解放大道和另外一条城市主干道的十字路口设置了红绿灯，就在180米之外，太近了，对汽车不友好。政府的解决办法是，从2016年9月创建文明城市开始，市交警部门在路口安排了协警，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两班倒上班，分别在早中晚高峰时段现场指挥人车通行。

马萍出事那天，上下午班的是协警郑智，他不记得当天有什么异常，直到第二天上午8点30分，他指挥完早高峰路况后去巷子里的汤包店吃早饭，汤包店的老板告诉他，路口出事了，碾死了一个小

学生，两辆车碾死的。当时汤包店老板还不知道出事的是他斜对面的邻居。因为没有去烩面店吃过饭，也没有什么人讨论，郑智很快就忘了这件事。直到6月9日，网友爆出了马萍车祸现场的视频，上了各大新闻头条，虽然新闻里只点名了驻马店市，但郑智还是一眼就认出这就是他执勤的那个路口。

对马萍事件，郑智不理解为什么当时没人围上去，他的结论是：“现在的人太冷漠了，只认钱。”他说自己也受够了这个路口，“每天都闹哄哄的，明明是按正常节奏指挥的，开车的人骂，走路的人也骂”。记者来采访，他说有几个问题早就该曝光了，一是路口即使没有信号灯，至少应该设置减速带，因为这里的车辆都没有在路口减速的习惯，只要路口没人，就直接往前冲，“小孩子多危险哪”。在马萍出事时，斑马线3米开外的地方，本来有方格子凸起物的小缓冲带，聊胜于无，但翻修路面时铲掉了，这个作用微小的缓冲带也没有了。

二是公交站牌设置，连接火车站和高铁站的1路和12路公交是驻马店最繁忙的公交线路之一，在这个路口设有一个站点，离同一线路的上一个站点240米，步行大约需要2分钟。但这个路口并没有位置为2分钟路程的公交站腾出站台，站牌只能被局促地设计在绿化带里面，等车的人和过路的人混在路边，公交停靠时，一些人“哗啦啦”上车，另一些人则趁着公交车停，狂奔过路。如果那时候有轿车从公交车的左边径直往前，轿车和行人都将处在对方的视线盲区范围。马萍发生车祸的地点，同样有可能处在这个盲区当中，因为视频的视角原因，很难确定，当时是否有公交停靠。

这是两个最突出而急迫的问题，郑智说他们基层协警“反映了起码800遍，还是老样子”。也有市民向当地媒体投诉，媒体也曝光了，并和绝大多数地方媒体上民生小问题一样，仅限于曝光。在两边的商铺店员印象里，这个路口没怎么出过事，但在银行当保安上夜班，隔天就守在路口的三轮车师傅梅伟可不这么认为，光今年，除了听说的马萍这桩车祸，他就看到过三次比较大的车祸。

第一件是过年的时候，一辆出租车把城中村到学校上学的小孩撞了；不到两个月，他又见到一辆面包车把一个骑电动车买菜回家的老人撞了；再过一个月，一辆轿车和迎面而来骑电动车的夫妇相撞。三个车祸都没出人命，但都送去了医院。梅伟在这里开了近四年三轮车，因为不满别人说三轮车不安

全的意见，所以格外小心，他对自己的手艺倒是放心，但“生人来这里，那肯定是要出事的，我见得多了。”

我采访的当天就在路口也见到了三场事故，一场是早上10点多，一辆轿车追尾了一辆出租车，两辆车横在路中间处理了大半天；第二场是下午2点半，一辆电动车和一辆准备驶入非机动车道停车位的轿车同时拐弯，发生了摩擦，人车本无恙，但骑电动车的中年男子和开轿车的女士吵着吵着下车打了一架，见了血。打架的时候，本来围了一大圈围观人群，但警察来了，想找证人时，人群一下散得一千二净，气得警察直摇头。第三场事故更微小，两辆轿车相向拐弯，谁也不让谁，堵在路口吵了起码20分钟，才终于在协警的劝说下各自愤愤离开。

下午7点40分，就是马萍发生事故的相同时刻，我站在路边，问梅伟，这样的小事故是不是天天发生，这个乐呵呵的三轮车师傅顿时哈哈大笑起来，“这算什么事故？这就算事故，那事故多了去了。”这倒和马萍的邻居们，那些每天在店里忙碌的店主们态度一致，他们不明白记者们为什么追着这个事故采访。马萍对面的理发店女老板不解地问：“你们到底想知道什么呢？这不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交通事故吗？过去有，以后肯定也还有，难道每一个都要来采访一遍吗？”

最终，马萍在她开店一年多，并失去生命的地方彻底变成了隐形人。她的店面已经关门，帮工已经回到老家，周围没人知道联系方式，她以前会到店帮忙摘菜的母亲和其他家人不愿意对媒体吐露任何信息。一墙之隔的烙馍店里，女店主的侄子跟她聊天：“前几天，有个小姑娘在路上被车碾了两次碾死了，好惨。”女店主笑着纠正：“不是小姑娘，就是隔壁的。”出事当天中午，女店主还和马萍聊过天，她不记得聊了些啥，她是所有邻居里面最热情的一个，但对马萍的任何信息，她说自己“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郑智、马萍为化名）

在两边的商铺店员印象里，这个路口没怎么出过事，但上夜班的保安除了听说的马萍这桩车祸，今年还看到过三次比较大的车祸。



6月6日，2017 NBA 总决赛第3场赛前媒体公开日，金州勇士队双星杜兰特（左）与库里积极备战

NBA 总决赛：勇士王朝奠基礼

文 / 朱步冲

让我们暂时把时钟回拨，回到2016年6月13日的旧金山甲骨文球场，金州勇士队刚刚输掉了总决赛第七场，以失败结束了这个本该载入史册的73胜赛季。主场更衣室里一片死寂，只有骑士队球员们欢呼的声音隐约可闻，曾经的2015年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平时寡言少语的安德烈·伊戈达拉在更衣室里站了起来，对着沮丧的队友发表了一番讲话，他激励队友，一定要从失败的打击中走出来。他说，如果勇士队能够以正确的方式回应，那么旧金山将在未来的岁月里收获不止一座总冠军奖杯，辉煌的前景将最终洗刷2016赛季的耻辱。伊戈达拉特地提到了主教练史蒂夫·科尔曾为之效力的圣安东尼奥马刺队，波波维奇和邓肯也从未连续卫冕，但依旧不妨碍他们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球队。

“鲛鱼”杜兰特

伊戈达拉所谓“正确的回应方式”包含了许多含义，也许最主要的一重，就是凯文·杜兰特加盟的可能性。在伊戈达拉的演讲完成不久后，德拉蒙德·格林拨通了凯文·杜兰特的手机，他的通话简单明了，没有寒暄，没有试探：“看到我们缺少什么了，对吧？我们需要你，让它成为现实吧！”《体育画报》专栏作家利·詹金斯说，他得悉格林已经私下与杜兰特交流了一个月，这几句短短的话可以被看作是格林说服杜兰特的结案陈词。就在格林致电杜兰特整整51个星期后，在同一间更衣室里，空气里洋溢的是狂欢和香槟酒的味道，刚刚收获了职业生涯第一枚总冠军戒指，并获得了总决赛MVP头衔的杜兰特和格林、库里，以及其他队友挨个紧紧拥抱。

由杜兰特、库里、汤普森和格林组成的勇士“海啸四人组”，可以说是NBA有史以来最令对手胆寒的攻击组合，尽管本赛季因磨合问题，以及杜兰特短暂的韧带伤势，勇士队常规赛67胜15负，但却在季后赛迎来了15连胜，只负1场。

通常，NBA历史上的巨星组合，都存在因兼容性引发的阵痛，但勇士队却不用担心杜兰特和旧金山存在排斥反应。根据著名体育数据分析网站Synergy提供的统计数字，库里和杜兰特是2016赛季中有球/无球两种进攻模式比例最为均衡的巨星，杜兰特为50.5%~49.5%，库里为50.3%~49.7%，也就是说，勇士队可以不用担心他们的球权分配，或者进攻短板，随心所欲地为两人制定不同的进攻战术：杜、库两巨头任一个进入持球主导模式后，另一个可以即刻无缝转化为时时无球跑动，伺机接球投篮，切入的暗影杀手，让对手防不胜防。同样，勇士队也根本不用担心杜兰特在场上的自我驱动力和获胜欲望，在进入联盟十年后，两手空空的杜兰特对总冠军戒指的渴望已经登峰造极，他在2016年夏天宣布离开俄克拉荷马的决定，甚至让一些体育媒体讥讽为托尔金《指环王》中因追求魔戒力量而自甘堕落为索伦走卒的“戒灵”。

科尔在接受ESPN采访时曾盛赞杜兰特：“他热爱无球跑动，传球，在球场上满场飞奔，他与我们的体系完美契合，确实，我们为得到他，放弃了一些关键球员，但是，这可是世界上排名第二的球员啊！”确实，这笔自由签约交易看上去几乎是“打劫”，除了总决赛上失常的潜力小前锋哈里斯·巴恩

斯，勇士队失去的只是一些禁区内的轮换球员，比如斯贝茨与艾泽利，还有伤病不断的中锋博古特。

在2016至2017赛季季前赛第四场后，勇士队在客场丹佛共进晚餐，其他球员和助理教练逐渐离开，只剩库里和杜兰特同桌相对，一些球队官员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希望他们像一对恋人那样擦出某些和谐的火花。这场谈话持续到深夜，杜兰特后来对ESPN记者说：“我们只是谈了谈生活，当你和某人谈得来的时候，你经常会发现能聊很多，聊上几个小时。”

“我来这里是为了乐趣，我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他们对待我的方式让我感觉我不是那个KD。”杜兰特说。在初到勇士队之时，杜兰特在队友和教练组眼里是“拘谨”“敏感”的，他车里放得最多的歌曲是《别担心，开心点》(Don't Worry be Happy)。在勇士队的训练馆里，一共有两个篮球场，四个篮筐，在每日常规训练结束后，大部分球员都会留下来加练投篮：库里占据一个篮筐，汤普森占据一个，格林占据一个，然而杜兰特会选择默默地加入那些替补球员，在第四个篮筐下训练。“我不想让任何队友过来迎合我。”杜兰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想默默地，悄无声息地成为球队的一分子，而不是带来任何压力。”

科尔认为，整支球队已经连续三年打入季后赛，在精神上已经有些疲劳，所以他们需要杜兰特这样一条生猛的鲛鱼，来激发球队的斗志。总决赛第四战，当杜兰特的上篮被凯文·乐福以一记凶狠的犯规阻止后，杜兰特震怒了，他和走上来声援队友的詹姆斯横眉冷对，鼻尖对鼻尖地飘起了垃圾话，也许在他内心深处，唯有如此强悍，如此不妥协，才能昭示自己的决心。

具体到比赛范畴上，勇士教练组需要修正的只是杜兰特身上某些从雷霆队带来的“小毛病”，比如在快攻中，杜兰特一开始仅仅是依靠习惯，在底角落位。但教练组告诉他，在没有得球之前，要继续不断地跑位，内切，或者外出给库里或汤普森做掩护。然而在最初的水土不服之后，杜兰特发现在勇士队比赛更加轻松了：他不再频繁地单打，在被人包夹时强行投篮，他的每场出手数(16.5次)是职业生涯新低的，但有效命中率(59.4%)却是职业生涯最高的，在总决赛中，他拿出的成绩单是场均35.2分，8个篮板，5.4次助攻。

有时，当双子星其中的一颗亮度增大，另一颗就不可避免地黯淡下去。从2016年圣诞节到2017

年2月，杜兰特和库里的球场表现宛如坐跷跷板，此高彼低。勇士队助理教练布鲁斯·弗拉泽曾对媒体说，库里想让所有人都开心，他会迎合所有人，很少照顾自己。在全美转播的骑士与勇士的圣诞大战上，库里仅得15分，投篮11投4中。这是一场被誉为“总决赛预演”的比赛，然而库里并没有以自己标志性的方式去回应骑士的挑战，在比赛最后6个回合中，他只碰过两次球，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他被利文斯顿换了下来，然后凯里·欧文就毫不留情地在后者头上命中了绝杀，在场下观战的库里只能以抱头姿势表达自己的失落与挫败感。一时间，各种批评意见重新冒了出来，《体育画报》专栏作家本·格罗弗就曾批评说，库里依旧没有改掉自己的老毛病：一遇到强悍的身体对抗与投篮手感不佳，他就会放任自己进入一个消极的阶段，也不大会积极去用其他方式帮助球队。

然而到了季后赛，一切都恢复正规。根据统计数字显示，库里在场时，勇士队净胜对手的分数是245分，历史第一。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自从1996～1997赛季NBA引入净胜分值这项统计以来，这是新的季后赛纪录。在总决赛中，库里场均拿到26.8分、8个篮板和9.4次助攻，在杜兰特投中的149球当中，就有33次来自他的直接助攻。在季后赛，库里在场，勇士每百回合得123.1分，而库里不在的情况下，勇士每百回合只能得到95.9分，27.2分的巨大差值更加惊人。除了这些摆在明面上的数据，库里为勇士队默默做了很多“看不见的工作”，诸如勇士队每场的“破坏传球”名列全联盟第四，“地板球争抢”名列全联盟第三，其中库里的季后赛“地板球争抢”次数名列全联盟球员排行第二。

最好的体系 VS 最好的个人

“和他们（勇士队）比赛太难了。”骑士队教练泰伦·卢在第五战前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你在场上做得好，或者出色，都不足以拿走一场胜利，而必须做到接近完美才可以。”有趣的是，一方面每一场比赛都是勒布朗·詹姆斯的个人里程碑：总决赛三双数量历史第二，季后赛得分超越迈克尔·乔丹，但依然无法给球队带来最终的胜利，在他五场比赛休息的区区28分钟里，骑士队累计就输掉了27分。“最好的那个人”最终未能逾越“最好的体系”。

确实，2017年总决赛一开始，比赛就呈现出某

种“一边倒”的态势。前三场比赛，骑士队苦心孤诣积攒的空位射手群发挥不佳，凯尔·科沃尔累计3分球12投3中，J.R.史密斯累计14投6中，香珀特7投1中。知名NBA评论员张文璟分析说，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还是因为空位不足。骑士三巨头里詹姆斯威胁最大，但勇士有大量摇摆人能减缓其突破速度，导致其并不能频繁制造空位；而欧文的打法往往更依赖单打而非挡拆，各种高难度球进了让人击掌叫好，但不进的时候改变对方阵型的能力有限。凯文·勒夫则无法通过低位单打吸引勇士队的包夹。

第四、第五战，泰伦·卢有意识地让詹姆斯更多地通过挡拆后的错位，“找”库里。尤其是特里斯坦·汤普森下场，骑士也摆出五射手小个阵容时，詹姆斯频繁通过单打库里直接得分，并成功造成后者的犯规。这迫使勇士队不得不调整防守策略，想尽办法，在防守端把这位勇士队的灵魂人物“藏”起来。张文璟表示，勇士队先后采取了两种办法阻止詹姆斯直接对位库里，进行“碾压”式的单打。首先是换防时，只让库里对詹姆斯的突破进行瞬间延阻，然后迅速撤回，让原本詹姆斯对位的防守人（经常是杜兰特）迅速回位，然而缺点是在延阻换防之间，库里原本防守的骑士球员会得到一段短暂而难得的“放空”时间。在第四场、第五场一开始，库里原本盯防的J.R.史密斯，就果断抓住这个机会，频繁远投，以3分球为骑士队赚取了不错的开局场面。另一种“藏”库里的防守战术是在无球阶段就进行换防，在骑士队詹姆斯示意要求掩护的一刹那，库里立刻和其他勇士队队友进行换防，诸如身高体重不吃亏的伊戈达拉，这样詹姆斯在掩护后的切入，面对全新的防守者，依旧无法占到便宜。这个布阵对勇士队防守的默契性要求非常高，稍有交流不畅，就会出现阵型的混乱。

从第三战开始，骑士队开始升级自己的防守强度，试图用频繁的身体对抗和干扰节奏，将勇士队流畅的节奏破坏，就像去年总决赛后四场比赛那样。其中他们唯一取胜的第四战堪称经典，在第四战中，库里只拿到了一次无人防守空位投篮的机会。另外一个体现骑士队防守骤然升级的数据是：在今年总决赛前三战中，他们让勇士拿到了99分的攻守转换得分，然而第四战，这一数字仅仅是7分。在第一节，勇士队就犯规12次，让骑士队通过罚球拿到了22分。

然而，骑士强硬的防守策略为什么不能扭转最终的战局？骑士并不是一支单防能力极强的球队：

32岁的詹姆斯必须将体能更多地分配在进攻端，欧文向来不是一个专注热情的一对一防守者，而凯文·勒夫受限于速度，特里斯坦·汤普森的经验也称不上老到。“一方面骑士这个队防守能力有限，只能尽量拿积极性去补。但积极性往往又是建立在充沛的体能上的，他们经常会出现开局有个强度结尾就松懈的情况，整个总决赛下半场崩盘也不是第一次了。”张文璟表示，在勇士队最终夺冠的第五场，科尔教练扩充了著名的“死亡五小”阵容上场时间，整个空间和跑位速度都处于最佳状态。在第三、第四场，骑士队曾经一度得意的“库里持球寻找挡拆时对其进行包夹紧逼”的战略不再有效，库里一旦顺利传球，受助攻者经常惊喜地发现自己面对的就是一马平川的大空当，可以轻松投篮或者上篮。原因就在于骑士队体力急剧下降，两名防守者包夹库里后，其他三人由于必须在三分线附近紧盯有远程杀伤力的杜兰特与汤普森，无法及时实现轮转防守。

张文璟总结说，最关键的差别在于，勇士是一支进攻发起点和终结点相对模糊的球队，但骑士不是，他们的进攻必须自上而下，由三巨头发起，其他配角球员既没有助攻能力，也不大擅长靠跑位找出机会。

反过来看勇士队，库里和杜兰特的挡拆才是令人恐惧的终极武器，库里能利用自己的控球、速度和射程以小打大杜兰特的防守者，杜兰特能用身高和步幅以大打小库里的防守者。于是我们看到，在第五战，由于双方通过四场鏖战，彼此已经达到了“知己知彼”的地步，所以双方都力图用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杀死”对方。对于勇士队来说，就是频繁地局部挡拆，再挡拆。根据统计，勇士队全场挡拆进攻达到38次之多，尤其是库里和杜兰特的挡拆，几乎一手打崩了骑士。

两大豪门的未来

勇士队还会统治联盟很长时间吗？ESPN知名分析员扎克·洛维说，他们拥有四名29岁以下，能够名列NBA第一到第三阵容的明星球员，其中三个配得上入选NBA有史以来的最佳射手十人榜，所以勇士队在未来4到5年间，还会继续统治联盟。能够阻挡他们的，首先是球员工资帽，2018至2019赛季，勇士队工资总额可能将超过奢侈税触发线3000万美元。然而根据媒体报道，杜兰特愿意降薪，

以便能够让勇士队顺利留下库里，以及伊戈达拉和利文斯顿这样的主要替补。但是即便如此，四巨头中的汤普森和格林也将在2019与2020赛季结束后合同到期，届时，勇士队的薪水总额将达到1.7亿美元，加上奢侈税则是恐怖的3.3亿美元。勇士队老板是否愿意拿出如此一笔巨款，尚未可知。

另外，他们的核心板凳球员随着年龄的增长，运动能力下滑，可能也无法像以往那样主导比赛的衔接阶段，控球后卫肖恩·利文斯顿已经32岁，替补小前锋、最为凶悍的防守球员安德烈·伊戈达拉也已经年满33岁。不过由于勇士王朝的“冠军磁石”效应，应该在未来2到3个赛季之内，依旧会有源源不断的渴望戒指的实力老将带枪来投，只求一份底薪。

正当勇士队庆祝夺冠凯旋的花车行列驶过旧金山的大街时，一场夏季军备竞赛已经悄悄拉开了帷幕。于东部总决赛惜败骑士的凯尔特人队，送出了自己的状元选秀权，换来了今年夏天的探花选秀权以及2018、2019年的首轮选秀权。ESPN专栏分析员查特·福德分析说，这更显示了凯尔特人队的争冠决心。在骑士、勇士东西两大豪门巨擘自成一档，可能长期争霸的情况下，其他剑指总冠军的球队唯有加注，一方面通过交易，不惜血本引进全明星级优秀球员，另一方面则本着“广积粮、缓称王”的原则，囤积有天赋的年轻人，希冀两大豪门在中长期因明星球员年龄曲线逐渐下滑的背景下，伺机崛起。所以凯尔特人队这一笔交易的目的，首先是放弃了状元大热门，控球后卫富尔茨，而准备选择来自堪萨斯大学的锋线球员约什·杰克逊，以解决今年东决因锋线身高运动能力不足而被詹姆斯蹂躏的短板，其次，未来两个选秀权可以连续保证凯尔特人队持续有高质量的新血注入。

作为“总亚军”铩羽而归的骑士，自然也不会安宁，依靠现有阵容即使来年再进总决赛，也是凶多吉少，所以升级阵容也势在必行。已经有传言说，骑士队希望送走总决赛表现不佳的凯文·乐福，以便换来印第安纳步行者的全明星小前锋保罗·乔治。这个“骑士三巨头2.0版本”，与勇士队将更相似，更年轻，更快速，射程更广，每个人都可以从外线充当进攻发起与终结点，然而这一笔交易的难度相当高，骑士也并没有合适的、性价比高能当作交易添头的角色球员，所以这个夏天，如果克利夫兰渴望将阵容升级，来年再战勇士，将极大考验总经理大卫·格里芬的智慧。☑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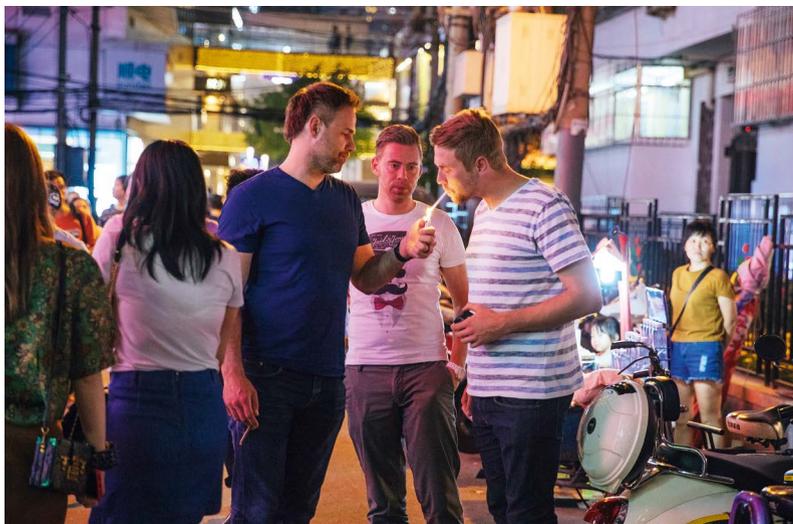
三里屯“脏街”的命运

记者 / 丘濂

所有“野生”的街道，都生气勃勃，充满趣味，这是为什么作为后起之秀的三里屯“脏街”能够成为三里屯地区的灵魂。然而“野生”的意味也在于，它可能逐渐生长得偏离轨道，并且脆弱而不堪一击。

“脏街”不再

晚上9点，徐老板来到了位于三里屯“脏街”42号居民楼的DVD店铺，接过白天店员的班。“现在顾客不多了，干脆把夜班店员辞掉，自己来盯着。”他说。他店铺临街一面被封掉了，安上了铁栏杆，看上去和一般住家没有区别。基本只有熟客才会摸到反面



(本组照片：慕小川摄)

2



3

1. 北京三里屯“脏街”42号居民楼里的 Toy Box 酒吧。没有任何牌子指示，只有内部朋友带着才能找到
2. 华洋杂居的三里屯“脏街”上有着不同国家的面孔
3. 42号居民楼天台，周围已被繁华商业包裹

的单元入口走进来。“也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几年前光盘生意就不好做了，这次正好给了一个彻底转行的理由。”

距离4月24日三里屯街道对“脏街”42号居民楼“开墙打洞”以及私搭乱建进行集中执法已经2个月了。三里屯“脏街”上依旧人来人往，但人流与喧嚣都减少了几分。“开墙打洞”是指居民楼的底层“由居改商”的现象，往往都伴随着违章建筑向街面的公共空间延伸。改革开放后，随着个体和

私营经济的发展，它在城市街区里变得相当普遍。整治“开墙打洞”的工作从去年开始在北京各区开展，目的在于排除建筑物的安全隐患、解决交通秩序拥堵、消防通道占用等问题，更长远的还有疏解人口的考虑。

“脏街”是人们起的绰号。这条位于北京夜生活胜地三里屯的街道，在地图上不见名字显示，很长时间内被叫作“后街”，因为它相隔着的三里屯北街是“前街”，那是最早成名的酒吧街。“后街”

连接着太古里商场的南区和北区。它的一侧是42号居民楼和原京客隆超市对外出租的店铺，另一侧是同里和3.3大厦的底商。短短200米距离的一条小街，会聚了廉价酒水餐食，各种青年亚文化的元素，以及舶来的时髦之物。“脏街”是指它环境的脏乱差，但同时也是说它足够“接地气”。在这里肆意过青春的年轻人，称它为“三里屯的灵魂”。

42号居民楼就是灵魂中的核心。因为所处位置优越，以及它和附近商业楼宇相比，有着较为廉价的租金，能够提供给不同业态以生存空间，它几乎被商业所占据。有人回忆，在商业发展最巅峰的时候，这栋7个单元的居民楼里大约有11家餐馆、2家咖啡馆、5家酒吧、2家炸鸡排店、5家文身店、3家服饰店、4家美甲美睫店、4家小卖部、2家DVD商店、1家塔罗牌占卜店和1家裁缝店。

它因此成为三里屯街道“开墙打洞”的重灾区。在这次的整治行动中，42号居民楼一共33家沿街商户被整顿，拆除面积1000平方米。整治完后，居民楼前面被栽种上了鲜花和绿植。有的店铺转入了完全室内的生意，有的店铺则彻底消失了，有的还处于一半室内一半室外的模糊状态——DVD隔壁小卖部老板推着板车继续把摊摆在路边，和“铁窗”里的老板娘用一个在绳子上能滑动的塑料筐来补给供货。

此次整治只是从建筑风貌上恢复住宅楼的外立面，下一步的行动则是对经营者的工商执照进行检查，无照经营者、经营内容不符合经营范围规定者将继续被清出。4月底的整治行动，是“脏街”从混乱走向规范与有序的开始。

建筑师、城市研究者王硕把像“脏街”这样不受规划管理、兀自生长演变的街区称作“野生空间”。“‘野生空间’的形成是为了满足某一部分人的欲望。”他说。和他之前关注的其他具有本地和日常性的“野生”街区不同，“脏街”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地处三里屯这个华洋杂居之地，它要迎合这个半中半洋群体的需求。“北京本土街道能够长出一个卖臭豆腐的店铺，但长不出一个卖Mojito酒的小摊。”

所有的“野生空间”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因为是野生，它们开始都会热烈生长，生机勃勃；接着由于管理主体不明确，发展缺乏引导，难免进入野蛮生长的状态；它们又很脆弱，外界一旦干预，要么被驯化而失去生气，要么是死亡。”王硕看到了若干个他所追踪的“野生空间”犹如生物有机体一样，



都历经了孕育、生长、极盛和衰落的状态。作为建筑师，他像生物学家一样，把它们当作样本来研究，再把最早激发活力的机制提取出“原型”，应用到其他的建筑设计中。

从某种程度上说，讲述“脏街”的形成演变比诉说它的结果更加重要。从中可以看到这条街的演



(蔡小川 摄)

三里屯文身店“诡异空间”的文身师老和

变逻辑，它如何长成让建筑师欣喜的充满活力的状态；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对这条街无比怀念、满怀情感，有的人又对这条街充满愤恨、想要离开。更关键的是，这条街提供了一种城市形态的可能性。它的命运让人思考：如果在恰当的时候，能够有明确主体来牵头，平衡好各方利益进行有效治理，那

么不需要整治“拆墙打洞”这样“一刀切”的行政手段，它是否也仍然有机会成为一条好的街道？

“后街”往事

42号居民楼是一座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普



【张小平摄】

三里屯塔罗牌店“窝塔罗”的占卜师雨婷

通红砖居民楼，呈L形状。它朴素的外貌和三里屯地区的其他居民楼一样。

2006年，北京人小飞来到了三里屯“后街”，租了42号楼半地下的房子开了一间叫“局”的酒吧。那时这条街上人虽然还不算多，但小飞准确预测到它未来的景象：南北两边都在建商场（即之后的太古里），建成之后这条街就会成为人流的必经之路。这栋居民楼的位置让他联想到香港铜锣湾地区，SOGO商场附近的一处民宅——由于拆迁困难，那座地处闹市的楼里逐渐被商户占据，街上就能看到各种花花绿绿的招牌。小飞的酒吧度过了一段寂寥的时期。为了多挣钱，他下午4点钟会在店门口支起炸炉，炸香肠、做热狗，卖给附近三里屯一中放学回家的孩子们。

比小飞早几个月来到42号楼的是老和的“诡异空间”文身店。小飞与老和还是在北京隆福寺开店当邻居时结下的友谊。那里是北京早年间一个青

年亚文化的集中地。小飞卖他的Hip-Hop服装，老和搞他的文身事业。老和是云南傣族族人，从小喜欢画画。觉得有文身图案显得叛逆而不同，他十几岁自己用缝衣针在手指上扎了第一个骷髅头的图案，从此走上文身之路。来北京学习艺术设计，老和本想找份稳定的工作，却忍受不了朝九晚五的坐班生活，重新捡起了文身的手艺。“青龙白虎那是狭隘了，文身的独特性在于它能表现比绘画更为广阔的领域。水彩、水墨或者油画效果，工具加上皮肤这个载体，让图案千变万化。”已经被奉为北京文身界鼻祖的老和对我说。选择来到三里屯“后街”，是因为隆福寺那边被一些乱七八糟的小文身店给搞乱了。“满街都是拉客的，没文身让你做文身，有文身让你洗文身。”三里屯外国人多，对文身艺术更有接受能力，这让老和看到了三里屯的市场。于是文身人士的聚点，从北京的西单、隆福寺又向东到了三里屯。“诡异空间”成了开疆拓土者。

2006年，姬恺上“大二”。他之前老老实实上学读书，从没去过酒吧，那天约会一个网上认识的女孩，来到了三里屯。不喜欢北街的商业气氛，他带着姑娘往里面的胡同小巷走。“我告诉人家，三里屯的酒吧我都熟，带你去个常去的。”误打误撞进了“局”酒吧，小飞拿着酒单过来，“我们刚开张，想喝点什么？”姬恺尴尬得不行。

42号楼的租户中还有卖DVD的徐老板。他2004年就租下了这处房子来居住，为的是能够方便照看在旁边雅秀市场的服装生意。自己喜欢看电影，再加上有门道，他在雅秀的摊位实际一半卖服装，一半卖DVD。2005年，随着同里和3.3大厦的相继开业，“后街”有了些人气，他便和房东商量着把出租房开墙打洞成为专卖光盘的店铺。徐老板的经营之道在于诚信与懂得规矩。“新片一上映我这里就会有盘，可版本不好，我都会告诉顾客，有质量要求就再等等。地下影片是绝对不卖的。碰到北京开会之类的重要日子，我都会自动关门一星期。”

姬恺喜欢上了“局”的氛围。“小飞健谈，有个人魅力。彼此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都喜欢围着吧台来坐。喝了酒互相开始搭茬聊天，就都熟了。有情侣进来想坐散座，看到好像酒吧被包场的样子都会被吓走。”姬恺每周四、五、六的晚上会来“局”打工，在吧台后面帮忙。那时候的“局”酒吧，有一群特别的客人。“1992年或1993年出生，在中国读高中的外籍孩子，估计是使馆工作人员或者外企员工的子女。”姬恺分析，是因为其他大酒吧夜店会查年龄，不让他们入内，“局”则随便出入，才会成为他们的聚点。再加上小飞是性情中人，经常和大家一起喝酒，酒水成了半买半送的性质，孩子们自然很开心。姬恺观察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无论ABC，还是中国和外国人的混血，只要在血缘上和中国沾亲，遇上酒后以国家种族名义来寻衅滋事的外国人，一定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看上去，就是两拨外国友人在打架啊！”

姬恺在“局”认识了和他同岁的Mike隋。这个后来以模仿全国各地方言出名的中美混血，那时候是个性格开朗、喜欢表现和嘚瑟的穷小子。“Mike隋在北京上的小学，结果说了一口九年义务制教出来的‘Chinglish’，美国妈妈看不下去了，又把他送回国接受教育。”姬恺见到Mike隋时，正是他再次回到中国不久，中文水平连小学生都不如。“他有超强的模仿能力，不久又说了一口‘京片子’，有一

群‘粉丝’追随着他。他喜欢‘调戏’姑娘。一秒钟前还是一字一顿、荒腔走板地说‘我一的一中一文一不好’，下一秒就和老板嚷嚷‘给我来瓶儿啤酒！’”Mike隋后来当了职业演员，他的幕后团队几乎都是在“局”聊出来的朋友。

对于小飞的热情，姬恺一开始还长个心眼儿。“毕竟以前没接触过夜场人，总是有点儿担心。对方递过来的烟酒都会提醒自己留神。”2007年的一天，姬恺正在“局”打工，突然店里进来一堆防暴警察，“拿着枪，戴着盔的那种，让我们把音乐关了，把灯打开，所有人站成一排，验尿、搜身”。原来那天是警方打击三里屯一带毒品交易的突然行动。“‘后街’一头一尾都拉上了警戒线，街上都是警察牵着缉毒犬，‘法制进行时’现场拍摄。”“后街”上所有酒吧的老板都被带走协助调查，小飞也不例外。他临走前，从腰上解下来一个鼓鼓囊囊的腰包挂在姬恺脖子上，里面有所有钥匙、几万块钱的流水。“我和小飞认识也就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能这样信任我，说不在的这段时间，店就交给我照看。”“局”和毒品没有关系，小飞很快就从派出所出来了。这场“突袭”事件却让姬恺和这座酒吧的情感联系更加紧密。

这场行动也为小飞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一些店铺因为和毒品交易相关而被封店，刚刚有点热度的“后街”又冷了下去，另外几家店铺眼看生意不行就关门了。小飞趁机拿下了42号楼的几间房。“我也想过租3.3或者同里商厦的房子，可是都太贵了。”之后生意最旺的时候，小飞自己的店铺有“局”酒吧和“局”酒屋日式料理两个，再算上对外合作的“七爷清汤腩”“小小美甲美睫”“三里屯面馆”等一共6个，成为后街上知名的“二房东”。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位于“后街”一南一北位置的太古里也开业。“后街”如小飞所料，迎来了汹涌的人潮。那也是让小飞和姬恺感到快乐的一段时光，“局”里挤满了来自各个国家的人。“大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位于“后街”一南一北位置的太古里也开业。“后街”迎来了汹涌的人潮。

家一起喝酒拍照，没有什么阶层之分。一个土耳其的冠军拿着胸前挂着的金牌大喊要换一瓶威士忌黑方。”

那段时间也让文身师老和跟他的徒弟忙坏了。“最多的时候，一天要文 20 多个‘五环’和‘中国印’。”老何说，“就是最简单的黑白五环，加上准备工作台的时间也要半个小时。真是文吐了。”

野蛮生长

2008 年夏天，李涵来到开业不久的三里屯太古里闲逛，在从南区走往北区时，他被不期而遇的“后街”42 号居民楼镇住了：这座楼二层以下的住宅全都变为了商铺。洗脚店上面是卖潮牌 T 恤的，隔壁文身店下面是卖光盘的。金发美女在酒吧喝着奶昔，两米开外人行道上大嫂正卖着凉皮，几个印度人站在街角聊天。这种混杂着时尚与粗鄙、本地与国际的场面，就如同 Photoshop 里完成的拼贴。

这让建筑系出身的李涵产生了把它和周边环境画下来的冲动。他曾经看过一本叫《东京制造》的书，书中收入了一堆稀奇古怪的东京房子。它们都是来自民间、无权无势的普通建筑。李涵认为，在这批“坏建筑”的世界里，所谓的审美、形式都烟消云散，建筑回到了最基本、最原始的状态：对环境和功能的诚实回应。建筑师的工作是预先设计，李涵看到了那些华丽而空无一人的街道所暴露的设计缺陷，反而这样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街区有着无可比拟的活力。李涵甘愿做个“卑微”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在这个过程中也见证了“后街”快速发展的时期。

“我感到我的记录速度，赶不上那些店铺的变化速度。”李涵说。他指的是 42 号楼半地下那家叫卢卡斯（Luga's）的墨西哥餐厅。在 2008 年的某一天，他突然发现楼上多出了个经营越南河粉的餐厅，还有个伸出来的露天平台。老板 Luga 证实那的确是快速扩张的结果——仅仅 4 个月的时间，他就决定租下楼上的房间同时来做快餐河粉，因为墨西哥快餐店的生意实在太好了，牛肉和鸡肉两种口味的卷饼，可以从上午 10 点排队售卖到凌晨两三点，直到原料全部干净。而露天平台则是一夜之间搭建起来的。“正赶上街道两边改修管道，我们趁着晚上赶紧把结构竖起来，等到城管第二天发现，已经是既成事实。”



更为小众的店铺也在“后街”落脚，比如一家叫“窝塔罗”的塔罗牌占卜。它 2013 年来到“后街”，和 42 号楼里的一间美甲店共用一个门脸。“我们的客人 80% 都是女性，跟做美甲的是同一人群。”占卜师浩霆这样说。浩霆最常碰到的问询来自刚刚踏入娱乐圈的女孩，她们关心 A 合约还是 B 合约，哪个能让她们一举成名。让浩霆最为矛盾的问询来自那些在感情中扮演“第三者”的女生，尽管他会有自己的道德判断，但仍然需要按照塔罗牌的指示来给出回答。

2013 年，李涵所绘制的图册《一点儿北京之三里屯》出版。他用轴测图（即一种空间投影视图，纵深的投射不会向灭点收缩，而是保持平行）的方式，展示了“后街”隐藏在 42 号楼建筑中的店铺以及周边的街景。在书的前言中，他讨论了这种局部、渐进、自下而上的演变方式如何让城市的自身生成能力得到释放，从而产生一个生动有趣街区的



(蔡小川 摄)



(蔡小川 摄)

左图：整治后的“脏街”依旧人来人往，但人流和喧嚣已不像从前

右图：“封墙堵洞”整治后，42号楼里的一些餐馆仍然在营业

过程：首先通过转换功能激活已有建筑的某些室内空间；随着这些局部发展壮大，它们将带动更多室内空间产生积极的分裂组合和功能变化；于是多样性产生，人流开始增加，空间价值上涨；这将导致进一步室内空间细分，产生更丰富的多样性；随着室内空间越来越稀缺，使用者开始想方设法利用城市空间，室内活力向室外扩展，最终带来整个街区的繁荣。

然而李涵也看到了在没有干预的前提下，“后街”在继续朝着“疯狂”和“失控”的方向发展演变：由于人气的增长，麻辣烫和烤肉串的流动小贩开始进入街道，污水和红油满地横流；各家餐饮店铺私搭出来的门脸、户外用餐区不断疯狂蚕食着中间的通道，行人和机动车常被阻塞在中间，在污秽中前后不得动弹。人们在这个时候改称“后街”为“地沟油麻辣烫一条街”，或者干脆给了它个简单粗暴的名字，“脏街”。

在另一位建筑师王硕看来，自发生长而成的街道不加引导，都难以摆脱两种命运，一种是“绅士化”（Gentrification），就是能交纳得起昂贵租金的店铺的入驻，挤占掉之前风格迥异、具有创造力的小店位置；另一种就是“旅游化”（Tourification），都在卖投游客所好的物品。在“脏街”，随着这里的名气越来越大，店面租金越涨越高，一些迎合游客口味的店面开始分割既有店面，以争取单平方米利益的最大化，比如“脏街”从街头走到街尾，能有四五家炸鸡排的店铺。这让王硕想到北京另外一条最早以文艺青年开原创小店著称的“南锣鼓巷”胡同，逐渐沦为“旅游小吃一条街”的过程。“一开始只有一家文字奶酪，每天下午两点就关门，个性鲜明。后来满街都是卖奶酪的。再后来，糖葫芦、烤鸡翅、摊煎饼等各种小吃全都冒出来了。”

“脏街”按照自己的逻辑在继续发生着演变。2016年夏天，李涵再次来到这里做例行的拍摄记录



【蔡小川 摄】

长期观察和记录“脏街”变迁的建筑师李涵



李涵绘制的“脏街”42号居民楼及其内部商业图



李涵绘制的“脏街”上“青年”酒吧情景图

时，发现42号居民楼顶上长出了一个金色的皇冠。“那是一个开在顶层的理发店，在自己的头上加了个霓虹灯牌。这装在居民楼顶实在太高调了。”在李涵眼里，那个耀眼的皇冠仿佛是“脏街”盛极而衰的标志，也仿佛是末日来临前最后的狂欢。

谁的街道？

42号楼也就还剩下十几户“原住民”，住在三层的杨敏君（化名）是其中之一。方便孩子上学、出行方便是她迟迟不愿意搬走的理由。她的女儿上

的就是离家咫尺的三里屯二小和一中。如今女儿和女婿就住在三里屯路的东边，外孙又重复女儿当年的上学轨迹，每天需要杨敏君来接送。为了享受便利，她和丈夫需要日复一日地忍受噪音，以及炒菜炆锅和厨余垃圾产生的污浊气体。“推开窗户往下看就是密密麻麻的电线，还有层层叠叠的店铺。晚上回家的时候，经常连单元门都找不到。”面对“整治”后的结果，杨敏君感觉“比以前要清爽多了”，同时也感叹，住宅楼擅自改为商业用途，为什么早前没有人来管这些呢？

另一位居民李军岭表示，住宅出租为商业，实属无奈。他曾经和父母住在42号楼半地下的一层，很早就放弃自住改为商业出租。“整条街没有公共厕所，总有人在你窗口底下大小便和呕吐。”即使现在门口都种上了花、围上了铁栏杆，他也依然无法搬回来居住。“附近有同里大厦的酒吧餐馆，还有太古里的商业，晚上仍然很吵闹。”

面对苦不堪言的居民，三里屯街道有过一些整治举措，但都不算理想。“城管搬着椅子坐在‘脏街’入口不让那些小贩进去，可总不能天天值通宵吧？城管一走，他们就又来了。那些私搭乱建的商户，你让他整改，他就叫板说为什么别人可以他不可以。但有的商户确实由于历史原因，还能拿出社区的占地证明。”三里屯街道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李卫东介绍说。

2013年，三里屯街道决定在42号居民楼前竖起一堵3米的高墙，将居民楼和外部商业隔离开来。“这相当于把我们这些楼里的商铺封死在里面，让我们慢慢死掉。”小飞回忆说。这个决定由此产生一个积极的影响——为了存活自己，小飞发动20多家商户成立了“酒吧协会”。他们提交了一个文字的协议，还附带一张一米多长的自我整顿效果图。“包括招牌怎么摆设能够规矩和统一一些，一、二层是不是能够统一来做钢架显得整整齐齐，还有租绿植来美化环境。更关键的是，商铺们是和居民们共用一个下水道，大量的油污会进去造成堵塞。我们会每月定期让市政来做一次高压通井。”考虑到这样可以兼顾商户和居民的感受，小飞的提议通过了。

有一段时间，小飞走在街上都被大家叫作“会长”。“我拿着各种收据去和各个商户分摊钱，根据商户面积大小、楼上楼下的位置不同来均摊。”小飞还在每天晚上组织商户出人来看维持秩序。“晚上七点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南北两边就有人守着，不让那些售卖麻辣烫、烤肉串的流动小贩进入。”在小

飞的逻辑里，尽管自己和其他同行并不一定是有营业执照的合法经营者，但是他们在乎这条街的面貌，他们商铺的生意和这条街的环境休戚相关，这是固定商铺和流动小贩的区别。

这些工作小飞连续做了两年半时间。“结果听说政府要全面系统整治全北京的‘开墙打洞’。让我们少挣点钱、整改都没问题，但要彻底让我们关张走人，心就凉了，这个工作也就搁置了。”从此，“脏街”上也就不再没有这种自发治理。

王硕认为，理想的街区发展和治理模式应该是一种平衡的机制。“有点像是一桌人在开会，原住民、商户、开发商、建筑师、规划师、政府等各个利益相关方都有机会发声，谁的声音也不会湮没。”在对“脏街”的整治上，最终结果显然是有一方声音过大了。

整治之后，小飞的“局”酒吧就处于关闭状态。“局”做得不错后，小飞在工体西路又开了一家夜店，如今他同时是另外一家国际连锁品牌餐厅的合伙人。“年纪大了，整天熬夜受不了。希望把事业做得长远一点。”在他的名片上，小飞仍然把“局”酒吧创始人排在第一。他在观望政策，考虑如有可能把过去的房子转成一间对内的聚会场所。“门口没有任何招牌，但是可以有个标记，比如一只80年代常见的邮筒。里面我想把‘局’酒吧那些墙壁上的涂鸦都用龙骨盖上，搞成一个红酒吧或者雪茄吧，毕竟混‘局’的那代都已经长大了。但是在一个合适的时候，我会把那些龙骨都取下来，告诉大家，我没有忘记‘局’。”

这是李涵所发现的42号居民楼曾经有过的另一重意义：它孕育了有趣的商业，成为一些人事业起步的地方。倒是整治过后，这栋楼变得尴尬了——“就算楼前重新做了绿化，那些曾经‘开墙打洞’过的地方加上了‘铁窗’来确保日后不会重蹈覆辙，这些也不会有助于将这栋闹市中央的居民楼变成一个宜居之所。发展商业，其实是它顺应周遭环境的一个选择。”

有一天李涵走进42号楼后面的院子，看到中间的空地上曾经是餐馆的位置变成了一个托老中心。那是三里屯街道为了解决社区养老问题，在这个寸土寸金之地觅得的一个空间。每天上午的时间，“脏街”属于这些老人。社工推着老人们在“脏街”上走上几个来回晒晒太阳。“听着有些荒诞，但现在在42号楼的最大意义，大概是充当一道为老人带来庇护的隔音墙吧！”■（感谢The Bar老板Jim、大明西餐厅经理Jack、“牛掰吃喝指南”作者陆少、三里屯街道办事处对本文的帮助）



从徐扬到赵永勇 18年回家路

文 / 左衞 摄影 / 张雷

2016年，幼年被拐卖的赵永勇户口迁回四川老家，身份证上的名字终于从“徐扬”变回了“赵永勇”



赵永勇的父亲赵代富曾是泥水工，几年前手臂受伤后便在家做农活、养鸭子，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位于四川省达州市的开江县是一个典型的西南小城。白天，高楼在建；晚上，饭店热闹。从县城驱车 20 多分钟即可到达永兴镇，永兴中学斜对面的 270 号看上去是个平房，23 年前，在其中一个房间，8 岁的赵永勇和 6 岁的弟弟赵永宽目睹了母亲肖学琴被人贩子们杀害——那年，肖学琴只有 31 岁，而赵永勇并不知道加害母亲的陌生男人们是谁、为什么要害她。

此后，赵家人的全部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赵家兄弟被分别拐卖至福建莆田两处地方，彼此失了联系；久寻亲人未果的赵父另组家庭。18 年后，经多方努力，赵永勇找到了老家、找回了父亲。可是，故事发展至今，并没有迎来众人期盼的“圆满”，更多的，是真实的“复杂”。

离奇的失踪

5 月正值农忙时节，箭口垭村却有几分冷清，村民们三三两两地忙着插秧、烧秸秆，鸭子们在田里游来游去。与中国很多农村一样，箭口垭村如今到处是二层楼房，目之所及多是老人和小孩。在这里，找到一户人家并不容易，但只要问“赵永勇”的住址，村民们都会帮忙指路。他俨然成了村里的“名人”。

赵永勇已经回家半个多月，他在广东肇庆有自己的玉器铺。这次回家，他一边准备买房，一边等待某影视传媒公司摄制组，对方准备将他的故事改编成电影。

55 岁的赵代富收了十几捆胡豆回来，一个个地摘进篮子里，“可以炒着吃”。他原本是泥水工，几年前手臂受伤，便在家务农，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前妻和孩子们失踪后，他差点活不下去，后来娶了现任妻子，将老屋拆了，在新的

地皮上盖了二层小楼，这一住也20年了。

赵代富的现任妻子当年带着一双儿女与赵代富成亲，如今这一对儿女在重庆工作，赵妻也在那边帮忙，但经常回家，“只要三个小时”。赵代富说。在他看来，“两个孩子挺懂事”，每逢春节会“孝顺”自己一两千块钱，“他们从家里也就带一些米，几只鸭子，这些在外面买才几个钱，是吧？”

记者到访时，家里只有赵代富和赵永勇两个人。父亲的卧室在一楼，赵永勇睡二楼。赵代富说，中午，他会把饭菜准备好，然后用手机打电话叫赵永勇下来吃饭。“我说话他听不进去，”赵代富说，前几日，父子因一件事发生分歧，赵的妻子从重庆打来电话，劝了劝赵永勇，“她的话，他（赵永勇）还会听一点。”

说话时，赵永勇在堂屋看电视。在广东的业余时间，他喜欢看科幻和恐怖电影，但是父亲家里没有网络，“无聊死了”。在记者到访的几天里，父子俩很少说话，即便交谈，也只是回合不多的几个短句。记者询问赵永勇的联系方式，赵永勇说弟弟不喜欢接受媒体采访，只有微信，没存手机号码。说着把手机递过来：“不信你自己看。”“昨天他不是打电话给你了吗？”记者问。“他是打给我爸，然后让我接的。”赵永勇说。

曾经，赵代富一家四口过着温暖平静的生活。但这一切，在1994年7月12日被击得粉碎。赵代富记得，那天一早，他跟往常一样去建筑工地干活。那几日恰逢永兴镇赶场，妻子肖学琴准备到镇上给他做一件衬衣。“当时她只带了28块钱还是30块钱，家里放着一笔钱，她一分没动。”赵代富回忆。一位村民记得当天肖学琴的鞋子坏了，便同自己借了一双白色凉鞋。8岁的赵永勇与6岁的弟弟赵永宽蹦蹦跳跳地跟在母亲身后。

但这一天，母子三人并没有回家，赵代富的第一反应是妻子可能带着孩子们回了娘家。那时没有座机或手机，第二天，他骑自行车挨个到亲戚家询问，都说没见过。

开始有村民怀疑是人贩子所为。74岁的村民顾元成记得，90年代初的那几年，永兴镇上发生过多起小孩失踪事件，一度闹得永兴小学人心惶惶。而这一点，也在后来专门用于寻找被拐儿童的公益网站“宝贝回家”得到了间接证实。除了赵永勇，记者在网站上查到了至少五个寻亲帖，失踪儿童皆来自永兴镇。

也有一些流言，有的怀疑肖学琴带着两个儿子跑了，有的说是娘家人把母子三人藏了起来，但赵代

富说那时夫妻二人感情很好，他从未怀疑妻子带着孩子们离家出走：“如果她要走，不会只带着那么点钱呐。”肖学琴性格内向，有点闷，平时干完农活和家务，最大的爱好就是看小说。“别人想找她吵架都吵不起来，别人嗓门稍微高点，她就走到一边去了。”

赵代富怀疑镇上一个外号叫“蒲三娃”的人，家住永兴中学斜对面。长期做泥水工的赵代富很早就听说中学对面有人家拐过小孩，他还给蒲家周围几户人家修过房子。“蒲三娃家也有地下室。”赵代富说。他坐在家门口，指着不远处一个地方：“蒲三娃以前在这里当过知青，我们还说过话。”并且，“手脚不太干净，在店里偷过东西”。

赵永勇的姑父张玉鳌是开江县一名律师，就在赵代富四处打听妻儿下落的时候，他和老丈人赵世桃一起到永兴派出所报了案。当时，村民高元翠说赶集回来时看见赵家两个男孩坐在永兴中学对面的街基上，便招呼孩子们回家，但兄弟俩说在等妈妈——肖学琴正在身后的门市房内与人谈话。后来，得知母子三人没有回家，高元翠带着赵代富一行人指认了最后看见兄弟俩的地方。张玉鳌回忆，高当时指认的并不是蒲三娃的住宅，而是另一户人家，派出所将那家人带回去问话，对方直说“冤枉”。

赵代富也找过派出所，还花了80块钱买了条香烟，跟派出所的人一起去过蒲家。“他们就在屋里看了一下，问了几句话就回去了。”他说。“你没到地下室看看吗？”当被问到这一句时，赵代富顿了一下，说：“我当时急得很，根本想不起来……而且没有证据。”他说自己到现在都很后悔。

赵代富的哥哥赵代余在一旁说：“当时我就跟他（赵代富）说，我们喊上十几个人，一起到他（蒲三娃）家里，没有证据也去。”

“后来去了吗？”记者问。

“不给钱谁帮你呀！”赵代余说着点燃一根烟，缓缓说了句，“而且没有证据呀！”

“要是现在，我就敢去！”赵代富又说了句，“大不了被关几天，但是那时候，谁知道会怎么样……”

母子三人就这么离奇地失踪了。村民顾元成记得赵代富足足有三四个月没有出门。小村子热闹议论了一阵子后，又归于平静。

“我那时候真的想死的心都有，要不是我妈……”赵代富哽咽起来。母亲劝他出去走走，哪怕到镇上打打牌也会好点。但是老母亲自己却在半年后去世了，赵代富记得她是看着两个孩子的照片

断气的。后来，赵代富再婚，盖了新房，仍常在老房子周围转悠。赵代富的父亲在新房子里住了四五年，经常去孙子们曾经玩耍的地方看看，有次不小心从桥上摔下，也去世了。

赵代富家的小楼旁有个院子，里面养着兔子和狗。院门看上去有点年岁——赵代富说是老房子的卧室门。门后两行毛笔字清晰可辨：“肖学琴走后：代富放心不下一辈子。公元一九九四年六月初4日（即1994年7月12日）”。“怕写在本子上忘记了。”他说。

漂泊

肖学琴失踪后，肖家找了好几年。肖家兄妹一共六个，幺妹肖学萍一直挂念着三姐肖学琴，常做噩梦。她记得小时候经常“欺负”三姐，还到母亲那里“恶人先告状”，但是母亲“知道姐姐性子好，每次都护着她”。为了找寻亲人，兄妹几个外出打工，逢人便打听，肖学萍自己还差点被骗。

“你们为什么不去蒲三娃家看看呢？哪怕没有证据也去看看呢？我们在地下室关了一个星期啊！”肖学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直在旁边看手机的赵永勇冷不丁反问了一句，毫不掩饰怨意。

“一个星期哦……”肖学萍低头喃喃地说，过了一会，又说，“可是没有证据啊！”

赵永勇记得当天他和弟弟跟着母亲肖学琴逛街，在一处门市前，一个男人走过来跟肖说话，后来肖要进门市，赵永勇拉了拉母亲，说：“不认识的人家，不要进去。”但是母亲还是进去了，他就和弟弟在外面等。他记得刚开始还有人在屋里打牌，然后有人叫他们进屋，打牌的人也散了，有人把他和弟弟带到一个陌生的房间。

然后，兄弟俩目睹了最残忍的一幕，几个男人当着他们的面加害了母亲。因为恐惧，赵永勇和弟弟一直在哭，最后，他们趴在母亲身上，想摇醒她，但是母亲没有反应。

兄弟俩被一个男人带到地下室。赵永勇并不清楚母亲是否还活着，一边哭一边问那个男人母亲怎么样了。“他当时跟我说我妈回家了，我不信，又问了一句，他就打我。”被关在地下室的第二天，兄弟俩看见门上有两个窗户，没有玻璃，刚好门旁有一根长木棍。赵永勇便试着把木棍搭在门上，顺着木棍爬过窗户，但是赵永宽太小，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他记得自己一个人跑到院子里，正准备翻墙，就被

一个比自己大几岁的孩子拉了下来。

那个孩子是蒲三娃正在读初一的儿子，按照其之后的证言，一天放学回家后他从阳台上看见一个小孩在家中后院，便喊了声：“有个小孩跑出来了！”蒲随即将小孩带进屋内。

那几天，赵永勇总是迷迷糊糊地睡觉，又醒来。他记得一个男人拿出一张纸币，问他：“这是什么？”赵回答：“50块钱。”那人对同伙说，孩子清醒了，可以上路了。当天晚上，他们从后山离开。赵永勇记得，同行的共有四个大人、四个小孩。因为恐惧，他和弟弟一路上都很听话。

兄弟俩被人贩子带到福建莆田北高镇高洋村一个叫“阿和”的人家里。赵永宽很快被人抱走，在接下来的好些天，赵永勇每天被带到不同人家。他听不懂当地人说话，长大后，赵永勇才知道那时别人都嫌自己年龄太大，怕“养不熟”，最后，他成了当地农民徐金池的养子。直至2013年，兄弟俩再也没有见过面。

徐金池有两个女儿，都比赵永勇小。在徐家第一年，赵永勇没出过门，他要负责全家的一日三餐，照顾上百只鸭子。徐家当时很穷，赵永勇常常吃不饱，有时在家偷吃，被发现后就是一顿毒打。他记得打得最厉害的两次：一次徐金池用大棍子直接“砍”他的腰，还有一次用绳子将他绑在厕所。

回老家后，赵永勇跟父亲提起过这段遭遇，赵代富告诉记者：“那时候他们不让他多吃。有一次他在院子里喂鸭子，就偷偷抽掉墙上几块砖，墙倒下来，砸死了几只。他肚子太饿了啊，想搞点肉吃，没想到挨了一顿打，那打得厉害哦！”

一年后，赵永勇开始上学，登记的名字是“徐扬”。后来，一些人告诉他，养父买他回来是为了做女婿，但他觉得自己只是徐家的苦力。每天上学的同时，他还要负责一家人的三餐，要干农活、喂鸭子。偶尔听养父母说起人贩子曾在他衣服上写了“四川”两个字，但也没有更多信息。

他曾听人提到邻村有个小孩跟自己长得很像，赵永勇猜测可能是弟弟，还去找过，但没有找到。他渐渐知道村里很多人家都买了小孩，大家对这类事情讳莫如深。在赵永勇看来，养父就像仇人，他们之间很少说话。他知道一些老人对徐金池说：这个孩子长大后，肯定会跑的。

这样的“讳莫如深”大抵可以从赵永宽的经历中看见端倪：他最初以7500元被同村一户徐姓人家



1

1. 赵永勇站在四川家乡的石桥上，这曾是他上学时的必经之处。为了不让自己忘记，他曾将小桥画在纸上

2. 如今，蒲三娃家的门市虽已出租给别人，但房子结构没变，“地下室”还在，赵家兄弟俩当年就被关在其中一间

3. 在箭口垭村赵家老房子所在的位置，一户人家盖起了小楼

买走，那户人家有三个女儿，正想要一个儿子。过了一年左右，对方嫌赵永宽过于调皮，还经常逃跑，便委托同村一位村民将其转卖。1995年底，另一个镇上的吴姓人家通过同村“阿春”介绍，以8000元从徐某某那里买了赵永宽当孙子。在这笔交易中，徐姓人家说自己拿到了5000元钱。而1995年，福建省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不到1300元。

因案发时年纪尚小，赵永勇只记得自己小名叫“永勇”，不确定自己姓“赵”还是“超”。这个姓，母亲教他练过很多次——走字旁，右上方一个“月”，下面一个“口”。

慢慢地，他开始学会用“徐扬”的身份生活。他说自己没有心思学习，但在所有科目里，他最喜欢美术，喜欢画画。五年级之后，徐金池便没有让他继续读书。徐扬在家待了一年，仍然每天干活。

春节时，几个老乡从广东回来，他们在那边做玉石雕刻的生意。“过年时他们就带了几件回来做，我就看见了。”徐扬说。

他看老乡们作画，观察他们如何将画刻在玉石上，心想：机会来了！年后，徐扬便跟着老乡到广东当起了学徒，同去的还有养父的一个女儿和另一位亲戚的孩子。学徒是没有工资的，还要交学费、购买机器设备，养父帮他交了这笔钱。

想来有点奇怪的是，在福建的时候，徐扬并不怎么做梦。但到了广东，他反而时常做噩梦，梦见小时候母亲被害的场景。每次梦醒后，他就想，“一定要找到那几个人！”但在这之前，先把手艺学成。

学徒的生活从早上7点多开始。先学画画，再学雕刻，中午休息两小时，再工作到晚上11点。徐扬记得当年被拐的时候，人贩子们带着他坐火车；



2



3

玉石铺对面就是火车站，这让他反感。

一年后，徐扬雕刻的玉石小件，每天能帮铺子挣100块钱。那时候他做的翡翠小件每个加工费是10块到20块钱，而其他学徒只能达到3块到5块钱一个。他决定出来单干。

但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徐扬一度连房租都交不起。他记得自己饿晕过几次，醒来后接着喝自来水充饥。后来，几个朋友帮他介绍了客户，他的生活才慢慢好转。2008年，徐扬搬到广州四会，开始尝试加工翡翠大件，每件加工费一两百块。经济条件好转时，他开始有意识地在一些城市转悠，寻找家乡的影子。

徐扬被拐的时候只有8岁，家乡的记忆早已被冲淡，但他记得小时候吃过腊肉和香肠。这隐约成了一条线索，徐扬循着这些风俗来到一些南方城市，

试图寻找与记忆相吻合的蛛丝马迹。虽然他知道莆田有很多从四川买过去的孩子，也听养父母无意中提起人贩子在他衣服上写下“四川”两个字，但并不清楚来龙去脉。

2010年，徐扬收了两个四川学徒，春节时他到学徒家吃饭，对方做了腊肉和凉拌折耳根，他终于尝到了和小时一模一样的味道。一瞬间，他确定，自己来自四川。

寻家

2012年3月底，公益寻亲网站“宝贝回家”志愿者“老中医坐堂”（下称“老中医”）接到任务：一个叫徐扬的年轻人称小时候与弟弟被人贩子拐卖到福建莆田，家乡可能在四川。在徐扬的寻亲描述中，他不确定母亲是否还在人世，而他被拐时的“药针”和杀戮，则让志愿者们震惊。

徐扬将身份证连同十几页日记和四张铅笔画拍好照片发给老中医——为了不忘记，他在五年级时开始写日记，记下对家乡的记忆和对亲人们的思念。当十五六岁到广东学玉雕时，徐扬开始用铅笔在纸上画下家乡的风景风俗：人们在家门前玩龙灯，家后面有鱼塘和竹林，上学路上必经一座小小的石板桥……

他也画下了案发当天看到的细节——第一个场景，母亲披散着头发被摁在桌子下，旁边录音机里的音乐“很大声”，一个“坏人”举着“药针（注射器）”扎在母亲头部，他和弟弟在一旁哭，屋里还站着两三个“坏人”；第二个场景，母亲还是趴着，音乐仍然“很大声”，一个“坏人”举着短刀刺向母亲背部，他和弟弟吓得坐在地上哭。

这些日记和画仍作为证物保存在开江县公安局。日记第一页，贴着徐扬从小到大的五张照片。这些是养母带他去照的，他把照片偷偷藏了几张。他记得弟弟小名的发音，也写在日记上——“框框（即宽宽）”。

2012年5月17日，徐扬登上了从广州开往成都的列车。在接下来的10天里，“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们帮他安排了密集的行程：验DNA，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文章刊出后，一些热心读者及时反映相似情况，志愿者们又陪他到处寻访，只是每次都失望而归。

转折来自“挖坑取火”的习俗。徐扬跟老中医

提起，小时候，大人们会在堂屋中间挖坑，架上柴火，一边烧水一边取暖。这时，有志愿者提出，挖坑取火是达州一带的风俗。据此，志愿者们拟出一条此行路线。“柏高（音）”这个发音一直在徐扬心中挥之不去，他记得小时候母亲经常带自己去“柏高街”买东西。而达州刚好有一个“碑高乡”。

经志愿者多方询问，碑高乡确有一户人家，多年前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离家。徐扬和志愿者们一同前往，但那户人家的亲戚告诉他们，两个孩子离开的时候都已经十几岁了。显然，这次又不是。在回去的车上，徐扬哭了。

9月4日，志愿者“达州背二哥”（下称“背二哥”）联系上福建电视台，对方提出让徐扬回福州，由电视台出面帮忙联系当地公安部门，争取从“阿和”那里入手倒查，先把失踪的弟弟找到。次日，徐扬动身去福建。

9月5日，背二哥从永兴镇一位叫肖时英的村民那里得到消息，永兴镇箭口垭村一户赵姓人家多年前母子三人失踪。永兴派出所证实了这个消息，经志愿者们比对，徐扬记忆中的很多细节都与赵家相对应。

徐扬对这一切尚不知情，他在福建找到养父徐金池，打听阿和住处。但徐金池言语躲闪，说自己连对方叫“阿胡”还是“阿和”都记不清楚了。村民们说阿和住在另一个村子，时间过去太久，他们也不知道具体住在哪里。

彼时，赵代富正在广州打工。砌一个电梯间时，他就在想：“做完这个就回家。”当天，他接到50多通电话，亲戚朋友们告诉他：“永勇回来了！”向来节俭的赵代富立即坐着飞机赶回家。

提供线索的人

第一个提供赵家线索的人叫肖时英，永兴镇龙头桥村人，也是两个男孩的母亲。2001年，蒲三娃被判刑9年，涉及两起儿童拐卖案，其中一个就是肖时英的大儿子王锡勇——1987年出生，1993年失踪。当年，肖和丈夫分别在江苏和广东打工，孩子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在永兴镇小学读大班。10月的一天，王锡勇中午放学后便没再回家。

2012年9月初，达州当地一家报纸登出“永勇”的寻亲文章，一直苦寻孩子的肖时英拨通了记者电话，几番询问，双方意识到“永勇”可能是当地一

户赵家的孩子。

王锡勇失踪后，肖时英夫妇四处寻找，也报了案，一直没有线索。她当时并没有怀疑蒲三娃。她所在的龙头桥村离镇上很近，步行不到10分钟，孩子放学回家会经过蒲家门口。她记得蒲三娃以前在税务局做过临时工，见过他在一些摊位上收税，后来好像又开了饭店。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95年。那一年，肖时英收到一个叫熊运奎的男人写的“交代书”，信上交了熊本人与同镇蒲际建（即蒲三娃）、郑智现拐卖了王锡勇。贩卖无果后，他们将王锡勇带回开江县，熊向蒲三娃提议放了孩子，但蒲威胁他：“你要放回去的话，我就把孩子杀了，把你也一起杀了。”肖时英很快将这封信交给了开江县公安局。后来，她听说蒲、熊、郑三人打了一架。“好像是他（郑智现）黑了钱，说是被小偷偷走了。”肖时英说。

在当年的判决书上，关于王锡勇的拐卖案件，案犯共三人：蒲际建、郑智现和熊运奎。蒲将王锡勇骗至家中，找熊运奎一起将王带至福建石狮准备卖掉，但对方觉得小孩年龄太大，拐卖未遂，后又带至河南，仍贩卖无果，只能将王带回开江。熊运奎提议放了王锡勇，但蒲不听，后由熊联系同镇的郑智现，蒲与郑抛开熊，将王锡勇带至达县火车站出卖。

1995年，熊运奎投案自首。审问后，他还供述了参与另一起贩卖婴儿的犯罪事实。当年这起案件，被告人除三人外，另有几人，且涉及开江县邻县——宣汉县的拐卖儿童案件。

判决书中还提到，1995年1月20日前的一段时间，蒲际建（蒲三娃）曾因拐卖儿童被开江县公安局收容审查，后解除收审。

肖时英记得，就在王锡勇失踪后一年多，蒲三娃因盗窃烟草公司的香烟被拘留，当时县公安局还通知她去协助调查，因脚受伤，王锡勇的爷爷代她前去。回来后，老人家说公安局好像掌握了一点孩子的消息，当时家里还高兴了一阵。但是没多久，蒲三娃被释放，很快外出打工。

肖时英多次向公安局询问王锡勇的下落，对方说孩子在达县火车站被卖后便不知去向，并建议她和丈夫外出打工。“说如果我们在家，他们（人贩子）就不敢回来，我们出去，等他们回来后再一网打尽。每次都说让我们安心打工，说有消息会通知我们的。”肖时英回忆。

2000年6月6日，蒲三娃被浙江省慈溪市公安局抓获，后以“拐卖儿童罪”被判9年。2008年，蒲三娃服刑8年后出狱。赵永勇的姑父张玉鳌2006年尚在永兴司法所工作，在一次刑满释放犯安置帮教工作中，一个当年与蒲三娃一起拐卖儿童的同案犯告诉他，肖学琴的尸体就埋在蒲家菜地里。张立马到永兴派出所报案，但警方并未展开调查，张玉鳌也没有将这个信息告诉赵代富。“为什么不告诉他呢？”记者问。电话那头的张玉鳌顿了一下，说：“我们两家那时候关系不好。”

蒲三娃刑满释放后，在外打工的肖时英每年春节回家都打听他的情况。“找不到人，躲起来了。”她说。2011年国庆节，她回家恰巧看见了蒲三娃。她跟对方打听孩子的下落，又说了很多好话，并承诺如果帮忙找到孩子，不仅路费她出，事成后会支付5000块钱。蒲三娃推说孩子是由郑智现转卖的，自己并不清楚；肖时英又给郑智现打电话，回答也是“不清楚（王锡勇）在哪里”。

2013年，在询问县公安局无果后，肖时英自己去了趟福建莆田，成了莆田市公安局和法院的常客，但没有等到她想要的结果。后在志愿者们的帮助下，她到开江县公安局做了亲子鉴定，最终找到了王锡勇。

回家

2012年9月的一天，细雨绵绵，路上行人不多。但永兴镇箭口垭村的一处入口人头攒动，人们准备了鞭炮和鲜花，打出横幅“欢迎宝贝赵永勇回家”，在场的电视台记者们将镜头对准站在横幅中间的男人——赵代富，他激动地准备迎接18年前被拐卖的大儿子赵永勇回家。

此时的赵永勇正坐在一辆赶往永兴镇的车上，对这一切并不知情。当天，志愿者们希望给他一个惊喜。但在此之前，他们要先带赵永勇去见一个人。

汽车在离永兴镇街道270号不远处停下，那里已经是一家自行车修理铺。住宅看上去是个平房，有三个门市。志愿者背二哥领着赵永勇走向修理铺，另外三四个志愿者留在车上。随行的还有一位记者，摄像机开着。

一个男人站在铺子门外，看上去五六十岁，有点苍老。此前，背二哥打听到赵永勇被拐可能与这里有前科的人贩子蒲三娃有关，他在心里比对着知情者提供的信息：个子不高，有一只眼睛看上去

是闭着的。眼前的人就是。他悄悄问一旁的赵永勇：“是不是他？”赵虽然有些害怕，但很快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从8岁开始，他就再也没有忘记过这张脸。

背二哥也有点紧张，他试探地朝蒲三娃的眼睛望去，对方迅速移开目光。当时四川多家媒体报道了赵永勇寻家的故事，背二哥猜测，蒲听到了风声，有点慌。

背二哥领着赵永勇迈进铺子，他想让赵看看这是否就是当年的案发现场。蒲三娃没有说话，也没有阻拦。穿过门市，二人来到阳台，阳台下是100平方米左右的一片菜地，周围是两米多高的围墙。他们继续往地下室走，这一层也是5个房间，23年前，赵永勇和弟弟就被关在其中一间。

两人很快出来。“不超过两分钟。”背二哥说。自始至终，蒲都没有说话。

回到车上，背二哥告诉赵永勇：“家找到了。”赵永勇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

人们在箭口垭村的一处路口拥作一团。赵永勇下车，没走几步，他就认出了站在横幅下的父亲。他低头，一直流泪。人群中有人很快认出了他，亲戚们上前塞给他一捧鲜花，乡亲们一路放着鞭炮，媒体的镜头热切地记录着这一幕。赵代富有点不太适应这种场面，他搂着儿子的肩，不知该说些什么。有人指着赵代富问赵永勇：“知道他是谁吗？”赵永勇这才抬头，说了句：“认识，爸。”赵代富抹了把眼泪。

一直到这时，赵永勇还是不太确信自己回家了。他看着家里的房子，说：“这不是我家。”父亲解释这是新盖的房子，老屋好多年前拆掉了。赵代富拿出当年全家的照片给赵永勇看，赵永勇一点点和父亲核实记忆中的细节：你是不是以前经常穿西服？爷爷喜欢编竹篮？老房子后面有两个鱼塘……之后，他才确信自己真的回家了。

当天下午，父子一起去开江县公安局报案，并很快做了亲子鉴定。赵永勇记得，报案半年后，

回到车上，背二哥告诉赵永勇：“家找到了。”赵永勇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



5月是农忙时节，箭口垭村的村民们正忙着犁田插秧。据说，当年人贩子将孩子拐出永兴镇时，就是翻过了不远处的一座山

2013年2月，在开江县公安局以及幺姑赵代凤等人的陪同下，他到福建寻找线索。警方让徐金池帮忙找寻阿和的家，这次，徐很快找到了。

阿和交代了拐卖经过，证实了赵永勇的说法。警方意外得知阿和的妻子易某某也是四川省开江县人，20多年前，郑智现将其拐卖至莆田，卖给阿和为妻，翌年产下一子后，便安心生活。易某某证实，1994年7月，在她坐月子期间，郑智现带了两个小男孩过来联系买主，其中一个六七岁的男孩还跑到她的卧室里，她听男孩说的是四川话。这次，警方回开江后直接找到蒲三娃家，蒲很快承认了罪行，其胞弟廖定杰（小时候被廖家抱养）也很快被抓获，郑智现另案处理。

根据案卷里蒲际建和廖定杰的供述，1994年7月初，二人在蒲家商量“弄小孩出去卖”，但因“小孩不好找”，蒲提出“看到有大人带小孩的，将大人杀了，再把小孩带出去卖”。

几天后恰逢永兴街赶场，二人便在蒲家门口搜寻目标，不久盯上了肖学琴母子三人。蒲上前与肖搭讪，假称请肖帮忙带一封信给村里一位熟人。肖

便跟着蒲进了家门，穿过堂屋来到蒲三娃卧室。后来，两个孩子也跟着跑了进来。

卧室里，蒲将录音机的声音开得很大，对廖喊了声：“还不动手！”随即卡住肖的脖子将其按倒在地，肖边挣扎边喊：“打死人了！”廖上前按住肖的手脚，蒲从席子下面抽出一把匕首，朝肖背部捅了两刀，肖“就没怎么动弹了”。但在他们的供述中，没有出现令赵永勇印象深刻的“药针”。

蒲三娃随后将两个孩子关到地下室。他回到卧室时，廖正用柴刀肢解肖的尸体，蒲找来塑料纸、尼龙袋和电线等，将尸块包裹成三包后提到楼梯间。二人将卧室地板上的血迹打扫完，到街上吃了午饭，饭后买了两瓶花露水洒在卧室里。其间看见一个小女孩跑到菜地里试图翻墙，蒲将其捉了回去并叫廖负责看守。翌日，二人在菜地里挖了三个坑将尸块埋了。

为了不让孩子们吵闹，蒲、廖二人将安眠药混进饭里给孩子们吃。六七天后，蒲、廖和郑智现带着孩子们坐火车到福建莆田的阿和家，由阿和帮忙联系买主。

2008年刑满释放回家后，蒲三娃从后院挖出当

年埋下的两袋尸块（另一袋没有找到），架好柴火，将尸块浇上汽油烧了，没有烧完的骨骼被扔在厕所旁边。

2013年2月，蒲被公安机关抓获，随后指认了犯罪现场。警方在蒲家后院的厕所附近挖掘出焚烧过的木炭块22块、骨块16块，并在阳台柱头附近挖出一个编织袋，经展开清理后，确认为人体双下肢骨骼。

就在蒲三娃指认完现场出来，准备上警车时，赵代富揣着一把刀直直地冲向他，中途被几个公安拦住了。

之后，赵永宽也很快被找到。他当时正在北京打工，幸运的是，那户人家对他很好，渐渐培养了感情。被拐前的很多事情他都不记得了，但知道自己有个哥哥，也知道母亲遇害。

2014年8月，经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蒲际建被判死刑，廖定杰判处无期徒刑。原告人除了赵永勇和赵永宽，还有肖学琴的父亲肖启祥。法院判决的赔偿金共5万元出头，由蒲际建赔偿60%，廖定杰赔偿40%。后赵家上诉，提出近50万元赔偿金额，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定“不予支持”。截至记者采访时，赵家只收到蒲际建赔偿的3万多元。

回家之后

采访的第三天，赵代富让赵代余帮忙用三轮车载着记者和摄影师到镇上，平时，赵代余除了用车接送孙子上下学，也会接一些载客的活儿。下车后，赵永勇给了“车费”。“我爸说家里人不用给，但我每次都还是会给。”赵永勇说。

2015年，媒体对赵永勇和赵永宽做了一次回访。两年后，父子三人似乎又过回各自的生活。去年，徐扬的户口迁回老家，身份证上的名字终于变回“赵永勇”。

在家人口中，兄弟俩的性格与电视中展现的不太一样。赵永勇的幺姑赵代凤告诉记者，自2012年认亲后，赵永勇每年都会回家，只是不大出门，不喜欢与人交流。赵永宽虽不常回来，但每隔十天半个月就会和父亲通电话，也常和幺姨肖学萍微信联系。本次采访中，记者和肖学萍、赵永勇坐在一起聊天，肖学萍说到前几天赵永宽又打来电话，便问：“宽宽前几年打电话给你，你爸也打电话给你，你怎么都不接呢？”赵永勇没有接话。

据说，肖学琴的遗骨仍保存在开江县公安局。赵永勇在2015年接受采访时说，因为后妈不同意将肖的遗骨葬入祖坟，所以他一直未将母亲的遗骨取回。但在本次采访中，赵代富告诉记者，按照开江风俗，只要不是在家中过世的人，其遗体、骨灰或遗骨均不能入宅，应直接入土安葬。他和妻子从未反对将肖的遗骨葬在祖坟。赵代凤记得，赵永勇当时的想法是按照福建那边的风俗，将母亲的遗骨供奉在家。“在我们这里，是犯忌讳的。”

公安局催过赵家几次，让他们将遗骨接回来。但赔偿金始终没有全部到位，赵家怕接回后更没有着落。记者询问准备何时将遗骨接回，赵代富说要看兄弟俩的意思。“按照这里的风俗，需要他们一起（将母亲）接回来。”

志愿者老中医告诉记者，有些时候其实不太愿意接受媒体采访，也不太希望寻亲的孩子们总生活在媒体的关注中。“实际上，让他们真正回归社会和家庭，我们还远远做得不够，也没办法帮助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回归家庭，我从内心希望他们有正常人的隐私和生活，不受到外界过多的干扰。”

媒体报道后，赵永勇的生活确实一度不平静。不仅关心和鼓励扑面而来，“桃花”也接踵而至，前后几个女孩找到他，说想做他的女朋友。上海一位商人，将赵永勇留在公司，带他看各种展览，认识玉石制作的同行，甚至介绍其去看心理医生。一周后，赵永勇离开了。

采访时，肖学萍提到前两天赵永宽跟她联系，还拜托她“多跟哥哥通话”，也建议“可以去看看心理医生”。“他就觉得可能小时候的事情对哥哥有影响。”肖学萍说。

“考虑过去看心理医生吗？”记者问。

赵永勇笑了笑：“我没病啊！为什么要去？”

这两年，不断有影视传媒公司找到赵永勇，“光北京就有三家”。采访第三天，他又接到一个类似电话，对方称现在的寻亲类电影更多聚焦于亲情，她想让更多人注意到犯罪本身。

赵永勇与天津一家影视传媒公司签了独家合作协议，并约好在开江先拍摄一些素材，只是拍摄时间一再延后，他在家等了半个多月。当初，这家公司是通过张玉鳌找到赵永勇的，这次他们又托张劝赵永勇在家多留几日，张让妻子赵代凤给赵永勇打了电话。记者离开的第二天，赵永勇坐车回广东了，他说那边的生意还得继续。☑



日本奈良县葛城当麻寺一景

奈良若只如初见

文 / 唐克扬

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是“到日本去看古中国”。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点爆了这种双重远方的想象，空间的、时间的远方……好像但凡是在日本取景，银幕中的人物立刻就“唐朝”了，好像一朝穿越到了古都，就得是背倚金碧山水，出入烟花乱丛之中了。

然而，京都和奈良并不能等同于洛阳和长安，掐头去尾的城市也并不就是真正的“古都”吧。仅看一眼电影剧照，唐风习染的古代庙宇确能催发一种“回到过去”的文艺感性。然而，待得更长的人，也许会发现另一个更久远的奈良。若真想看古都而不仅是古建，城市真正的“最初”没剩多少，比如奈良的平城宫，也就是和铜元年（708年），由元明天皇下达诏令，花了一年半就建成迁入的“平城京”的主体部分，业已湮没在现代城郊的荒草中了。

“剩下的”又注定是孤立的。就算是片段尚存，最初的城市脉络久已漫漶不清，今日奈良那些最著名的古迹——存有世界上最早木结构的法隆寺，见证了中日早期交流的唐招提寺，以及有号称“最美佛塔”的药师寺、旅游者必去的东大寺……反而是在昔日城市的外围了，分别是今天奈良的西郊、南郊和东郊，它们常常是在乡野的环境中，错落在无名的水田和树篱之间。对于大量寻求“异邦”（heterotopia）体验的善男善女，诱得他们千里迢迢去到东瀛的，最好是“活物”而不是“死物”——比如东大寺的门前散走于林间花下的梅花鹿。这一切提醒着我们，能够发生当代意义的那一部分“古代”反而常是被持续使用更新的场所，其间发生的空间转换不可避免，中心和边缘往往位置倒错，而后来居上的例子屡见不鲜。

无论如何，要一座历史城市满满都是“历史”可能太奢侈了，要知道回过神的“历史保护”不过是吃饱了饭的“现代”之后的事情，洋风大盛的东亚城市的近代史尤其如此——在现实中，要最终抵达明信片式的古老场景，首先必须搞明白它们的现代语境。比如我，虽然从书上熟读了此地的过去，首先记住的却是奈良的两个火车站，火车站进，火

车站出，城市最早的方位感已经摸不着了。其中的JR奈良站，竟成了我几天奈良游最重要的生活节点。不用出站，就可以通过连廊走到旅馆，将行李塞进狭窄的混凝土盒子，楼下的便利店购买旅行必需品，附近的观光中心取阅相关资讯……然后，才是蓦然立在闹市里的红绿灯下，向东拐去往兴福寺的三条大路，走上一条让你疑惑是否走错地方的访古之路——没错，通往真正古代的道路最多是“仿古”的，它的包装纵然精致，却与古都无关，街上的导购员可以轮番说日语、英语和中文，你将被他们招徕个千遍百回……这些在世界各地都似曾相识的场面，多少叨扰了一个人的唐朝梦境，如果不是彻底将它们摧毁了的话。

不管剖面多么古老，以火车站为重心的城市基础结构早已更“新”了，不仅在JR线上也在其他地方，代表现代速度的生活隆隆地驶过，并无古老时间里的滞怠或犹疑。这明显和布鲁日、威尼斯、横店不同——眼睛所及之处，后者刻意将现代赶得远远的，营造了全面、立体的古代，宛如真正的电影场景，向络绎不绝购票前往的旅游者脱帽致意，奈良却有相当的部分属于当代。就在另一座火车站附近，日本的建筑大师矶崎新设计了一座现代风格的奈良会馆，它有着一般水泥盒子不具备的优美曲线和平面、结构特征，你若说它勉强只是“会意”的古代也未尝不可，因为从丹下健三等一批战后建筑师开始，日本人已经这样向传统致意了：富于塑性的混凝土可以模仿出木构轮廓中婉转的“生起”或“收分”，就像庞贝的火山灰壳子里浇筑了古代曾有过的形体，阔大的屋顶和台基象征着“上宇下栋”——但这种与古为新的致意和布鲁日、威尼斯将自己彻底“旅游地化”的做法判然有别：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矶崎新的作品是用那时方兴未艾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工具渲染出来的，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最终收藏了矶崎新的这幅“建筑绘画”。

对我这样一个外来者，几乎没法知道什么时候奈良就变成这么“新”的，显然不是一朝一日。西

方研究者敏感地注意到，日本建筑师对于日本传统的真正重视，并不是在他们的西式城市兴起的阶段而是在“二战”以后，所以他们返回自己的“原点”的时间并不比我们早多少。同我们一样，日本建筑发源于极端实用的文化转型之中，在那时，在明治维新的洋式建筑风潮里，现代日本建筑的使命和日本的传统都市缺乏急迫的联系，甚至，对于“旧”城市慢慢滋生的自信心还要靠“新”建筑的大获成功来反向积累。在奈良，同为国宝的东大寺和唐招提寺金堂都经过好几次现代式样的大修，在100多年以前，刚刚登上近代化之路的日本人，毫不犹豫地将在古代结构中的“冗材”去除，添加更具效率的三角钢铁桁架，原因是传统技术达不到维修的要求，只是到近一个世纪后，“修旧如旧”的愿景才回到志满意得的大匠的视野中……但是都“旧”了也不见得就是“历史”，你到整洁如初的法隆寺金堂应约访古，可能拂拭不出什么时间的灰尘，因为人家修复的活儿干得太利索了，以至于“如此旧的也是这么新”。

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让历史城市的语境并不如名建筑的古风外表那般受重视，老旧的东西最终只是种语焉不详的“感受”。在学习西方的初期，日本留德、留英和留美的学生当然要学习所在国的语言，直至1915年，日本大学建筑学科的毕业生仍需要以英语写作毕业论文。但是从一开始，外国教育家就发现，日本建筑师对于反映建筑原初逻辑的“文法”存在某种程度的忽视，觉得它们是第二层面的东西，是工具而非建筑学的核心，日本现代建筑教育的草创者，英国人康德尔就警告他的学生们，不要借鉴日本抄袭的那些二手欧洲建筑，因为尺度、功能、光线、温度等等只有通过原境“直观”的感受才能学习，但英语急剧退化的日本学生似乎很快忘了这事。现代日语更是将外来词转音吸收在日语词汇中，山寨成功的同时，客观上也就削弱了对“翻译”过程中“转义”的重视，更不细究“原文”。于是，表面上超级耐心的建筑细节的实录，会一下子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极度发散的“感受”——从“与古为新”，变成“与古为徒”了。谷崎润一郎著名的《阴翳礼赞》的“礼赞”，也是向传统的“致意”，本质上是点状的“评估”（appraisal）而非社会全景式的研究，更谈不上是有所取舍的“批判性”写作（critical writing）。

不难理解，这样的历史“是出发点而非回归点”

（篠原一男）。难怪真正的古代奈良（平城京）早让呼啸的JR线拦腰穿过了，这一切甚至也发生在关野贞等人开始发掘平城宫之后——出发者，至少是在出发的一瞬间，来不及考虑将来再回来时看到的景象，高速铁路的速度和尺度下，艺伎款款穿越的招牌画面已经失效。在空旷无比的平城宫遗址上，我费了不少力气才找到入口，却发现没有什么值得流连的真正的遗迹，连建筑础石之类找到的都不多。荒芜的基地上一无所有，他们倒是动作麻利地修起了宫殿群最重要的建筑“大极殿”，是个全然人造的古迹——这，也颇有点像拆毁了城墙的北京城，又在它“中轴线”的南端修起来一座永定门，为的是让历史能够重新“看见”。

明信片中闪亮的地标，荒草里空荡荡的废宫，哪个才是真正的奈良？

就古都而言，着眼单体建筑而非城市文脉，恐怕也来自长久以来西方人对于东方情调（既包括狭义的东方，还有希腊、埃及等）的浓郁兴趣，后者倒回来促生了普通日本人对于建筑“自我”的一种重新定位。这种现象自从芝加哥博览会所复制的平等院凤凰堂以后就普遍存在——最终，那些“重点”的、“国宝”级别的建筑从它们的语境之中剥落出来，成了古代日本的象征。这样的象征多是诱惑眼睛的而不是经由头脑的，对于景点里森林般的相机镜头比较友好，但放在人海茫茫的现代闹市里就失去了作用。一个满心期待这样的奈良的人一旦真的来了，恐怕难以不感到一丝失望。

有趣的是，貌似比较“现代”的日本建筑师，反而超脱于明信片式的新旧情节，更感兴趣那些“看不见的城市”里的传统。在哈佛大学接受过建筑学训练的建筑师桢文彦，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讨论日本历史城市的“内部”。在他看来，只有把城市看成一个整体才会有“深入”的建筑问题，这个意义上那些无名的城市社区和著名的地标建筑一样有价值——另外，其实本来哪有什么“内部”？主要是不了解情况的“外人”倒回头看才有“内部”。

秋山国三和仲村研，日本著名的古都学者，详细讨论了构成“看不见的奈良”的基本单位：“町”。熟悉中国古代城市的人都知道，奈良的前身平城京和这以后发展为京都市的平安京，都积极地模仿了中国的古都比如长安和洛阳，它们的相似不仅在于命名，也在于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的手法。“町”的中国原型就是“里坊”，不过是街道的公共界面所围

合的城市街块的总称，所不同的是“町”的四面不设围墙，你在周边所看到的，和它沉默的内部所包裹的，构成了楨文彦所说的不一样的“内”和“外”的关系。即使不细究起源，“町”这个象形的汉字——“田”加“丁”——亦形象地说明了此类城市的结构建制：除了少量的高等级建筑和宫殿是事先布置，其他的方块街区是整齐划一地建立起来的。与隋唐两京的情况类似，平城京在初期建设的时候并无精细化的规划，分配宅地的原则不过是根据品级做了“一町”“半町”“四分之一町”的限制，下面就该听任官民“分地版筑”了——这样才能在短期内“建成”这座一共也没有超过100年试用期的国都。与同时期的欧洲小城市不同，东方城市的“町”和“坊”彼此相似大量繁殖，只能靠“一条、二条……”的名目区别，而不是依赖个体建筑物的不同坐落万千姿态，从而雕琢出更立体化的城市面貌。城市规划的这种“数目字化”是“看不见”的原因之一。

按说，这样的城市应该极端无趣才是。但是事实正好相反，没有经意设置的面向和形象，让这些平面相似的街区反而面貌纷异、变化多端。我们今天走过通往兴福寺的那条旅游街，只要在往南多走一会儿，就会穿过奈良最富于古都风貌的传统住区，

虽然街区尺寸类似，有的是围墙院落，有的是街面房屋，有的只是一泓古池塘、一围荒草……恰恰是这些说不上名字的“町”依稀散发出更浓郁的古意。虽然每个街区的地盘方正相似，唯独其中的地形高低起伏，巷曲纵横交错，园池星罗棋布，各个“町”的地况参差不齐，于是外围有时倒逼了内里，人工混杂着自然，通路和门禁带来了街区内外的不同境遇、纷繁各异的使用——在重复的基础上形成的变化，貌似雷同又永不能穷尽的市井繁华，出入之间“看得见”和“摸不着”的矛盾，大概是楨文彦所着迷的东方古都特有的都市学。

尤其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旅行者而言，这种都市学是撩拨起更多的好奇心的。它不是一般人可以接近的，因此永远不会被窥破；葱葱郁郁的幽晦处，反而是最接近古代气息的东西；看上一眼，恐怕没有什么可以记住，那种神秘的气氛却永不会忘却。对于日新月异的公共界面而言，“古代”也许早已消失，但是真正的奈良也许依然活在这种暧昧的深处——即使在那些外表已经很时髦的旅游街的后面。

只是，我每次又走回来这里，在为之吸引的同时，也总会对自己旅游者的身份感到下意识的困惑：我究竟应该驻足停留，还是很快地走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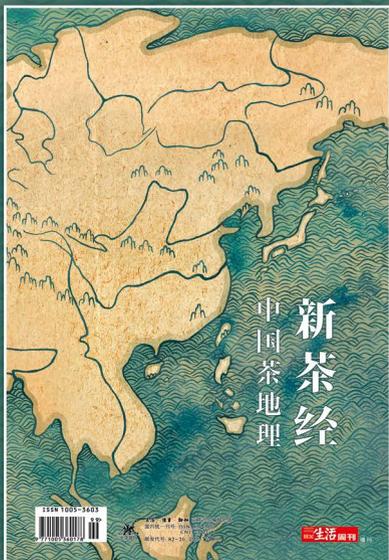
新茶经

中国茶地理

茶叶起源于中国，它原生于澜沧江畔的原始森林中，亿万年间一路向东迁徙，覆盖南中国的大部分省份。

一杯好茶，离不开地理、风土、气候、技艺的共同作用。《新茶经》以地理考察的方式讲述中国茶的故事。

历时七年，写作者十数人，足迹深入皖、浙、川、闽、滇、鄂、桂七省市，倾尽心力，无一篇不是亲自考察所得。



《三联生活周刊》天猫旗舰店



离尘不离城：如何构建生态之城？

文 / 程清

在经历了短暂的逃离后，知识精英们发现根本无法脱离城市实现生态。如何建立生态化的城市和社区，正在成为城市建设者的核心问题。

回到城市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 (Edward Glaeser) 是一位坚定的城市生态主义者。他在著作《城市的胜利中》讲述了一个故事。两个美国青年在康科德河边野炊，因粗心不慎引发了火灾，烧毁了 300 英亩的森林。但其中一名青年毫无悔意：“我是在森林里点了火，但我在那里没犯任何错误，现在看起来好像是闪电导致了这场火灾。” 这名青年就是被后世尊为环境主义先驱的梭罗，他的名著《瓦尔登湖》成为 20 世纪的畅销书，“被全球具有环保意识的中学教师用于教育孩子们”。

这一切在格莱泽看来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他在《波士顿环球报》上发表文章，题为《如果你热爱自然，就搬到城里来》。在他看来，人类是对自然有极大破

坏力的物种。如果人类热爱自然的话，最好的办法不是到自然中去，而是回到城市里。真正的生态主义不在乡村，而在城市。

在经历了短暂的逃离后，知识精英们发现根本无法脱离城市实现生态。

城市生活最大的魅力在于无穷的机会，任何人可以在大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生长空间。即使互联网构造了一个无所不能的虚拟世界，但也无法架空现实中的城市。就像互联网学者凯文·凯利所说的，互联网并非削弱了现实交流，而是大大增加了人们的交流，并把更多实际的交流带到了线下，因为人们发现通过交流能产生更多的创意。只有城市才能促进这种交流，让人们靠得更近，“城市是对流动的认可”。

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也是人类文明最灿烂的成就。但是今天，它们比以往更像是一个个黑洞。城市只占地球土地面积的 2%，在地球总表面积中，城市部分不到 1%，却用掉全世界资源的 75%，产生超过 70% 的碳排放。全球 744 个大城市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超过了世界所有森林吸收能力总和的 10%。

如何建立生态化的城市和社区，正在成为城市建设者的核心问题。



北京西南五环的卢沟桥畔，有一片5平方公里的土地，是距离市区最近的山地丘陵地带，这片区域有多个郊野休闲公园，以及河流、湿地和地热温泉，小白鹭、苍鹭、绿头鸭、斑嘴鸭、长嘴剑鸫等多种野生鸟类在此栖居、越冬或中转。

这样一块距离繁华的CBD区域不到30公里车程的土地，被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寄予了更多期望，将其命名为“长辛店生态城”。人们希望这座“新城”以现代生态技术为手段，设计、组织城市社区内外的空间环境，最高效、最少量地使用资源和能源，营造一种自然、健康、舒适的聚居环境，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模式。

在实际规划中，从环境、资源、社会、经济四个纬度，针对长辛店生态城区域内土地、交通、能源、水资源、废弃物等发展策略提出19项可量化、可持续发展指标，是全国首次将生态指标纳入的城市规划。

这一规划在2013年《北京市发展绿色建筑推动生态城市建设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次年，成为国家住建部评选的“绿色生态示范城区项目”。在得到更高层面的认可之后，经过三年的投入与发展，这座生态之城已日渐成型。

把“生态城”理解为在规划图的某些版位填上绿色，以实现绿化达标的观念，在中国依然很普遍。但“生态城”不只意味着“绿色”，它更多的是对一个城市经济、规划、执政能力的综合考验。在这个意义上，长辛店生态城是城市管理者对美好生活的觉醒。

毕竟，一个符合生态规律的生态城市，要有适度的人口密度，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完善的基础设施，有效的自然保护制度，资源优化配置、利用、更新、协调的方案，这些都需要在城市管理层面上进行考量与协调。

就北京这座城市而言，秋冬天的雾霾已经不再单纯地作为生态事件，而是进入政治议事空间，成为影响舆论的力量。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社会发展模式，不再能满足现在城市发展需求。既然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完整的存在，不可能先“污染”而后治理，为什么作为生活容器的城市能容忍“先污染后治理”？

长辛店生态城，为北京这座城市增加了生态城市的新选项。它有别于过去人们评判是否满足自身需求的核心价值。它定义了一种未来的生活方式，如何将城市、生活与生态统一起来。居住生态是城市空间的细化和延续，我们选择的居住生态直接表达的是我们支持的生活方式和城市面貌，而城市的面貌将长久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品质和身心状态。

城市的生态主义

城市化带来的好处让人类乐此不疲，并且有能力为自己制造舒适。在技术的推动下，门窗的密闭性开始越来越好，保温材料的使用越来越普遍，照明、通风、取暖、制冷、加湿、加负离子等设施的功能日趋完善。

对生活品质的追求集中体现在了居住上，人们呼吸由居所预先“呼吸”过的空气，接受它提供的温度和湿度，也被迫接受在这个充满化纤地毯、化学涂料等人工制品的温暖躯壳中生长的大量化学分子、放射物质、微生物和病菌病毒。在这之后人们开始了下一个阶段：对环境要求要环保、节能、健康。

就像一架巨型的机器，城市需要从自然世界不断提取物质，以获得维持城市和消费者生活方式所需的资源和物产。在消耗大量能源后，排放出数量巨大的固体、液体和气体废物。钢筋水泥的城市虽然远离山林原野，事实上，今天的城市居民比以往任何年代都更加依赖大自然的供给：从住房、消费、娱乐到交通运输等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土地和生态系统。

“城市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正如我们许多人通过自身的经验所看到的一样，城市的道路有时会通向地狱。城市可能会获胜，但居住在城市里的市民似乎往往会遭遇失败。”格莱泽说，“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伴随着工业时代的结束，20世纪后半期带给他

们的并不是城市的辉煌显赫，而是城市的污秽肮脏。我们如何更好地吸取城市带给我们的教训将决定我们的城市人群能否在一个可以称为新的城市黄金时代里实现繁荣发展。”

随着近几十年来地区性环境污染和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加剧，面对人为的各项资源利用对环境所造成的冲击，许多规划者致力于将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观念纳入规划理念之中。“生态城市”这一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计划研究过程中正式提出。1987年，苏联生态学家杨尼斯基提出生态城是一种理想城模式，其中技术与自然充分融合，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而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得到最大限度地保护。随即，世界各国产生了生态城市、生态社区、生态村等一连串的规划理念，并走向实践。他们的目标，是为了设计出满足居民需求又不破坏生态环境的绿色社区。

最初国外学者对生态社区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生态建筑本身。上世纪90年代，以梅尔·希尔曼、纽曼、肯沃西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开始从城市的空间形态研究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他们受欧洲传统城市高密度发展模式的启发，针对美国城市郊区化、分散化发展所带来的交通、环境、社会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紧凑型城市才能发展生态社区的理论，认为未来社区应该强调土地混合使用、较高居住密度、交通友好，以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北欧是绿色生态理念技术发展较早也较为先进的国家。以瑞典为例，哈默比湖城作为北欧的环保样本，于1995正式启动。哈默比湖城的发展目标是一座自循环的环保新城，最大限度地将其自身的耗费转化为动力，不去消耗额外的能源，以最低限度地控制碳的排放。如今，这座可以容纳数万人生活其中的社区，50%的动力来自于处理废水和垃圾的转换，其他则来自于铺在屋顶的太阳能电池板。有了这样清洁的能源系统，哈默比确保了低碳排放量。而瑞典马尔默，也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重工业基地到“零排放”社区的“华丽转身”，同样实现了百分之百当地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1995年开始建设的荷兰雨果太阳城可持续发展滨水生态小镇规划，现已成为荷兰建筑高等教育的示范教材。雨果低地太阳城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尊重地块肌理、复合功能社区、大面积生态绿化等方面都值得借鉴。在技术方面，雨果太阳城着重解决了太阳能

光伏发电系统以及太阳能设备和建筑的一体化设计，另外在水资源利用方面，实现了水体自净循环系统和雨水的生态排放、综合利用。

各类“生态城”实践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和路径可循，但都推动了城市生态主义的诞生，即生态城市是和节能、可持续发展等绿色环保理念结合在一起的，它的终极目标，是协调现代城市经济系统与生物的关系，保护与合理利用一切自然资源与能源，提高人类对城市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修复、维持和发展的能力，并由此衍生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平等相待、和谐共处、可持续生活的精神信条。

北京版生态城

如果跳出已有的发展模式，我们看到时代正酝酿着一次新的发展范式变革：相关的知识和技术已然具备，需要的是对未来可持续生活方式的坚持，将精神追求重新融入生活。

北京金隅房地产业常务副总经理陈玉谦向我描述了长辛店生态城的居住体验：一条小溪环绕着社区，溪畔树叶与野花相映成趣；一座木桥横跨两岸，从桥上走过，见桥下流水潺潺，落英缤纷；清晨，鸟儿们的歌声将你唤醒，夜晚，蝉儿及蛙鸣伴你入眠；工作结束后，穿过树林回到社区的途中，野鸭、天鹅等野生动物自由自在地穿梭在周围；地里有玉米，社区有果园。

在这背后，区域内可再生能源供给达到21%，高于国内外标准；碳排放51%，建筑节能达到78%，是国内最高标准；最终实现美国LEED认证标准。看似普通的窗户、墙壁、屋顶、屏风，实际上个个都会“吸能”“产能”。新兴技术在这里广泛运用，将建筑视为一个生态系统，通过设计、组织建筑内外空间中的各种物态因素，使各种能源在建筑生态系统内部有序地循环利用，获得一种高效、低耗、少废、少污、生态平衡的建筑环境。生态本身也意味着高品质的生活。

长辛店生态城主要包括园博园、丰台科技园西区和生活配套区，陈玉谦所供职的金隅房地产业主要负责生活配套区的打造。根据项目所处的区域，他们为这个项目命名为“西山甲一号”。这三个区块将以超越传统的“发展”与“资源环境”极度对立的发展模式，共同组合成一个全新生活方式的产业混合生态城。

在未来的5年中，这里将有近4万人居住。他们更多关注“生态”的本质：什么是好的材料？什么是更经济的投入？什么是舒适的空间设计？什么是可

进可退的生活尺度？什么是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如同美国生态城市建设者协会主席理查德·瑞杰斯特所说：“对于其他城市而言，虽然原理是相同的，但每座城市的特有环境却各不相同，因此每个城镇向生态城市的转变方式也是不同的。”新的建筑材料的确可能体现了最新技术成果，但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建材是否是生态的，需要用系统和历史的眼光来看待。

坐落于郊外原生林中的太阳能别墅是生态建筑吗？未必如此：花费在交通上的时间、油耗，分摊到个人头上的道路面积和松散而显得浪费的建筑占地；而在材料上，各国生态材料也是因地制宜的。德国劳动力成本高，钢和玻璃材料施工速度快、可循环利用、施工能耗低，因此可以算是生态材料。瑞士等国家绿化程度高，种植量大于砍伐量，因此使用木材这种天然材料有利于生态环境，而对于森林覆盖率低的国家来说，木材虽然天然，但却并不生态。

长辛店生态城不完全追求生态技术的集成，而是通过合理的邻里单元空间形态、与本土环境相适应的街道网络、地块内微风通道、区域联通的绿色空间、步行可达的公共交通系统、步行与自行车网络的安排，寻找低碳生态的空间解决方案。

比如在区域内原有自然纹理的基础上，在整个基地 80% 的面积内使用本土植物，保留原有生态栖息地、水体和湿地；同时通过创造区域生态连接，形成

丰富、多样化的生态廊道，把周边所有的公园都连接为一个网络。

一个 30 米宽的微风通廊，被纳入到用地标准之中。作为土地使用者，金隅房地产业界的陈玉谦知道它的用处：缓解北京的热岛效应。“西山甲一号也是北京第一个运用微风通廊的项目，从大自然的角度通过微风通廊去解决，夏天基本会比其他地区低 3 到 5 摄氏度，冬天利用南北格局又有效阻挡了北风。”

“生态是一个系统，城市也是一个系统，两个系统组合以后，不是简单的一加一。这是一个复合的概念，除了用生态的内容在物理上建造一个梦想之城，这座城里还应该包括文化的多元性、信息交流的便利性、区域的开放性。我相信这种多种文化、多种产业的融合，会是保证一个城市、一个大生态系统保持活力的根本。”在陈玉谦看来，生态也包括精神层面的，即一个人的一生在这里都富于意义。“我们希望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服务多于索取，合作大于竞争，创造胜于重复，节约制约消费，精神胜于物质，相对于当今集成化、消费型、竞争的生活模式，它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

中国人每年平均排放 5 吨二氧化碳，如果达到美国水平（20 吨），将导致全球每年增加 200 亿吨碳排放，并使全球的碳排放总量增加 69%。生态城在中国的发展，也将对世界环境的改善做出重要推动。☑





日本电影版《深夜食堂》剧照（2014）



“深夜食堂”这味药

记者 / 黑麦

美食片是一种“药”，有的治愈，有的致郁。

中国版的深夜“广告食堂”

《深夜食堂》最早是安倍夜郎的一部漫画，讲的是在车水马龙的东京新宿的一条小巷里，有家小饭屋，欧吉桑老板把他的营业时间设定为午夜12点到次日清晨7点。这个看起来50来岁的老板，也是店里唯一的员工，他亲自下厨，亲自上菜、倒酒，偶尔和客人闲聊几句，虽然讲话不多，但是一张口总能戳中人心。他的左脸上有一道划过眼睛的刀疤，这使他看起来饱经沧桑，却又不缺乏故事，从来没有人问过他的来历，想必他也不会讲。

这个名为“深夜食堂”的居酒屋，是店老板的

整个世界，也是食客的心灵舞台，在这里，每个人都愿意和陌生人讲出自己的故事。大叔做的菜都很家常、简单，也很细心，眼神似乎可以穿透食物，也看穿食客的心思。居酒屋的菜单有限，豚汁套餐，每位客人限点三杯酒。人们通常只按自己的喜好随意点些酒菜，老板就按客人的要求，利用现有食材做出来。这里的客人很杂，有富人和穷人，辛勤的办公室职员、课长，有刚刚走入社会的年轻人，有混迹新宿歌舞伎町的帮派成员，有脱衣舞娘甚至AV演员，有红不起来的歌手，也有小商业经营者……这些不同的职业组合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形态，看似不同的身份，却有着相似的平凡人生、孤独和情感，当他们坐在食物面前，每个人都变得平等起来……

上周，步深受欢迎的日版同名剧集的后尘，黄磊领衔主演的中国版电视剧《深夜食堂》也上映了。



几天后，这部剧刷新了“豆瓣”有史以来最差的影视剧评分纪录，截至发稿前，7万用户给出了2.4的低分（最低分2分），将近九成给出了一颗星（2分）。作为投资公司股东的黄磊，先后在2015、2016年投资了两部日本热门影视剧的翻拍，却都成绩不佳，特别是这部《深夜食堂》。

在网上，关于《深夜食堂》的评价，使电视剧陷入了一场关于“文化正义”的战争。一方面有人认为电视剧还可以，而大多数人觉得，黄磊版既想搭大IP的顺风车，又想封住“原版粉”。这种几乎是懒惰的翻拍方式，没有将故事做成中国版的深夜饮食，脱离了中国民间的饮食习惯，又没有描写平凡的故事，创作者喜欢将人物拔高到一种境界，对于小人物描写的不屑、不齿流露闲笔，像是一种对细节的怠慢，而这恰恰是日本影视剧中衬托人设重要的组成。

对于美食片，几乎全世界的观众都有一种“借食物比喻人生”的观看标准。9年前开播的日版《深夜食堂》更是美食片中的经典，其讲故事的方式也成为一种主流的情感观，一些观众甚至对剧中的菜品都了如指掌。因此，在中版《深夜食堂》上映后，

激怒的首先是一群栖息在豆瓣上的观剧精英。

那么黄磊版的《深夜食堂》到底有什么问题呢？影评的意见大多集中在三点：广告植入、抄袭和演技差。“茶泡饭三姐妹”变成“泡面三姐妹”恰不是因为国情，而是因为频繁的广告植入。根据中国消费网显示，泡面行业在中国的销售已经连续5年下跌，在美食剧成为一种热门，送餐变得越来越方便的今天，很多人已经远离了对泡面的热忱。当然，在剧中，让人抓狂的不只是三位女生对于泡面的高涨热情，而是老坛酸菜的反复植入，最终成为引爆骂战的导火索。

有人统计了，《深夜食堂》前4集出现的品牌已达19个，为了与美食剧调性保持一致，快消品占据了大多数，其中包括烧水壶、泡面、可乐、啤酒、保险塑料袋等。为了刻画人物身份，《深夜食堂》也将商业机构与人物相结合，在40集的体量中反复插入19个品牌的广告植入和口播，难怪有人将其称为“广告食堂”。而反观欧美商业电影，广告植入也不在少数，例如《变形金刚》、《黑衣人》、“007”系列等，在《机械公敌》中，男主角的植入不但没有给观众带来不适应感，匡威鞋和跑车本身具备的质感和文化符号，反而成为塑造人物性格的元素。

或许中国版《深夜食堂》的制片方认为买了版权，就不会有抄袭之嫌。然而这恰恰不是“东施效颦”最好的理由。在剧中，黄磊也穿上了日本传统料理人的制服，印上了刀疤，在与日剧格局几乎相似的置景中表演。为了试图保持那种“匠人的尊严感”，从手起刀落，切菜、摆盘，演员和摄像都模拟了原版，然而这空洞的模仿仍给人一种不精致的感觉，粗糙的做法让人觉得缺乏诚意。金承佑、南太铉主演的韩国版《深夜食堂》虽基本按照日剧原版的感觉走，但在饮食上做了调整，例如中版里面成为众矢之的的“首集红香肠”，韩国人索性改成了本土的煎年糕。

虽说中、日、韩三国民众对于彼此的食物相对接受，但是对于深夜入胃的吃食，多数人还是会选择最熟悉的味道，聊以慰藉黑夜的漫长。

那些日本的美食片

日本的美食片为什么那么好看呢？《海鸥食堂》讲的是三个性格与年纪各异的日本女性，在遥远的芬兰以最质朴的食物拉近当地人的心；《南极料理人》



日本电影版《深夜食堂》剧照（2014）

讲的是7位科考队员在南极枯燥的生活中，把吃看成最大的乐趣；《孤独的美食家》男主角五郎，借工作之便在出差地周边的美食店驻足，自由享用各种食物；《有问题的餐厅》说的是几位女性为了对抗社会的大男子主义，一同开餐厅的故事；《三星营养午餐》讲述了烹饪小天才在一档制作营养午餐的电视节目中，决心把午餐也做成米其林三星水准；《小森林》则让女主回归自然，远离都市的喧嚣和浮躁，参与村民的劳动，用双手打造渺小却舒适的生活……

拿到《深夜食堂》的日本漫画，几乎从哪一页都能轻松看进去，这是食物的某种魅力，似乎也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上的共鸣。其实，作者安倍夜郎也无非是端出些例如芋头炖乌贼、凉面、猪肝炒韭菜、奶油炖菜、烤饭团、青椒镶肉、洋葱圈、果醋茄子炒五花肉、冷豆腐洋葱丝……这样的大众食物。

说实话，这家餐厅也“很不现实”。即便是在日本，其中的有些菜品，几乎都很难在那些年轻人愿意去的居酒屋找到，因为它土、过时，显不出厨人的技术，更显不出餐厅的高档，卖不上价钱，不能带给所有食客味蕾上的刺激，它们甚至不是一种“高尚阶级”愿意点来果腹的食物。然而正是因为处于这种“非现实”的餐厅，正是这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食物被用心烹制，摆在一个粗陶器皿中，它竟然也能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它开启的不只是食客的味蕾，也是一个人深埋的回忆，一个人的情感。可以说漫画《深夜食堂》，就像个告解室。在这里人和食物都不分阶级，每个人在食物面前都如此的平等，丝毫不会为某一道菜、某一种

记忆，感到羞愧。

漫画《深夜食堂》最动人的部分，是作者与美食家饭岛奈美的对话，他们不觉得自己是“美食艺术家”，甚至对这些称谓感到好笑。谈及记忆与人生，饭岛奈美说，之所以投身美食，只因为当年她曾为暗恋的男生每天做便当表达心意，坚持了很多年后，男生并没有接受她的感情，而是鼓励她成为专业的料理人。

日版电视剧的男主演小林薰也说过，《深夜食堂》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借着美食说人心。人们对味道的记忆甚至好感都停留在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感之上。作为京都人的他，在童年和成长的记忆里，生的青花鱼蘸上醋，和饭团捏在一起吃的寿司，就是他的最爱，至今未变。他面对这个食物时，就好像回到当年在京都，那个3岁的自己。

经历过战后的贫困，在如今四五十岁左右的日本人记忆中，那些熟悉的家常味道，不是鱼肉，而是肉的边角料；不是精贵的菜和水果，而是腌菜拌米饭的香味。薄薄的三明治、素然无味的面条、清淡的饭团、捞不起菜碎的清汤、偶然入口的奶香气味，却也散发着生活之趣和希望。夜郎笔下这些朴素的料理，似乎能唤起日本一代人的记忆，像是在物质匮乏的贫穷时期，随便凑几道食材临时做的饭，尽管它早已不是那些人的日常饮食，可是每闻到那种旧时的饭香，一些记忆就会涌上心头。

《深夜食堂》中的饭食并非出自小林薰之手，饭岛奈美是幕后真正的操刀者。在她的《深夜食堂，严选之味》一书中，详细列出了这些来自民间的、鲜有复杂工序的美味教程。直到今天，奈美仍认为那是日本人的“家庭之光”，给平凡的食物“平添光环”是主妇们的技能。当孩子们打开母亲为他们做的午餐便当，可能已经没有了几十年前的兴奋感，但是那些偶尔分享食物的小日子所带来的欢愉，仍旧会是他们未来的回忆。

如今，美食片是很多城市人的下饭“佐料”，有时也是治愈的良药。精致的视觉感受，恰到好处的温情和小幽默，使它正在成为一种精神陪伴。在《美食总动员》中有这样一段话：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伟大的美食家，但是真正的美食家可以来自任何一个地方。这或许才是人们从观看美食片中需要获得的。■

（实习生栩栩对本文亦有贡献）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阅读之美



生活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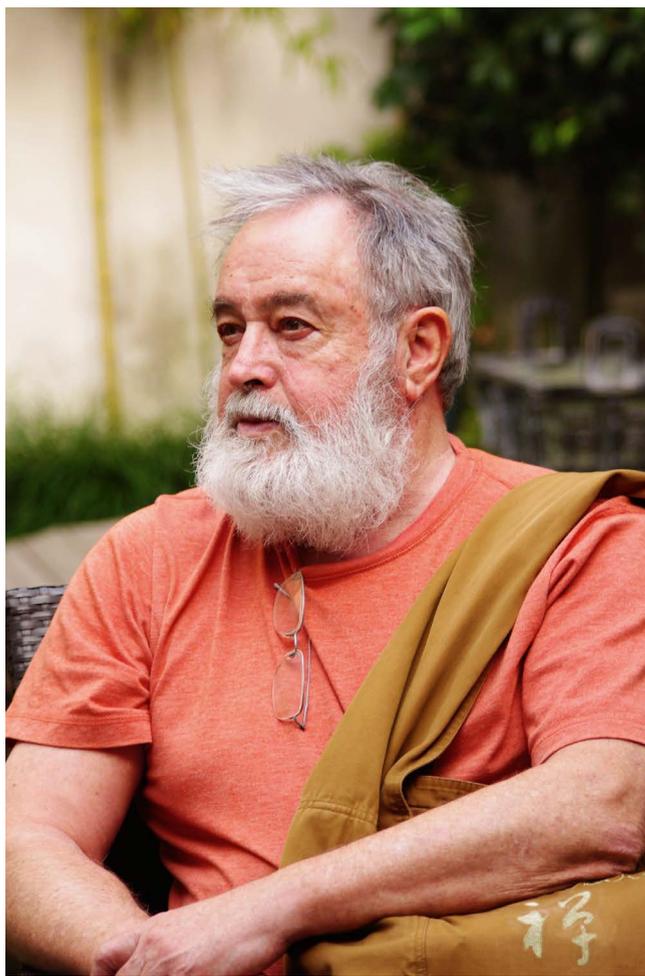
每周一出版 全年52期 多样便捷的订阅方式
邮发代号:82-20 拨打11185上门收订
零售单价:15元 零售年价:780元 订阅单价:10元 订阅年价:520元,全年净省260元
读者服务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邮箱:dzfw@lifeweek.com.cn

绘画 阿梗

24年后，终南山再寻隐士

记者 张星云

在《空谷幽兰》出版之前，很少有人知道终南山里还存在着隐士，更没有人写过隐士生活。24年后，峨眉电影频道的纪录片摄制组和该书作者比尔·波特重走终南山，拍了一部纪录片《隐士》。



比尔·波特

(峨眉电影频道供图)

比尔·波特(Bill Porter)跟我说，直到2010年，他才觉得自己和《空谷幽兰》在中国火了。那时，为了写新书《寻人不遇》，他去了孔子的出生地尼山，有人突然跑到他身前说：“我认识你，我有你的书！”

“这种感觉很好。我在美国，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2017年这个初夏，波特坐在成都的酒店里跟我回忆。这次他来成都，是为了参加《隐士》纪录片发售。

1989年、1990年，比尔·波特带着摄影师史蒂芬·约翰逊三上终南山寻访隐士，与隐士们一起生活，回台湾后写成《空谷幽兰》，一本将自己的寻访经历和中国古代历史结合起来的旅行记叙。

以当下的地理解释，“终南山”指的既是西安东面40公里处的终南山山峰，也指与之相邻的东西上百公里内的山峦，即秦岭的最北端。历史记述加传说中，“天下修道，终南为冠”，相传正是在终南山西端的楼观台，骑上青牛的老子在出关前把《道德经》交给了守关人尹喜，终南山因此成为中国道家 and 道教思想的发源地，楼观台成为道教的总祖庭，终南山东端的华山则成为道教兴盛之地。著名的八仙大部分在终南山修道，全真教祖师王重阳也是居于此，并创立全真道。

终南山对佛教的意义同样重要，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五大派的祖庭在终南山，即三论宗、净土宗、华严宗、律宗和唯识宗。中国最早官方钦定的观音道场在南五台，隋文帝令人修的珍藏佛舍利的法王塔在终南山仙游寺，玄奘翻译《心经》时所在的终南山翠微宫也被记述为唐太宗长期居住的地方。

此后，在正史和野史的记述里，终南山成为重要的修隐之山，相传姜子牙、陶渊明、王维等历史名人都曾隐居于此。不过，直到这个美国人比尔·波特寻访终南山并出版了《空谷幽兰》之后，中国读者才发现，原来在终南山中修隐的传统在现代并没有中断，山里面现在还住着隐士。

波特告诉我，他觉得《空谷幽兰》能在中国出名，可能是因为“猎奇”。他以法国作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作为例子：“托克维尔所写的书之

所以能在美国流行，是因为他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写美国。他会注意到很多我们美国人自己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如今，终南山的隐士生活早已不再神秘。比尔·波特的书带来了一系列后续影响：终南山佛教协会成立，协会将终南山区隐士居住的茅棚和洞穴位置登记造册，定期派人到山中分发药品和食物，包括外面寄来的邮件。当《隐士》纪录片的导演和波特重访终南山时，他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慕名来这里修行、隐居，新的茅棚不断建起来，隐士们不仅要面对纷至沓来的记者、摄影师、驴友、普通游客，也要面对终南山的旅游开发。隐士生活，是否还真的存在？

山里的隐士还在吗？

2011年，当峨眉电影频道买下《空谷幽兰》的影视改编权时，导演周成渝没料想到，未来4年里14次上山，节目组才得以完成纪录片的拍摄。

周成渝最初的想法很简单：比尔·波特作为被拍摄的主角，翻山越岭重访终南山，与隐士们聊天。但波特每次获得在中国大陆旅游的签证时间不长，所以没法将他留在这里好几个月参与拍摄。为了节省成本，周成渝需要提前上山踩点，与隐士们都事先联系好，到时波特来了，就直接带着他去找隐士拍摄。

周成渝开始寻找隐士线索。第一条线当然是《空谷幽兰》。这本书好读，因为波特拥有7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人类学博士的研究基础，以及80年代在台湾做广播电台记者所积累的经验，他冷静、细致地记叙下了这些隐士的生活，尝试平等地去理解他们。书中另一点吸引人的地方，是波特寻找隐士的过程。他在书中详尽描述了每个隐士所居茅棚的位置：从哪个寺庙往右拐，沿哪条小道走多久，便可找到哪间茅棚。

可这本书已经有二十几年的历史了，很难再按图索骥。远在美国的波特又给了周成渝另外两条线索：住在南五台的乘波法师，她是那本书中写到的隐士里唯一至今还在山上生活的人；还有兴教寺的心一居士，他有一张终南山隐士茅棚分布地图。

1990年写《空谷幽兰》时，比尔·波特就去兴教寺，当时74岁的住持常明为他指引了去嘉五台

的上山路。该寺历史记载，公元669年，唐高宗李治救命从白鹿原迁玄奘舍利安放于此，后因舍利塔建兴教寺。此寺与终南山主要的两个修隐山区都很近——西南15公里便是南五台，向南不到10公里是嘉五台。2001年，在比尔·波特离开十年后，《空谷幽兰》中文版上市，也是在同一年，常明住持在兴教寺成立了终南山佛教协会，专门帮助山中隐士。与此同时，一个名叫田洪纲的人关掉了自己的书画装裱工作室，去了兴教寺，成为终南山佛教协会的第一名员工，并得名“心一居士”。

如今心一居士已经是长安终南山佛教协会副会长了，依然住在兴教寺。周成渝按波特给的线索找去，心一居士对他的态度非常冷淡，并告诉他，比尔·波特所说的什么地图，自己手里根本没有。

后来周成渝才知道原委。心一居士曾经一度非常热衷于宣传终南山隐士。他是最早将终南山隐士照片通过论坛和博客发布上网的人，还先后组织过终南山佛子夏令营、终南山访道供僧、终南禅修等活动。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年中秋前后，心一居士还带领各地义工将网上募集的道粮、棉大衣、药品送到南五台和嘉五台修行者居住的茅棚。

“他关注终南山隐士十几年了，对终南山和隐士文化非常有感情，没想到最终让终南山隐士引起了太多关注。”如今周成渝似乎理解了心一居士最初对他的冷漠，“找他的各色人等中，有想借机炒作的，有带着商业目的的，这些年找他的媒体也数不胜数，所以他就变放为收，不想让那些隐士再受到打扰。”

心一居士对《空谷幽兰》这本书的态度也是矛盾的，这些年一直不愿太多提及。他曾多次表示：“终南山没有隐士，《空谷幽兰》中寻访到的所谓隐士，



比尔·波特所著《空谷幽兰》



纪录片《隐士》剧照

【供图：贾斯汀·李·史密斯】

虽然过着与古代隐士相似的生活，但他们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隐士，只不过是佛教或者道教的住山修行者罢了。”

所以那一次见面，心一居士不承认有茅棚地图，只为周成渝指了一条道：“你可以去嘉五台，翻过‘龙脊’到兴庆寺，然后去观音洞，那里可能会有隐士居住。另外观音洞那个地方非常陡峭，拍摄下来的画面会非常有视觉冲击力，你们可以试试。”

周成渝按照山民的指引上了山，才发现“龙脊”是嘉五台最险峻的一条路，必须过一段没有任何植被的山脊，最窄的路也就一只脚那么宽。周成渝意识到，心一居士还是在探他们的虚实，看他的诚意。

周成渝他们开始在兴庆寺所在的嘉五台寻找隐士。每次上下山，他们都会去兴庆寺向心一居士讨教，后者逐渐发现节目组并不只是打算在终南山待十天半个月猎奇，于是开始慢慢告诉他们每间隐士茅棚在山上的具体位置。虽然周成渝至今也没有看到传说中的那张地图，但他自己开始绘制地图，为纪录片备份。此后每次上山踩点，他都用谷歌地球将茅棚的GPS坐标记录下来，“就像占山头，插红旗”。就这样，一年时间，他在地图上累积标记出了110间茅棚的具体位置。“我们已经非常幸运了，之前很多媒体上山后，茅棚里的隐士们不是下山了，就是去其他地方采药去了。而我们真的见到了很多。”周成渝说。

书中世界和现实山中

按照周成渝的说法，如今的终南山早就不像比尔·波特当年记述的那么纯净了。也有很多“装神弄鬼”的人，穿古装，建茅棚，然后摆一架古琴，发朋友圈；或者见人就说认识200多岁的道长，从来不喝水，天天睡地上。“虽然这种人不多，但是有。我自己对这些人还挺气愤的，但是换位一想，这也是我们所见终南山的其中一面，凭什么我可以觉得比他们高级。”周成渝说道。

找到真正隐士居住的茅棚仅仅是第一步。如何取得隐士们的信任，说服他们接受拍摄，才是更难的事情。

周成渝开始在山上与隐士们一起生活，短则三五天，长则十天半个月。住山洞，住茅棚，大部分隐士居住的地方条件艰苦，水电气三不通。他觉得《空谷幽兰》书里写得太好了，过滤掉了很多山里的阴暗面，“实际上一路很艰辛，如果完完全全带着书去终南山，估计你会失望”。

2014年拍比尔·波特与乘波法师的重逢和对话，是纪录片期待的重点。乘波法师就是那位书中写到的唯一还留在山上的隐士。

两人在“净土茅棚”的院子里促膝而坐。波特从包中掏出《空谷幽兰》中文版，翻到一页给乘波

看。那是一张拍摄于1990年的黑白照片，一棵苹果树旁，年轻的乘波站在自己师父慧圆法师身后，后者望向枝头的苹果，表情慈祥。如今慧圆法师早已圆寂。没有周成渝预期中的激烈对话，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相对无言。

其实《空谷幽兰》写完之后，比尔·波特回过七次终南山，除了去拜过慧圆法师的舍利塔，为自己的第二本书《禅的行囊》做考察之外，其余四次他都是带着美国旅行团去的。

尽管《空谷幽兰》在中国很火，但对比尔·波特在美国的生活并没有带来什么影响。1993年，在台湾住了20年的波特带着台湾妻子和一双子女回到美国。他在面包房打过工，在餐厅当过服务员，还将《心经》《金刚经》《六祖坛经》《道德经》译成英文，为香港广播电台做临时性旅游节目。2001年，他家乡小镇上的居民突然找到他，因为听说他很了解中国，想请他当导游带团去中国旅游。从那时起，每年波特会带一个由2至5位当地人组成的小旅行团来中国。“只在山上待一两天，我也不想太打扰隐士们。”波特说。

2014年这次，为了拍纪录片，波特难得地在山上待了两周。心一居士专门上山陪了他三天。71岁的波特，头发和胡子都已花白，背着朝山香袋、拄着手杖，仍然顺利地爬完山路。因为写上一本书《寻人不遇》时摔了一跤，他的左脚里其实还有24根钢钉。

“我曾经对他有偏见。”心一居士谈到比尔·波特时说，“波特是个修行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比不少中国人都深，他还有着西方人的那种较真、直白和坦然。”

为了筹备纪录片而上下终南山的四年时间里，在不断的聊天采访过程中，周成渝和摄制组也逐渐学会了与隐士们的相处之道。

周成渝不再一上来就问对方为什么要到山上修隐。他发现这些人上山做隐士，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理由，有的只是喜欢一个人清静，有的是为了把《楞严经》或《金刚经》看懂，有的是不再想和山下寺庙的经理们打交道。终南山上既有大乘佛教的隐士，也有小乘佛教的隐士。修大乘佛教的隐士上山隐居是为了在悟得正果后再下山入世普惠大众，而修小乘佛教的隐士们只是为了管好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做好自己。☑

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始终没变

——专访比尔·波特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你看到的终南山上的隐士，与《空谷幽兰》里90年代的隐士相比，有什么区别？

比尔·波特：很多年轻人看了《空谷幽兰》后，觉得这样的隐居生活太好了，也想要这样的生活，于是他们上山，在山里盖个新茅棚。这当然会影响原有山上隐士们的生活，但后者不能拒绝新的隐士。当然，我觉得也不应该批评这些年轻人，因为他们是很诚实地在走这条归隐修行的路。可每个人的缘分不一样，不一定全都成功。很多年轻人在山上待不过第一个冬天，天气一冷他们就全下山了，所以对原有隐士的影响其实也并不大。

三联生活周刊：山上现在人多了，是好事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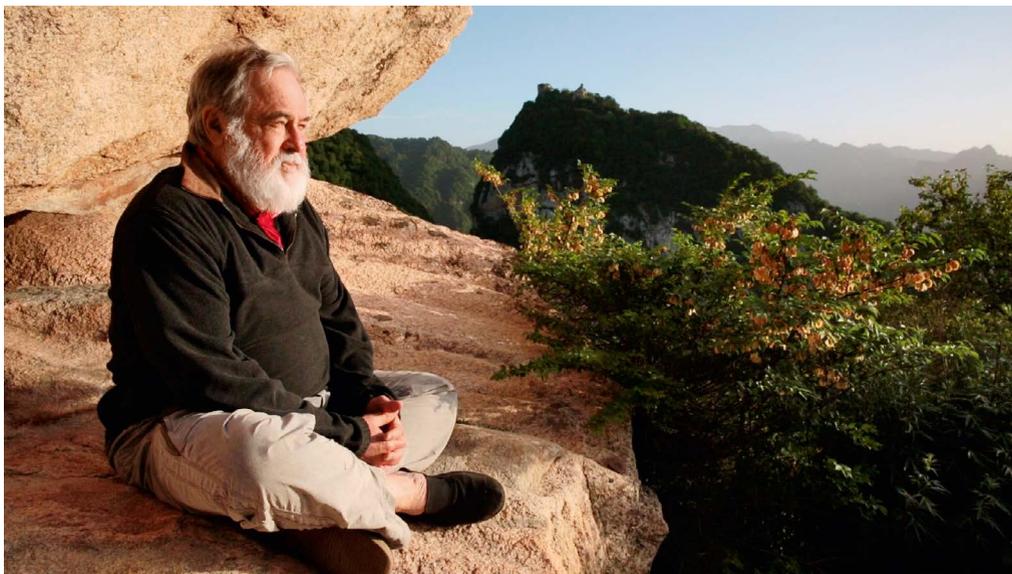
比尔·波特：1989年、1990年，终南山上的隐士差不多有200位，这是我自己的推测，也是隐士们当时的看法。后来西安的一位摄影师在读了我的书之后，这几年开始在终南山拍摄隐士，按照他的记录，现在终南山有600多位隐士，是24年前的3倍多。当年我见到的隐士们，有一半至少50岁，现在的平均年龄也就30岁。此外，最大区别就是教育程度，我当年没有碰到过一位上过大学的隐士，而现在山上大学毕业的隐士很普遍。有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也有一些大学教授。我不知道山上有多少隐士才算多，我不敢说。

三联生活周刊：有没有想过，你的书曝光了终南山的隐士生活，但隐士的精神也许就是不愿意被曝光。

比尔·波特：当然会有一点。但其实中国有很多座山，其中有隐士居住的可能不到1%。终南山就是这样一座隐士山，并且2000年前就已经开始有隐士在这里居住了。这样的传统有一个很大的好处便是，一名新的隐士上山盖茅棚修行，但他没有山上生活经验，这时其他隐士便会帮助他。当然，隐士之间也需要一些距离，以我在终南山的经验，每两位隐士之间保持的距离差不多是走路10分钟，在这个距离范围内，每位隐士各自收集自己用的木材，种菜。

三联生活周刊：旅游开发对隐士生活有影响吗？

比尔·波特：中国是一个特别的国家，人口多，



(峨眉电影摄影提供)

比尔·波特在拍摄《隐士》间歇面迎夕阳打坐

很多山被破坏了，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不容易。虽然在中国所有的山都面临旅游开发，但终南山很大。现在隐士居住的茅棚外通常有一道外墙，院门挨着上山道，每到周末，院门口就会挂上一块牌子，“请勿打扰”——以前没有这道外墙，也没有那块牌子。我认为旅游对终南山有好有坏，但人人有来去自由的权利，无权将游客挡在终南山外。

还有就是，佛教跟道教的隐士不一样。佛教隐士不会特意离群索居，而道教隐士则喜欢离人越远越好。1990年我在山上碰到的隐士，都离山下主路不远，走路去茅棚很少超过两个小时。这一点现在开始改变了，因为山下旅游开发，现在很多隐士越来越往山上搬。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终南山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比尔·波特：山还在。想要隐居修行的人，总能找到一个合适的隐居地点。虽然古人说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但如果你连小隐都没做过，是无法真正大隐的。所以修行的隐士们必须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看破红尘。另外大部分人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其实政府是在默许这些隐士。隐士在山上居住的茅棚，其实那些地也不属于他们，但政府没有赶走他们，也没有拆除茅棚。所以我觉得虽然隐士们受到一些旅游开发的打扰，但只要他们真心想，在终南山还是可以修行的。

三联生活周刊：北京有个龙泉寺这两年很火，这一类的禅修课程在中国也越来越多，你觉得是好事吗？

比尔·波特：我没去过龙泉寺，不知道真实的情况。但现在在美国，也有很多为期一两个星期的课程，有师父讲课，带着念经，打坐，吃素。我认为这样很好，是一种新的修行方式。通过短期课程，给予他们一些帮助，所以不应该是坏事。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你也可以将这看成是一个生意，寺庙赚钱的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你尝试过上山隐居吗？

比尔·波特：我见过很多隐士，我知道隐士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不想那样生活，我喜欢洗热水澡。在山上忍几天可以，但忍一年、两年，甚至一辈子，我没有那样的耐心。我现在做的，就像陶渊明一样，“结庐在人境”，而我的茅棚在美国的小乡村里。

三联生活周刊：还会再去终南山吗？将来有什么计划？

比尔·波特：我不知道，至少不会再带旅游团去。看缘分。我现在差不多每年都会收到邀请，去参观他们山上新的修行场所，说不定有一天我会接受邀请。我不想随便去打扰山上的隐士们。接下来我有一个计划，是进行一次寻找西王母的旅行，考察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很少有人知道这段历史，我很好奇。☑（感谢姚瑶对本文的帮助）

威士忌 我说我 你说我 你喝

99元 / 50期 扫码购买
每周两次 固定更新
大咖亲自 讲授录制
利用碎片 化时间
轻松玩转 威士忌



【松果音频课堂】



生活家简介：支彧涵

WhiskyEnjoy享威-创始人 / 威士忌收藏家 /
爱丁堡威士忌学院中国首席讲师 / 中国大陆首位获得
爱丁堡威士忌学院 (EWA) 单一麦芽威士忌课程认证者

除了兵马俑，中国如何向世界展示自己？

——专访著名汉学家、英国学术院院士杰西卡·罗森

文 / 朱可人



杰西卡·罗森

（张超摄）

大英博物馆正在整修中的中国文物展区计划于2017年11月8日重新向公众开放，其中的展品介绍文字，特邀了著名汉学家、考古学家杰西卡·罗森主导撰写。

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是目前中国艺术与考古领域最杰出的西方学者之一。她曾担任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近20年，之后的1994至2010年，历任牛津大学中国艺术考古专业教授、牛津大学副校长，以及牛津最古老的学院——墨顿学院院长。为表彰她在中国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2002年英国女王授予其爵士头衔。2017年，美国著名史密森尼博物院向她颁发珍贵的佛利尔奖章，以表彰她在艺术史领域“具有开拓性而艰苦卓绝的研究”和博物馆领域“至高无上的专业成就”。

5月，罗森受北京大学邀请来到中国，完成了“两个古代社会：中国和美索不达米亚，相似与差异”“中国与欧亚草原上的黄金大墓”“秦汉王朝与它们同时的伊朗、地中海”和“北朝、佛教的传入以及唐王朝时期的新型国际体系”四场演讲。之后，故宫博物院请罗森教授做了“早期中国的个人饰品：公元前2000至500年的红玛瑙珠”专题讲座。这些都是她的重要研究领域。

从痴迷中国文字和书中氤氲水墨，到随家人在古董旧货市集淘中国工艺品，罗森自幼就结下与中国文化与器物的不解之缘。她从历史和考古入手，再深入语言，潜心研究古代中国。在英国长大的她能讲流利的汉语，研读中文古籍经典，并熟练掌握拉丁语、希腊语。她的考古足迹起源于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其后又踏看中国诸多遗迹，她将自己的研究放置在欧亚大陆的大背景框架之中，横跨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1000年，以器物为线索，探寻中国与其他地区之间联系与区别的背后的驱动力，尤其着重研究中国如何选择性地吸收外来文化，用于自身文化、礼制建设。

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27年，是罗森寻找古代中国的钥匙。从研究馆藏的商周玉器和青铜器等珍贵文物出发，罗森提出了著名的西周“礼制”改革学说。她致力于将文物放在历史文化脉络中展现其整体结构性变化，让文物传达比文献更多的信息。她撰写的有关古代中国的介绍生动而优美，至今仍是 大英博物馆的畅销书。1996、2005和2009年，罗森策划了三大展览——“古代中国之谜：前朝新发现”、康雍乾“盛世华章展”、“上海珍宝：古代中国的玉器与青铜”，先后在大英博物馆和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等地展出，颇具影响力。两个问题贯穿她的所有策展思考：中国与其他地区究竟在哪些方面不同？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些差异？

罗森在我们的访谈中特别强调中西文化间存在

的鸿沟，她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实践，让西方公众及学者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别，以避免因低估彼此差异而导致的文化误解。与中国学者相比，罗森在研究中更关注各文化发展路径的区别、文明的跨区域联系以及这些联系对中国及周边地区的影响，这在她2011至2016年在牛津大学主持的“中国与亚洲：改变中国的互动”主题研究中尤其明显。

作为汉学世界的权威，面对走廊里、教室窗外都站满听众的讲堂，74岁的罗森仍时时感到一种困扰：“对于外国学者来说，研究中国的考古与历史非常艰难，没有捷径可言。然而中国学者认为中国于我只是一项兴趣爱好，并不严肃对待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你能想象，在过去的45年间，你每天都这样对待吗？如果你不了解中国，你也就不在乎了。可对我来说，研究中国就是我人生的全部。”

“在观察器物的过程中，学会提问是最重要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古代中国的研究始于青铜器和玉器，这也是你最受关注的研究成果。从器物出发，你发现了什么？有什么不同于他人的研究思路？

杰西卡·罗森：没有其他文化（像中国一样）对青铜和玉石如此着迷，这引发了我的深刻思考。我最为公众所知的，应该是我关于赛克勒(Arthur M. Sackler)系列西周青铜器藏品的研究（注：赛克勒系列收藏位于美国史密斯森尼博物院，拥有世界范围内最全面的中国青铜礼器藏品）。

在考察青铜器的过程中，我发现在公元前850年左右的西周时期，青铜器的形制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观察，我认识到这些礼器的变化源于祭祖仪式本身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实际上，当时的西周在南北受敌的情况下逐渐衰落，商代及西周早期对成套青铜器的使用在此时突然中断，新的器形开始流行，并以多件重复的方式构成器物组群；相比以前繁复细密的纹饰，青铜器上的设计更加粗放。这些变化，暗示着参加相关礼仪活动的人员的增加——祭祀活动的参与者，不再局限于极少数站在近处看得清纹饰的人，而包括了站在远处也能一眼看明白纹饰意义的广大观众。器物形制的变化，不仅对应着礼仪中的重大变革，也对应着贵族阶层社会结构的变化。

这一影响力深远的发现，基于一种我经常采用的研究方法：首先，我会在适当背景下考察某一时

期的一大批器物，比如青铜器或玉器——墓葬作为考察背景特别重要，文物出土的具体墓穴尤为关键。接下来，我会观察器物演变上的重大和微小变化。然而，仅观察变化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器物背后的社会行为和结构的研究来解释这些变化。比如，在对西周青铜器的研究中，我会结合西周祭祀仪式上的表演进行分析——与前一时期相比，器物大小和形状变化，都会引起仪式上的动作种类和幅度变化，也对仪式上食物和酒水数量提出新的要求。

考察这些变化和差异对其他器物的研究也十分重要。在这一研究思路的引导下，我在晚期墓葬中发现了远早于墓葬所处时代的早期玉器和青铜器，还发现了很多在商周时期被重新雕琢的新石器时代古玉器，探究了红玛瑙珠由异域到中原的传播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在牛津，你主持了“中国和内亚（Inner Asia）：——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改变中国的互动”项目，并在考古艺术历史实验室工作。这些经历对你的研究有什么启发？

杰西卡·罗森：在牛津的项目为我提供了与诸多学者、学生互动的机会，也激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我对西伯利亚、俄罗斯西部和蒙古的材料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这大大增进了我对中国及其边疆地区的认识。这样的经历对于希望理解中国在东亚角色的学者来说，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与蒙古、西伯利亚保持着长期接触，但古代中国仅仅从两地引进了适用于中国大型社会的材料和工艺，包括铸铁、铸铜技术，并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本土化改造。看似源于中国本土的工艺，实际上是来自大草原地区(Steppe)和它位于西亚的源头。在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互动过程中，中国从来不完全照搬异域元素或器物，而是将外来文化元素有机地融入中国社会结构中。某一器物或图案在传入中国后，被赋予了崭新的内涵。

比如，周贵族在向邻国学习的过程中，将红色玛瑙珠串引入中原，后来成为精英阶层的繁复装饰和葬礼祭品，融入其礼制体系中。与之类似，黄金和铁器等材质由异域引入中原，成为重要的装饰材料；彩色陶器、三足瓮、铃铛、镜子的制造技艺通过与毗邻地区的不断接触而得到消化吸收。周致力于通过将新的礼制和外来元素引入统一体系中，以控制其边境内的文化多样性。被引入的异域材料和器物被完全整合在周朝的社会结构中。

三联生活周刊：从器物角度来看，中国与西方究竟有哪些不同？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些差异？

杰西卡·罗森：中国与欧洲在社会形态上有着巨大的差别。中国是一个高度分化的大型社会，结构清晰而等级森严，社会、政治和艺术的运作都基于大型社会的特点，在新石器时期就已如此；相比之下，欧洲是流动性很强的小型社会。二者间鸿沟是巨大的。这些变化也体现在宇宙观上：在西方有一个更加积极的宇宙观体系，探讨世界如何被创造，又如何分化；而中国则秉承一种静态（Steady State）的宇宙观，不希望静态被扰乱或破坏。中国政府经常讲和谐社会，实际上反映了静态的世界观。

社会关系和宇宙观的差别也反映在器物上。比如，从器物质量上来讲，中国器物的质量比西方的高出很多，因为中国在当时就有了劳动分工，不同工匠各司其职，分工细化也带来了器物质量的提升。中国可以说是工业革命的发明者，在半工业化时代就发明了分工。这也可能是中国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但在中国，很少有人注意到或提及这一点。

从中西方装饰体系来看，中西方纹饰展现出对人类活动空间的不同定义。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大量建造石质建筑，这种建筑的装饰系统因此成为2000多年以来西方的主导系统。在中国，建筑只起了较小的作用，主导的装饰系统通过绘画或刺绣方式表现出来，多以寓意吉祥的雀鸟、动物和植物为主题，是一个由语言体系主导的系统。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中西方的差异并非一成不变，器物的变化也受社会、政治因素变迁的影响，在相互联系中不断发展。

造成社会差别的主要因素主要是社会经济的体量。欧洲以畜牧业为基础，而中国以大型农耕经济为基础，由此产生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此后，很多事都在偶然中发生。例如，我认为中国历史上对玉和青铜的选择都是偶然事件（Happenstance），欧洲历史上用石材建造房屋的选择也是偶然。很多事情的

考古学者不能仅关注器物的外表，一定要不断问自己，能从一个考古遗迹中看到什么、学到什么。

起源并不复杂，只是根植于意外。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一旦开启一个传统，就会逐渐产生路径依赖，久而久之就无法脱离这一发展道路。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考古学者，在观察和研究器物时主要关注什么？

杰西卡·罗森：在观察器物的过程中，学会提问是最重要的。考古学者不能仅关注器物的外表，一定要不断问自己，能从一个考古遗迹中看到什么、学到什么。古人做任何事都有其特别目的，我们需要通过考察遗产去体悟古人的世界。理解古人的意图应该成为考古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只有在不懈努力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做好这件事。

“与卢浮宫相比，大英博物馆的中国藏品质量高出很多”

三联生活周刊：在世界知名博物馆中，你认为大英博物馆的特色何在？

杰西卡·罗森：几大博物馆的起源不同。大英博物馆有悠久的考古学传统，有很多挖掘出土的文物，这一背景与以艺术史为背景的卢浮宫和大都会博物馆迥然不同。相比之下，大英博物馆更注重展品的背景及其社会属性。

从来自中国的藏品来看，大英博物馆有最全面而深入的关于中国的馆藏。从前，相比大都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在绘画和雕塑方面略有逊色。在新的中国展区，我们会更多地展示中国绘画。与卢浮宫相比，大英博物馆的中国藏品质量高出很多，尤其是在珠宝、瓷器和考古方面。

我现在正在与大英博物馆再次合作，这是我25年后再次投入博物馆事业。如今大英博物馆的游客大幅增长，展览风格也有很大调整。展示的内容更加面向普罗大众，传递的信息尽可能简单而全面，没有从前那么学术化，更突出科技的力量及观众的欣赏、参与。整个展厅与以前比会有更令人激动的效果。灯光效果有很大变化，色彩基调也大胆了很多——新的中国展厅的背景色是深红色，而印度展厅则是深蓝色的。

由于近来参观大英博物馆的游客越发摩肩接踵，我们也对展览进行了调整。在每个展柜的中央，我们会放一个“把门”的主展品（Gateway Object），以便让游客聚焦于此，并附有关于该展品的介绍和语音向导——这样的安排主要基于对游客

参观习惯的研究，大部分游客在展厅里可能只会看这些主要展品。

三联生活周刊：大英博物馆中，来自中国的藏品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化？

杰西卡·罗森：在19世纪，大英博物馆的中国馆藏主要是印刷品，当时来自中国的瓷器、漆器隶属于民族学部或地中海部。到了20世纪20~30年代，由于中国的很多文物被卖到美国、日本、欧洲，大英博物馆得以在20世纪20年代到“二战”期间买入了很多文物。同时，博物馆也获得了很多战争期间已故人士的捐赠。大量新藏品的流入，让亚洲部成为博物馆的专门部门。需要注意的是，大英博物馆亚洲部包括伊斯兰文明、日本、韩国和中国。60年代，亚洲部靠捐赠购入一大批新藏品。我在70~80年代也曾参与购买一些藏品，但此后博物馆就极少购买中国文物了，一是因为太贵，二是担心走私文物的风险。

大英博物馆最多的中国馆藏是瓷器——我们有1万件中国瓷器。欧洲人从明代就收集中国瓷器，因此四分之三的瓷器藏品都来自(从中国)出口欧洲、被使用的日用品。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展在大英博物馆处在一个很偏僻的角落，不是吗？

杰西卡·罗森：中国展所在的区域可能确实是比较偏僻的。大英博物馆在传统上聚焦希腊、罗马和埃及文明，正因为这样的传统，我认为在大英博物馆，中国展永远不可能像埃及展那样占据重要的位置，因为我们手中的中国藏品，没有埃及展中那样体量巨大的藏品。

中国在很多人看来依旧是遥远而偏僻的。为了更好地向世界展现中国，我认为中国对待文物和展品，应该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将更多更高质量的展品送出国门，而不是降低送出展品的质量。近年来，中国向海外发出大量办展申请，但决策人并未意识到哪些海外展览地是最重要的。除了卢浮宫、大都会博物馆两大竞争者，很少有和大英博物馆量级的博物馆了。如果我是中方决策者，我会把最好的藏品和展览集中力量送到这三家博物馆。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中方把送到这三家的展览也同时送到了佛罗里达等并不为人所知的博物馆，这样没有侧重的展示并不会达到中方预期的效果。

要提升中国的形象，应该思考的是：除了兵马俑，中国应该如何向世界展示自己？迄今为止，中

国办了两个很棒的展览，一个是秦始皇兵马俑展，另一个是清代故宫藏品展。应该有更多这样精心设计而内容丰富的展览走出国门。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向西方传递中国声音的过程中，存在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杰西卡·罗森：旅游和教育都有助于双方增进理解。但目前来看，我认为中国对外标榜的独特中国形象，在西方其实不被理解。中国无法将其特别之处展示给西方，有时候显得自己很傲慢，有时候又显得很自卑。

中国与西方在社会形态上的巨大差异深刻影响了二者的发展路径和文化心理。中西文化隔阂或许可以用我在北京的经历作为例子。从中国的标准看，北大已经给予了我足够的礼遇：考古文博学院的教授坐在台下全程聆听我的演讲，文物局的官员、考古界学者与我进行对话。然而在我看来，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被当作一只“金丝雀”(Trophy Bird)来展示，而没有专业深入的交流。尽管观众热情极高，但很多学者和观众提出的问题往往并不基于我的研究领域，而只是由研究内容的佐证申发出的一些无关主旨的细节性、技术性问题。从一个西方学者的视角看，没有针锋相对的交流，这是另一种不尊重。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大英博物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展览，类似这样的展览，是否有助于中西文化相互理解？

杰西卡·罗森：在我看来，启发这个展览的同名广播节目在促进文化沟通上的意义值得深思。

这档BBC广播节目完全靠优美的语言讲述，而不靠任何图片来传播，力图通过声音来接通世界各地没有机会亲自参观大英博物馆的听众，向他们讲述世界历史。节目的设计者、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克格雷格(Neil MacGregor)和我都坚信，应该通过节目增进世界各文化间的相互理解，让人们对此更加宽容。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介绍世界之最，而是展现展品背后令人眼花缭乱的思想、概念，让人通过这些想象中的器物理解全球历史，了解自己和他人所生活的世界。西方人对增进相互理解这一使命充满激情。

无论是听节目还是参观展览时，观众不应该把注意力仅放在器物如何精美上，而应该去了解制造者、制造缘由、功能和目的，理解其背后蕴含的思想。希望更多人能通过文字和声音了解另一种文化，感知未曾谋面的器物 and 世界。■

于佩尔：行走 在电影国

文 / 驳静



1



2



3

于佩尔上一次来中国是8年前，和这次一样，主办者特地组织了她的电影回顾展。对照两组片单会发现，8年里，这位法国当下最好的女演员可以说是非常勤奋了。

从“佩姨”到“少女”

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从广州飞到北京，航班前后延误了4个小时。几项行程取消了，但还是赶上当天晚上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影迷见面会。活动结束后，拥上来签名的人很多。于佩尔签了几个，很快就被塞到车里。上车后，她问跟她一起来的摄影师卡罗尔(Carole Bellaïche)：“这有点仓促啊，嗯？”

卡罗尔把这件事当笑话讲，还跟我模仿了于佩尔说这句话时的神情，“带着点无辜”。实际上，这几年我们在提到于佩尔时，几乎总是称一声“佩姨”或“于阿姨”。而她在上海文化广场的首次亮相，主持人开场白中的“于阿姨”迅速被现场影迷大声纠正为“少女”。

她这种少女感，是观众从她所扮演过的角色里

叠加出来的一个人设吗？显然不是。64岁的于佩尔，这十几年来并没有真的出演十几岁的姑娘——不过这回上海、广州、北京的三场“于佩尔朗读杜拉斯”，她读《情人》倒真是15岁半的少女附体，特别是当她捡起自己身上的一片裙裾，在手里反复纠葛并告诉大家这件白绸裙子的来历时。

实际上于佩尔的银幕形象，多半集中在“内心扭曲而强大的杀人犯之女”（范霍文导演的《她》），或哲学劲儿十足的巴黎中产阶级（米娅·汉斯-洛夫导演的《将来的事》），甚至是两者兼而有之的复杂人物设定。她早年得戛纳电影节影后的《钢琴教师》不必去说，和哈内克拍的新片《快乐结局》也仍是克制又汹涌的中产阶级形象。

摄影师卡罗尔说这是她特有的气质。1994年，于佩尔为《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担任了一期主编，卡罗尔就在这当中与她结识，这次中国之行的海报肖像正是出自卡罗尔之手。按照卡罗尔的观点，于佩尔的瘦小身形在“少女感”或是“天生不引人注意”方面，都起着作用。在巴黎，她很少遇到被影迷围观的情形，但又不是那种墨镜口罩武装起来的低调，她的“discrète”（不引人注意）可以说有点浑然天成。

跟她差不多同时代且也仍然活跃的另一位法国



1. 法国影星伊莎贝尔·于佩尔
2. 电影《在异国》剧照。于佩尔同时扮演三个女人
3. 电影《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剧照。于佩尔扮演女主角的母亲
4. 电影《情人》剧照

女演员凯瑟琳·德纳芙 (Catherine Deneuve)，就完全不是一个类型。德纳芙一头金发，又有模特身高，这让她走到哪儿都自带聚光灯，几乎没办法混迹在人群中不被发现。但于佩尔就毫无压力。她身形瘦小，目测只有一米五几，完全不是那种会制造大型交通阻碍的女明星。卡罗尔说她通常随手捋上头发，戴个眼镜就能出街。

这个情形在 2001 年的纪录片《伊莎贝尔·于佩尔：献给表演的人生》(Isabelle Huppert, une vie pour jouer) 中出现过。她戴着顶毛线帽，穿着明显大了两号的深色厚外套，全景镜头中，很快就不太能分辨哪个是她的背影。

这趟中国行程，于佩尔在三个城市一共只给了平面媒体 15 分钟专访时间。我跟她聊了聊杜拉斯、帕斯卡·朗贝尔、哈内克，以及“为什么演员就像盲人”，并在之后的一个小时都为自己的愚蠢问题感到气急败坏。

这种气场，可以说来自她扮演过的角色。就像她在今年世界戏剧日发表的演讲所说，她并不是独自一人踏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讲台，每一个她曾经扮演过的角色都与她在一起，“这些角色，看似仿佛随着大幕的落下而离开，却偷偷在我体内蛰居”。

她也绝不是那种以美艳著称的女演员，即便是最青春年少的时分。甚至，当她鼓着婴儿肥出现在镜头里，看上去实在有点过于邻家。谁也没想到这位外形上跟德纳芙和阿佳妮完全不是同一类型的女演员，却在演员生涯后半程持续发力。用贾樟柯的话说，“于佩尔最近这十几年的活跃程度本身，就是一个女权宣言”。

她对各式电影人充满好奇心。在她跟我历数的她关注的中国导演里，除了成名多年并受法国人喜欢的贾樟柯和娄烨，还有拍了《白日焰火》的刁亦男。刚刚崭露头角的毕赣，也在她的关注范围内。

以杜拉斯和《情人》为中心画一个圆

于佩尔记得很清楚的是，1984 年杜拉斯获得了龚古尔奖，正是凭借同年出版的《情人》。而她认识杜拉斯是在那之前不久，杜拉斯 70 多岁，已经“从影”好多年，彼时的于佩尔，20 多岁，已经拿过一个戛纳影后。于佩尔说她认识杜拉斯时，后来以“大鼻子情圣”走天下的德帕迪约，刚刚主演了杜拉斯的《卡车》(Le Camion)，这片子甚至拿到了当年戛

纳的最佳提名。杜拉斯不止一次地跟于佩尔说“我们一起来做部片子吧”，但这件事最终没有成。

于佩尔印象中的杜拉斯是个总是对其他人的事充满好奇心的人。这跟另一个法国导演伯努瓦·雅克 (Benoit Jacquot) 和我提过的印象惊人的一致。去年底伯努瓦·雅克来北京，也跟我聊到了杜拉斯，毕竟他年轻时给她干过两年导演助理。他说这位干着导演的事却认为“所有的电影人伟大与否，本质上都是失败的作家”的难搞女人，最喜欢做的事之一，就是问任何一个访者一些极为琐碎的事。伯努瓦·雅克的工作，就是负责替她解决一切电影拍摄中“她不感兴趣的电影客体部分”。

《情人》出版后，谁来拍这部电影成了当时法国文化圈子的一个悬念。伯努瓦·雅克是杜拉斯中意的人选之一，但若干年后还是给了让·雅克·阿诺手中。伯努瓦最接近杜拉斯作品的一次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他连剧本都几近完成了，最终因为版权问题而作罢。

不过在 2008 年，于佩尔倒是演成了这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导演是柬埔寨人潘礼德 (Rithy Panh)。这是于佩尔第一次用电影的形式，成为一个“杜拉斯主义者”(durasienne)，她在其中扮演女主角的母亲。

把《情人》的故事主线拆出来，跟《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基本一致。都是一对白人母女，都在异国他乡，都有一个有钱的 30 多岁的中国男人与女儿发生爱情。《情人》中的母亲形象，是个小学校长，对 15 岁半的女儿早早失去贞操恨得要命。

于佩尔此行在台上朗读杜拉斯时，表演中的第一次情绪高潮就发生在母亲跟女儿的对峙中。但实际上，于佩尔朗读过程中的低语和沉默，衬托着上千人的剧场里更巨大的沉默，比爆发出激烈情绪更有力量。三场演出，许多观众都共有一段几乎称得上三段式的观剧体验。开场前，不管对方是多厉害的演员，大家对在大剧场朗诵小说文本多少特点怀疑态度；看的时候，又完全沉浸；看完后，跟没看过的人描述有多厉害，又发现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佩尔大概刷新了许多中国观众对戏剧和朗读的认知。

实际上，这当然也不仅仅是小说文本这么简单。于佩尔委托剧作家丹尼尔 (Daniel Loayza) 专门对文本进行了调整和浓缩。如果说在上海的第一场还

有点拘谨，到了北京这最后一场，于佩尔就松弛下来。而且，大概由于杜拉斯和于佩尔这两个女人的名字吸引力足够，几乎没有人提到这次演出是“专门为中国之行量身打造的”。换句话说，这其实是“于佩尔读《情人》”的全球首演，连剧团自己，都很克制地没有使用戏剧界爱用的套路广告词。

帕斯卡·朗贝尔(Pascal Rambert)是颇有成就的法国剧作家，上个月他带着剧作《爱的开端》来了北京。他跟我聊到说，自己正在为于佩尔专门写一个戏时，而且就在5月份，于佩尔在他担任艺术总监的剧院T2G里朗读过一回让·法布尔(Jan Fabre)的作品。在这之前，她还有过两次类似的朗读表演，最接近《情人》这种表演形式的一次发生在奥德翁剧院，她朗读了帕蒂·史密斯的自传《只是孩子》(Just Kids)。

更纯粹意义的戏剧表演，于佩尔还进行过很多。她跟美国以先锋著称的罗伯特·威尔森(Robert Wilson)合作过两次，第一次是在1993年，威尔森将伍尔夫的《奥兰多》(Orlando)搬上了舞台。于佩尔说她虽然并不畏惧经典，但发现自己总是倾向于那些并不那么传统的戏剧文本，所以实际上她真正参与莎士比亚作品的演出次数的确少得可怜，“喜剧或悲剧，我并不在乎，只要文本好。并且你得知道，没有力量的文本，是上不了舞台的”。

于佩尔走到哪儿，都有人问，戏剧舞台表演和电影表演的区别。大概由于她一个人就创造了两座山峰，人们就忍不住想，两座山峰有什么不同。回答的次数多了，她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观点。这次在上海跟贾樟柯对谈，贾樟柯发出的第一题就是它。于佩尔回答说：“很多人觉得电影演员面对的是自己，而戏剧演员更多面对的是观众，尤其是在经典剧目里。但我一直都希望，能够打破这个信仰，即，演电影是演自己，而戏剧舞台演绎的才是他人，我希望能淡化这条界限。实际上，我自己，在如何接近和演绎角色这个层面(approche the characters)，无论是在戏剧舞台还是电影，没有任何区别。”

总在“去往某地”

往于佩尔身上再加一个“最”，得是“最具冒险精神的女演员”。除了夏布洛尔、哈内克这些大导演，她毫不介意跟年轻、没什么经验的导演合作，

于佩尔说：“喜剧或悲剧，我并不在乎，只要文本好。并且你得知道，没有力量的文本，是上不了舞台的。”

甚至，有不少干脆就是他们的处女作。她自称“没有犯过错，因为这些作品后来都挺棒的”。

另一个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幕后故事是范霍文的《她》，这个好莱坞一线女演员都不愿意接的角色，于佩尔一口答应下来。“谁规定60多岁的女人不能拍一个以情色为驱动的惊悚片？”

她说她做演员的初衷就是想要“去往某地”，即便是在法国，她也力图“去往某地”，而不仅仅是在巴黎。有时候，这个某地是某个人的精神地域。当她需要去往地理上的远方时，她说自己会更喜欢，“因为这样一来，我既和导演的内心世界同行，向内又是带着探索自我的目的。远行，再加上真实世界里的物理距离，这一切都会加倍旅行的感知”。

所以，于佩尔跑到韩国，去拍洪尚秀导演的《在异国》。于佩尔发现她在镜头上的表现是只属于导演的。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其他演员都讲着韩语，以及她完全听不懂他们希望她去做的，或者别的什么。她说：“我总是处在一个懵懂的状态里，不停地好奇着他们究竟要我做什么。可能这些让我的行为呈现一种以往没有的模式，于是洪尚秀导演的作品里，我表演的状态，完全就是属于洪尚秀的。”

2009年她担任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力排众议，硬是将那年的最佳导演颁给了菲律宾导演门多萨(Brillante Mendoza)。过了两年，她就去了菲律宾，主演门多萨的《人质》(Captive)，帮门多萨拿到了一个金熊奖提名。

看上去，于佩尔很乐意到亚洲这些语言不通的国家拍电影。几年前伊朗导演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还在世时，于佩尔跟他有过一次关于“电影国度”的对谈，其中谈到的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在好莱坞工作，比在哪里都更有异乡感。

于佩尔也曾在美国拍过所谓的“独立电影”，她英语说得好，也有足够的名气，却仍然感到“束手束脚”。相比而言，于佩尔就不太喜欢这种拘束。所以有时候她会选择去位于各地的舞台演出。她跟



伊莎贝尔·于佩尔

凯特·布兰切特合作过一部叫作《女佣》的舞台剧，就在林肯中心。2006年跟罗伯特·威尔森合作的另一个《四重奏》，在巴黎秋天戏剧节主会场的山顶演了七天七夜。

戏剧干脆就是“发生在别处”的某种当下了罢。

更何况她不爱排练。贾樟柯提到《钢琴教师》里的一幕很多人都印象深刻。于佩尔从地铁里出来，被一个陌生男人撞了。走过几步，开始弹身上的灰尘，仿佛要把侵犯者当作灰尘弹掉。这显然不是什么能事先排练好的东西。实际上《情人》也没有进行过排练，三场表演都在进行即兴创作。

她说她不喜欢排练，是因为有时候排练出来的东西，会比正式表演时更好。“因为排练时，你所有的东西都是最新鲜的，最敏感的”。而且，这很可能是于佩尔一早就认定的表演信念。1980年她和德帕迪约拍了莫里斯·皮亚拉（Maurice Pialat）的《情人奴奴》（Loulou），从那时候起，她就是皮亚拉的信徒了吧，“很可惜你们看不到最好的电影，最好的电影在喊‘action’之前和‘cut’之后”。☑

专访伊莎贝尔·于佩尔

三联生活周刊：你仍然相信“演员就像是盲人”这种说法吗？

于佩尔：仍然相信。因为一个演员，他得将身心都托付给导演，让导演带去某处。我做这个比喻，是因为演员应当相信导演的判断。当然，其实偶尔眼睛还是需要睁开一条缝去看的。

三联生活周刊：但你其实常跟没太多经验的年轻导演合作，有时甚至是他们的处女作。

于佩尔：比如我和比利时导演乔克姆·拉弗塞（Joachim Lafosse）合作了《私有财产》（*Nue propriété*），还有瑞士女导演乌苏拉·梅尔（Ursula Meier）的《爱巢》（*Home*），这两个例子里，导演是都很年轻，但两位其实都通过他们的处女作就已经证明自己属于那种真正的“场面调度者”。我们法国人习惯用“场面调度者”这个词超过“导演”，他是整场游戏的统领者，演员是能够感知他是否能真正掌控现场的。至于是不是处女作，说到底，我也不是唯一一个参演导演处女作的演员。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怎么平衡呢？会不会出现演员更强势的情况？

于佩尔：我肯定不愿意也不会为场面调度者代劳，我自己光是演员，要做的就足够多了。其实导演年轻与否，经验几何，对我来说没太大差别。或许还是有一点，但我还是不会去怀疑。这就回到了刚才问题，演员要像个盲人。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不是就像你曾说的“演员的存在是种虚无”？

于佩尔：比如音乐家或舞蹈家，他们得有些扎实的技巧和切实的负担在身上。相比之下，演员就没有这些东西，说到底就是个孱弱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的确就是种虚无。演员依仗的东西，与其说是那些就在手边的，可以顺利取出来的，不如说反而是那些埋于内心的不太对劲的部分，然后我们把这部分激发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主演的哈内克新片《快乐结局》，你怎么评价它？

于佩尔：我觉得是部很有力量的作品。哈内克电影互相之间区别挺大，《爱》就更偏重于亲密性，《快乐结局》就挺政治的。它展现的是西方社会漠视移民问题的景象。他选择了一个自私的中产阶级女性角色去集中展现这部分特质。而且他有点直击痛处的意思，这让整部电影有点绝望，这倒是挺哈内克的。☑



陈兑

加州注册心理师
《通往真爱之路》



孟子

娓娓道来，从科学角度解读真爱，很有启发和作用。



人比黄花胖

谢谢朵拉，这些话说到我心里去了。你的课给了我信心！



Yvon

振聋发聩的小课。谢谢老师，回看自己的生活，感觉很多事情都得到了解释，这就是哲学的力量吧！



a^tman

谢谢老师。人生，正是不断地选择，冲突，挣扎，最终找到自我，谢谢。



田Candy

可是这三个“着陆技术”，只是暂时地消除了焦虑情绪，如果多次使用这样的方法抑制，身体也会免疫吧



清流

临床咨询经验超过6000小时的心理咨询师
《打败紧张、焦虑、愤怒，三大情绪敌人》



李剑

牛津学者、社科院专家
《难以选择时如何更好的做选择？》



马良坤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副教授
《备孕二胎你必须准备的十件事》

放下你的焦虑

「中读小课」



扫描二维码
下载「中读」客户端

三联生活
传媒有限公司

《彼得·潘的冒险岛》和戏剧“游乐场”

文 / 驳静

彼得·潘“会飞”，而且“长不大”，总在父母为孩子阅读的睡前故事里出现，也是百老汇著名的音乐剧，而今与一个超维度戏剧空间发生密切关联。

2013年，《又见平遥》面世的时候，中文语境里还很少出现“沉浸式戏剧”这个概念，该剧的宣传语也是更容易让人理解的“情境体验剧”。实际上跟大多数人一样，戏剧出品人钟丽芳第一次接触这类剧的反应也是“原来戏还可以这样看”。

“这样看”，除了是说观众不再固定于座位，而是可以随着剧情自由游走之外，还意味着戏剧舞台上“第四面墙”的消弭。

“环境戏剧”(Site-specific Theatre)在20世纪80年代的伦敦便已有尝试，但直到2011年，伦敦Punchdrunk剧团在曼哈顿切尔西区的三个废弃仓库内制作出《不眠之夜》(Sleep No More)，才正式成了“沉浸式戏剧”的流行鼻祖。

该剧的风靡，也成了《彼得·潘的冒险岛》出品人钟丽芳制作类似作品的灵感来源之一，但她觉得，“《不眠之夜》的血腥和暴力不适合移植到中国市场”。她很快就通过旧友，认识了《不眠之夜》制作人兰迪·韦纳(Randy Weiner)。韦纳在戏剧界浸淫已久，他的妻子戴安·鲍罗斯(Diane Paulus)也从事戏剧制作，二人1995年结婚，逐渐被视作戏剧界的权力夫妇。妻子戴安的主战场是百老汇音乐剧，而韦纳则更先锋，“沉浸式戏剧”即是他身上最显著的标签。

钟丽芳找到韦纳时，他正计划制作一部比《不眠之夜》更具普适性的作品。如果戏剧也有分级，韦纳希望在《不眠之夜》之外，制作出适合儿童及青少年的作品。

最后选址于北京蟹岛上演的这部《彼得·潘的冒险岛》，整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大约8000平方米的巨型戏剧空间。彼得·潘故事中的五个重要部分皆有呈现，观众不仅仅是旁观者，还参与了戏剧本身。如果说《不眠之夜》将观众的参与作为某种相对神

秘稀缺、可遇不可求的元素，《彼得·潘的冒险岛》则将这个亮点元素做了一番旗帜鲜明的升级。比如在海盗船这一故事场景中，有所谓的“海盗新兵训练营”，而在“土著部落”中，观众还可以学习跟踪技术，又或者参加“人鱼礁湖”的派对。

导演希望观众在剧场里是自由的。《不眠之夜》中他抛却镜框舞台，模糊台前台后的界限。更广义的戏剧创作论中，观众的反馈被视作艺术创作的最后一步。而《彼得·潘的冒险岛》，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戏剧“不是遗憾的艺术”这一特质的受益者。换句话说，进入演出阶段后，创作过程远未结束，后期的剧情、舞台装置和细节等的调整，便是在观演关系中不断完成。

戏剧之外，钟丽芳说她还有私心。2014年，钟丽芳的三个孩子，最大的7岁，最小的4岁，她正处在“周末不知带着娃娃上哪儿找乐子”的焦虑期。将孩子放到游乐场，大人在外头搬个小凳子玩俩小时手机，这几乎是当下“陪伴孩子的怪现状”。而“有质量的陪伴”则要求陪伴过程中互动，孩子向大人学习的同时，大人也在观察孩子的特性。不过，在儿童教育家看来，中国的一部分家长，已经从过去的只注重学习成绩，发展到如今开始意识到这种与孩子实现“共同经历”的重要性。

所以实际上钟丽芳的想法更直接，她头脑中理想的以戏剧为内核的作品，得兼具上述两种品质。

《彼得·潘的冒险岛》在纽约初创期间，韦纳组织过两期工作坊，每期都邀请近百个有艺术专业背景的家庭参与。工作坊设于一个简单搭建的仓库里，“没想到效果这么好，每个家庭的投入程度令人咋舌”。原本打算进行三轮工作坊的韦纳，最后决定，两轮验证就足够。他发现，“适合亲子观看”会成为这部作品最鲜明的特点。

实际上，《彼得·潘的冒险岛》演出之外，还设有相应俱乐部，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场所。《不眠之夜》的成功原因之一，在于每条人物线会发生不同的故事，如果是组队去观看，观后讨论会变得饶有兴致；《彼得·潘的冒险岛》对这个模式的复

制，在于它干脆就提供这样一个场所，让孩子们在相应老师的带领下，回忆讨论彼得·潘的故事。

事关儿童和青少年，性别偏好是个挺大的命题。有些是否能够吸引大小孩子注意力的细节疑问，由青少年或儿童专家们来解决。实际上现在这个版本的《彼得·潘的冒险岛》，“土著部落”更受男孩儿们喜欢，而“人鱼礁湖”显然更是小女孩儿的菜。

创作团队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年龄。除了孩子们的年龄段，其实还有家长这些“大人们”在其中的融入程度。“小孩子相信童话，大人则不然”一度成了创作者无法回避的一道小王子式的哲学题。

此外，科技与童话的冲突，也是这类戏剧作品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曾凭借《孟菲斯》(Memphis)和《彻底的现代派米莉》(Thoroughly Modern Millie)等作品多次获得托尼奖的大卫·加罗(David Gallo)，是《彼得·潘的冒险岛》的布景设计师。他的本意是保持该剧原作创作时的20世纪时代特征，但他发现，复古布景在应对成长于iPad一代的孩童时，不一定能完全获得他们的注意力。

实际上彼得·潘的故事开始正式亮相，正是在20世纪的舞台上。这个长不大的男孩的创作者、苏

格兰剧作家巴利(J. M. Barrie)尽管是在1902年一部名为《小白鸟》(The Little White Bird)的小说中才第一次使用了“彼得·潘”这个名字，但那时，彼得·潘还是个“7岁的婴儿”形象。“长不大”这个特质，在两年后他创作的《彼得潘：长不大的男孩》这部舞台剧中沿用。巴利几年后又出版了一部同名小说，自此，彼得·潘的形象有了文学上的溯源。而在此基础上创作改编的电影和电视，也为彼得·潘这个形象增加了更多丰富的细节。及至今天，会飞而长不大的彼得·潘，在无数父母为孩子阅读的睡前故事里出现，也成为一個醒目的文化符号。

钟丽芳与韦纳沟通时，一度为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来作为首个合作项目争论不休。实际上彼得·潘这个人物在中国，并不是最耳熟能详的。所以，中国传统故事中的葫芦娃、鲁西西，也曾在他们考虑范围内。但后两个又缺乏世界性，毕竟百老汇总是很注重作品的观众普适性，这也是类似《魔法坏女巫》这样的音乐剧能做全球巡演的前提。而从目前的热度和百老汇团队的反应来看，这个超维度戏剧空间的第一个样品，《彼得·潘的冒险岛》的确是最不冒险的选项。☑

左图：大型超维度童话主题剧《彼得·潘的冒险岛》精彩瞬间

右图：《彼得·潘的冒险岛》出品人钟丽芳





舞蹈是对人性本身的庆祝

文 / 石鸣

安娜·特蕾莎比皮娜·鲍什小 20 岁，某种程度上，人们把她看作皮娜·鲍什的后继者。

比利时编舞家安娜·特蕾莎·德·姬尔美可（Anne Teresa De Keersmaeker，以下简称“安娜”）的中国之行像是惊鸿一瞥。

她今年 56 岁，仍然在舞台上跳舞。“从 1980 年开始，我一直在跳，除了生孩子之外，中间没有中断过。”她说，“跳舞让我感到自由。”

5 月份，在上海美琪大戏院的舞台上，应静安

现代戏剧谷的邀请，安娜亲自跳了她 21 岁时的处女作——双人舞《相位》（*Fase*）。这也是她第一次来中国大陆演出。

她站在舞台上，和 30 多年前一样，又不那么一样。她还是跳着她年轻时的那个位置，也就是纵观下来动作更多、更复杂的那个角色，她像一个少女那样转着圈、踢着腿，来回走着，蹦跳着，偶然地，步子会稍稍有一点不稳，身体有一点踉跄，但是她很快调整回来，继续转圈、踢腿……

她不善言辞。对她来说，舞蹈才是她的第一语言。2003 年 11 月，纽约布鲁克林音乐学院曾给她颁了一个艺术奖项，她上台领完奖，致辞，台下掌

声雷动，为她喝彩。之后人群很快就散去了。安娜留了下来，她结束这个夜晚的方式是与场内那些无名之士和普通侍者跳舞。

“舞蹈不仅是一种运动，也是一种思考方式。”她说，“舞蹈是对人性本身的庆祝。”

一位现代舞大师的诞生

2012年，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新馆“油罐”（Tanks）揭幕，这是一个致力于现场装置和表演艺术的空间，安娜被邀请去做开幕演出，也是演《相位》。

演出之前有一个座谈会，主题是：布鲁塞尔北面一个叫韦梅尔（Wemmel）的小村庄里一个农夫的女儿，是如何成为现代舞史上的标杆性人物的？

即便对于西方人而言，安娜的舞蹈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存在。1981年，《小提琴相位》（*Violin Fase*）在纽约首演，报道描述：“观众瞪大眼睛，像看到天外来客一样。”一位80岁的观众看完演出后告诉安娜：“你的舞蹈就像生命本身。总是重复，总是有一点点不同。一直一直继续下去，然后，突然间就停止了。”

“80年代之前的比利时，在现代舞领域基本上乏善可陈。主要就是贝嘉，但他无论看起来多么先锋，本质上还是一个芭蕾编舞家。”《卫报》说。

安娜改变了这一切。到80年代末，借由《相位》、《罗莎跳罗莎》（*Rosas Danst Rosas*）等作品，她的罗莎舞团已经闻名世界，并且运转至今超过35年。另一方面，比利时内部，舞蹈领域涌现出了一大批实验艺术家：维姆·凡德吉帕斯（Wim Vandekeybus）、让·法布尔（Jan Fabre）、亚兰·布拉德勒（Alain Platel）、西迪·拉比·彻克奥维（Sidi Larbi Cherkaoui）……“比利时从此在现代舞领域有了一席之地。”

有人问过她，她的舞蹈语言是从何处受到的影响，答案是，大部分影响并不来自于舞蹈界内部。她喜爱电影、戏剧和音乐，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看法斯宾德和黑泽明的电影，还有费里尼和斯科塞斯。文学方面则喜欢海纳·穆勒。

她早年一开始上的是音乐学院，学习音乐理论。“我们在家会学习倾听和演奏音乐，但是不怎么跳舞，我们家没有舞蹈传统。”

半个世纪前，韦梅尔村还是一个传统的小村落，安娜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田野里玩耍。她有自己

1. 比利时编舞家安娜·特蕾莎·德·姬尔美可（右二）与罗莎舞团的舞者

2. 安娜·特蕾莎早年成名作《相位》（1982）

3/4. 安娜·特蕾莎早年成名作《罗莎跳罗莎》（1983）



（Jean-Luc Tanghe 摄）



（Jean-Luc Tanghe 摄）



4

的小马，12岁就学会了开卡车和拖拉机。她的叔叔教她犁地、收割，给小羊和小牛接生。她父亲会在清晨4点叫孩子们起床，听鸟儿唱歌。她还记得坐在厨房炉子旁边听大人讲故事：“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男人生病了，一直住在浴缸里，直到有一天，一个女人来了，在浴缸里杀死了他。”

直到今天，安娜仍然怀念童年时期亲近大自然的经历。“我喜欢树，喜欢森林，喜欢高山，比起海，我更喜欢山。”她会说法利的法语，但自认是北方（比利时）人，而不是南方（法国）人，“我们来自地地道道的弗莱芒文化”。

安娜曾经坦言：“我能走上舞蹈之路，关键是我母亲。”

那个时候她七八岁，贝嘉的20世纪芭蕾舞团在比利时正如火如荼，电视上天天都能看见那些舞者们的曼妙身姿，她告诉母亲自己也想要跳舞，于是母亲为安娜在韦梅尔办了一个舞蹈班。“她去安特卫普找来了一位舞蹈老师，从教区牧师那里筹得了一笔钱，在教区大厅里建起了一个木头舞台，买了两根古典芭蕾练习用的把杆，我们上课和排练就有了地方。”

高中毕业时，尽管成绩很好，安娜还是决定选择舞蹈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不是按其他人的期待那样，去当医生或者律师。家族里众议纷纷，父亲的态度是顺其自然，正面支持她的唯有母亲。

安娜最终被当时布鲁塞尔最有名的舞蹈学校——贝嘉开办的掌印（Mudra）学校录取。这所学校从两个方面塑造了后来的安娜：一个方面，是编舞哲学，安娜遇见了韵律课老师费尔南德·席伦（Fernand Schirren），此人是贝嘉在比利时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之一，为贝嘉的多部舞作谱写了音乐。“他有一套和东方的太极、阴阳学说非常相近的哲学思想，后来给了我非常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安娜意识到自己作为舞者的短板：“在班上我总是拖后

腿，因为我从来无法达到那些既成的舞蹈标准，无论是古典芭蕾的还是现代舞的。我意识到，我无法使用他人的舞蹈语汇来表达我自己，无法在其中找到认同——我得说我甚至在这方面有技术问题。因此，我不得不找到属于我自己的语言。我想当一个编舞家。”

一个不懂音乐的舞者不是一个好的编舞家

“对舞蹈我是自学成才。”安娜说，“我和莫里斯·贝嘉（Maurice Béjart）或者威廉·弗西斯（William Forsythe）等人都很不一样，他们的作品有一整套古典芭蕾的语言作为基础……而我，是从非常小的层面一点一滴地开始，由简到繁，慢慢把我的身体语言雕琢成型。我的动作的灵感来源，就是我自己——一个年轻女孩的身体。”

《相位》就是这一自学过程最早的产物。这支舞蹈用的是极简主义音乐家斯蒂夫·莱茨（Steve Reich）的同名音乐，一共四个段落，最先编出来的是第三段独舞《小提琴相位》。“这个音乐听起来非常具有东欧风情，像是一个犹太小提琴家，或者一个咖啡馆里的小提琴手在演奏，在邀你起舞。”安娜说。

《相位》中的动作都非常简单。“我就是从用脚擦地、转圈这样的动作开始的，”安娜说，“任何一个小女孩想要跳舞时，都会这么跳。”

音乐给安娜的舞蹈语言提供了灵感。《小提琴相位》是回旋曲结构，安娜组织空间的方式是圆。《钢琴相位》《拍手音乐》是一种短促利落的打击乐声响，她就更多地运用了直线、方块、对角线等等更有棱角的形式。

莱茨在这些音乐中应用了一种“相位移动”（Phase Shifting）的技术，在安娜的舞蹈中，我们看到，两个舞者原本一同开始起舞，然后，其中一个舞者开始加速，动作在空间中出现位移，持续一段时间后，另一个舞者也加速，直到两人的动作重新重合……

对音乐和舞蹈的关系的重新发明，被认为是安娜编舞作品最大的价值之一。“这种关系有两个极端：一端是坎宁汉·凯奇式的关系，音乐和舞蹈彼此完全独立，没有关联；另一端我开玩笑地称之为米老鼠音乐，就是像迪士尼动画片里那样的配乐，这种

“我无法使用他人的舞蹈语汇来表达我自己，无法在其中找到认同。因此，我不得不找到属于我自己的语言。我想当一个编舞家。”

关系通常被认为是比较缺乏艺术性的。”安娜说，“过去30多年来，在这两端之间，我发展了各种策略，来连接音乐和舞蹈。”

她曾经是布鲁塞尔人津津乐道的一个神话。据说她像专业搞音乐的人一样分析音乐，在她的排练厅里，你听到最多的是视唱练耳、和声、对位法这样一些音乐术语；她的舞者像交响乐团乐手一样，会看谱，会记谱，排练时可以迅速一致地从某某小节开始，在两个交叉小跳之间，还能帮小提琴手给乐谱翻页。

“安娜的舞蹈动作，是在对音乐进行了一个完全分析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罗莎舞团的创团成员、1982年起一直跟随安娜至今的日本舞者池田扶美代（Fumiyo Ikeda）说，“她给乐谱中的每种音型都分配了颜色，分析具体到每个音符的层面。比如，‘主题A和主题B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他们在这个点上互为镜像’，等等。我们所有人都在自己头脑里如此彻底地理解了乐谱，以至于当换了不同的音乐家来合作时，你会发现我们跳舞的时候会指出‘我没听到那个音符’，或者，‘这里难道不应该演奏成这个样子吗？’”

“然而，无论每样东西经过了怎样彻底的分析，总是存在一些不可被分析的东西。我想那就是安娜创造的舞蹈语言的独特温暖所在，就是这样一些动作，让舞者想要起舞。”

一个结构主义者的浪漫

1983年，安娜的作品《罗莎跳罗莎》横空出世，自此开始常演不衰。2011年，碧昂斯的MV《倒数》（Count Down）还在抄袭这个作品。

这是安娜迄今为止最具爆发性的舞作之一，有人称为“北方人的弗拉明戈”。“当时是80年代，我们听着TC Matic、Talking Heads、性手枪等等乐队。我们想要一种生理上压倒性的、暴力宣泄的感觉，我们想要有挑衅、傲慢、不羁的意味，在朋克文化中常常有这些特质。”安娜说。

然而，这个作品却是以一种极其冷静的方式编出来的。“我们花了好几个月，每天从早到晚，工作一整天，编好的舞不过10秒钟，就像农夫在田里犁地一样，是真正的苦劳力。”

迄今为止，安娜仍然保持着这样的工作方式。



安娜·特蕾莎在讲解舞作的编舞过程

理性和激情成了贯穿她作品的一对巨大矛盾，也是她的编舞具有迷人魅力的源头。

她说自己是一个形式主义者。在这方面，她喜欢引述爵士音乐家温顿·马沙利斯（Wynton Marsalis）的一句话：“自由之内没有自由，限制之内才有自由。”

在她的作品中，动作的空间常常被一系列几何结构所规定和划分：直线、斜线、方块、圆圈、螺旋、五角星……“我一直对螺旋结构很迷恋。”她说，“它可以有不同的方向，打开的螺旋，封闭的螺旋，海洋的潮汐，宇宙的运动，你指头上的螺旋，头顶上的螺旋，螺旋无处不在。”

还有她最爱的黄金分割法和斐波那契数列——不仅可以用来结构空间，也可以用来结构时间：舞句的长短，可以按照黄金分割比例来安排，每一次主题的重现，都落在彼此套叠的黄金分割点上。

段落的分配，可以是斐波那契数列，比如，第一部分是21分钟，然后是13分钟、8分钟、5分钟、3分钟、2分钟，从而形成一种加速，反方向则是减速。

“可以说，我是很客观地在进行这些计算。”安娜说，“我设定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则，然后开始和这个规则斡旋，以此为基础尝试各种偏离。某种程度上，我是在和我自己斡旋。逆流而上或者顺流而下，主观控制还是顺其自然——这是一种美妙的平衡。”

“缺少形式的情感并不是真正的情感”

——专访现代舞大师安娜·特蕾莎·德·姬尔美可



安娜·特蕾莎·德·姬尔美可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为了能够一直在舞台上跳舞，你必须过一种非常自律的生活，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可否提供更多的细节？

安娜·特蕾莎：在布鲁塞尔的时候，我的生活很安静，早上很早起来，从9点半工作到下午6点。跳舞对我这个年纪来说，的确消耗很大，比较像过着一种运动员的生活。“自律”这个词听起来可能过于严肃，但随着年龄增长，60岁时，你不可能再过20岁的生活方式——不可能说熬个通宵，第二天还能正常上台。你必须非常小心地照顾你的身体，否则就要付出代价。因为你的身体就是你的创作材料，你在衰老，而身体在感知所有这些逝去的时光。

另外，我是舞者，同时也是一个母亲。在某一

个点上，你决定想要孩子，但是你又热爱跳舞，你就需要把这两方面平衡起来。表演艺术和家庭生活的确是彼此矛盾的，你得寻找解决方案，如何安排时间，在物质上和情感上都兼顾。对女人来说，这个命题比对男人来说更重要，因为女性天生具有养育这个方面。

三联生活周刊：你有几个孩子？

安娜·特蕾莎：我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养育他们是非常巨大的挑战，可以说是最难的挑战。我想，对于一个有创造性的女性来说，同时平衡艺术、伴侣、孩子这三件事是很难的。通常情况下，你只能兼具其二：又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又是一个好母亲，没问题；又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又是一个好妻子，没

问题;但同时做三件事……很难,太难了。我做不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学古典音乐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学长笛?

安娜·特蕾莎:因为在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在学钢琴,于是我就学了吉他。后来,又学了长笛。结果没想到,一夜之间,所有女孩都跑去吹长笛了,因为一个叫 Jethro Tull 的乐队突然很火,里面那个主唱就是吹长笛的,女孩们都被他迷得不行,当时是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摇滚乐爱好者吗?

安娜·特蕾莎:我是音乐爱好者。音乐对我的生活非常重要,所有类型的音乐。我一直生活在音乐家中间。除了在开车的时候,我基本不把听音乐这件事看作一种单纯的娱乐。随着年岁渐长,从编舞的角度而言,我对音乐的口味变得比以前挑剔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编舞选择音乐的范围相当广泛,从 13、14 世纪的中世纪音乐,到 20 世纪下半叶的频谱音乐,以及披头士、琼·贝兹等等,但你从来没有选择过 19 世纪浪漫主义音乐来编舞,为什么?

安娜·特蕾莎:是的,我没有编过肖邦、舒伯特、舒曼……这并不是喜欢或者不喜欢的问题,我不太知道应该拿这样的音乐怎么办。我自认为我本质上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相异相吸原理,所以我非常喜欢那些结构严谨的东西。我是一个形式主义者,我对形式富有激情,舞蹈的魅力在于可以把抽象的形式具体化,我对布局、对位法、几何结构感兴趣,以及客体性的某种观念,这与如何书写音乐和舞蹈的关系有关,是超越个体表达的。我认为,缺少形式的情感并不是真正的情感。

三联生活周刊:近年来,你的作品有所转向,从探索音乐和舞蹈之间的关系转向文本和舞蹈之间的关系。你如何看待文本?你编舞时是把文本像音乐一样来进行分析吗?

安娜·特蕾莎:实际上,我是通过音乐,回到了文本。我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你如何能够具象化一个思想?你可以从非常物质的层面去分析语言,例如,声音振动的频率,高音低音,但是,它是如

何组织时间的?你如何通过动作将之具象化?你能将某一种思想注入动作之中吗?我对这些问题非常感兴趣。舞蹈对我来说,最大的魅力就是能够用最具象的方式,去表达最抽象的思想。我非常喜欢这样一个想法:如果你想有所表达,首先能做的事情是谈论、讲述,如果光是说还不够,那么你就歌唱;如果还是不够,那么你就舞蹈。

三联生活周刊:你似乎非常注意舞蹈资料的记录,上个世纪 90 年代,你就为自己的代表作拍了舞蹈电影。最近又出了一系列的,把相关的资料做了一个回顾和汇总。

安娜·特蕾莎: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曾经先锋的现代舞,进入了一个需要整理、保存和反思自己历史的阶段。许多非常重要的舞蹈家要么离世了,要么退休了:皮娜·鲍什去世了,崔莎·布朗也去世了,威廉·弗西斯停止创作了,莫里斯·贝嘉去世了,迈克尔·杰克逊去世了……这都是当代舞蹈史上的重量级人物。所以,现在我们这些还活着的创作者,实际上还有一个机会,就是把我们的作品的秘密公开,传承给新一代的舞者和观众。

三联生活周刊:你计划自己在舞台上跳多久?

安娜·特蕾莎:我希望……能跳多久就跳多久。希望还能跳很多年。不过,《相位》可能跳不了多久了,这支舞对体力和准确度要求太高,消耗实在太大了。但是我还可以去跳其他的作品。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舞团在招募、考核舞者的时候,你认为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安娜·特蕾莎:以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舞蹈,并且倾其一生都保持这种严肃态度。■

舞蹈对我来说,最大的魅力就是能够用最具象的方式,去表达最抽象的思想。我希望……能跳多久就跳多久。



1



2



3



1.《水粒子的世界——金色》是 teamLab 根据超主观空间观念创造的虚拟瀑布

2. teamLab 在北京佩斯画廊展出的装置作品《花之森林：迷失、沉浸与重生》

3. teamLab 今年初在伦敦佩斯画廊举办的展览“超越界限”



2012年 teamLab 为东京晴空塔创作的壁画，真实与虚拟、历史与未来被无缝地混合在一起

超越自我 与世界之间的界限

文 / 钟和晏 图片提供 / teamLab

数字技术赋予 teamLab 一种改变自然的强大能力，在被他们数字化的“自然”中，四季鲜花可以在瞬间同时绽放，空白的墙壁也可以变成繁茂的森林。

第一次见到日本数字艺术团体 teamLab 的创始人猪子寿之是在深圳设计周 Mindpark 创意大会上，他的穿着举止似乎并不贴合一位数字时代精英的惯常形象，身穿一件皱巴巴的军绿色棉布帽衫，撕碎的线条从袖口悬挂下来。他不会英文，即使说的日语听起来也有些刺耳。

虽然他伴随着令人目眩的 PPT 演讲赢得了大会上最热烈持久的掌声，但是，当主持人试图与他讨论一些经营问题时，例如问“你最欣赏的人才特质是什么？你最想招什么样的人？”他的回答却是——“就我自己来说，我的性格上有点问题，所以，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面试，不知道我们雇了什么人。”然后，脸上露出像是得意又像是歉意的招牌式笑容。

猪子寿之的个人经历大概符合人们对一位东大毕业生的想象：他 1977 年出生在德岛县一个牙医家

庭，高中时决定投考日本排名第一的东京大学的最初动力，据他自己说是为了能与富家女结婚，然后掌管一家大企业。但是，在他入学考试之前，互联网已经出现了。“互联网真是令人吃惊，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对外发送信息，从世界自由地获取信息，这很浪漫不是吗？所以，我觉得不再是找富家女的时候了。”

2001年，他从东京大学数学工程与信息物理系毕业不久，就与几个校友一起创办了 teamLab，一家基于数字技术的创新公司，重点是探索技术、艺术与自然的融合。如今，teamLab 发展成由程序员、CG 动画师、设计师、编辑和建筑师等不同背景专家组成的“超技术团队”，今年总共有 17 个展览在世界各个城市轮番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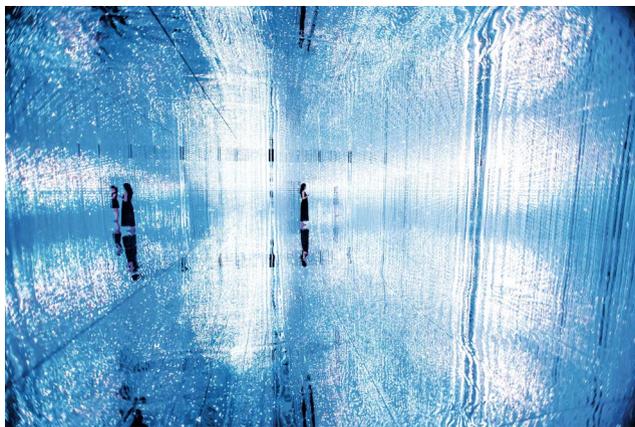
从 5 月 20 日到 10 月份，teamLab 在北京佩斯画廊举办中国首个展览“花舞森林与未来游乐园”。佩斯北京 2500 多平方米的包豪斯风格厂房已经变成限制入场的全封闭空间，一旦你被允许进入，你的眼前就会出现一个难以描述的幽暗与花朵的世界。成千上万、五色缤纷的花朵被投影到地面和所有的墙壁上，通常大自然中随着季节相继出现的鲜花，在这里上演着同时绽放的胜景，如果真有神话中的仙境，大概也就是这样繁花似锦的景象吧。

被投影的花朵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们在飞舞、绽放与凋谢。大簇的紫阳花伴随着背景音乐慢慢分离开来，花瓣在飘浮中消散。花朵重复着生与死的过程，如果你在它们面前停伫不动，周围的花朵就会长得更多，如果你伸手去触摸，花朵就会凋谢。

与 teamLab 的其他作品一样，这件名为《花之森林：迷失、沉浸与重生》的装置并不是循环播放预先制作好的影像，而是通过电脑程序实时演算绘制成的。眼前一瞬间的画面，错过就无法再看到了。

最近几年，teamLab 一直在反复呈现类似的“幻术”，比如作品《茶碗里鲜花盛开的无限四季》，点茶后，静置的玻璃茶碗中出现了绽放的鲜花。茶碗里的花卉随着时令变化着品种，可能是茶梅花，也可能是紫阳花，当茶碗被拿起时，花朵开始凋零。

又如《睡莲盛开的水面》，佐贺县武雄市御船山乐园的池塘里突然开满了多彩的睡莲，几百条锦鲤在水中游弋，触碰之下，鱼儿变成了花朵。池塘里还有一艘坐着划桨渔夫的小木船，木船静止不动的时候，锦鲤会聚集到小船旁，如果小船开始晃动，锦鲤就纷纷闪避着游开。



漫游水晶宇宙

Wander through the Crystal Universe, teamLab, 2015 年

这是由光点构成的雕塑作品，创作方式类似于点彩绘画，即用各种彩色的点绘制图像。数字控制的 LED 光点作为粒子，被三维地设置在空间内，表现宇宙空间中光的律动。由于使用 teamLab 开发的“Interactive 4D Vision”技术，观众可以自由地进入空间中，与光点融为一体，并且让光线持续地改变。

数字技术赋予 teamLab 一种改变自然的强大能力，在被他们数字化的“自然”中，四季鲜花可以在瞬间同时绽放，瀑布的水流可以变成鲜花流，源源不断地倾泻下来，空白的墙壁也可以变成繁茂的森林，还有麋鹿、羚羊等各种动物出现。

多年以来，teamLab 的作品都是基于一种他们称之为“超主观空间”的理论创作的。日本传统绘画往往被描述为平面化，因为它缺乏西方的透视，在将三维空间转换为二维平面的过程中，也许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日本空间逻辑。具体来说，teamLab 在电脑创造的三次元空间里建构立体的世界，然后摸索如何让这个三次元空间呈现出日本传统绘画般的平面化构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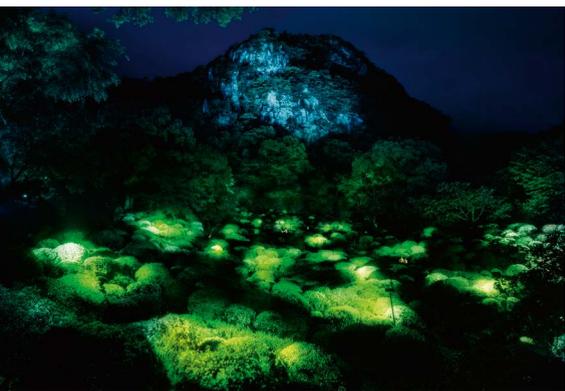
猪子寿之对此的解释是：“现代人对空间的认知是基于他们在照片和绘画中所看到的视角，一直到 19 世纪后半叶以前，日本人观察空间所得到的印象可能就类似于日本画，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透视法的空间认知理论。”

一个易于理解的例子是 2012 年 teamLab 为东京晴空塔（Skytree）一层创作的壁画——融合数字技术与江户时代盛行的版画手法，没有固定的焦点与时间轴，以总共 40 米长、3 米高的篇幅呈现东京

杜鹃花谷

Resonating Azalea Valley, teamLab, 2017 年

这是佐贺县武雄市御船山乐园内拥有 5 万株杜鹃花的杜鹃花谷，被投射的灯光所改变。每棵树上的灯光像呼吸一样时暗时明，当有人接近时，光线色彩产生变化并发出特别的音色，这种变化还会被传递到邻近的杜鹃花树上。



圆相

Enso, teamLab, 2017 年

teamLab 曾经花费 10 年以上研发在三维空间里书写的书法，立体地建构出书法的墨迹、笔画的深浅、力道的强弱等。这件作品将禅宗书画里的“圆相”以空书的方式在空间中一笔画出，在禅宗里圆相能反映观者的心境，对圆相的解读也因人而异。

城市的繁华风貌。从壁画上可以辨认出大量丰富的细节，比如著名的筑地鱼市、上野动物园、浅草观音寺等，如同江户初期描绘京都市街风貌的《洛中洛外图》的东京版本。

有 13 块显示动态场景的屏幕被嵌入壁画中，屏幕上汽车往来穿梭在道路和高架桥上，行人在走动，游船行驶在隅田川上，海豚跃入水中，大量的彩色气球飘向天空。

晴空塔壁画并不只是现代东京的风貌图，画面上身穿江户时代服饰的男男女女、杂耍艺人与上班族出现在同一条街道上，神仙妖怪正从彩虹大桥上飞过，真实与虚拟、历史与未来的东京被无缝地混合在一起。这个东京故事没有主角，每个人以各自的存在增添着东京的趣味。

日本传统美术中，对绘画进行折叠与分割是常见的技法，屏风是以折叠为前提的画架，拉门画是以分割为前提。用超主观空间理论呈现的平面，也就意味着这些平面可以被分割。面对晴空塔壁画，观众的视点是自由的，如果把某个部分分割出来欣赏，从逻辑上说，就能够进入这个部分所代表的空间之中。

最近几年，teamLab 创作过多件以瀑布为主题

的作品，电脑生成的水流包含着成百上千的水粒子，倾泻在虚拟的岩石上。这是电脑通过计算粒子的运动，生成根据物理定律降落的虚拟瀑布，瀑布的线条是由其中 0.1% 的粒子轨迹叠加而成，它们的弯曲程度取决于水粒子的整体互动。

《水粒子的世界——金色》就是这样一件影像作品，叠加的瀑布线条以一种强劲的力道向下滑落，高清解析度表现出影像中极其细微的部分，令人联想到与书法笔触和绘画线条之间的关联，被抽象化的瀑布似乎具有一种神秘的生命力。

“在传统日本绘画中，描绘河川、海洋等水的时候很多会以‘线的集合’来表现，这些线让人感受到生命的活力。”猪子寿之解释说，“如果用‘我们自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这种观察方法，很容易使人产生自然与自身之间没有界限的感觉。”

佩斯北京的展览上，《追逐的同时亦被追逐的八咫鸦》这件互动装置作品则提供了一种更加不同寻常的空间体验。以光描绘出的八咫鸦盘旋在空间中，它的轨迹化为光线并描绘出“空书”。当你站在被投影所包围的空间中，你周围的世界在晃动，地板与墙壁的界限似乎消失了，瓦解了现实的空间感。☑

专访 teamLab： 希望通过数字媒介扩展物理空间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 2001 年组建 teamLab 的初衷是什么？

猪子寿之：创办 teamLab 主要是为了满足我的个人兴趣。在我上大学之前，互联网出来了，我意识到一个全新数字社会的到来。我想有个地方，不仅我自己，还有各种不同背景的专业人士，我们能够一起实验和创作新的事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公司的名字包含了“实验室”这个词。硅谷的人才已经创造了许多技术创新，是我们无法与之竞争的高水平。所以，我决定把重点放在基于数字技术的艺术上，改变人们的艺术观念，这是硅谷不怎么涉及的领域。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是如何从不同的学科组合起来的？

猪子寿之：大部分的初始成员是程序员和工程师，其实我们一开始就在创作艺术装置，但是没有展出的机会，必须通过各种商业项目、为企业提供解决方案等，从经济上维持我们的艺术生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增加了画家、数学家、建筑师、CG 动画师和硬件工程师等，达到现在 400 多名成员的数量。我们以超越专业领域的范围成为一个团队，就像科学研究一样，由思考和工作团结在一起，没有人是单一的艺术家的。

三联生活周刊：通常一件作品从设计到完成是怎样的过程？

猪子寿之：每个项目由 3D 动画制作者、传感器工程师等各具专长的技术人员组成，根据不同项目，在一个项目上工作的人数从几个到 20 多个不等。比如，有的作品是受日本古典绘画启发获得的主题图案，我们先在电脑上创建一个三维的空间，在此空间中绘制出人物、花朵、书法笔触等，然后把图形转换成动画。也有的视频装置运用实时渲染短片，通过编程和来自传感器的位置信息而创建，并进行交互式表达。有时候，我们借助读取手机信息的设备，在观众与作品之间形成互动关系。说实话，一开始我不会去设想作品的最终版本，它们是在不断实验、错误和改进的过程中完成的。

三联生活周刊：teamLab 提出的“超主观空间”观念是与日本动漫和游戏有关联？

猪子寿之：我从小沉迷在电脑游戏和漫画书中，有一天当我看日本古典美术作品时，突然意识到电脑游戏和漫画在平面上的呈现方式，与传统日本画有相似的地方。比如畅销游戏《超级马里奥兄弟》诞生于京都，它描绘了以平面表现的风景，用完美设计的层次来表达空间背景，与使用透视法的立体景观非常不同。你需要水平滚动，才能移动到下一个阶段。这个超级马里奥游戏就反映了日本传统的空间识别方法，你可以同时观察整个场景，不受单一视点的限制。我认为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总是保留了一些固有的“超主观空间”观念，足以影响我们的当代文化，它潜意识地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心理中，在动画、漫画和电脑游戏等形式中表现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追逐的同时亦被追逐的八咫鸦》这件作品也是与电脑游戏有关吗？

猪子寿之：八咫鸦 Yatagarasu 是一只三条腿的神奇乌鸦，引导灵魂飞越空间，身后留下明亮的运动线。创造这个作品的时候，其实我们参考了动漫艺术家板野一郎 (Ichiro Itano) 的手法。板野以所谓的“板野环形交叉”闻名，如《超时空要塞 Macross》中的导弹齐射。飞行的导弹不是从一个具体角度出发，他夸张了运动轨迹，看起来好像一台高速摄像机与导弹一起在空间四周移动，这种表达方式让人真切地感受到来自屏幕的动态能量。

三联生活周刊：teamLab 的创作从“超主观空间”理论获得的益处是什么？

猪子寿之：通过数字技术创造的图像会不停地变化下去，所以，我们不可能完美地设计它。不过，我们需要让这些变化着的图像保持同等美丽的水平。西方透视法可以在照片中捕捉到最美的时刻，但是在视频中是不可能的。可以说，利用“超主观空间”逻辑让我们在艺术作品中保持了同样的美感。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你们的作品总是集中在鲜花、瀑布、池塘、森林等自然的主题？

猪子寿之：我出生的德岛是一个有着茂密原始森林的地方，我一直觉得大自然就像是蕴含着巨量信息的神秘媒介。我们选择自然作为对世界的抽象表达，因为水是生命之源的形式，花朵是生命循环



日本数字艺术团体 teamLab 创始人猪子寿之

的代表，而流水是自由的、柔软的、没有固定的形状，我觉得它与数字技术非常吻合。

三联生活周刊：当代艺术中似乎有越来越依赖技术的现象，尤其是电脑技术？

猪子寿之：与使用物理材料创造的艺术相比，我认为数字表达是被低估的。我们根据作品的主题和概念，选择和开发最佳的技术，所以 teamLab 并不是专注于技术本身，确切说是“数字化”的概念。似乎从硅谷起源的技术，主要焦点是个人想法的延伸：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肯定是个人思维的延伸，Twitter 是个人陈述的延伸，Facebook 是个人关系的延伸。在数字化领域，自我意志是主要原则，个人应用是先决条件。相比之下，teamLab 更希望通过使用数字媒介扩展和改变物理空间，同时间接地改变占据空间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从“超主观空间”以来，近年来你们有理论与作品上的新突破吗？

猪子寿之：“超主观空间”是自己看世界的方法，现在我们更着重于如何打破和扩散自我与世界的界

限，就像《水晶宇宙》这样我们称之为“身体的沉浸”式作品，观众把自己完全融入水晶宇宙中，迷失了方向，这种迷失就是沉入、沉浸的体验过程。透过数字技术从物质媒介中获得解放的作品，在边界上会变得暧昧。伦敦佩斯画廊的“超越界限”展览中，我们就是在探索艺术作品的边界被移除时出现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我们正在寻求如何超越各种边界。

三联生活周刊：听说你曾经有两年时间放弃固定的住所，在东京过着无家可归一般的生活，选择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猪子寿之：这大概是 8 年前的事情了，小时候从学校学到了“食物、衣服和住所”的重要性，我想知道它们究竟有多重要，没有这些又会怎样。那时我抛弃了所有，全部财产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就是身边这个手提包，包里有护照、信用卡和电脑等。出乎意料，即使这样我也过得很好，另一种意义上，整个东京都变成我的家。我发现如果有个房子人会变懒，没有固定住所，每天都会有种迫在眉睫的感觉，精力变得旺盛，生命的力量也更强大了。☑



1

文化挪用是一项“罪名”吗？

记者 / 杨聃

“文化挪用”听起来是个有点儿严肃的词，通常指从非自身的文化表达方式或人造用品历史中借用概念。这在商业中并非新鲜事，尤其是时尚圈。

高级时装和部落文化

最近因网红 Jeffrey Star 在社交网络上炫耀了一下香奈儿的黑色木质回旋镖，香奈儿遭受了网友们的声讨。他们认为这只美国标价 1350 美元的回旋镖涉嫌“文化挪用”，奢侈品牌为了牟利把最早作为澳大利亚边缘化的原住民们用于狩猎的武器，打



1. “维多利亚的秘密”超模佩戴灵感源于北美印第安原住民的羽毛头饰
2. 华伦天奴以非洲为灵感的服装系列
3. 香奈儿回旋镖
4. Osklen 以阿沙尼卡部落为灵感的亚马孙红

3

4

造成了价格高昂的运动娱乐消费品，然而，那些土著居民却仍在遭受歧视。

事实上，从2005年开始，回旋镖就出现在香奈儿的配件系列里了，同时还有网球拍和冲浪板等。“对有群体因此感到被冒犯而深感遗憾。”官方声明中说道，“该产品灵感来自其他国家的休闲活动，我们无意贬低澳大利亚原住民、托雷斯海峡岛民，和作为文化客体具有重要意义的回旋镖。”

先抛开这次的箭靶，“文化挪用”听起来是个有点儿严肃的词，通常指从非自身的文化表达方式或人造用品历史中借用概念。这在商业中并非新鲜事，尤其是时尚圈。1967年，伊夫·圣罗兰的非洲系列开启了T台上西方人对非洲的又一次“掠夺和扩张”。从60年代的非洲动物斑点图案，到1997年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以马赛人（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游牧狩猎民族）为灵感的迪奥设计高级定制，再到亚历山大·麦奎因2000年推出的ESHU系列的原始主义等等，高级时装品牌都在挖掘“部落文化”这块宝藏。

华伦天奴品牌创意总监曾邀请以《阿富汗少女》肖像而闻名的《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史蒂芬·麦柯里（Stephen McCurry）为广告掌镜。在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里，镜头前的模特们站在金合欢树下，身穿以部落族群为灵感的高级成衣，与马赛人一同放哨。设计师因大量起用白人模特梳起“玉米辫”并佩戴部落风格饰品，而被指责有“文化挪用”之嫌。

将非洲元素作为灵感就是会带来这样的麻烦，连渡边淳弥（Junya Watanabe）也领教过了。对于以辽阔东非稀树草原为拍摄背景的2016春夏系列，创意总监皮耶尔保罗·皮乔利（Pierpaolo Piccioli）坚持道：“我们想要呈现的不是什么非洲风情明信片。它叠加于我们的文化之上，创造了一种在部落文化与我们自身文化之间的新平衡。”这种美学层面上的对话已持续多年。“‘同一个世界’，不是说我们被数字化科技联系在一起，而是我们彼此之间相互了解。”但讽刺的是，该秀场上约90个造型，只有8个是有色模特演绎的。无论初衷是什么，结果事倍功半。



古驰也刚刚经历了类似的事件。在佛罗伦萨举办的2018年早春度假系列发布会里，模特阿兰娜·亨利身穿的河豚袖皮草夹克，像极了1988年设计师Dapper Dan——真名丹尼尔·戴——为奥运会运动员黛安·狄克逊设计的那件，最明显的区别在于袖子上少了路易·威登的标志。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说唱歌手、运动员到毒贩子，丹尼尔·戴差不多给每一位黑人设计了衣服。他大胆地把迪奥、芬迪、路易威登等高级时装标志用在了自己的作品里——外套、衣服、汽车内饰。因为被控告商标的非法使用，他在1992年被迫结业了黑人区125号的店铺。如今想来，商标狂热的风潮（logomania trend）就是从他而起。

古驰此次的“致敬”造型算是对这位一直非法贩制品牌产品的设计师发出的认可证书，毕竟是他先非法盗用了品牌的商标。但网友们可不这么想，别管全部起用黑人模特的2017年早秋广告思路是不是来自丹尼尔·戴的造型，其灵感是否可追溯至上世纪70年代末纽约嘻哈界与英国北方的灵魂运动

（Northern Soul），他们坚持声称该造型的发挥盗用了黑人文化的创意。

如今时尚灵感可以来自任何地方、任何时代或任何文化，《时装商业评论》将这些创意称为文化智商（Cultural IQ），比如维多利亚的秘密超模身穿缀有北美印第安原住民的羽毛头饰与比基尼走上时装天桥；马克·雅可布以白人为主的模特阵容梳着Dreadlocks脏辫。在“文化挪用”正式出现在学术领域之前，人们还会老生常谈地把那些借来的敏感概念与种族或地缘政治放在一起。如今，它们统统被归入了这个不明觉厉的指控中。

似有还无的罪名

如果文化挪用是一项罪名，问题出在“文化”上还是“挪用”上？很显然不是后者。艺术家理查德·普林斯所谓的“挪用艺术”（appropriation art），翻拍了帕特里克·卡瑞奥所拍摄的万宝路香烟广告后除掉文字，原封不动地作为自己的艺术作

品在画廊展销，并创下了摄影作品拍卖 120 万美元的纪录。这类的官司都能打赢，还集结办了展。

时尚界里的类似案例更是不胜枚举。当年麦奎恩曾联系过英国战地记者唐·麦库宁，希望得到他的允许重新创作其拍摄影像中的衣服。虽然麦库宁拒绝了，麦奎恩还是硬着头皮做了。可见，时尚行业接受“挪用”，只要不以复制为目的就好。

难道，问题在文化上？也不像。当川久保玲、三宅一生和山本耀司首次登上巴黎时装周的舞台时，他们的服装不分男女，没有定型，对大量使用垫肩和华丽装饰的潮流形成挑战。1982 年，三宅一生以藤做人体雕塑，设计了服装式的外在骨骼；川久保玲则把编织机的程序彻底打乱，结果编织出来的衣服不是有窟窿就是有抽丝；山本耀司破败的褶皱边和残破的美是对 50 年代席卷日本的消费品浪潮的直接反映。这三个人，设计的异常的观念大多数源于传统日本的黑色长袍、武士盔甲和艺伎和服，评论家喜欢这种唯理智论的服装，虽然至今服装背后的气息西方人仍然不能完全理解。

正如《谁的文化？美国法律中的挪用与真实》一书的作者苏珊·斯卡菲迪 (Susan Scafidi) 说的那样：“让所有文化都像博物馆里的陈列品那样被封存在自己的时间里是不公平的，文化挪用有时能成为它们的救星。”

巴西运动品牌 Osklen 和南美洲最大原住民族群之一的阿沙尼卡部落 (Ashaninka) 之间的合作就是如此。该品牌创始人兼创意总监奥斯卡·麦兹艾维特 (Oskar Metsavaht) 从阿沙尼卡部落的考察中带回了图样和概念，为其 2016 年春夏系列作参照：丝质硬纱上的图腾经过了再创作的处理，森林植物特有的“亚马逊红”为整个系列奠定了基调，所有跟丛林、部落和野生动物相关的元素都出现在了外包装和官网上。相应的，麦兹艾维特为使用其文化为灵感向阿沙尼卡人支付了版权费用，并通过宣传来提高公众对该部落免遭非法砍伐的环境保护意识。

虽然不是每一种文化挪用都能对弱势群体形成实质性的保护作用，但如果没有文化挪用就没了当下流行的巴拿马帽、编织篮子袋，也不会有曾经的黑人朋克和嬉皮士风格。设想一下没有了采样和混音，当代音乐，尤其是嘻哈音乐，会变成什么样？如此说来，真正令人反感的是“不当挪用” (mis-appropriation) ——那些表面化的、带有剥削性质的挪用。☑



2



3



4

1. Marc Jacobs 秀场

2. 华伦天奴在非洲拍摄的大片

3. 澳大利亚版 *Vogue* 的服装大片

4. DSquared2 2016 秋冬系列

一本流行科学杂志的生存之道

记者 苗千



《新科学家》杂志执行主编格雷厄姆·劳顿

《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杂志于1956年创办于英国伦敦,因其多年来致力于为普通读者提供科普阅读资料而享誉全球。前不久,该杂志出版了一本“咖啡桌书”——《万物起源》(*The Origin of (almost) Everything*),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为这本书撰写了导言。从宇宙大爆炸到人类文明,该书把世界归纳为六大类53个题目,试图为普通读者用尽量简单的方式讲述我们身边几乎一切事物的起源故事。2017年这本书出版了中文版,本刊专访了《新科学家》杂志执行主编格雷厄姆·劳顿(Granham Lawton)。

三联生活周刊:能够简要介绍一下《新科学家》杂志吗?

劳顿:《新科学家》是一本从1956年开始在英国发行的流行科学杂志,这是一本周刊。在英国,我们每周有大约20万的读者和300万在线读者。我们是一本面向普通人的杂志,并不是专业杂志,专业科学家当然并不需要阅读这样的杂志来了解科学

界。我们只是面向那些对科学、技术、医学感兴趣的普通读者。我们在英国和美国,还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有50名科学记者。我希望中国的读者有一天也会喜欢这本杂志,我们把非常精彩的科学世界用一种大多数人都能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这本科学杂志如何生存?有很多英国读者对于每周阅读科学新闻感兴趣吗?

劳顿:我们确实很幸运,能够使用科学界的语言来出版一本科学杂志。这让我们在全世界,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和地区都有很多读者。我们认为我们杂志的潜在读者要远多于英国的人口,我们通过卖杂志就可以生存,也能接到一些广告。虽然全世界的杂志市场都在衰退,广告市场急剧缩小,但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些广告的,虽然这些收入不足以支付工资。你知道以前有很多人买我们的杂志就是为了看上面的广告,因为上面有很多的工作招聘信息。目前我们有很多的订户,所以我们仍然在盈利之中。即使仅仅在英国,也有大约50万人是我们的“核心读者”。现在一个问题在于,很多英国的日报开始常规性地报道科学内容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威胁。我们必须尽力让自己显得不同。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有没有想过完全抛弃纸质的形式,把杂志变成完全的网上版本?

劳顿:我想两者我们都要做。传统杂志市场虽然在衰退,但是我们不认为它会完全消失。要办一本网上杂志,需要调动所有的网上社交资源。纸质杂志仍然是我们最重要的销售渠道。实际上,有点奇怪的是,在英国过去一年里杂志市场的衰退停止了,反而有一点增长。可能是因为被世界局势刺激吧,人们需要在报纸上读一些关于英国脱欧、特朗普、法国大选之类的消息。他们一开始是从电视新闻上获得消息,之后就会买报纸杂志来深入了解。和四五年前的市场相比,现在英国的杂志市场看起来更健康。

三联生活周刊:为了吸引读者,你们有时候会不会有意选择一些非常吸引人的标题?例如这一期的封面标题是《时间和空间正在泄漏》,我自己学物

理学，但是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所以很想买一本带回家看看，这是一种策略吗？

劳顿：是的。我们必须尽量卖掉杂志，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读者感兴趣。有些话题是最吸引读者的，例如宇宙学、物理学故事，人类从哪里来，脑科学，进化论……还有像私人健康和营养学之类。我们会有意倾向于这些话题。

三联生活周刊：在中国很容易流传各种伪科学谣言，你对中国的科学记者有什么建议？

劳顿：其实英国也很相似，这里也有关于科学的各种谣言、阴谋论之类的，包括关于转基因食品、疫苗的谣言，否认气候变化等等，我的建议是，尽量严谨地做你的工作，检查你的信息来源和内容，让你的文字不要违背科学事实。但是另一方面，我想实际上你无法改变人们的想法，一点都做不到。人们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事情。事实和证据并不会改变人们的想法，只会让人更加觉得自己是对的，（反对科学的）人更认为科学是一种阴谋。

三联生活周刊：让我们来聊聊《万物起源》这本书吧，它在2017年4月刚刚有了一个中文版本，在中国出版了。

劳顿：我们早就有这样一个计划，想出版一本“咖啡桌书”（放在咖啡桌上让所有人都有兴趣读的书）。我们想写一切从何而来，整个宇宙，包括我们自身。在科学世界里有如此之多的创生故事，而且在很多文明里都有关于创生的传说，例如太阳从何而来、人从何而来等等，当然这些故事都是错误的。在100年的时间里，科学把这些故事全部都扫除了。我们所撰写的科学创生故事从非常大的话题一直到非常小的话题，包括在一些小标题里，讲述行星、暗能量、暗物质、黑洞等等，然后集中到地球的大气层、水、生命，性如何演化，还有昆虫、恐龙……然后我们又转移到人类，包括语言、文明、进化，还有人类社会的金钱、葬礼、音乐等各个方面，还包括科学、数学、量子力学……这些段落都很短，我希望所有人都愿意去读一读。

三联生活周刊：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市场上关于解释一切的书太多了？例如霍金自己也出版过一本

在学校上学时，老师会给你讲有关科学的“事实”，却没有人告诉你这些事实是从哪来的。科学是一个正在发展的过程，不能回答一切问题。

类似体裁的《大设计》(The Grand Design)，这是否会给读者带来一种错觉，以为人类已经理解了一切，而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这样？

劳顿：我想确实可能会给读者这样一种印象。在学校上学时，老师会给你讲有关科学的“事实”，却没有人告诉你这些事实是从哪来的。科学是一个正在发展的过程，不能回答一切问题。但我并不认为现在有太多的（解释一切的）书，书毕竟是好东西，我想人们还是很愿意读书的。

三联生活周刊：《新科学家》并不是一份同行评议的科学杂志，那么你们刊登文章的标准是什么？

劳顿：我们报道值得信赖的科学新闻，这需要有值得信赖的来源，比如被可信的科学杂志报道过。我们的科学记者都有科学背景，在很多时候需要依靠他们，比如有些尚在争论之中的话题，我首先需要问我的同事该如何抉择，一些选题和科学家是否值得信赖。我们报道的大多数科学新闻都是经得起时间检验，被很多科学家和学术会议讨论过的。

三联生活周刊：最后一个问题，你对未来50年有什么畅想？

劳顿：我想气候肯定会发生变化，而且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像伦敦和上海这样在海边的城市可能都会沉到水下，看起来目前我们没什么办法能够阻止气候变化。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非常快，现在常有人讨论技术的奇点(Singularity)爆炸，对于这一点我不大相信，因为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技术会突然发生爆炸性的进展。在科学方面，我想或许到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结合了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终于有了一个大统一理论，而我们对人的生理方面也会有更强的控制能力，基因工程、基因改造方面都会有很大的进展。■

22 块奥运金牌下的“恐惧文化”

文 / 张斌



2016年8月11日，英国队在里约奥运会场地自行车男子团体竞速赛中夺冠

过往三届奥运会，英国自行车队总共拿下了 22 块金牌，堪为英伦“奥运争光”之第一大项。比对中国奥运军团，也只有跳水的夺金总量能与之接近。据闻，当下中国竞技体育统帅部正准备积极推广英国自行车的强盛之道，吸收营养，走科学之路，以求金牌狂潮可以来得更猛烈些。

英国自行车近些年的确是成功学的重要标识，超越竞技范畴，直抵商界，企图教化人心。奥运夺金者往往授勋晋爵，一时风头无二。但如今的英国自行车运动形象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困境，一份出笼多日的独立调查报告，矛头直指英国自行车协会和英国体育（UK Sport）两个组织，认定在奥运金牌光环之下，英国自行车运动在追求奖牌的历程中盛行“恐惧文化”，胁迫之下运动员很难表达自我的真实感受。英国议会文化、传媒和体育委员会主席达米安·柯林斯公开说，英国自行车协会面临全面变革，包括主席布朗宁在内的核心管理者必须离职。“协会糟糕的管理架构，让他们往往回避与著名教练之间造成矛盾，对团队内部不正常的文化氛围形成要负全责。”

英国自行车协会反应强烈，回应独立调查报告称：“信息错误，误导公众。”王者之师也好，金牌工厂也罢，英国自行车协会在去年上半年之前完全可以在荣

耀中安享岁月，但随着一位名叫杰西·瓦尼什的女选手被粗暴地逐出里约奥运会精英计划后，荣耀的光晕旋即被击碎。瓦尼什向媒体透露，英国自行车队中充斥着“霸凌”现象，性别歧视无处不在，在她离开精英计划的时刻，技术总监、澳大利亚人萨顿冷冷地说了一句：“走吧！生你的孩子去吧。”

瓦尼什通过律师向萨顿提出多达九项的指控，并威胁要与英国自行车协会对簿公堂，她本人评论那份独立调查报告不够犀利，还在“粉饰”英国自行车协会。萨顿起初被停职，里约奥运会前被迫辞职，这位英国自行车奥运荣耀的奠基者据说平日里对残疾人士和女性常常口出恶言，去职实在也是咎由自取。瓦尼什为个人尊严而战，原本想是向自行车协会投掷了一枚小小的石子，但如今眼看着大厦将倾。

霸凌和歧视远非英国自行车协会仅有的麻烦，还有一项更为严峻的指控亟待澄清。英国反兴奋剂组织目前锁定了 2011 年环法赛中，同时为天空车队和英国自行车协会工作的医疗官弗里曼曾经从英国飞抵法国，将一神秘小包裹交到著名车手维金斯手中。车队辩称小包裹里是解除凝血的一般药物，但随即得到迎头痛击，解除凝血药物不过 8 欧元一包，何苦要费此劳顿。如果不顾一切地查下去，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敲钟人”维金斯以及其他英国奥运自行车名将会面临药瓶里的困境。

兴奋剂迷局一时难以揭开，英国自行车协会同时还要承担另外一项压力，那就是奥运夺金花费过高，东京奥运会周期，英国体育将为自行车项目拨款总计 3300 万美元。根据最理想的投入回报原则，不仅要合算每一块奥运奖牌的成本，还要看对公众参与的拉动效应，这就是所谓的奥运遗产，但很可惜伦敦奥运会之后，公众参与热情缓慢下降。因此，那些得不到英国体育资助的项目自然会指责运动投资理念过于偏狭，只注重夺金，而忽略运动的多样性和平等。

英国自行车曾经何等荣耀，当下则要接受各方的严格审视。金牌，竞技体育的终极产品，无人不爱，但因此无视人类共有的价值观，迟早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英国自行车运动科学体系长久还会被视为经典，但根深蒂固的傲慢、粗暴与疯狂，会让这项运动变得“极为不科学”。■

特朗普在中东玩的是“红白脸”？

文 / 宋晓军

6月14日，当特朗普再次批评卡塔尔向恐怖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与卡塔尔国防部长阿提亚（Ghalid al-Attiyah）签署了一份价值120亿美元的协议——向卡塔尔出售36架F-15QA重型战斗机。看到这则消息后，我马上就想到了这篇文章的标题：特朗普在中东玩的是“红白脸”？我之所以想到这个标题，主要是源于协议签署后卡塔尔防长阿提亚说的一句话和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治国理念。

在协议签署后，阿提亚对媒体说：我们认为该项协议不仅为卡塔尔提供了自身的安全能力，而且也减轻了美国打击极端主义的负担，该协议将为美国42个州提供6万个就业机会（波音公司F-15生产线需提供各种服务）。看了这段话，不能不佩服阿提亚对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了解。事实上，在2014年3月因卡塔尔支持埃及穆兄会发生了沙特、阿联酋、巴林召回大使的“外交风波”后，卡塔尔就迅速与奥巴马达成了一份价值110亿美元的军火交易协议。尽管这份包括“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爱国者”反导系统和“标枪”反坦克导弹的“军火大单”颇有争议，但在“中期选举”期间，国会还是顺利批准了这笔交易。2016年大选期间，奥巴马政府再次与卡塔尔达成了价值210亿美元、出售72架F-15QA的意向协议，但

直到特朗普当选后卡塔尔也没与美国正式签署这份协议。但在这次“断交风波”发生后，卡塔尔则马上将其中的120亿美元“正式协议”作为见面礼送给了参与策划了“断交风波”的特朗普，卡塔尔这一举动无疑凸显了“小国大外交”的风格。

那么卡塔尔送给特朗普的见面礼——42万个的6万个就业岗位与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治国理念有什么关系呢？从“中期选举”的角度看，特朗普自然重视6万个就业机会。因为空军在2018财年为恢复其“糟糕的作战准备”（6月13日政府问责署发布的报告显示，空军的飞行员缺口为1500名，维修人员缺口为3400名，只有不到50%的部队符合战备标准），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去采购飞机帮波音公司拉动就业（2018财年空军申请购买飞机的钱约为150亿美元）。而特朗普也不可能拿出更多纳税人的钱为波音公司解决就业。原因在于，据知名就业大数据分析公司IMPLAN提供的数据显示，每百万美元投入只能创造6.9个军工就业岗位，但却可创造19.2个初中毕业水平的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如果用“拉选票”的政治投资收益标准来衡量，特朗普无疑会优先选择后者。因此，用来解决波音公司等军工利益集团就业岗位的“头寸”，最好还是能从沙特和卡塔尔等国的钱袋子里出。而这，也许就是特朗普先拉沙特，再抨击卡塔尔，然后再由国务卿和防长出面对卡塔尔“唱红脸”的真正原因。

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上述推论是成立的，那么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态度也是一个佐证。根据伊朗英文电视台的消息，6月13日美国前国务卿克里对媒体表示，沙特等中东国家的领导人曾向奥巴马政府施压，称“轰炸伊朗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而眼下无论是“拿了人钱财”的特朗普，还是国务卿蒂勒森和防长马蒂斯，都在对伊朗“唱白脸”。那么接下来美国真会为沙特等国“消灾”而去轰炸伊朗吗？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美国与卡塔尔签订出售战机协议的两天后，第二次到访伊朗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与伊朗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举行了一次联合演练。演练前伊朗海军官员表示：这次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到访，表明两国关系的提升空间是无限的。☑



（视觉中国供图）

4月22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卡塔尔，并与卡塔尔国防部长阿提亚会谈

王德威：召唤虚构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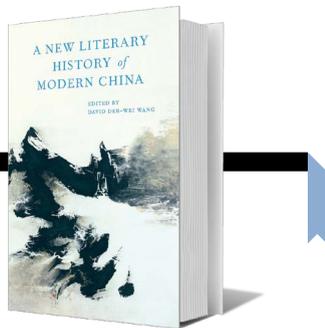
记者 艾江涛

“我认为小说是一个众声喧哗的结构。它教导我们喜怒哀乐，教导我们穿衣吃饭，也教导我们各种可说不可说的禁忌与向往。所以在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小说是一直参与中国现代性建设的一个重要媒介。”



(蔡小川摄)

王德威与他主编的《现代中国新文学史》



6月初，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前来北京领取“21大学生世界华语文学人物盛典”首届致敬人物一奖。在飞机上，他读完了王安忆今年新出的一本小说《红豆生南国》，一个中年男子在香港的生存故事。作为一个研究现代文学的专业读者，阅读小说是题中之

义的功课，但小说对于他的意义，绝不如此简单。

王德威曾在2006年北大的一个系列讲座中谈起自己的一次阅读体验：“我记得在大学二年级时，当时的台湾大学外边还有一条小小的人工河道，有一些黑市书店专卖盗版书籍，如大陆的书籍等。有一次我找到了一本书，它的题目是《边城》，这是我第一次对所谓的中国现代文学稍微有一点见识的开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在两岸隔绝、各自建构的文学史讲述里，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自然在两边都不受关注。一次阅读为王德威打开了既有政治、历史格局的束缚，也让他开始迷恋小说的阅读与研究。

在美国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之后，王德威先后任教于台湾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等高校。在夏志清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所开辟的海外中国文学研究传统中，王德威被视为继夏志清、李欧梵之后的第三代学者的代表人物。从晚清小说蕴藏的丰富现代性，到将小说作为想象中国的方法，王德威在小说研究中自由出入，既在文本中比较过鲁迅与沈从文的“砍头”经验，也从鲁迅早年对科幻小说的译介，一路谈到刘慈欣所创建的科幻世界。学者许子东曾带着调侃将他这种研究方法形容为：“有些人是这样，他跑到这个花园里，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他就在东边摘一朵花，西边砍一棵树，那边取一块石头。你开始不明白他要干什么，这些花和石头表面上是没什么关系的，可是，他把它拉起来一讲，哇，你发现可以讲出一个道道，可以有很大的启发。”

但在比较方法之外，真正让王德威念兹在兹的，其实是小说作为一种虚构文学，其想象本身蕴藏的力量。正如他在采访中所说：“小说确实说明了许多历史要刻意隐瞒或埋藏的东西。”如何透过小说召唤那些隐匿历史中的“鬼魂”，也因此成为他所说的“20世纪末作家们的共业”。

这些年他在启蒙与革命的两极叙述中，不断追溯中国文学绵延不绝的抒情传统。在2006年出版《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一书之后，他在2014年与陈国球合编了《抒情之现代性》，使“有情中国”的论

述更为系统化。而更多体现王德威将小说与史互动的，是今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他主编的《现代中国新文学史》。在这本由150篇小文章组成的新文学史中，时间从1635年的明朝一直延续至科幻小说中的2066年，空间上则在中国大陆以外，也纳入了中国港台地区，乃至马华文学（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等他所称为“华语语系文学”的范畴。可以从书中看到，虚构的力量从小说延伸至文学史，乃至历史的实践与叙述中。

6月8日，王德威在他与人大作家班的交流活动结束之后，接受了本刊专访。

三联生活周刊：从你的演讲和谈话中感觉到，你的阅读量之大令人惊讶。你平时是如何读书的？最近关注的书或话题是什么？

王德威：阅读对我来说确实是个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一个专业读者，阅读既是专业研究的需要，同时也是一种消遣。我在这样的工作中，找到一种很好的结合。

我刚刚重读了黄锦树的一本小说《鱼》，讲述的是他《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里的一个后续，所谓“花果飘零”的马华社群现象。我也刚刚在飞机上读了王安忆的《红豆生南国》，讲述一个中年男子在香港成长生存的来龙去脉，还有他几次可笑的没有结果的相亲过程等等。

我没有说最近刻意关注哪个话题。有一些书稿还没出版，正在看。比方说台湾有个非常受尊敬的作家叫林俊颖，就是朱天文、朱天心他们那个“三三”小作家群里的一位作者，他有个新作品叫《猛暑》，是对台湾现当代政治的反思，写得特别有意思。我正在读这本书，会为它写序，应该在今年8月出版。

我对中国台湾地区和海外书籍的资讯了解还比较完整。反正谁有机会告诉我什么有趣的作品，我就会读读。（人大）作家班的双雪涛比较有名，原来我不知道，3月时，复旦一个学生告诉我，说你必须读双雪涛，他怎么怎么好，还寄给我好几本，其中就有《平原上的摩西》；不但如此，这个学生（发来）的读后感我也得看。所以有时候，阅读是有意无意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知道夏志清先生是以文学性去品评作品或建构他的小说史叙述，你评论作家与作品的标准或尺度是什么？

王德威：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尽量试着回答。夏先生是我的伯乐，我后来接续了他的工作，我特别感谢他的提携。但是两代人毕竟在文学品位，对文学史的看法，还有对批评理论的运用上，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在他的“新批评”时代，特别强调文本本身周延的精致密度，特别强调作品本身能带给读者的最大能量的生命启示。无论如何，精致的文本是他研究的起点。

到了我们这一代，对文本的阅读精致与否仍然是我们的基本功，但可能没有像夏先生那么强调，只将文本作为一个判断的绝对标准。我常常开玩笑，有的时候最差的文本（比如晚清小说中大量不太精致的作品），因为它的话题性，反而成为一个很有趣的文学研究对象。文学作为一个有社会脉动意义的文化象征物或文化产品，很难用一个单一标准来说明它的好与坏。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社会或者我们这样一个群体，没有一个判断文学价值的客观尺度。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尺度，所以我们才不断试炼这个尺度的有效性与否。只是我大概不会说，我们希望的是这样的好文学，你们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所以不是好文学。

三联生活周刊：或者换个问法，你更关注哪一类作家与作品？

王德威：我特别关注的是文学与历史和政治互动的作品。不论是我过去的研究（我开始做茅盾研究，后来做沈从文），还是现在，都会强调那个部分。我会倾向于阅读那些也不是话题性的，而是会在很多问题思考上刺激我的作品，是在政治、历史、思想史层面，让我觉得有所感发、有话想回应的作品。

所以我今天在问答（人大作家班）同学时特别强调，我觉得在当代中国，我们依赖哪一位伟大的历史学者、哪一个伟大的思想史学者，对这样一个现实社会做出定论式的评判，无论从客观和主观的局势来看，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文学采用最细腻

最缜密的方式来书写、来铭刻、来批评现当代的中国——不论是在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海外，我都觉得这仍然是我一个很强的信念。

你讲到夏志清和我的差别，我会把文本的概念扩大，我认为历史本身就是一个文本。对我来说，看小说，也就是观察这个社会、关心这个社会的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小说与历史之间如何互动？

王德威：这是一个千古的问题。我刻意反问你，你觉得历史是可信的吗？我在台湾成长，所接受的历史和你们在大陆成长的人，肯定是不同的。我们在台湾常常有一句很可笑的讽刺国民党的话：“国民党的地理课就是历史课，国民党的历史课就是文学课。”国民党已经失去了中国大陆，但我们所学的中国地图有35个省，那是“历史的地理”。国民党告诉我们的历史，到后来发现，原来这就是文学。虚与实之间的问题，是千古的问题，对这个话题我当然有很多思考，我用《论语》里面的一句话，文、史之间哪个是真正的虚构，或者哪个是真正借助语言的华丽性来铺陈夸张？很可能历史的虚构性、夸张性，不亚于文学。但文学毕竟是不同的学科领域，我认为文学就是文学，千百年来就有这样一个领域，必须依赖我们的想象力和我们的经验糅合起来，见证历史，同时也发明历史。

三联生活周刊：说到文学对历史的发明与想象，从晚清小说“被压抑的现代性”论述开始，你对科幻小说一直情有独钟，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在刺激着人们对未来的想象，请谈谈你对中国科幻小说的看法。

王德威：科幻是晚清小说文类非常特殊的一个发展，晚清小说大宗是狭邪小说，还有公案小说、谴责小说。科幻是到了1900年之后，十年之间突然冒起来的文类，一下子成为引起很多读者关注和作家写作的热潮。那时的科幻小说尽管非常有魅力，但是它的文字基本是不够好的。但它对中国现实处理的张力，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时空，引人入胜。很多怪异的场景，对未来中国的想象，不论是乌托邦还是恶托邦（反乌托邦），我都觉得非常特别。

现在到了21世纪又一个科幻热潮出现。科幻小说很奇怪，在过去是儿童文学，我前几年就知道北师大的吴岩教授，还有韩松、飞氖。2007年还是2008年，我们在上海复旦开了一个会，关于新时期的文学现象。韩松和飞氖来了，他们很谦卑，说：“我

们是儿童文学作家，不登大雅之堂。”大家都觉得特别可笑。

我最初知道《三体》是我的学生宋明炜推荐的。有一次我在复旦开完会，在旁边的五角场吃饭，宋明炜说他最近看到一些作品很有意思，尤其是《三体》。我说什么叫《三体》？刘慈欣这个名字从来没听过。宋明炜也是个热血青年，说：“我去给你买一本！”过了半小时满头大汗回来了，他说只买到一本，那时《黑暗森林》还没出。

看了我就特别奇怪。我必须说刘慈欣的文字是不够好的，但是你又觉得他处理人类文明的手法，诸如“三体人要来”的情节，完全不是王安忆、莫言、苏童或者阎连科可以处理的。在那个意义上，他让我吃了一惊。即使到今天我都觉得，整个这十年的中国科幻作品在文学品质上是有限的，它的创作基本所依赖的是横空出世的想象力，这个想象力是非常无羁的，而且科幻的兴起和新媒介的兴起是有关的，因为很多科幻小说是在网上先发出来的。

我经常把20世纪最初十年的科幻和最近十年的科幻做类比，在这个意义上，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推荐刘慈欣，其实我完全不认得他。2011年我来人大，做了一个题目叫《从鲁迅到刘慈欣》的讲座，当时在座的很多学生都不以为然，觉得这王老师的脑袋有问题了。有学生举手说这样合适吗？我觉得刘慈欣当然不是鲁迅，不能相提并论，他只是一本作品。我想讲的是，刘慈欣给我的教育是，原来文学有很多种，原来我们在学院里正规教的文学是这样那样，但是科幻作为一个文类，有就有了，你作为一个文学的专业读者或者观察者，必须去正视这个现象。

从那个意义上，我觉得刘慈欣所代表的现象还有他内在的爆发力，他对整个历史以外的现象的重新思考，间接影响了我们对历史以内的思考，这是他们一群作家共同的贡献，不是刘慈欣一个人的贡献，包括了韩松、王晋康等等。

但是，我讲得很坦白，科幻的热潮或高潮恐怕已经过去了。一方面，这些作家的爆发力到了一个点，他们必须要停歇一下；另一方面，坦白讲，现在政府很关注他们，对他们特别友好，一旦科幻文学被委以救国救民的大任之后，很难发展自己。

三联生活周刊：有论者认为，你的文学研究是站在祛魅的现代性陷落的边缘，对另一种现代性的招魂，你对此如何看待？

王德威：作为一个补充，我倒没有说现代性失败了。我会觉得是一个发生的现代性，不完美的现代性，而且有各种可能性。我觉得在中国的语境里，我们对现代性的描述可能多半时候局限在两大论述里，一个是启蒙论述，一个是革命论述。我觉得这两个论述是重要的，形成了现代中国的思想资源以及行动、生活的形态与形式。

但从文学角度讲，毕竟我们的生命是如此复杂，不应该简化成为革命、启蒙等等这些简单的范式。我认为小说是一个众声喧哗的结构。它教导我们喜怒哀乐，教导我们穿衣吃饭，也教导我们各种可说不可说的禁忌与向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小说是一直参与中国现代性建设的一个重要媒介，它不应该被我们目前制式的现代性或教科书所规定的现代性所局限。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小说一直存在无限的可能性，这当然是我的一个近乎乌托邦的思考。

至于那个“招魂”的部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就被贴上了这个标签，可能自从我写了《后殖民写作》之后。在台湾很多批评者说，你看这个遗老遗少的姿态，写这种东西。“招魂”的另外一面是

“祛魅”（“驱魔”），在这个意义上，我当然可以提升小说作为文化建制的意义，它必须不断去搅扰、提醒或者召唤一些我们宁愿不看到的鬼魂。但是小说却告诉我们魂兮归来。我有一本书叫《历史与怪兽》，最后一章就叫“魂兮归来”。招魂的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是个大问题。在经历了那个大的动荡之后，中国文化界、历史界怎么去记忆过去？过去曾经告诉我们牛鬼蛇神是可怕的，我们要训练中国人民讲不怕鬼的故事，但我们的反问是，鬼有什么好怕的，为什么怕鬼？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招魂其实是面向历史，既看帝王将相的一面，同时也看牛鬼蛇神的一面，魑魅魍魉的一面。

所以，我可以用这种比较形容性的话来说明，小说在这个地方担负了历史所不能扮演的角色。小说之所以精彩，在于它虽然以实际经验开始，却不为其所局限。小说确实说明了许多历史要刻意隐瞒或埋葬的东西。所以用一个佛教术语来说，让鬼魂回来，我觉得是20世纪末作家们的共业。作为小说观察者与小说读者，大家有心从这个小说来复苏一个曾经喑哑的，曾经阴暗的，曾经不让我们看到的历史的一面。■

《读书》2017年第六期目录

韩少功 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

张曙光 市场设计与自发秩序

邱士杰 重温“经济学的民族形式”

李欧梵 理论于我有何“用”？

短长书

狄更斯和美国版权法之间的“恩怨情仇”（托马斯·霍伦）·旋翻新谱初足（柏万良）·“新天下主义”：观念与秩序的重构（郭盛民）

卜键 一个岛能有多少名字

杨俊杰 大清侍卫清福和小洪堡

高峰枫 拉丁文的社会史

王维佳 “胁迫之术”：传播学的心理战起源

傅刚 围观公元前七〇年宋国的弑君事件

品书录

《胡乔木传》是一部大书（王蒙）·日军侵华战争的“自供状”（傅光中）·呼唤一种源初的伦理（王光耀）

周晓虹 东亚的审读与傅高义的人生

姚达兑 傅兰雅小说征文与梁启超小说界革命

蒋晖 马里卡纳没有来临的春天
薛毅 何谓“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

刘焱 民间技艺与社会转型：一个造纸村的兴衰史

林少华 “侘寂”之美与“物哀”之美

读书平台

同情本身已是弥足珍贵（章美锦）



生活需要读书，
《读书》丰富生活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读书》邮购部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苏童：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7）

文 / 朱伟



苏童

苏童的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都有建树，可他似乎更看重对他短篇小说的评价。他自己说，他对短篇小说很自恋。一个作家，长篇小说可能显示的是气度，短篇小说则要在角度选择中显示智商与情商。苏童的短篇构思，可能很得益于他在广泛阅读中，对短篇在有限空间里表达游刃有余回味的兴趣。他编过一本《影响了我的二十篇小说》的集子，这20篇中，除莫泊桑的《羊脂球》、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似乎都是稍长一点的短篇。

其实，苏童在1989年给我写《仪式的完成》时，已经在短篇小说里追求一种类似福克纳的《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那样的调子。2001年他写了《伞》，开头便是“一把花雨伞害了锦红”。雨伞是漂亮的：绿色的绸布面上印着红蘑菇，伞柄有机玻璃里还有玫瑰，伞是道具。人物是两实两虚：小女孩锦红炫耀她美丽的伞，伞被风吹到青春期的春耕手里，无意的口角、争夺，竟导致了强奸。未成年的春耕于

是被送进了少教所，锦红的雨伞被母亲踩断了。小说跨度20年，20年后，母亲将锦红嫁给一个建筑工人，锦红因拒绝房事，成为家庭暴力的对象。为何不跟他做呢？她觉得自己已经给了春耕。离婚后，锦红走进了修自行车的春耕的车棚，她说：“我们的事，得有个结果。”苏童写春耕见她进车棚，“有点害怕，有点茫然，有一点惊喜的感觉，也有一点虫咬的悲伤”。短篇小说讲究这种细微处的把握。最终，他没选择她。苏童写锦红积累的伤心、痛苦、无助、失望，层次很多。这小说的毛病是顺势叙述，没有回流，锦红后来嫁给了一个快50岁，还有病的男人。

同样是写被美改变的命运，2004年写《桥上的疯妈妈》，命运磨砺已经变成疯妈妈身后的背景。疯妈妈站在桥头，炫耀她的旗袍与旗袍裹着的身材，旗袍是道具，人物是两实三虚。两实是曾经的美人疯妈妈与现在的美人崔医生，旗袍是美与辛酸的载体。三个虚写的人物，第一个绍兴奶奶是为交代疯妈妈疯之根源而设，她说：“你就是思想坏了才倒霉的，思想一坏，生活作风也坏。”生活作风，具体就体现在旗袍上。疯妈妈自己说，她原有六件旗袍，让素素爸爸剪坏了五件。第二个虚写人物是裁缝店的裁缝，崔医生被疯妈妈的旗袍吸引，买了红丝绒也要做一件，做旗袍就要找裁缝。裁缝要量身材，崔医生与疯妈妈要在灯光可映出的布帘后换衣服，李裁缝“吃豆腐”、悄悄占便宜，就成为这构思中的回流特别重要的一抹暖色。更重要的还要借他铺垫——量完尺寸，他说，琵琶扣要拆一个下来，不照着样子他不会做。于是用别针偷换，导致了疯妈妈发现后惊恐，精神病发作，引出第三个虚写人物崔医生的丈夫。崔医生的丈夫是卫生局的干部，他叫来了救护车，疯妈妈见车上下来人就“蜷缩成一团，整个身体都剧烈颤抖着”。她被送往精神病院，她的女儿素素就成了孤儿。在她的惊恐中，装着为美曾受过的所有的伤害，比《伞》的构思高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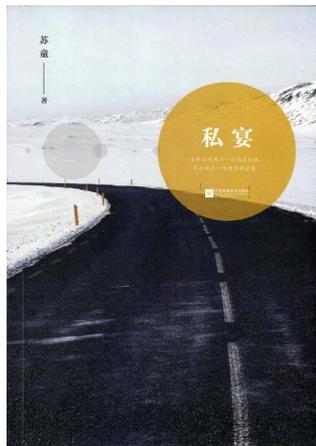
这一年苏童写的另一个短篇《私宴》其实有点夸张。他写一位在北京已经风光了的博士包青，过年回乡探亲，被胁迫参加一个老同学的私宴，被迫重新丧失尊严的过程。这位老同学大猫乃当地土豪，

小说也是两实两虚的人物配置——另两个同学，女同学程少红扮演三陪的角色，大猫甚至可以要求她当众跳脱衣舞。男同学李仁政则是俯首帖耳的跟班，他告诉包青：“没钱，好人也变坏人。”苏童有意夸张了金钱的作用，写贫富差距构成的同学关系。他写斯文者包青在酒席上的拘谨、尴尬与拙劣，这个包青原来也在大猫手下毫无尊严地受尽屈辱。这篇小说好在，私宴劝酒的过程中，写包青因其善良的本质而一步错步步错：先为程少红不跳脱衣服，后为间接伤害了李仁政，他“尽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最终只能因不胜酒力而坐在大猫脚边，喝掉了最后一杯酒。大猫则借醉酒，让他擦鞋上的泥，打了他的耳光，完成了对他身份的羞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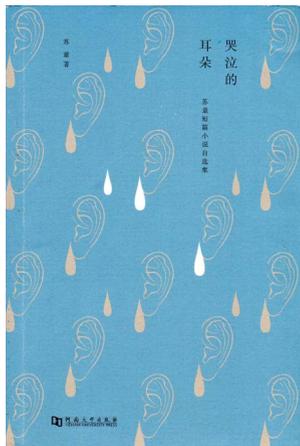
我其实更喜欢苏童后来写的《拾婴记》与《香草营》。《拾婴记》写一个裹着金葵花棉袄的熟睡弃婴，被放在了罗礼文家的羊圈里，苏童用这样漂亮的叙述：“母羊以为陌生人送来了一堆葵花”，婴儿身上的香气，“让母羊想起了春天清晨的草地，还有夏天在河边失散的一头小羊羔”。这小说的主角，其实是女婴，她清晨被发现后，招来枫杨树乡妇女们的围观，大家就劝罗礼文的老婆卢杏仙收留这孩子。卢杏仙说：“她要是一头羊，我就留下她了，羊吃草，不花钱不占口粮。”然后就写女婴不断继续被遗弃的过程：卢杏仙让小儿子庆来送到政府去，庆来把她送到幼儿园的窗下；幼儿园不收，李六奶奶只能让外甥送政府；政府午休休息，李六奶奶的外甥只能把婴儿放在花坛边；人们认为这是枫杨树人的弃婴，最后，女婴重新回到罗礼文家的羊圈里。等卢杏仙早晨起来，重新见到箩筐，箩筐里葵花棉袄还在，羊圈里多了一头小羊，羊的眼睛里有眼泪。这是一个以诗意将冷暖纠结在一起的极优秀的构思，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香草营》的构思同样出乎意料——香草营其实是一条与医院一墙之隔的陋巷。还是四个人物的结构：有名望的梁医生与女药剂师偷情的需要，勤杂工老孙帮梁医生租了小马的房子，小马在院里养了很多鸽子。梁医生与药剂师在偷情中发现，房主小马其实是把房子租给了他们，自己住在鸽棚上。

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都在小马的监视之中，于是梁医生提前退租了，药剂师与梁医生的浪漫史结束了。梁医生觉得小马手里掌握了他的把柄，小说就走向了梁医生感觉到小马会有“行动”的悬念上去。随后故事发展，却走向相反的方向——小马得了癌症，住进了医院，梁医生去看望时问起他的计划，小马其实只想巴结梁医生的关系。有求于他什么呢？其实不过是想在他已经有限的生命期内当个养鸽协会的秘书长。高高在上的梁医生当然觉得这渺小事不值得动用他的关系，就将其束之高阁了。小马的癌症无法手术，时日无多，就对梁医生的食言发泄了愤怒，梁医生却觉得自己并不亏欠小马什么。最后是小马的鸽子，脚上系着黑布飞上了梁医生的窗台。“鸽子的羽毛看上去很湿润，像是被雨水淋湿了。”它构成了结构上的“漏斗”，让你想“香草营”这个巷名，梁医生与这个表面卑贱的小马之间，构成了什么呢？短篇小说因篇幅有限，是在有限空间里通过巧妙构思，争取更多回味的余地。苏童这些短篇小说的语言已经好到经常令人敢不击节，构思中的柳暗花明也常令人会心而自叹——他写了30年，居然还在青春期。只要还年轻，就仍然有无限的可能性。☑（完）



短篇小说集《私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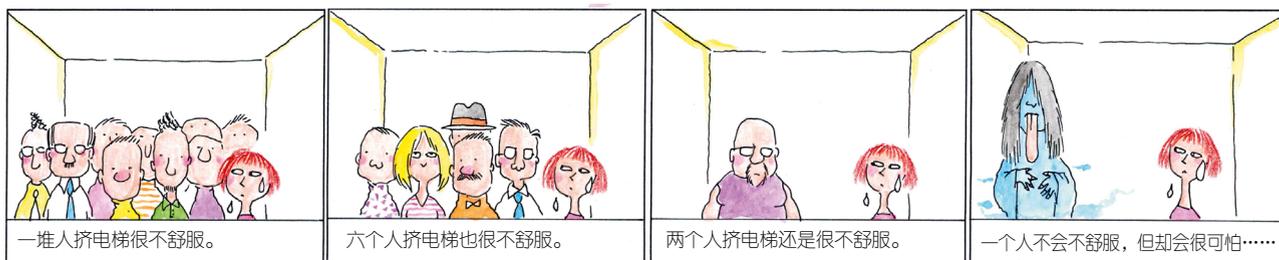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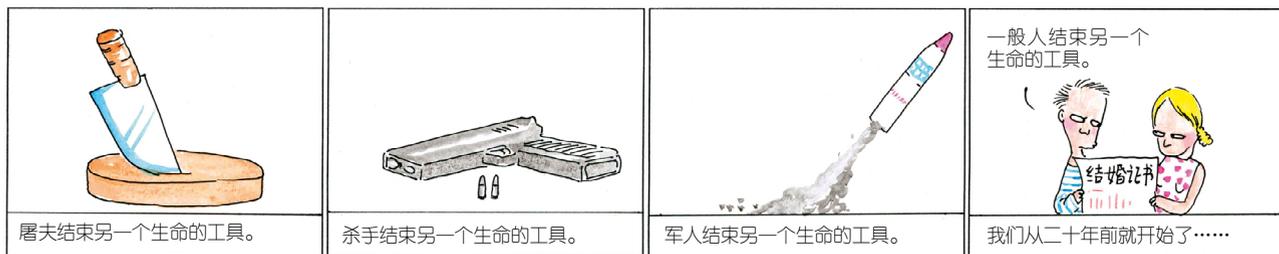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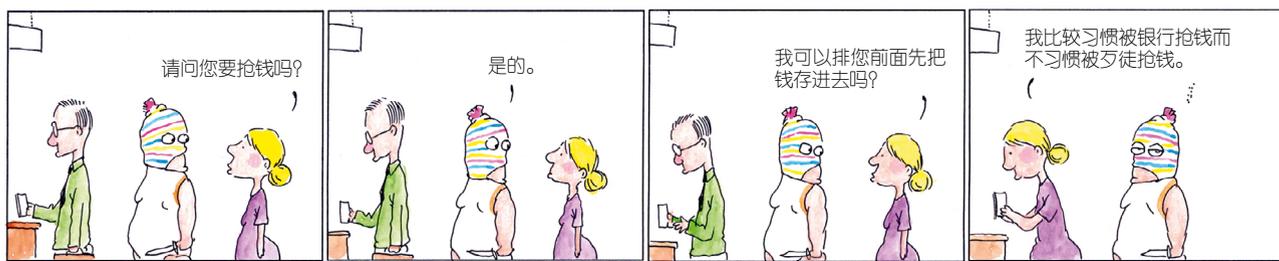


短篇小说集《哭泣的耳朵》，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大家都有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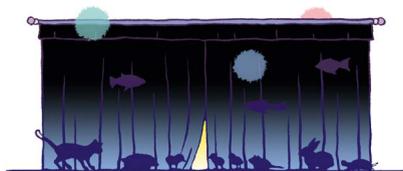


朱德庸



幕布后面的妖怪

文 / 马林斯基的树 图 / 陈曦



我人生第一次恐惧死亡，是童年时意识到母亲有一天会死去。我记得那时搂着她的脖子，求她“不要死”。她的回答我一点也不记得了。大概因为太过于轻描淡写，我心里的恐惧和疑惑从来没被驱散。后来我发现，每个家庭都有一些禁忌，在我们家，谈论死亡是禁忌之一。我外公外婆在我读大学的时候相继去世，尽管有沉甸甸的亲情，父母却从来没有和我谈论过这些事情。

童年时代我对死亡的认识和探索都发生在养过的小动物身上。有一阵子我爸养迷你热带鱼，我对它们毫不感兴趣，但却记得它们死的时候，蓝色的小小身体晾在窗台上的样子。有一年外婆养了很多小鸡，但爆发了鸡瘟。我脑海里始终有一个场景：小鸡散布在天井里，它们的眼睛半闭着，看上去很冷，浑身都在颤抖。外婆搬一把椅子坐在南面的屋檐下面，把看起来最严重的两三只揣在自己胸前的衣服里。我外婆在我印象里一直是个严厉的人，情感不轻易外露，那个情景好像是我对她流露温情的最深刻记忆。

一些人觉得不应该让小孩养宠物，因为宠物去世的时候，小孩子会伤心。我的一个同学说，她小时候养兔子，一旦兔子死了，她爸爸就会悄悄弄一只长得差不多的搞“狸猫换太子”。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担忧，其实不是孩子无法接受死亡，而是大人不知道如何面对。

从前读到过一个故事，一直特别喜欢。一个外国父亲总是带着儿子去树林里散步，有时候就会碰到一些死去的小动物的尸体。终于有一天，男孩产生了好奇。父亲顺水推舟，将此作为解释死亡的好机会。从那以后，男孩总是会有许多疑问。他分不清：如果一个人死了，那他的腿是不是也死了；如果恐龙已经死了，那么它们为什么还会出现在电视上？爸爸告诉孩子，恐龙还会出现在电视上，但那不是真实存在的。一些人和动物死了，但我们还可以常常想起他们，就好像他们还活着一样，这就叫怀念。后来孩子的祖母去世了。在葬礼上，小男孩突然说：“我看到祖母和一个人在说话。”父亲愣住了。孩子接着说：“爸爸，这就叫怀念，对吗？”

多好啊！可我小的时候，没人和我说这些。我童年时代最亲密的朋友是一只仓鼠。仓鼠死于衰老。在它迟暮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上学前我去看它，它瘫在笼子里一动不动，我用手指头叩一叩笼子，它还是不动。

我疑心它已经死了，可是我不敢发问，也不敢更剧烈地晃动笼子。死亡好像是躲在一块黑色幕布后面的妖怪，我不但没有勇气掀起一角看一看，甚至还要用幕布把它裹得更好，好像只要我装作不知道它在那儿，它就不真的存在。我抱着怀疑和忐忑去上学，到了放学的时候，忐忑重新找回来：我告诉自己，回到家的时候，他们会告诉我它死了。那它就真的死了。

记忆肯定是有保护功能的，它会屏蔽掉我们最不愿意记得的那些瞬间。我那么清楚地记得早上去看它的情形，我甚至还能看见放学路上，坐在父亲自行车后座上忐忑不安的自己。但仓鼠真的死去的那一天发生了什么，我却一点都不记得了。我也不记得，奶奶怀里的那些小鸡到底活过来没有。后来想起来，令我恐惧的其实并不是死亡本身，而是一种无措：大人们看上去那么淡定地面对死亡，我不知道我的悲伤是不是一件对的事情，如果它是对的，我又该如何去表达。结果最后，我只学会了用一种方式去面对它：当作一切没有发生。

还有一件事，我也当作没有发生。我养过很多小动物，刺猬和乌龟养在后院的脸盆里，它们不是我的宠物。它们到我家的时候，就命中注定是要被吃掉的。但是大人们总是觉得，好玩的小玩意儿，小孩子喜欢，就让她养几天嘛。还有一只土狗，曾经拴在后院角落的一棵好像永远长不大的橘树上。它来的时候身份暧昧，大人们似乎没有对我明说，但我知道，它不久就会被吃掉了。有些事情，你根本瞒不过孩子。它们被端上桌的那些饭是怎么吃的，我也一点都不记得了。

对于它们，我并不很悲伤。我们相处不久，感情没有多深，但它们的死足以让一个小孩深深理解无力感，对成人世界产生深刻的怀疑和不信任。后来，我爸爸偶尔还会在饭桌上提起这些往事，每一次我都一言不发。最近的一次，他提到一件我从来不知道的事情：小时候我的扁桃体经常发炎，大人们听了偏方，还偷偷给我吃过猫肉。我心里一惊，想起一只曾经与我那么亲热，但却走失的小猫。应该不是它吧，它那么小，肉都没有多少呢。可我没去求证。那是幕布后面的另一只妖怪，我都这么大了，还是没有勇气掀起幕布来看它一眼。☑